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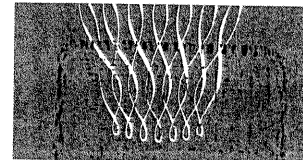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权力主义人格 (上卷)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美] 西奥多·W·阿道诺等 著

李 维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odor W. Adorno

Copyright©1950 by Theodor W. Adorno

Translation Copyright©1998 by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USA)

Copyright Lice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1-1998-20 号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当的年轻,但其源起,却可溯及人类思想的萌芽期。18 世纪之前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官能心理学家、科学革命时期的机械论者等著述之中。到了 18 ~ 19 世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联想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科学边缘的研究和实验生理学等,加速驱动着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础。然而,心理科学的真正发展则是在 20 世纪。回顾一下心理科学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心理科学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比较的范本,而且可以为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基本走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心理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出版“20 世纪心理学通览”的目的就在于此。

20 世纪的心理学出现了不少流派,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影响十分广泛。“通览”以 20 世纪心理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派、一家、一人、一说为选题原则,涉及到的流派有元素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策动学说、格式塔原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等。有些学派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家系。从每一流派或家系中有所侧重地选出一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学说,从中

可以看到这些学说对 20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们自身的地位和成就。当然,有些学说所属流派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只能以思想观点大体相近为依据而暂时归入一个流派的名称之下。至于一些跨派别的学术著述,则根据其侧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相应地归入人格、测量、人与社会等类别。

在“通览”中,每本译作都附有译序,旨在对倡导某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在 20 世纪心理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做一基本的阐释,以说明为什么选择该书的理由。至于译序中对历史上同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译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对此,难以强求一律。译序中的观点和结论由译者自负责任。此外,由于同一术语和概念在不同作者和不同时期的学说中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专业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人名译名,除约定俗成的外,也有可能不统一。对此,在主要术语和所有人名后都附有外文原文,以便读者辨析。

由于资料来源、外国语种、“通览”篇幅等方面的局限,加之我们经验的缺乏,所收的流派还不够全面;由于授权有先后,译作有快慢,很难依照流派活跃的年代、著述发表的年份、流派本身的结构、流派之间的关系等,有顺序、分类别地出版这部“通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适时地调整。对于这部“通览”为什么选定这位代表人物而不是那位代表人物,为什么收入某位代表人物的这部著述而不是那部著述等问题,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的意见或建议,我们表示真诚地欢迎和感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译序

1944 年 5 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邀请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美国学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关于宗教与民族偏见的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制订了一项研究计划,以便解决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偏见。对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家拥有各种理论,但却没有找到答案。为此,他们制订了两种研究标准。一种研究标准所涉范围较窄,主要针对社会教育遇到的问题,例如,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中若干重大事件的反应,以及对大众传媒在报道团体之间关系时所用方法和技术进行评价。另一种研究标准属于基础研究,目的是充实该领域内的知识体系。

上述两种研究标准由许多子课题所组成,其成果为五部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们分别从某个侧面阐释偏见的因果关系:第一部著作是由贝特海姆和贾诺维兹(Bettelheim and Janowitz)所撰的《偏见动力学》(*Dynamics of Prejudice*),主要探讨退伍军人的性格特征与其偏见的关系。他们调查了退伍军人的战争经历,因为这些经历通常伴有复杂的焦虑和应激,并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活。第二部著作是由阿克曼和贾霍达(Ackerman and Jahoda)合著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障碍》(*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该研究以一些来自不同行业的个案为基础,分析其意识和理性之下的因素对个体权力主义人

格的影响。第三部著作是由马辛(Massing)所撰的《破坏的彩排》(*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主要分析社会情境与偏见的关系,因为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直接制约着个体作出的反应或个体表现的心理倾向。第四部著作是由劳温塔尔和戈特曼(Lowenthal and Guterman)合著的《骗人的先知们》(*Prophets of Deceit*),主要研究煽动者如何将业已存在的偏见和倾向转化成某种学说,并且最终导致外显的行动,其中包括煽动者的作用、煽动者的鼓动技巧,以及使萌芽状态的感觉转化为特定信念和行动的调节机制。第五部著作就是这次被译成中文的《权力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它由西奥多·阿道诺和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Theodor Adorno and Else Frenkel-Brunswik)等人所著。

—

西奥多·阿道诺(1903~1969)出生于德国,求学于法兰克福大学。1931年,他因撰写有关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的学术论文受到法兰克福大学一些权威的首肯而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的专题讲师。由于纳粹在德国崛起,他离开了德国,移居英格兰,执教于牛津大学。不久,他仿效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友人侨居美国。1938~1941年间,他曾受聘于纽约社会研究所。1941~1948年间,他出任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课题组长,专司权力主义的研究。1948~1950年间,他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社会歧视研究项目课题组长。

阿道诺的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哲学和音乐社会学,并因此而闻名于学术界。早在1936年,他曾就家庭与权威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研究,并著有论著。这一论著为他后来进行权力主义人格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承接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

时,他与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等人协同进行了一项有关权力主义人格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1950年,他们合作撰写了汇集其研究的心理学代表作《权力主义人格》。在这部著作里,阿道诺认为权力主义是某些人格成分的核心,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更多地关心权力,包括本身行使的权力和服从上司的权力。

1950年以后,阿道诺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学。由于受到马克思、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他努力谋求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的综合。在哲学领域,阿道诺富有批判精神和正义感,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社会压迫”,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压迫,而且也包括专制的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为此,他曾著有《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在他逝世后的1979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此外,阿道诺还对音乐颇感兴趣。1938~1941年,他在侨居美国期间,一方面为纽约社会研究所工作,另一方面还兼任普林斯顿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1949年,他发表专著《新音乐哲学》。1952年,回到德国后,他写了一篇颇有争议的论文,分析了瓦格纳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起因。他的音乐社会学代表作《音乐社会学导论》在其去世后的1976年出版。

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1908~1958)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在美国的精神分析人格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其成名在于对权力主义的经验主义研究。她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便开始用人生进程的观点研究人格。在维也纳大学期间,她致力于精神分析、逻辑实证哲学的研究,参与了当时的“科学统一”运动。由于她是犹太人,因此在纳粹横行欧洲时所遭遇的经历,为她在美国20年间发表富有成果的著述打下了基础。

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吞并,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便逃亡美国,在伯克利儿童福利研究所(后来改称为人类发展研究所)从事心理学研究。当时,以行为主义或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操作主义在美国十分流行。她的到达非常适时,因为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新的专业正在期待精神分析的支撑,以免沦为操作主义的附庸。而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的精神分析和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使她能够捍卫当时精神分析的科学尊严。

在美国,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结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学者阿道诺,并与伯克利民意研究所所长尼维特·桑福德(R. Nevitt Sanford)和丹尼尔·莱文森博士(Dr. Daniel Levinson)合作筹划和发起范围广泛的反犹主义心理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负责实施和分析有偏见者和无偏见者的临床访谈。他们的成果《权力主义人格》使得精神分析的临床洞察和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经验主义方法对社会性质和思想意识的研究发生重要影响。虽然该书由于方法论的缘故而受到过尖锐批评,但是仍不失为是对现时仍然重要且尚未解决的问题的不朽论述。

二

《权力主义人格》是一部关于社会歧视的著作。它的目的不在于对一些业已广泛传播的信息补充经验主义的证据。相反,它意欲探讨“人类物种学”这一新现象的崛起。作者将其中一部分物种称为权力主义者。这类权力主义者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权力追求者,他们拥有文明社会的典型思想和技能,但却坚持非理性的感反理性的信念。他们既是开明的又是迷信的,既是普通人又不想成为普通人,既追求人格的独立又倾向于盲从权力和

权威。构成这种矛盾的人格因素,已经引起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本书就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

系统地研究社会歧视的机制,尤其是研究社会歧视的人格类型,并非起始于《权力主义人格》。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利斯·萨缪尔(Maurice Samuel)、奥托·芬尼奇尔(Otto Fenichel)等人已经勾勒了有关偏见者的心理图景。这些重要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主义人格》在方法论上达到整合,并且探讨研究结构所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若想把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既需要明确研究的目标,又需要一定规模的学科综合,而这恰恰是前人所无法实现的。《权力主义人格》的初衷是,以数十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将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达到有组织合作水平,除了把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外,还意欲动员在不同理论领域和实证调查中创制出来的各种方法和技术,让它们为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服务。例如,在《权力主义人格》中,阿道诺负责介绍与人格因素有关的社会维度,以及与权力主义有关的人格概念,还分析了访谈的思想部分,而这些访谈内容是根据社会理论的类别而展开的。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负责对人格研究中的若干变量进行系统阐述,并对动态定向的类别和访谈材料的量化进行系统地构思。桑福德策划了将各种技术结合起来的方法,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详尽的个案研究方面,尤其涉及偏见人格的动态病因。莱文森则主要负责AS量表、E量表和PEC量表,以及运用心理学术语对测量结果进行整理,包括对投射材料予以分析,对统计方法和操作步骤进行设计等。这样一种使不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分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方法充分体现于本书之中。社会理论、深蕴心理学、内容分析、临床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和投射测验等领域的专家彼此交流他们的经验

和研究成果,经过密切的合作,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成果:现代权力主义的要素。

现代权力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偏见和歧视。偏见是指对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持有某种否定性的消极认知和态度,这种认知和态度通常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的。歧视是指由偏见的认知和态度引起的直接指向偏见目标的否定性消极行为。歧视源自偏见。凡有歧视的行为,必有偏见的认知和态度。偏见和歧视所针对的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常与宗教、种族、政治或文化等有关。

偏见作为一种态度,有其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成分。个体对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的偏颇预期,就是偏见这一态度的认知成分。偏见者在以偏颇的预期作出认知反应的同时,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也就是说,在与偏见的对象接触时,不论是直接的接触抑或间接的接触,都会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而这正是偏见态度的情感成分。偏见的行为成分表现在,偏见者用消极的行为方式对偏见的对象实施行动。当这种倾向在外显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时,歧视也就发生了。

偏见是以不正确或不全面的信息来源为基础的,偏颇的预期具有定型或刻板的特点,而偏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则带有过度类化的倾向。定型和类化导致偏见者忽视个体差异和条件差异,并为第一印象的感受和判断所左右,根据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社会背景对特定群体及其成员进行归因。偏见作为一种不当的认知和态度,一旦被具体化为外显的行为,就会出现歧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制约行为的因素,以防御已有的偏见转化为歧视,但在特定的情境里,个体的偏见不免借行为表现出来而发生歧视。歧视的表现程度高低不一,低程度的歧视有情感色彩的言语贬抑或社交回避,高程度的歧视有暴力

行为的表现等,歧视发展的极端便是灭绝种族或宗教的屠杀。

在《权力主义人格》一书中,作者对偏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并由此派生出一些新的术语和新的方法。新的术语如“表面敷衍”等,它是歧视的一种微妙而曲折的表现形态。人们对高歧视和低歧视是容易辨识的,正如《权力主义人格》中提到的两个个案那样。但是,有不少社会歧视是非两极化的,它们既不极端的高,也不极端的低,而是以明显的迁就和表面的积极来对偏见的对象作出行为反应,目的是以甚少的代价作为换取自己在今后作出实质性的歧视行为的托词或借口。新的方法涉及态度测量的模式。在评定人们偏见的性质和程度时,需要对其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成分逐一进行测量。认知成分的测量属于成见评定,通常运用特质的项目,要求被试指出哪些特质与哪些群体相连。情感方面的信息一般是通过态度量表获得的,量表的设计是为了测量个体对特定群体的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包括向被试呈一系列性质相反的形容词,要求他们按此对特定群体作出相应的选择,或者呈示有关某个特定群体的一系列陈述,要求被试指出自己倾向于赞同还是反对这些陈述。行为成分的评定采用社交距离量表,也即向被试呈示个体与特定群体之间假设关系的项目,它们表示被试与群体成员之间不断递增的接近或亲密的等级,其范围从最低层次的邻里交往或同事沟通到最高层次的相互通婚,然后要求被试指出自己愿意在何种亲密等级上接纳该群体成员且与之交往。

三

《权力主义人格》将偏见和歧视的研究与种族偏见和歧视联系起来,对种族中心主义予以了精辟的分析。种族中心主义这

一术语最早是由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于1906年在其《社会习俗》一书中提出的。萨姆纳运用这个概念意欲表达下面两层意思:(1)人们观察自身团体的一种倾向,并且以此为标准去评价所有其他的团体;(2)认为自己团体比其他团体优越的一种倾向。虽然上述两层意思至今仍在一些学术圈子里使用,但是种族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更多地是指第二层意思,即认为自己的团体比其他团体更加优越。这个术语常与“内团体”和“外团体”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内团体是指个体所属的团体,所谓外团体是指个体所属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

萨姆纳最初认为,种族中心主义是一种“人类本性的事实”。为此,他列举了摘自各种人种史和历史记载的75个确实无疑的实例。然而,今天赞成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已经寥寥无几。现在,社会心理学家的基本共识是,种族中心主义并非一种“人类本性的事实”,而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所以,《权力主义人格》的研究主要指向:(1)产生、增强和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因;(2)消除社会领域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实际意义。其中,尤以第一方面的研究为重。

关于种族中心主义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根据研究人员的不同研究角度而予以分类。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第二类是人际动力学的研究;第三类是社会结构的种族中心主义研究。《权力主义人格》属三类研究的综合。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作者试图以法西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为背景。揭示导致团体外敌视的根本心理原因。他们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格动力结构,提出了所谓的权力人格。造成种族中心主义的心理动力包括压抑、投射和否定,而所有这些因素均会产生对其他团体的仇恨。权力综合征的起因可

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家庭经历。在人际动力学研究领域,作者广泛引用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参照团体理论。该理论特别注重团体对其成员的吸引力,以及这种吸引力与成员对其团体的忠诚程度之间的关系:当团体对其成员具有奖励效应时,预示着内团体忠诚的增强;当内团体为某些利益与外团体产生竞争时,内团体的忠诚可望增强;当内团体成员自以为自身的利益遭到外团体侵犯时,就会发生对外团体的敌意。人际动力学理论被看做是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发展,因为它同时为消除种族中心主义提供了一种途径。也就是说,当内团体成员既处于社会分裂状态又不能提供社会奖励,而外团体不仅强大而且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个体的种族中心主义可能被消除,致使内团体成员逐渐尊重和接纳外团体成员而成为其伙伴的敌意对象。在社会结构研究领域,作者是从社会结构的组成来揭示种族中心主义原因的。例如,内团体的领袖之所以将一个外团体看做一种威胁,是因为这样做对维护团体内的秩序和驱力十分有利,由此导致种族中心主义的增强。在该领域,人类学家认为,团体所处的文化特征既能促进种族中心主义也能阻碍种族中心主义,正因如此,研究种族中心主义需要关注不同文化的亲属关系、权力分配、忠诚的结构,以及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和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顺应。

尽管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各自提出了一些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的方法,但是,由于它们的研究限于某一方面,因而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正如《权力主义人格》所述,种族中心主义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根源,其中,有些起因不能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例如,社会的亲属结构、特定的亲子关系等)。为了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研究人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接触假设”和“超层级目标”。就“接触假设”而言,研究人员调查了各种种族

杂居现象,结果发现,通过增加不同团体成员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减弱团体之间的敌意,促进积极的相互关系。然而,后来的许多研究表明,要使接触产生上述的效果,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包括不同团体的成员在共同决策时必须拥有相同的发言权,以及在共同的团体生活中必须拥有相等的地位。此外,研究人员在调查竞争性团体的过程中,提出建立一个共同的“超层级目标”,也就是说,当不同团体的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工作时,种族中心主义将会被减弱。

四

《权力主义人格》还研究了权力主义者与其所处阶层的心理结构、特征、功能,以及形成与变化。阶层心理由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所构成,包括需要、兴趣、情感、理想、信念、世界观、态度、舆论、传统和道德氛围等成分。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因而它们之间在观念、信念、理想、动机、愿望、兴趣和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乃至对立,从而形成不同阶层者的不同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行为取向,也即不同的人格心理特征。

《权力主义人格》从三条基本途径研究各种阶层心理:(1)研究历史和当前存在的各种具体阶层的心理特征;(2)评述特定时代的各种阶层的不同心理特征,尤其是创造时代特色的各种阶层的相互关系;(3)分析阶层心理与阶层成员心理的互动,以此了解团体心理和团体成员心理的相互关系。

上述三条基本途径涉及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团体社会心理的结构,二是社会阶层的标签。就团体社会心理的结构而言,关键在于考察阶层心理的一些重要因素。例如,阶层的需要。这

是《权力主义人格》中社会情感范畴的一个因素。既然阶层地位决定了每个成员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数量和组成,那么阶层地位也就决定了阶层的需要结构,以及每种需要的相对的心理意义和权重。又如,阶层的兴趣。阶层的兴趣是由包括该阶层的整个关系系统所决定的。《权力主义人格》从社会心理角度提示了在阶层层次上形成的阶层兴趣是如何决定个体行为的。此外,阶层兴趣是作为整个阶层的兴趣而形成的,然而,阶层的每个成员不仅参与属于本阶层性质的团体,而且也有可能参与许多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团体活动,因此阶层内部就会出现若干按收入水平、职业地位、技术能力等划分出来的亚团体,加上一个阶层的成员可以同时又与另一个阶层的成员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各种兴趣的相互交错,而其中每种兴趣都是由社会团体的从属关系决定的。

就社会阶层的标签而言,它是一种将某些特定的个体及其行为归入某一类别,并且予以定性或界说的倾向。《权力主义人格》抨击了标签论所谓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容易犯罪和变态的评定。它将数据和分析两者结合起来,为现代标签论提供了一个实例。例如,美国黑人为社会地位而奋斗,往往会被界定为两种相反的定义。第一种是,他们不满现状,敢于冒险和拼搏,希望提升自己目前的社会层次等;第二种是,他们的奋斗意味着一种邪恶的信号,因为他们本质上是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的、懒惰的、好攻击的等。此外,这种标签还会发生渐变,即从奋斗行为是邪恶的观念出发,进而将行为者本人视作是邪恶的。一旦行为者接受这样的归类,则他们就会在被归属的同类群体中表现出相应的举止,这也就是所谓的标签作用。

《权力主义人格》指出,有些人之所以把社会阶层作为背景,认为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容易犯罪,是因为他们

原本不是根据该行为的本来性质来赋予犯罪行为这种特征的,而是阶层意识或团体意识所强加给他们的定义。也就是说,由于邻里评价、学校教育、司法机关,以及犯罪矫治机构在处理这些阶层成员的行为时,给他们贴上了顺应不良的标签,致使不仅行为者本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修正自我的印象,而且社会也会由此营造一种不利的评价氛围,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使之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甚至真正犯罪。由此可见,社会阶层的标签论实际上是关于行为、思想、人—环境相互需要的评定依据。标签论表明人—环境相互需要的可定义性,并引起异常行为。在异常行为产生的过程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社会对行为的反作用。所以,与其他一些评定个体或社会异常情况的理论相比,《权力主义人格》所说的社会阶层标签,其中心思想是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反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权力主义人格》还指出,社会阶层的归类及其派生的行为,包含两个关键的制约因素:(1)立法者创立了迎合本土文化的行为规范和法律范畴,并对此进行阐释,从而建立准则,而不考虑少数民族的外来文化;(2)官方的控制机构,尤其是警察、检察官和其他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对这些准则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并且运用这些准则将有些个体或团体同其他个体或团体分离开来,甚至把前者界定为容易出问题的个体或团体。对那些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来说,上述两种贴标签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内在含义。具体地说,所谓社会阶层较低成员的问题行为,是社会阶层较高成员对前者的特定行为的反作用引起的,而那些具有贴标签能力的个体或团体,则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运用分类标准将某些个体或团体予以归类,结果,有些行为就被视做“异常行为”,有些个体或团体就被说成“越轨者”或“顺应不良者”。

就《权力主义人格》而言,它关于标签论的抨击容易遭人误解和批评,好像所有发生在社会阶层较低成员身上的问题行为都是无辜的,也就是说,都是由社会阶层较高成员对他们的偏见和乱贴标签所造成的。对此,一种主要的抨击认为,它分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注意,因为这种制度本身创造了社会阶层较低成员的问题行为的条件。《权力主义人格》对于这些批评的反应是,当务之急是应该精确地鉴定那些支持标签效用的各种机构,而非仅仅对一味指责的批评家进行反驳。

五

《权力主义人格》给我们的最深印象是,宣传对权力主义者营造社会偏见和歧视的舆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宣传对象心理活动的规律,以及宣传活动对宣传对象如何产生效应的规律,是宣传活动的任务。宣传活动的目的在于转变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以达到既传播信息又对人们的观念、态度和定势施加影响的双重效应。

早在《权力主义人格》出版之前,已有许多研究涉及有意或无意的宣传对心理活动的影响。例如,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 Wundt)就说过:“完全有必要把群众的心理作为系统的实验研究对象,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群众的心理现象。问题不仅在于从理论上予以认识,而且首先要把它结论运用到政治、法律、教育、经济等领域中去。”看来,《权力主义人格》是赞同冯特这一思想的,该书作者运用调查、访谈、临床和投射等技术,对权力主义者的宣传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进行了研究。其中,最为显突的是关于定势心理的理论。

定势心理的理论主要研究宣传活动的心理内容和心理规

律。该理论认为,由一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所促成的某种准备状态,决定着个体的继后的心理活动趋势。根据这一理论,宣传活动不能仅仅限于传递信息,还需形成听众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因为态度是个体对某些现象所持的一种社会定势,而宣传活动的实质就是对个体施加影响的过程。这里,外部环境和个体需要是决定意识和行为的两个基本因素,它们包括四个方面:内部因素包括需要和自我,外部因素包括现实和社会要求。当这两个基本因素作用于个体时,会使个体形成一种心理准备,这种准备给个体继后的心理活动以方向。定势的趋向特征表现为,个体作为一种完整的人格系统,会竭力使引起定势的因素(在有些情境里,这些因素可能相互冲突)在其心理内部协调一致,并在顺利运用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一旦遇到不一致,或者进行得不够顺利,个体就会重新评价冲突因素,改变对它们的态度,恢复稳定状态。宣传活动正是利用这一规律来达到其宣传效果的。

《权力主义人格》是从平衡角度来考察定势变化的心理机制的,也就是说,改变定势的动力是定势成分之间失去平衡所引起的否定的心理体验。定势的某一成分发生变化,会影响与其定势有关的其他成分之间的平衡,结果整个人格系统就会力图恢复业已失去的平衡,于是出现新的定势,或者使原有的定势在稳定的前提下有所改良。正因如此,《权力主义人格》从分析定势变化的心理机制中得出两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1)为使宣传卓有成效,必须信任宣传演说的指令机构,既相信它有权威,又相信它是内行;(2)重复同一种宣传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手段,这样方能使宣传演说具有个性和特色。

权力主义者十分注意宣传者的心理特征。对听者来说,最能影响宣传效果的心理特征是宣传者的威望。如果听众认为宣

传者是一位很有威望的人,那么他或她对听众的影响就会具有很大的强度。这个问题涉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若干效应:(1)名片效应。人们都希望从具有威望的人那里接受到可靠的信息,甚至是毫无批判地接受。在宣传过程中,由此机制获得的效果称做“名片效应”。宣传者在宣传时经常利用这种效应。例如,为了让社会阶层较高的团体对社会阶层较低的团体产生偏见,宣传者便利用社会阶层较高的团体受到利益威胁的特例进行宣传,因为这种舆论像名片一样具有“先声夺人”的功效。(2)自己人效应。宣传者与听众之间存在的具有某种意义的相似性,能够提高宣传者的影响力。这种相似性会使听众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从而把宣传者视做与自己同类,两者彼此产生移情。例如,宣传者把宣传的主题组织到另外一些能为听众所接受的主题中去,以营造宣传者的观点和听众的观点相近的态势,从而起到动员听众的作用。(3)遵奉效应。社会环境是形成和改变人们观点的重要因素。个体在行为过程中会自发地相互模仿,重复别人的行为,而且在这样做时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倾向。权力主义者在制造舆论时,经常运用他人行为的榜样,以及他们之间众口一词的观点,使听众产生遵奉行为和遵奉观点。

六

《权力主义人格》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社会心理学需要关注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相互作用,包括对个体政治心态、团体政治心态和社会政治心态的研究。社会存在决定政治心态,政治心态对社会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个体政治心态涉及个体政治的社会化。在《权力主义人格》中,它主要指政治在人格结构中的作用。权力主义者通过营造

舆论,把那些自以为利益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组织起来,以他们追求的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形成权力主义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准则。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个体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环境与其主观能动性交互作用的过程,亦是一个不断“内化”和“外化”的过程。由此形成的政治心态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并且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意向所组成的统一体。政治偏见是一种歪曲的政治认知,包括种族偏见、宗教偏见、政治人物偏见等;政治冷漠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情感,包括人们对参与政治毫无兴趣,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等;政治信念是政治意向的灵魂。所有这三个组成部分,在《权力主义人格》中都有具体描述。

团体政治心态涉及群众心理。《权力主义人格》把群众心理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去个性化;(2)强烈的情绪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情绪替代理智;(3)不安于现状,不满于现状,要求进步和改革。基于这种概括,它以团体动力学为依据,研究团体活动的内部机制,包括团体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团体本身的行为规律等。与团体动力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有五个,它们是:团体的领导权力、团体的凝聚力、团体的互动现象、团体的决策,以及团体的冲突和协调。尤其是团体的领导权力,它是维持团体正常运作并对团体成员产生约束力的基础。团体领导权力的不同的领导风格,会造成不同的团体心理氛围,从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活动。

社会政治心态涉及政治运动心理。政治运动的发生、发展、衰落、停止等,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心理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权力主义者知道,心理上的需要期望与现实中的需要满足之间不可能达到一致,而两者的矛盾有可能导致运动的发生。在此运动过程中,舆论能够影响民众心理,其中,设法让

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威胁”,是引发政治运动的动力。《权力主义人格》主要描述了两种可能引发政治运动的动力:(1)民族心理。民族心理是通过民族文化体现出来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希望同化外来的文化,而外来的文化则希望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以免失去其个性。权力主义者利用这一冲突,以维护本土的民族文化为由,把保持外来文化的动机和行为视做异端或威胁,这就迎合了某些种族主义者的所谓民族心理。(2)变革心理。社会变革既是一场社会革命,也是一场心理革命。权力主义者深知变革的需求源自一定的心理动因,于是,他们利用存在于人们中间的刻板心理定势、保守的舆论压力、失衡的心理期望等因素,作为要求变革的心理动因,借以排斥在他们看来对己构成威胁的其他团体和社会政策。

《权力主义人格》一书既具理论价值又具实践价值。对社会教育来说,没有捷径可走。若想回避复杂的研究历程和理论分析,就无法获得科学的结论。该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偏见,是无法通过单纯的驳斥来予以克服的。而对此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的科学阐释,能够直接对偏见赖以存在的文化氛围作出改善。人类的文明史已有不少例子说明,民众的盲目崇拜不是通过宣传来消除的,而是通过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在研究了盲目崇拜产生的根源后才得以解决的。旁且不论,他们的理智贡献在《权力主义人格》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 维

2002年6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 录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1
中文版译序	1
《偏见的研究》丛书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引言	1
一、问题	1
二、方法论	15
三、数据收集的方法	24

第一部分 思想倾向的测量

第二章 比较两名大学男生的思想:初步的观点	39
一、麦克: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获得高分的男子	41
二、拉里: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获得低分的男子	48
三、上述两例的分析	54
第三章 反犹思想研究	78
一、反犹主义(AS)量表的设计	80
二、结果:量表的统计分析	97
三、反犹主义量表的简短形式	113

四、个案研究的证据:麦克和拉里对反犹主义量表的反应	121
五、讨论:反犹主义思想的结构	124
第四章 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	139
一、民族中心主义(E)量表的构建	142
二、结果:量表的统计分析	149
三、民族中心主义所包含的反犹主义	165
四、个案研究:麦克和拉里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反应	193
五、结论: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结构	196
第五章 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团体成员身份	207
一、政治经济保守主义(PEC)量表的构成	209
二、民族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	242
三、个案研究的证实:麦克和拉里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回答	250
四、各种政治经济团体中民族中心主义和成员身份之间的关系	254
五、结论	277
第六章 与某些宗教态度和宗教实践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	280
一、结果	280
二、讨论	292
三、归纳和小结	293
第七章 对反民主倾向的深层因素的测量	296
一、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建构	299
二、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相继形式	322

三、法西斯主义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相关	346
四、各个被试组法西斯主义量表平均分的差异	351
五、个案研究的证实:麦克和拉里对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反应	357
六、小结	369
第八章 与智力和教育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	372
第二部分 临床访谈反映的人格	
第九章 访谈:对偏见人格的一种研究方法	387
一、团体的比较	387
二、访谈被试的选择	391
三、访谈者	401
四、访谈的范围和技术	402
五、访谈计划	405
六、访谈的记分	433
第十章 访谈所揭示的父母影响和童年影响	446
一、个体对父母的态度和家庭概念	447
二、儿时环境概念	474
三、童年时期的事件与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	497
四、关于家庭模式的概要和结论	508
第十一章 访谈所揭示的性爱、人际关系和自我	515
一、对性的态度	515
二、对人的态度	537
三、对自我的态度	558
四、童年时代的自我概念	576

第十二章 访谈所揭示的动力的和认知的人格结构	585
一、动力的性格结构	585
二、认知的人格结构	609
第十三章 综合的分数和访谈结果的概述	618
一、主要研究领域的分辨力	618
二、访谈的综合分数和评定的效度	621
三、访谈中获得的人格模式之小结	623

第三部分 投射材料所揭示的人格

第十四章 持有偏见者的主题统觉测验	643
一、测试过程	645
二、实验报告的分析方式	652
三、麦克和拉里的主题统觉测验	717
四、小结	740
第十五章 人格和思想研究中的投射问题	742
一、评分项目的量化	745
二、评分手册:回答投射问题的项目	747
三、结果	789
四、小结	807

第四部分 思想的质的研究

第十六章 访谈材料所揭示的偏见	819
一、反犹太主义的“功能”特征	824
二、想像的敌人	829
三、反犹太主义的反犹原因	836

四、两种犹太人	842
五、反犹太主义者的困境	847
六、既是法官又是原告	851
七、不相称的资产阶级	861
八、低分被试的反应	869
九、小结	880
第十七章 访谈材料所揭示的政治和经济保守主义	883
一、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	887
二、若干政治和经济的题目	941
第十八章 访谈材料所反映的某些宗教思想	970
一、一般观察	973
二、具体问题	976
第十九章 类型和特征	990
一、研究方法	990
二、高分者的特征	999
三、低分者的特征	1020

第五部分 个体和团体的分析

第二十章 权力主义人格与遗传的关系:两个个案的研究	1041
一、麦克的例子	1042
二、拉里的例子	1065
第二十一章 犯罪和反民主倾向:囚犯的研究	1076
一、引言	1076
二、民族中心主义	1082
三、政治—经济态度	1099

四、道德和宗教	1110
五、防御软弱	1126
六、异性爱	1138
七、反内感受作用和童年经历	1146
八、对待父母的态度	1149
九、高分者和低分者的“犯罪行为”	1162
第二十二章 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有关的心理障碍：对精神病诊所患者的研究	1167
一、样本的性质	1168
二、问卷的统计结果	1172
三、民族中心主义与各类精神病的关系	1174
四、与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	1189
五、患者在精神病访谈中所反映的人格倾向	1197
六、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临床描述与人格	1225
七、小结	1247
第二十三章 结 论	1258

《偏见的研究》丛书序

在今日的世界里,反犹主义(anti Semitism)虽未以狂暴性和破坏性来表现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条件成熟,它是会表现的。即便是一种社会病症,也有它的静止期。在此期间,社会科学家可以像生物学家或医生那样对它进行研究,以便找到有效的方法来防止或减弱下一次爆发可能造成的致命损害。

在今日的世界里,人们也许不再记得若干年前那场机械化的迫害和屠杀,而它恰恰发生在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避难所里。不过,经过那场战争,人们的良知也因此而提高了。他们彼此询问,在这样一个具有法律、秩序和理性的文化中,怎么有可能存在原始民族和宗教仇恨等非理性的残余呢?他们该如何解释广大人民曾经忍受过的关于自己的同胞被集体屠杀这一事件呢?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还有哪些组织仍具有“癌变”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不断予以启迪,仍有可能出现回归原始人类的返祖现象呢?就人类有机体而言,他们是否仍有可能以破坏性的侵略方式对我们文化中的某些刺激作出反应呢?

但是,如果人们不去系统地寻找答案的话,光是提高良知还是不够的。人们因为自己的天真而付出的代价是够昂贵的了。单凭符咒,实际上不可能驱逐暴风雨、灾祸、疾病或一切邪恶的东西;意欲制造天下大乱的人,也不会出于对受害者的怜悯而洗手不干。

偏见(prejudice)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每个人都有一种理论,但却没有人拥有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认为他是研究自己的社会科学家,因为所谓社会科学,实际上是日常生活的要素。科学进步也许可以通过科学家对现象的分析来获得指引。为了探讨比团体间冲突的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于1944年5月邀请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美国学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关于宗教和民族偏见的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制订了一项研究计划,以便解决上述提出的关键问题。他们讨论了两种研究水准。一种研究水准所涉范围较窄,主要针对教育机构遇到的问题;例如,对当前社会生活中若干大事的公开反应,以及对大众传媒在报道团体间关系时所用方法和技术进行评估。另一种研究水准属于基础研究,目的是充实该领域内的知识体系。

第一种研究由许多子课题组成,这些子课题所涉范围有限,而且关注特定的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些小规模的研究有其好处,便于我们在设计它们时发挥更大的独创性,反过来,它们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两种研究水准(有时称做“短程研究”和“长程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结果是直接满足研究计划还是间接满足研究计划,而不是方法论、技能和技术方面的区别。对于这两种研究水准,肯定会涉及学科间的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促进这两种研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科研部,由我们两人交替领导。科研部的责任不只表现在对偏见现象开展基础研究,而且还表现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这几部著作代表了该项研究的第一批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业已出版的五部著作构成了一个单元,一个整体。它们分别说明了我们将称之为“偏见”现象的一个方面。其中,三部著作探讨了现代人类人格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直接制约着一个

人对民族和宗教团体作出敌对反应。这几部著作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个体心理学中,哪些东西会使一个人“产生偏见”,从而使他或多或少有可能对戈培尔(J. P. Goebbels)或吉拉德·K·史密斯(Gerald K. Smith)的煽动作出赞许的反应?由阿道诺(Adorno)、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Frenkel Brunswik)、莱文森(Levinson)和桑福德(Sanford)合著的这部《权力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以一组综合的研究技术为基础,也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表明人格特征与偏见有着高度的相关。该研究也成功地创制了在各阶层人口中测量这些特征的工具。

在一些更加有限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也探讨了团体问题。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和贾诺维兹(Janowitz)所从事的《偏见动力学》(*Dynamics of Prejudice*)的研究,考察了退伍军人中人格特征与偏见的关系。他们调查了战争经历,因为战争经历通常伴有复杂的焦虑和紧张,并且作为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额外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活。另一部著作是阿克曼(Ackerman)和贾霍达(Jahoda)合著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障碍》(*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该书以一些个案为基础,这些人来自生活领域的不同行业,并且接受了集体的心理治疗。该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所分析的材料来自意识和理性之下的领域,由此告诉人们处理这些现象的证据是可以获得的。而且,它关于权力主义人格的调查,也证实了业已建立的相关性。

偏见方面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是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也即使个体作出反应或使个体表现其心理倾向(predispositions)的外部刺激。纳粹德国是社会情境产生效应的一个鲜明例子。鉴于对纳粹反犹太主义根子的理解,以及对德国民众定向之任务的分析,使马辛(Massing)写成《破坏的彩排》(*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一书。

在劳温塔尔和戈特曼(Lowenthal & Guterman)合著的《骗人的先知》(*Prophets of Deceit*)一书中,对煽动者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煽动者的说服技巧,以及使萌芽状态的感觉转化为特定信念和行动的调节机制,成了该书的主题。作为调节世界和个体心理的媒介,煽动者将业已存在的偏见和倾向转化成某种学说,并最终导致外显的行动。

所有这些,有可能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不适当地强调了偏见的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而不是社会因素。这不是因为我们特别重视心理分析,也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非理性的敌意可在社会挫折和不公正的待遇中找到原因。我们的目的不只是描述偏见,而是解释偏见,以便最终消除偏见。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挑战。消除敌意是一种再教育(reeducation),它需要我们在业已具备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规划。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人的和心理的。例如,一旦我们了解了战争经历如何强化人格特征,使之表现出团体憎恨的倾向,那么,教育补救措施便可合乎逻辑地随之展开。与此相似的是,揭露煽动者的心理伎俩,可能有助于受害者去识破这些诡计。

随着这些研究的完成,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科研部开始进入这样一些研究领域,即研究对象不再是个人,而是团体、机构和社会。通过对个体动力学(individual dynamics)的认识,促使我们关注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我们承认,孤立地研究个体是有失偏颇的;甚至在目前的研究系列中,尽管研究性质基本上是属于心理方面的,但我们仍然需要根据社会的因素来解释个体的行为。于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便是关注团体压力(group pressures)问题,以及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起作用的社会决定因素。我们希望对下述问题作出回答:为什么一个人在一

种情境里以“容忍”的态度行事,而在另一种情境里却以“固执”的态度行事?团体间的冲突有其民族差异的缘由,然而,在何种程度上,它是由以民族差异为内容的其他因素引发的呢?

这套丛书的作者及其同仁具有不同的专业兴趣,尽管作者也向其同仁们求得了经验和帮助。这些经验和帮助直接反映在作者所用的各种技术上,甚至反映在他们的写作方法上。在这套丛书中,有些书更具技术性,另一些书则更具“可读性”。对此,我们并不强求一致。根据当代社会科学的技术寻求真理是我们的惟一宗旨。尽管方法和技术各不相同,但在寻求真理方面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

上述问题要求更为广泛持久的努力,其努力程度超越任何一个研究机构或我们这样的小组可能提出的要求。我们希望,不论我们实施何种方案,它都能够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能够激发其他学者继续研究的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涉及这个领域的著述的数量在稳定增长,为此,我们深感满意。我们相信,有关这个核心主题的任何一项研究,只要贯彻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仅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减少团体间偏见和仇恨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法,而且会最终导致实际的解决。

对于《偏见的研究》(*Studies of Prejudice*)丛书序,如果没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斯劳森博士(Dr. John Slawson)的远见和领导,是无法完成的。他不仅负责召开了学者大会并设立科研部,而且还对我们两人给予了指导和鼓励。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萨缪尔·H·弗劳尔曼(Samuel H. Flowerman)

序 言

这是一部关于社会歧视 (social discrimination) 的著作, 它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对一些业已广泛传播的信息再补充些更加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这部著作的中心主题是一种相对来说新的概念——“人类学物种” (anthropological species) 的崛起, 我们将属于该物种的人称之为权力主义者。这类权力主义者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固执者, 他们将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典型的思想、技能, 以及非理性的或反理性的信念结合起来。这类人既是开明的又是迷信的; 他们因自己身为工业家而自豪, 却又常常害怕自己不像普通人; 他们猜忌自己的独立性, 并倾向于盲从权力和权威。构成这种冲突倾向的性格结构, 已经引起了现代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本书意欲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本研究既具理论价值又具实践价值。作者们认为, 对教育而言, 似乎没有捷径可走; 若想回避迂回曲折的研究历程和理论分析, 那就无法获得科学的结论。作者们并不相信, 诸如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 尤其是宗教和种族仇恨问题, 可以通过宣传容忍或者驳斥错误和谎言便能成功地得到解决。另一方面, 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 本书的作者满怀信心, 认为对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现象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阐释, 可以直接对文化氛围 (仇恨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滋生) 的改善作出贡献。

我们不要把上述信念作为一种乐观主义的幻想而撇在一边。在人类文明史中, 已有不少例子说明, 民众的盲目崇拜不是

通过宣传来消除的,而是由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研究了盲目崇拜产生的根源才得以解决的。他们的理智贡献(在整个社会发展框架中运作)是极为有效的。

我想举两个例子。在17~18世纪,对巫术的迷信随着人们越来越受到现代科学发现的影响而终于得以克服。其中,笛卡尔派的理性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学派的哲学家们指出——继后的自然科学家们实际上也运用了他们的伟大发现——以前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精神因素对肉体领域的直接影响是一种幻想。一旦这种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教条被消除,巫术的基础也就随之被摧毁了。

作为一个现代的例子,我们只需考察一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思想对现代文化的影响就可以了。它的重要性不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心理学的研究和知识随着新的研究成果而大大丰富了,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近50年来,知识界(尤其是教育界)已经越来越清楚家庭内部和外部对儿童的压制与社会对儿童和成人生活的心理动力的无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上获得的经验(这里的经验是指童年早期的事件对成年的幸福和工作潜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社会意识的渗透,已经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产生了一场革命,这在一百年前被认为是不可可能的。

我们希望,这部著作能在科学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历史中找到一席之地。它的最终目标是在研究领域开辟新的路径,使其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它谋求发展和加强对一些社会心理因素的理解,因为正是这些因素使权力主义者取代个人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威胁成为可能(后者在上一世纪颇为盛行,而且是我们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理解这种威胁可能包括的因素。用日益增长的科学分化手段来分析这种新的“人类学”

类型(包括其成长的条件),将会增进真正的教育补救的机会。

对于系统地研究歧视机制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性格歧视类型的研究,不只是以过去15年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且还以数十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美国像欧洲一样,为把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已经作出了相当多的成功努力,发展了各种学科,而且达到了有组织的合作水平,这原本是自然科学的一个传统。我所想到的不只是把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如在教科书中所安排的那样,而是动员在不同的理论领域和经验主义调查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方法和技术,让它们为一个共同的研究计划而作出努力。

这样一种使不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分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办法恰恰在本书中发生了。社会理论、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内容分析、临床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和投射测验等领域的专家们彼此交流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经过密切的合作,现在他们向读者展示了合作的成果——现代社会中权力主义者的基本要素。

专家们知道,他们不是涉足这一现象的第一批人。他们感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莫利斯·萨缪尔(Maurice Samuel)、奥托·芬尼奇尔(Otto Fenichel)以及其他一些人所勾勒的有关偏见者的心理剖面。这些辉煌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目前的研究(试图在方法论上达到整合,并探讨研究的结构)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认为,它将以先前无法实现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我们既定的研究目标。

从组织的角度讲,本书代表了伯克利民意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的合作。两个机构在结合不同科学和不同研究方法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伯克利民意研究所致力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考察偏见,发现了偏见与某些具有破坏性的虚无主义(nihilistic)

性质的人格特质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种虚无主义的人格特质是以那些非理性的悲观思想为标志的。社会研究所早在法兰克福大学期间就奉行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原则,并且发表了以此原则为前提的若干研究成果。在一部专门论述权威和家庭的著作中,“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概念被提了出来,作为联结心理倾向和政治倾向的一种指称。为了进一步追求这种思想路线,社会研究所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综合性研究报告(出版于1939年)。大约5年以后,研究人员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已故的欧内斯特·西默尔博士(Dr. Ernst Simmel)和R·尼维特·桑福德教授(Pro. R. Nevitt Sanford)进行讨论的基础上,为目前的研究方案奠定了基础。

就组织的领导班子而言,研究小组由四位资深成员来领导,他们是伯克利民意研究所所长R.N.桑福德博士,社会研究所所长T.W.阿道诺博士(Dr. T. W. Adorno),以及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博士(Dr. Else Frenkel Brunswik)和丹尼尔·莱文森博士(Dr. Daniel Levinson)。他们合作得如此密切,可以说是十分民主的;他们之间的分工又是如此均衡,以至于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他们对本书所负有的责任。本研究的主要概念由研究小组来推演。首先,间接测量了反民主的倾向,即F量表(F Scale),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当然,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各章由承担该研究的成员来署名也是合适的。实际的写作过程涉及到如何广泛地占有材料,从而也表明了各自所负的责任。不过,事实是,四位资深成员对每一章都作出了贡献,这使整部著作打上了集体的印记。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每一位资深成员都提出了构想,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桑福德博士构思了将各种技术结合起来的方式,并规划了研究过程。他的精力主要花在详尽的个案研

究方面,尤其涉及偏见人格的动态病因学(dynamic etiology)。阿道诺博士则介绍了与人格因素有关的社会维度,以及与权力主义有关的性格学概念。他还分析了访谈的思想部分,这些访谈内容是根据社会理论的类别而展开的。布伦斯威克博士对第一批人格研究变量中的一些变量作了系统阐述。她根据其早期的研究,对动态定向的类别和访谈材料的量化进行了系统的构思。莱文森博士主要负责AS量表、E量表和PEC量表,同时还负责运用心理学术语对材料进行整理,对投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统计的设计和操作步骤等。

本书有三章专论,涉及到方法论、主要技术(即“主题统觉测验”)和关于“批判性”团体的两个讨论,它们由贝蒂·阿隆(Betty Aron)、玛丽亚·莱文森(Maria Levinson)和威廉·莫洛(William Morrow)所撰。这三人是研究班子的老成员,对研究的进展十分熟悉。

如果没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慷慨而又理智的支持,本项研究计划是无法完成的。1944年,委员会感到,为了更好地实施计划,以便在合作研究中提供财政上和组织上的支持,需要一个主司管辖和调节的机构,于是决定成立科研部。科研部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科学中心,促进和协调社会学与心理学等领域的科学家的工作,并且密切关注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时予以评价。尽管该部的研究人员经常处于各种任务的压力之下(这些任务是各条战线上为民主权利而奋斗的组织向他们提出的),但是他们从不回避承担基础研究的责任。本书是联结民主教育与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科研部主任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第一章 引言

一、问题

本书中所报道的研究是以下列假设为基础的：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信念通常构成一种广泛而又一致的模式 (pattern), 好像被一种“心理”或“精神”所束缚, 而这种模式则反映了他的人格中根深蒂固的倾向。

本研究关注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 (potentially fascistic individual), 所谓法西斯主义者, 是指其结构使这个人特别易受反民主宣传的影响。我们之所以用“潜在的”一词,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对一些公开宣布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或属于法西斯组织的个体进行过研究。在我们收集数据之时, 法西斯主义已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被摧毁, 因此我们无法找到一些公开宣称自己与法西斯等类的被试; 不过, 要想了解被试的一些观点, 譬如说, 如果法西斯主义一旦成为强大而又受人尊敬的社会运动, 他们是否准备接受法西斯主义, 而找到这样的被试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时, 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他类型的人格和思想视而不见。可是, 我们的观点是, 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社会倾向比法西斯主义给我们的传统

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带来如此严重的威胁,而对那些接受法西斯主义的人格特征的认识,最终能够证明,在我们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是颇有助益的。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探索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新策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注意那些“潜在的反法西斯主义分子”呢?答案是,我们确实研究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倾向能够构成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当前研究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对法西斯的宣传表现出极其敏感的那些人彼此之间具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所表现出的众多特征,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症状”(syndrome),尽管这一综合症状有各种典型的变式(typical variations)。在这些入中间,有些表现甚至是对立的。诊断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研究它的主要构成因素,要想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设计专门的技术;当然,这些技术也应适用于其他各种类型。同样,也有可能区分出人格结构的若干类型,它们对反民主思想特别具有抵抗力。对此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给以适当的注意。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那么他是什么模样的?哪些东西构成了他的反民主思想?在他身上有着怎样的组织力量?如果确有其人的话,那么他在我们的社会中能否生存下去?如果这种人能够生存下去,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其发展途径又是什么?

上述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设计研究时用做某些启示的问题。尽管我们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潜在的反民主主义者是一个整体,但是,我们仍然要求对此作出某种分析。在大多数有关政治问题的研究中,通常需要区分两个基本概念:人的思想和人的基本需要。虽然这两个概念被认为在个体内部是以有组织的整体形式来表现的,但是,在我们看来,两者仍然可以分开来加以研

究。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同样的思想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而同样的个体需要也可能以不同的思想来表现。

本书所用的“思想”(ideology)这个术语,与一般文献中关于这个术语的释义相似,也就是说,它代表着意见、态度和价值观等结构,或者说是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思想方法。我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来谈论一个人的思想,所谓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指的是政治、经济、宗教、少数民族团体等等。思想不受个体的支配而独立存在;那些在某个特定时间里存在的思想,既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又是当前社会事件的结果。对不同的个体而言,这些思想具有不同的感召力,它视个体的需要而定,也视这些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定。

可以肯定地说,有些人所形成的思想取自多个现存的思想体系,并将这些思想编织成或多或少具有它们自己特性的模式。然而,可以这样假设,随着我们对人们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考察,我们将会发现一些共同的模式。这些模式虽然不会与我们所熟悉的思想保持一致,但是它们符合上述关于思想的界定,并且,人们发现,它们在个体的顺应中具有某种功能。

我们关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本质,从历史角度而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开始的。本书作者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样,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反犹主义主要建立在被试因素及其整个情境的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犹太人实际特征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表现反犹观点和态度的人们身上寻找反犹的观点和态度。由于研究这种人格需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心理学方面而不是社会学方面或历史学方面——尽管目前关于这三门学科的划分是有点人为的——因此不可能说明我们社会中存在反犹思想的原因。确切地说,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接受这些思想而另一些人则不接受呢?由于

本研究从一开始便受上述假设所指导,因此人们有可能认为:(1)反犹主义也许不是一种特定的或孤立的现象,而是更为广泛的思想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个体对这种思想的易感程度主要取决于他的心理需要。

关于反民主主义者的这些见解和假设,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存在的,但它们必须受到大量观察的支持,而且,在许多情形下,还必须受到量化的支持,惟有如此,它们才能被认为是结论性的。当人们说由个体所表示的众多意见、态度和价值观实际上构成了一致的模式或有组织的整体时,是因为对这个人进行集中调查的结果。当人们说把众多个体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模式,其中有些模式比另一些模式更加普遍时,除了在人口中测量各种思想,并且通过标准统计的方法来决定哪些思想内容可以整合在一起外,恐怕没有其他更加恰当的方法可用了。

对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来说,思想(正如已经界定的那样)的研究似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任务。运用适当的方法去测量单一的、特定的和孤立的态度,对于被试和实验者来说,都是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人们经常争论说,除非态度是特定的和孤立的,否则它就无法被正确地测量)。鉴于此,我们又如何指望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对构成一种思想的众多态度和观念进行测量呢?显然,进行某种选择是有必要的。调查者必须把自己限于最有意义的东西上,而对意义的判断只有在理论上才能作出。

指导我们研究的各种理论将在后面逐一提出。尽管这些理论在本著作的每个部分都有其地位,但是,它们是以最易观察和相对特定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的客观研究为前提的。

正如我们可以想像的那样,意见、态度和价值观或多或少能用词语来表达。从心理学角度讲,它们是“浮在表面的东西”。

但是,必须承认,当一个人遇到这类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时,例如,当一个人涉及少数民族团体和当前的政治问题时,他讲话的公开程度取决于在他看来他所处的情境。他在特定场合所讲的话,与他“实际上所想的内容”,两者之间会有差异和不一致。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想的东西可以在他与知心朋友私下交谈时表达出来。即便如此,从心理学角度讲,如果心理学家运用适当的技术,则上述情况仍有可能直接地观察到,而这正是我们试图要做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体可能有“私密”的思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向他人透露这些思想;他也可能有一些连他自己都不肯承认的思想,也可能有一些他不愿表示的思想,不是因为它们“私密”,而是因为它们如此模糊和朦胧,以至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如何获得通往这些深层思想的捷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些思想,代表着一个人在关键时刻是接受民主的思想和行动还是反对民主的思想和行动。

人们所说的东西,以及他们实际上所想的東西,主要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舆论;当舆论发生变化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能够更快地适应这种变化。如果反民主的宣传明显增强的话,那么我们预期有些人会立即接受它并重复这种宣传,有些人仿佛以为“人们也许相信这种反民主的宣传”,但仍然有人根本不相信。换言之,对于反民主宣传的易感程度,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对于表现出反民主倾向的准备状态,人与人之间也是不一样的。看来,有必要研究这种“准备状态”的思想,以便对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进行测量。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希特勒前的德国直言不讳地宣称反犹主义的数量要比美国目前的状况少;人们都希望在美国这种可能性少一些,但是,这只有通过集中的调查,也即通过调查表面现象来认真研究其下面的东西,才能知道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有一个问题可能会随之提出来,它涉及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正在进行反民主的宣传,同时参与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公然挑衅,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与他的行动相一致;然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一个人用言语表示了反民主的思想,但他却没有(也许不会)将这些言语转化为行动。这种情况再次表明,存在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明显的行动,像公开的言语表示一样,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境——这是可用社会经济学和政治术语进行最佳描述的东西——在个体被煽动去采取行动的程度上,由于情境的因素,人与人之间有很大差异。对这种可能性的研究,是个体思想研究的组成部分;了解哪些类型和哪些强度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更有可能导致行动,了解个体中有哪些力量对行动起着抑制作用,这样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实践性。

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准备状态的思想”(ideology-in-readiness),“用言语表示的思想”(ideology-in-words),以及“用行动表示的思想”(ideology-in-action)等等,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对于一个人整体思想的描述,不仅需要描述他在每种水平上的结构,而且需要描述水平之间的结构。例如,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说些什么话;当他感到不会招惹麻烦时又会说些什么话;他不会说出来的私密东西是什么;他曾想过但不愿承认的东西是什么;当别人向他提出各种要求时,他倾向于想什么或做什么——所有这些现象能被认为是构成了单一的结构。该结构可能不是整合的,它可能既具一致性,又具矛盾性。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该结构的组成部分是以心理学上有意义的方式联结起来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有组织的。

为了了解这样的结构,需要涉及整个人格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它指导了当前的研究),人格是个体身上一种或多或少

持久的力量的结构(organization of forces)。人格的这些力量在各种情况下决定着反应,因此,对于它们来说,行为的一致性,不论是言语上的还是体势上的,都是可以归因的。但是,不论行为如何一致,它与人格不是一码事;人格操纵着行为,它位于行为的背后,或者说位于个体的内部。人格的力量不是反应,而是反应的准备状态;一种准备状态是否会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取决于一个人此时此刻所处的情境,而且取决于是否有其他的准备状态作为它的对立面。被压抑的人格力量,要比那些在公开的行为中直接地一致地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处于更为深层的水平上。

那么,人格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人格力量得以组织起来的过程是什么?当我们谈到人格结构的理论时,我们自然倾向于弗洛伊德(Freud)。至于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人格,为了有助于系统的阐释,我们主要采用经院心理学(academic psychology)的理论。

人格力量的主要成分是需要(内驱力、愿望、情绪冲动等),它们在质量、强度、满足形式,以及依附的对象方面,随个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这些需要又以一致或冲突的方式与其他需要相互作用,有些需要属于回避惩罚的需要,有些需要属于情绪的需要,有些需要属于如何保持社会性良好意愿的需要,还有一些需要与维持一致和自我内部的一体化有关。

由于人们认为意见、态度和价值观取决于人类需要,由于人格基本上是一种需要的结构,因此可以把人格视做思想偏见的决定因素。但是,不能把人格看做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人格远非终极因素,它也不是恒定不变地对周围世界发生作用。人格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会出现演化,并且不会与社会相脱离,因为人格就发生在社会中间。根据目前的理论,环境力量在塑造人

格的过程中,一般说来,其影响可以追溯至个体的早期生活史。儿童的早期训练,尤其是在家庭生活的背景中进行的训练,会对人格的发展产生主要的影响。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受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不仅每个家庭按照它的社会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孩子,而且经济因素也直接参与了父母对其孩子的行为。这就意味着,社会条件和习俗的广泛变化将对源于这个社会的人格类型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希望发现在个人的以往经历中思想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而不管这些相关性是否在他目前的状态中继续运作。在试图解释这些相关时,人格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颇为引人注目。一般的研究认为,人格是一种能动作用,社会对思想的影响是由它来中介的。如果弄清楚人格的作用,那么就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哪些社会因素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达到它们预期的结果。

尽管人格是以往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一旦它发展起来,它就不只是当前环境的一个目标了。实际上,发展起来的是个体身上的一种结构,它能够自主地对社会环境进行作用,能够对不同的刺激进行选择。总之,它是一种经常可以修正但又拒绝作出根本改变的东西。这一概念不仅在解释广泛变化的情境中行为的一致性时有必要,而且在解释一个人面临冲突的事实和剧变的社会情境思想倾向的坚持性时也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在解释处于同样社会情境中的人为什么对社会问题具有不同的或冲突的观点,以及为什么有些人的行为随着心理操作失误而返回到他们的老方法中去,也是很有必要的。

人格结构的概念驳斥了下列观点,即把个体的一致性倾向归因于他内部“天生的”或“基本的”或“民族的”东西。纳粹断言:自然的和生物的特征决定了一个人的存在。如果这种断言

并不意指人类行为中相对固有的东西,如果这种断言并不是对那些想从非生物学基础解释人类行为的人提出挑战的话,那么纳粹的断言就不会成为如此成功的政治手段了。假定没有人格结构的概念,那么那些将研究置于人类可塑性和反应性的假设基础上的作者们,无论把一致的倾向(他们无法证明其为“混乱”或“精神病”或“邪恶”)归属于这一种名下还是另一种名下,均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确实存在一些对“病理”行为进行描述的依据,这些病理行为表现为对即时刺激不能作出一般的和合理的反应。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狭义的基础上使用“病理”(pathological)这个术语的,并且认为,人格结构中的某些东西可以置于这个标题之下。实际上,人格包含着一些变式,它们广泛地存在于人口之中,彼此之间具有合理的关系。有些人格模式被贬为“病理的”,原因在于它们与一般的倾向不一致,或者与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思想不一致。但是,如果予以认真地调查,可以发现,这些人格模式之所以被称之为“病理”,原因在于它们只关注社会主流文化以外的东西。今天所谓“病理的”东西,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明天可能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倾向。

因此,很清楚,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一种适当的研究方法是既考虑固定性又考虑易变性;必须将两者视做并非相互排斥的类别,而是一个连续体中的两极,人类特征可以沿着这个连续体来定位,因此必须提供一种理解这些条件(有利于一极或另一极的条件)的基础。人格是一个解释相对恒定性的概念。但是,人们可以再次强调说:人格主要是一种潜力(potential);它是行为的准备状态,而非行为本身;尽管它存在于以某些方式行事的倾向之中,但实际上发生的行为将始终取决于客观情境。凡在关注反民主倾向的地方,对个体条件的描述有赖于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理解。

如果说人格结构可能使个体易受反民主宣传的影响,那么,现在可以这样提问了:在哪些情况下,这种反民主宣传会增加其强度,或者说在报章和电台占据支配地位,并排斥相反的思想刺激,从而使得原本潜在的东西公开化了?问题的答案不该在个体的人格因素中寻找,也不该在民众的人格因素中寻找,而应该在社会本身的运作过程中寻找。今天,人们业已了解的是,反民主宣传能否在一个国家成为一种支配力量,主要取决于强大的经济形势,取决于这种宣传是否经过蓄意的设计,并利用这种设计手段来维持其地位。这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大容易注意到的问题。

目前的这项研究,由于主要限于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因素,因此它并不涉及宣传的产生。确切地说,它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者,也即该宣传为之设计的个体身上。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不仅要考虑个体的心理结构,而且还要考虑个体赖以生活的整个客观情境。我们的假设是,人们一般倾向于接受政治的和社会的计划,相信这些计划能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服务。这些利益究竟是什么东西,则取决于个体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是由经济的和社会的条件来决定的。因此,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试图发现哪些社会经济因素与反民主的可接受性有关,哪些社会经济因素与抗拒这种宣传有关。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必须注意,个体的经济动机并不具有决定作用和关键作用。如果经济利益是意见的惟一决定因素,那么我们便应当期望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会有十分相似的意见,而且还应当期望这种意见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视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而变化。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为这些期望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同样的社会经济阶层,人们之间只有一般的意见相似性;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人们之间却有着明显的

意见相似性。为了解释为什么相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而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们却具有十分相似的思想,我们必须考虑除了纯粹的经济需要以外的其他一些因素。

现在,比较清楚的是,人们通常并不是以促进其物质利益的方式来行事的,甚至当他们清楚这些利益是什么时,也不完全以促进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方式来行事。例如,白领工人拒绝工会组织,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工会不会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小商人在大多数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倾向于站在大商家一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完全因为在小商人看来这是保证他们经济独立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上述这些例子中,个体似乎不仅不考虑他的物质利益,而且甚至反对物质利益。他似乎在参照更大的团体反应来进行思考,好像他的观点更多地是由支持某个团体并压制对立团体的需要来决定的,而不是通过他对自己利益的理性考虑来决定的。确实,今天,人们也许会认为,团体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不只是一种深层的情绪内驱力得以释放的斗争。但是,当问题进入到人们评价社会的方式时,非理性的倾向便突显出来。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有一个专业人士反对犹太难民的迁移,理由是这种迁移将增加竞争,他必须对付这种竞争,以免减少收入。不论这种想法多么的不民主,在某种限定的意义上说它至少是理性的。但是,对这个人来说,如果继续评价下去,像大多数从职业立场出发反对犹太人的人那样,他就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有许多意见是矛盾的,包括对一般犹太人的看法,甚至将世界的不幸归罪于他们,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就像按照犹太人是“好人”的思想模式对一切犹太人大唱赞歌一样,也是不合逻辑的。对团体的敌意是以实际的挫折为基础的,这些挫折产生自团体成员身上,并且毫无疑问为团体成员所体验,但是,这种挫折的体验又几乎很难解释下

列的事实,即偏见倾向于被概括。从目前的研究中得出的证据证实了通常被指出的东西:对一个少数民族团体怀有敌意的人,很有可能对其他民族团体也怀有敌意。对此概括,不存在可以想像的理性基础;而且,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对一个特定的团体怀有偏见,或者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个团体,往往是在不具备有关该团体成员的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发生的。个体的客观情境看来不是这种非理性的根源;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寻求心理学在哪些方面已经找到了梦、幻想和对世界的错误解释等缘由——也就是位于人格深处的那些需要。

个体情境的另一面,即我们期望对他的思想的接受性施以影响的那个方面,是他在社会团体中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职业的、帮会的、宗教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些团体赞成并传播(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模式。有理由相信,一些个体出于他们的需要会确认和相信这些思想模式,并且通过模仿和条件化或多或少地接受作为团体特征(只有具有这些特征,方能表明其成员资格)的那些意见、态度和价值观。在这样的团体中,如果流行的思想或隐或显地是反民主的,那么个别成员就可能被期望接受那种宣传。相应地说,目前的研究通过观察一般思想倾向的方法调查了可能找到的各种团体成员资格,包括各种变式。

然而,人们也认识到,团体成员资格和思想之间的相关可能取决于不同个体中的不同决定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由于个体重复一些在他的社会环境中被认可的意见,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意见提出疑问;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是由于个体选择某个特定的团体,因为该团体所代表的思想是他所深表同情的。在现代社会中,尽管存在着文化的感召力,但是,对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明确了

思想对他意味着什么之后,他很少会顺从于单一的思想模式。相反,他会按照他的人格需要作出某种选择。甚至在思想形成时期,面对单一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思想模式,还是会有一些人与之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起来反叛它。因此,似乎有理由询问:人格因素是否参与了这种差别的形成?看来,健全的研究方法应该考虑,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正如在行为的形成过程中一样,既存在着一种情境因素,也存在着一种人格因素,惟有谨慎地权衡每一种因素的作用,才会得出正确的预见。

情境因素(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团体成员)在最近关于意见和态度的调查中已经得到研究,而更加内向的和更加个人主义的因素则未得到理应得到的重视。此外,为什么目前的研究特别强调人格,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为使自已成功地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必须具有群众基础。它不仅谋求民众的恐惧性顺从,还想获得他们的积极配合。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本质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因此它不可能去考虑如何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确保他们的真正利益。于是,法西斯主义必须求助于情感需要,而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民众利益——也就是说,它求助于原始的和非理性的愿望与恐惧。如果有人认为,法西斯的宣传是愚弄人们,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命运确会得到改善,那么问题就接踵而至了:为什么民众会那么容易被愚弄?对此,人们可以假设,这是由于他们的人格结构;由于长期建立的希望模式和志向模式,恐惧和焦虑使他们倾向于某些信仰,并拒绝其他信仰。当反民主的潜力存在于民众之中时,法西斯宣传的任务就容易被提出来。正因如此,在德国,随着社会内部的经济冲突,甚至单凭这个原因就可以确定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迟早的事;但是,纳粹领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时刻

关注民众的心理——激发他们的反民主潜能,屈从于这种潜能,消灭异己。看来,问题很清楚,若要评价美国的法西斯倾向有否胜利的机会,必须考虑存在于民众性格中的潜能。这里,不仅存在对反民主宣传的易感问题,也存在反对它的可能性。

本书作者认为,美国是否会变成法西斯主义,应由人民来决定。根据上述假设,对反民主潜能的本质和规模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制定民主行动的计划。这些计划不应当局限于如何操纵人们,使他们更加民主地行事等方式上,而应当致力于增强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自决能力,致使任何一种操纵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关于个体思想的存在,有一种解释至今尚未考虑过:对一个理性者来说,惟有对上述讨论过的这些决定因素有所了解,并且接受必要的事实,才能组织他的世界观。这个概念,对于健全的思想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便会接受在现代世界里已被某些人所接受的一种观点:由于一切思想和一切哲学都产生于非理性的源泉,因此认为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加明智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一个好思的人的理性体系并不是一种脱离人格的东西。这样一种体系仍然需要激发。在其来源中,可以区别的东西主要是它得以发生的人格结构。可以这样说,一种成熟的人格(如果我们此刻运用这个术语而不对它进行界定的话)要比一种不成熟的人格更加接近于达到理性的思想体系;但是,对于成熟来说,这种人格是具有动力和组织的,描述这种人格的结构与描述任何其他人格没有什么不同。根据理论,那些决定着思想的客观性和理性的人格变量(personality variables),是属于自我(ego)的东西,而自我则是人格中评价现实、整合其他部分、运用意识的觉知(conscious awareness)进行操作的部分。

正是“自我”意识到人格内部运作的非理性力量,并对它们

负责。从心理学角度了解思想的决定因素,这样的目的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这就是我们信念的基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由此会消除意见分歧。这个世界是够复杂的,而且难以了解;人们有着各种实际的利益,这些利益与他人的实际利益会发生冲突。正因为存在着自我可以接受的人格差异,方能保证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争论不会变得毫无生气。对于思想的心理决定因素的认识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正确的思想;它只能在追索的途中排除一些障碍。

二、方法论

(一) 方法的一般特征

为了对上述概括的问题进行探究,我们需要描述和测量思想倾向的一些方法,以及揭示人格、当前情境和社会背景的一些方法。一种特定的方法论的挑战来自“个体的水平”这一概念;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设计一些技术来对表面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进行测量,借以反映那些被压抑的、并以间接的表现形式达到表面的思想倾向,从而使得深藏于被试无意识之中的人格力量清晰地显示出来。由于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动力地联系着的因素模式——需要研究整个个体——因此适当的方法是通过集中的临床研究(clinical studies)。这类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它们从这些研究中被概括出来之前是无法测量的。因此,有必要既进行个体研究又进行团体研究,并且找到某种手段和方法将两者结合起来。

对于个体,主要通过访谈和专门的临床技术来进行研究,借以反映潜在的愿望、恐惧和防御;对于团体,则通过问卷方式进

行研究。我们并不期望临床研究能像有些已经报道过的研究那样完整或深刻,也就是说,并不期望它们像精神分析所从事的研究那样完整和深刻;我们也不期望我们的问卷会比社会心理学家目前所使用的问卷更加正确。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确实,这对我们的目标是必要的——临床材料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概括,并用于团体研究中,我们也希望问卷能够针对那些留给临床研究的反应领域。换言之,我们试图将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方法用来为新的人格动力理论的概念和理论服务,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能使“深蕴的心理”现象更加经得起统计方法的检验,以使态度和意见的量化更具有心理学意义。

在试图将临床研究和团体研究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两者应交叉考虑。当个体成为关注的焦点时,目的是为了详尽地描述他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模式,了解构成其基础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设计有意义的问题,以便在被试团体中使用。当团体成为关注的焦点时,目的是为了发现哪些意见、态度和价值观是共同的,以及在被试的生活史和当前的情境中哪些因素模式与每一个思想丛(ideological constellation)有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个体以供集中研究的基础:首先,关注的是那些证明共同模式的个体,然后,根据那些个体反映的模式,设想相关因素是动力地联系着的。

为了研究那些潜在的反民主的个体,首先必须对他们进行识别。因此,一开始就要设计一份问卷,让一些人不署名地填写这份问卷。这份问卷所包含的内容,除了关于被试过去和当前生活的众多事实以外,还包括许多反民主的说法,要求被试对这些话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有些人对这些反民主的陈述表示同意(态度)——与此相对照,有些人则表示了不同意,或者在一些例子中,被试的表示显得中立——接下来,便通过访谈和其他一些

临床技术予以研究。在个体研究的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修改,于是整个过程又重复一遍。

访谈被部分地用做对问卷效度的一种检查,那就是说,它为下述判断提供了一种基础:那些在问卷上获得最高反民主分数的人,是否也是那些在与他人进行私下交往时最大限度地表示反民主感情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临床研究为我们接近反民主思想的深层人格因素提供了捷径,并为大规模的调查提示了手段。随着对潜在倾向的了解(偏见便是这些潜在倾向的反映),使我们不断熟悉各种迹象或表现,借助这些迹象或表现,我们可以辨认潜在倾向。于是,任务便成为将这些表现转化成问卷的项目,以便在下一次团体研究中使用。进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找到越来越多的关于核心人格力量的可靠指标;二是表现为这些力量与反民主思想表达之间的关系日益清晰。

(二) 技术

用于研究的问卷和临床技术可以简要地描述如下:

1. 问卷方式

问卷是以表格形式提出的,由团体中的被试无记名填写。每份问卷包括:(1)事实性问题;(2)意见—态度量表;(3)“投射的”(公开回答的)问题。

(1) 事实性问题主要与团体成员的过去和现在的身份有关;例如,对教会的偏爱、政治党派、职业、收入等等。据假设,答案可以从中提取。在选择问题时,我们起初涉及思想的社会相关因素;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越来越依赖于访谈者的经验。

(2) 意见—态度量表一开始就被使用,以便获得对某些表面思想倾向的量化估计:例如,反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等。嗣后,我们又创制了测量人格本身反民主倾向

的量表。

这里的量表是一种陈述的汇集,其中,每一条陈述都要求被试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每一条陈述都涉及一些相对来说专门的意见、态度或价值观,将它们在一个特定的量表内汇集起来的基础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以表示一个单一的一般倾向的概念。

量表所属的一般倾向广泛构想,如同关于社会生活广泛领域的复杂的思想体系。为了从经验主义角度对这些倾向进行界定,有必要获得对许多特殊问题的反应——这些特殊问题足以“涵盖”从概念角度标示的领域——并且标明它们中每一个特殊问题都与整体有某种关系。

这种研究方式与民意测验形成对照:民意测验的主要兴趣在于,根据一个特定问题,了解民众的意见分布;而对目前的研究来说,其兴趣在于,根据某一特定意见,探究它与哪些其他意见和态度相联系。研究计划先要探究广泛存在的思想倾向,创制对它们进行测量的工具,然后探究它们在较大规模人口中的分布。

对一种思想领域的研究来说,首先应评估它的一般特征,然后再评估它的具体特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先获得“总体印象”,然后再配以组成部分的特征,而不是去获得对这些细节的精确测量,指望这些东西会最终成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尽管对广度和深度的强调难以在测量中获得高度的精确性,但是仍有可能在符合目前可接受的统计标准这一点上制订每份量表。

由于每份量表既涵盖一个广泛的领域,又无须耗时过长,因此它有必要去谋求高度的效率。这里,任务是系统地阐述一些项目,它们将尽可能覆盖讨论中的各种现象。由于每一种予以测量的倾向被设想为具有众多的组成部分,因此项目不可能完全一样;相反,它要求每个项目反映一种不同的特征——若有可

能,也可以反映几种特征——或者说,整个系统中的一种或几种特征。按理,一个量表中的项目从统计角度上“被结合在一起”,从而表明单一的统一的特征正在得到测量,这种结合主要取决于项目之间的表面相似性——即它们反映的是同一件事。显然,对目前的项目来说,无法期望它们以这种方式达成一致;从统计角度上对它们的要求是,它们与整个量表在合理程度上相关。可以想像,目前体系的单一组成成分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相对一般的倾向,对它进行精确测量,需要运用许多具体的项目。可是,正如上面已指明的那样,我们并不关注这些高度具体的、在统计上属于“纯粹的”因素,以便获得对整个系统的可靠估计,接着将它与其他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接近个体内部的主要倾向。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意欲了解某种思想模式的强度——例如个人内部的反犹主义——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解释了我们的意思之后不去直接问他。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测量的现象如此复杂,以至于单一的回答难以反映个体之间的重要差异。此外,反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等,都是人们不愿以完全坦率的态度进行表白的主题。因此,即使在这种表面的思想水平上,也有必要运用一定的间接手段。我们不对被试讲清问卷意欲考虑的是,而是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对当今有关问题看法的调查”。我们在问卷中有意将属于特定量表的项目与其他量表的项目混合起来。当然,不可能避免对少数民族团体带有偏见的陈述,但是,在此情况下,采取谨慎态度,不让被试感到“难堪”,也就是说,使他既有可能表示自己同意这样的说法,又有可能维护他的“不偏不倚”或“民主”的信念。

一般说来,测量表面的思想倾向的量表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实践相符合,但是测量人格中潜在的反民主倾向的量表则代表了一种新的视角。其过程是在量表中将各个项目集合起来

(这些项目通过假设和临床经验,可能被认为是“展示”了相对而言深藏于人格中的那些倾向),从而构成了一种在适当的场合自发表示法西斯思想的倾向,或者受法西斯思想影响的倾向。

本量表中的陈述在形式上类似于组成表面思想量表的那些陈述;它们是关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见、态度或价值观的直接表示——但是,这些领域通常没有系统地呈现一种政治—社会经济观点。由于掺杂着来自其他量表的陈述,因此它们几乎不向被试传递(或者根本不传递)关于正在探索的实际问题的性质。它们主要是一些陈述,设计用来为非理性倾向的理性化服务。包括在本量表中的两条陈述如下:(a)“今天,由于许多不同的人频繁交往,自由结合,因此人们必须特别小心,谨防感染和疾病。”(b)“同性恋行为是青少年犯罪中特别腐败的一种形式,应当加以严惩。”凡是同意上述陈述中前面一条的人都表现出同意后面一条的倾向,而凡是同意上述两条陈述的人则倾向于同意公开的反民主陈述。例如,认为某个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基本上是低劣的,这种说法几乎不能根据各条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进行解释。更加确切地说,有必要假设某种潜在的核心倾向,它以这些不同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当然,不同的人可能对上述的某条陈述提供相同的答案,但却出于不同的原因;由于有必要为这种陈述提供虚饰的理性,因此人们自然期望有些人的反应将完全由理性来决定,而非由某种潜在的情绪倾向来决定。鉴于这种原因,量表中必须包括大量的项目,并由一般的反应倾向来指导,而非由那些对单一陈述的反应来指导;对一个人来说,如果要在他的基本动力结构中确定他是一个潜在的反民主主义者,则他必须在大多数量表项目上表示同意。

量表的制订以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方式是,找到或系统阐述一些项目,尽管它们与公开的反民主表述没有任何明显联

系,但仍然与反民主表述高度相关;第二种方式是,标明这些“间接”项目实际上揭示了人格内部的反民主潜力,如同临床研究中所做的那样。

(3) 投射的问题。像大多数投射技术一样,本研究采用的投射是向被试呈现模棱两可的、带有情绪色彩的刺激材料。这些刺激材料是被这样设计的,即不同的被试对材料有不同的回答,并且提供一些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相对来说较为深刻的人格过程得以展示。投射的问题在形式结构上不是模棱两可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回答应在情绪表述的水平上展开,而非在事实上展开,当然,被试在这样做时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含意。回答必须被解释,当它们与被试的其他一些心理事实的有意义关系得到表明时,回答的意义就被揭示了。其中一个投射问题是:“如果你还能活6个月,你将干些什么,你能做你想做的事情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被认作是被试实际上会干些什么,而是表明这些表述与他的价值观、冲突等东西有关。我们要探究的是,这种表述是否与其他投射问题引出的表述相一致,以及是否与人格量表中的陈述相一致。

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我们尝试了许多投射问题,然后从这些问题中选出8个问题供大多数被试使用。这些问题合在一起提供了有关被试人格倾向的广泛观点,并与表面思想模式高度相关。

2. 临床技术

(1) 访谈分成两部分:思想部分和临床—发生(clinical-genetic)部分。第一部分的目的是诱导被试尽可能自发地和自由地谈论各种广泛的思想题目:政治、宗教、少数民族团体、收入和职业等。如果说问卷中被试限于被规定的问题,并且只有通过所提供的等级形式来自我表达的话,那么,这里的目的是了解他

会主动地提出哪些题目,他会以何种强烈的感情自发地表达他的看法。正如上面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些材料提供了一种手段,以保证问卷能够或多或少忠实地反映“人们正在说些什么”——这是他们内心思索的题目,也是他们自发想起的表达形式——从而提供了有关反民主倾向的正确标示。这种访谈涵盖了范围广泛的各种题目,容许精心阐述,容许各种分化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这是问卷难以做到的。当我们试图从具有一般意义的、可在问卷中进行安排的访谈材料中提取精华时,剩下的材料用做个案研究、量化分析,以及对访谈材料本身的量化研究。

访谈的临床一发生部分首先探究被试的当前情况,以及他的往事,这是从问卷中难以获得的;其次探究个人感情、信仰、愿望和恐惧的自由表达,这些东西涉及被试自己及其情境,涉及被试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性关系等题目;再次探究被试的童年环境和童年生活。

访谈以这样的方式来实施,致使获得的材料有助于推论出被试人格的深层结构。关于访谈的技术,我们将在后面详述。可以这样说,我们遵循着以人格的动力理论为基础的精神病学访谈模式。对访谈者的访谈是根据综合访谈计划来进行的,该计划在研究历程中经过若干次修订,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哪些问题是最有意义的问题,哪些有效的手段可以引发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材料。

访谈材料用来估计某些共同的变量,它们存在于研究的理论框架之内,但不涉及其他的技术。访谈材料也为个案研究提供依据,而个案研究主要探究在反民主主义者的内部运作着的重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2) 主题统觉测验是一种著名的投射技术,它向被试出示一系列戏剧性的图片,要求被试根据每幅图片讲述一则故事。

被试表述的材料可以反映出他的潜在的愿望、冲突和防御机制。鉴于此,该技术在稍作修改后被用于目前的研究。材料根据心理变量进行量化分析,这种变量能在人口中广泛发现,而且可以随时与研究中的其他变量相关联。作为个案研究的组成部分,按照独特的人格变量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所获材料与来自访谈的结果密切相关。

尽管主题统觉测验设计用来探究个体的不同方面,但它们在概念上是互相联系的。所有这些技术可以按照变量来量化和解释,因为这些变量依据同一种理论体系。有时,两种技术产生同样变量的测量,有时,不同技术则将注意力集中于不同的变量。就前者情况而言,一种技术表明了另一种技术的正确性;就后者情况而言,一种技术是否合适,可以根据它与所有其他技术的有意义联系的测量来加以检验。鉴于一定数量的重复有助于保证正确性,因此研究时应拓展框架,使其达到最大规模。

个案研究所需的理论方法,既可以是一种新技术,也可以对现存的技术进行修改,使其适应特定的目标。开始时,存在一种应该测量什么东西的理论概念,以及通过哪些来源进行测量——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行描述——它们可以用来设计原始的问卷和初步的访谈计划。于是,随着研究的进展,每种技术也将得到演化。由于每种技术是专门为这项研究所设计的,因此随着理解的深入,它们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而改变,并且,由于研究的重要目标是创制和测试有效的工具,以便诊断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因此,为了积累可以比较的数据,必须在修订程序的前提下进行重复。这些技术如此相关,以致从其中一种技术中所了解到的东西可以用于对其他技术进行改进。正如临床技术为丰富问卷的若干部分提供基础那样,积累的量化结果也表明什么东西应当在访谈中予以特别注意;由于量表数据的分析提

示了潜在变量的存在(它们可以通过投射技术来探索),因此对投射技术的回答也提示了包含在量表中的项目。

技术的演化既体现在拓展中又体现在收缩中。为了把越来越多的反民主思想安置在所创设的情境中,必须拓展技术,同时,为了探索潜在的反民主人格的各个方面,以便对总体有所掌握,也必须拓展技术。技术的收缩则发生于量化过程中,随着理论清晰度的增强,容许压缩或简化有关技术,以便同样关键的关系可以用更加简明的技术来揭示。

三、数据收集的方法

(一) 被研究的团体

1. 以大学生为起点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目前的研究由于在开始时不仅来源有限,而且目的有限,因此研究的起点是以学生为被试。对他们可以随时进行提问(无论是个别提问还是集体提问),他们愿意合作,而且可以毫无困难地对他们重新进行测验。与此同时,关于思想研究的其他一些考察,也便于在大学生中实施。首先,大学生的知识和教育水准较高,无须对可能提出的问题的数量和性质加以限制——这是本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强调广度和深度。人们可以肯定,大学生对于大多数需要考察的项目有着自己的看法。其次,也可以相对肯定地说,所有的被试都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问题;也可以相对肯定地说,同样的回答具有一致的意义。再次,不论样本数有多大,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他会发现他的大多数概括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整个团体中相对来说同质的亚类;大学生作为一个团体,那些可以期望

的影响思想的一些因素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同质的。大学生代表了人口的重要部分,他们既与他们的家庭有联系,也在他们的社区中居于领导地位。

然而,很清楚,如果仅仅把大学生作为被试,那么这样的研究会在其一般的意义上严重地受到限制。州立大学的一些学生究竟属于哪一种人口中的合适样本呢?从这些样本中得出的研究结果能否适用于这所大学的所有学生呢?能否适用于所有的大学生呢?能否适用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呢?所有这些,取决于作出的是哪种概括。关于特定意见之分布的概括,或者关于同意这种陈述或那种陈述的平均数的概括——这是民意测验研究中寻求的信息——几乎无法超越正在调查的那所大学的学生们。从一所东部大学或者从一所私人创办的教育机构中得到的结果可能十分不同。然而,目前对分布问题的关注没有像对关系问题的关注那么多。例如,我们对于一般人口中有多少人会同意“工会已经变得太强大了”,“政府机构中的犹太人太多”这两句话很少感兴趣,而对这两种意见中是否存在一般的关系感兴趣。关于意见、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在个体中组织起来的研究,大学生确有大量的东西可以提供,尤其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我们的重点是改进技术,借此获得有关一般关系的第一批数据。只要被研究的因素存在着,这项研究就能够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反应肯定有所不同。当然,大学生样本的局限性在于,较高的知识和教育水准降低了抱有极端偏见的个体的数量,而且,据假设,影响偏见的某些因素很难寻找,甚至根本找不到。

鉴于这样一些考虑,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组被试。结果可以证明,各种思想倾向的强度在组与组之间会发生很大变化,而且,在大学生组中发现的那些关系与在其他地方发现的

那些关系十分相似。

2. 非大学生被试

我们也抽取了一部分非大学生人口的被试。为了增加被试的来源,以便拓展研究的范围,我们试图从范围广泛的各种成年美国人中抽取被试。这是因为,有关社会成员在不同程度上拥有社会变量,这些变量与研究有关——如政治的、宗教的、职业的、收入的和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等。上面列举的所有这些团体(大学的和非大学的),可借问卷收集数据,如表 1-1 所示。

在被试填写问卷时,他所属的那个团体,不一定是所处的各种团体中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团体。问卷本身主要用来提供有关团体成员的信息,这些团体成员的情况被认为是与研究最有关系的。被试则可以根据这一基础被归类,无须考虑问卷所涉及的团体。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获得不同类型的被试上面,借以保证意见和态度的多样性,以及适当涵盖那些被认为是影响思想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被试既非大学人群的随机样本,也非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我们的研究并不试图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进行社会学分析。研究的进展不在于拓宽较大人口的基础,确切地说,在于对“关键团体”进行集中调查,也就是说,这些团体具有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些特征。有些团体之所以得到挑选,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地位使得它们能被期望在社会识别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例如,退伍军人团体、服务性俱乐部、妇女俱乐部等。其他团体之所以被挑选出来予以集中研究,是因为它们呈现出对潜在的反民主主义者最为关键的人格变量的极端表现,例如监狱囚犯、精神病患者等。

表 1-1 问卷中收集的一些团体^[a]

	个案数
I. 问卷 78(1945 年 1~5 月)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	140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	52
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心理学班(成年妇女)	40
职业妇女(公立学校教师、社会工作者、 公共卫生护理员)(旧金山地区)	63
合计	295
II. 问卷 60(1945 年夏)	
俄勒冈大学学生(女生)	47
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54
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57
俄勒冈服务性俱乐部男性(基瓦尼斯俱乐部、 狮子俱乐部、旋转俱乐部)(总体问卷)	68
俄勒冈服务性俱乐部男性(只有表格 A) ^[b]	60
合计	286
III. 问卷 45 和问卷 40(1945 年 11 月~1946 年 6 月)	
A. 问卷 45	
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测验班(成年女性)	59
精神病临床患者(男性和女性)(加利福尼亚 大学兰格利·波特诊所)	121
圣·昆丁州监狱犯人(男性)	110
合计	290
B. 问卷 45 和问卷 40	
阿拉米达商业海运官员学校(男生)	343
美国退伍军人职业介绍所(男性)	106
合计	449
C. 问卷 40	

工人阶级女性:	
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	19
联合电气工人工会(C.I.O)	8
办公室勤杂人员	11
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I.L.W.U.)(新成员)	10
联邦住房建筑工人	5
合计	53
工人阶级男性:	
联合电气工人工会(C.I.O)	12
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	15
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I.L.W.U.)(新成员)	26
联合海员服务中心	8
合计	61
中产阶级女性:	
家长—教师协会	46
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中产阶级成员)	11
郊区教会团体	29
惟一神教教会团体	15
妇女选民联盟	17
上中阶层女子俱乐部	36
合计	154
中产阶级男性:	
家长—教师协会	29
郊区教会团体	31
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中产阶级成员)	9
合计	69
加利福尼亚男子服务俱乐部:	
基瓦尼斯俱乐部	40
旋转俱乐部	23
合计	63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32
洛杉矶男性(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南加利福 尼亚大学若干班级、联谊会、成人夜 校班、学生家长、电台采访写作人员)	117
洛杉矶女性(群体同上)	130
合计	379
总问卷 45 和 40	1518
所有问卷总数	2099

- a. 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采用问卷的团体,为了统计目的而被分别处理。例如,圣·昆丁州监狱犯人和精神病临床男性患者这两个团体被分别处理。但是,有些团体对于这一目的来说规模过小,因此与其他社会上相似的团体相结合。当这些结合发生时,团体的组成在表中予以指明。
- b. 表 A 包括了测量人格中潜在的反民主倾向的量表,该量表的一半用以测量政治—经济保守主义。

除了一些关键团体外,还从中产阶级中抽取被试。根据人们早期研究的发现,对较低阶层的调查要求不同的工具和不同的过程(相对于那些供大学生使用的工具和过程),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最好推迟。

在一些团体中,应避免少数民族团体成员占优势的局面,同时,当少数民族团体成员恰巧属于我们研究中的协作单位时,他们的问卷将从计算中排除出去。这倒不是由于少数民族团体的思想倾向不重要,确切地说,是由于调查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已处于目前研究的范围之外。

本研究的被试大多数生活在旧金山地区。这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10 年,人口增长迅速,大部分人口是来自全

国各地的新移民。在战争期间,该地区呈现出繁荣的情景,人口急剧增加,可以这样说,被试中大多数人是新近从其他州来的。

在洛杉矶地区设定了两个大组,在俄勒冈地区设定了若干小组,在华盛顿特区设定了一个组。

一个人要正确地填写问卷,至少应具有初中或小学教育水平,否则的话,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他难以理解量表中提出的问题和表格上的指导语。在本研究中,被试的平均教育水平大约是十二年级,大学毕业的被试数和未完成中学教育的被试数大致一样多。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目前的样本充斥着年轻人,其主体由20~35岁的人组成。

很明显,如果将本研究的被试合在一起,无法用来概括美国的总人口。本研究的结果可能被期望适用于非犹太人、白人、土生土长者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当不同团体(例如大学生、女子俱乐部、犯人等)所表现出的同样关系重复出现时,便可以用最大的肯定方式作出概括。当目前研究中未被作为样本的人口其他组成部分成为科研的被试时,可以期望下面几章论述的大多数关系仍将适用——当然,还可以发现补充的关系。

(二) 问卷的分配和收集

在考虑问卷所收集的一个团体时,第一步是取得该团体领导的合作。当领导的观点有点自由主义时(例如演说班的导师、海运学校的心理学家、男子服务俱乐部理事会的牧师等),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于是,向他充分解释研究的目的是过程,由他向自己的团体提出填写问卷的计划。当团体的领导趋向保守时,该过程的推进就有困难了。如果人们知道这项研究与社会辨别有关时,通常情况是,首先表示对这个“重要问题”有着巨大兴趣,然后是接二连三地推迟,直到我们不得不放弃从正在讨论

中的团体那里获得反应的希望。在这种类型的人们身上似乎存在这样的信念:最好的办法是莫惹是非;面对“种族问题”,最佳的研究方法是“不惹麻烦”。对于保守的领导的成功办法是把整个计划作为一般的调查提出来,像“盖洛普民意测验”那样,由大学里的一批科学家加以实施,从而指望量表项目的多样性和项目内容的温和性不会引发不必要的惊慌。

从大学生中收集问卷,无论是在学期中,或在暑期班中,或在大学的附设部分中(如夜校、函授班等),通常由班主任掌握整个进程。在其他团体中,通常把问卷的实施与一个研究人员对有关团体的谈话相结合。他讲述填写问卷的指导语,附带提出问卷收集的要求,并发表关于“公开意见的测量”等讲话,讲话尽量贴近研究的实际问题,以免引起听众的反感。

不论该团体是否被判断为自由主义,问卷始终作为民意调查表来呈示——而不是作为偏见研究来呈示。给团体的指导语如下:

民意调查:指导语

我们正在设法了解公众对若干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我们相信,你对内附的调查是感兴趣的。你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社会问题,它们都是你在报章杂志中看到过和思考过的,也是你在收音机里听到过的。

这个调查,既非智力测验也非信息测验。不存在“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你的个人意见就是最佳答案。你可以相信,不论你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总会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我们想了解的是:在每一个这样的社会问题中,公众意见实际上是如何分化的。

必须强调的是,本调查的发起人并不一定同意或不同意问卷中的所有陈述。我们的目的是想涵盖各种观点。我们同意某些陈述而不同意其他陈述。与此相似的是,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强烈地同意某些陈述,而同样强烈地不同意另外一些陈述,也许还会对其他一些陈述表示中立。

我们知道你现在很忙,因此不想花费你太多的时间。我们希望你做的是:

(1) 仔细阅读每条陈述,然后按照你的第一反应标上记号。对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必花太多的时间。

(2) 回答每个问题。

(3) 发表你个人的意见。在完成填表之前,最好不要与他人讨论问题。

(4) 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做到诚实、正确和完整。

这项调查做起来就像盖洛普民意调查或普通的选举。它像其他所有的秘密投票一样,“投票人”无须填写他们的姓名。

被调查的团体很愿意合作,当团体成员得到问卷后,至少在场的90%的人交回了填好的问卷。当然,团体中的有些成员在填写问卷的当天可能缺席,但由于我们不会对这项调查发出任何事先的通知,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缺席者的回答会与该团体的其余人员有什么不同。未能上交填好的问卷的被试差不多可以归为两类:一些人不想合作,另一些人则未填完问卷。人们也许认为,前者比该团体的其他成员更具反民主倾向,后者的拖拉则对本调查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也想到过采取邮寄的办法来收集问卷,例如,向教师和护士邮寄了200份以上的问卷,不仅附有完整的指导语,而且附

有希望他们合作的信件和他们单位领导同意合作的信件。但是,回收率极低,只达20%,而且这个样本在测量反民主倾向的量表的低分方面有着强烈的偏见。

(三) 临床研究中被试的选择

我们对特定团体的被试进行了访谈,并施以“主题统觉测验”,这些被试是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中获得最高分的25%的人和获得最低分的25%的人中挑选出来的。看来,该量表能提供对反民主倾向的最佳的原始测量。

如果被试所处的那个团体经常举行会议,那么操作程序便是在某次会议上收集问卷,获得量表分数,并且决定适当的访谈者,然后在下次会议上谋求进一步合作。在有些情况下,如果不可能借用第二次会议,那么在实施问卷时就向访谈者提出要求,愿意接受访谈的人告知我们如何进一步联系的方式。为了对选择和临床研究的目的进行伪装,告诉被试我们试图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意见和主张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大约与其中的10%的人进行讨论——然后,根据他们的回答,我们选择一些人进行访谈。

无记名的形式,既保证了团体调查,又保证了访谈的实施,当然被试也希望如此。为了实施访谈,要求进行个别研究的被试可在他们的问卷上填写生日日期,这样便于选择。然而,若要被试在填写问卷时说明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访谈,却是无法办到的。为什么这些被试难以接受访谈?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根据生日安排而获得访谈的人,一旦作出约会的决定,便对无记名形式不再关心了。

被试在临床研究期间花上2~3小时便可得到3美元。在对访谈者提出要求时便给以这项报酬的许诺,以表明研究人员

不会因为花费了被试这么多的宝贵时间而感到不安。这样的安排确实产生了效果,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对获得合适的被试有着相当大的帮助: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分低的人无论如何会进行合作,因为他们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被吸引,愿意在一种“良好事业”上提供他们的时间,但是许多得分高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决定参加,目的是为了钱。

在选择被试进行临床研究时,应考虑各种高分和低分获得者。我们采取从参加研究的大多数不同的团体中抽取一些团体的方法来保证被试的多样性。在特定团体中,有可能获得关于团体成员资格和另外一些量表分数的进一步的多样性。但是,我们不会作出这样的安排,即接受访谈的被试的百分比(这些被试具有各种团体成员资格)与被试所处的团体的百分比是一样的。接受访谈的高分者和低分者充分地代表了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获得高分或低分的所有的人,这个问题将在第九章讨论。

那些“中间”被试——处于 25% 高分者和 25% 低分者之间的 50% 的得分者——也得到了访谈。我们认为,对于理解反民主的倾向而言,最为重要的一步是决定一些因素,它们可以十分清楚地把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区分开来。为了恰当地对男女两个团体进行比较,有必要在每个团体中配上至少 30~40 个被试,由于男性和女性各自具有不同的问题,因此也必须分别加以处理,对于得高分和得低分的男性的研究,以及对于得高分和得低分的女性的研究,涉及四个统计群体,总数为 150 人。要想实施比这更多的访谈,出于实际的原因,这是不可能的。对于具有代表性的中间得分者的集中研究,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当然,必须沿着目前的研究路线进行。由于他们比两极中的任何一极人数更多,因此了解他们的民主或反民主潜力尤为重要。在与中间得分者进行的一些访谈,以及对他们的问卷

所进行的分析,使我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对量表上的问题并非漠不关心、毫不知情、缺乏动机和人格特征,这些都是在两极中可以找到的。总之,他们在类别上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这样说,他们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只不过材料的结合不同而已。

第一部分

思想倾向的测量

将被逐一讨论,每一种成分都与前一种成分有关,直到每一种组成成分都能与整体联系起来为止。分析的价值可以根据系统阐述达到的程度来加以测量,因为系统阐述决定着我们对每一个人的了解。

拥有案例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具体地陈述所研究的问题。读者也许会发现,下面提出的一些讨论是颇为熟悉的;他甚至在听了这样一种讨论后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以那种方式讲话?”这是提出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的一种方式。为了探讨一种答案,首先应该尽可能精确地描述被试如何谈话,他的思想方式和内容能否与他人的思想方式和内容作比较。因此,在本章中,访谈被用来表明本研究所描述的概念的起源。然后,这些概念被用来形成研究的问题,并系统阐述解释性假设。

下面呈现的记录并不代表研究中所发现的最为极端的例子(如果把全人口作为样本的话,该记录就不会变得极端了);这些记录也不能说是典型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并不属于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处于极高或极低的两极。还有比这些更为极端的类型,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仍属于在高得分者和低得分者之间十分容易看到的那些类型。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不可能在本章中考虑两极得分的女性例子;对个体女性的研究将在后面提出。

下面提供的许多访谈材料,乍一看,可能会给读者一种并不十分重要的印象,而且会认为它们与偏见无关。但是,接下来的分析将表明,这些被试所说的差不多每样东西都与一般图景有关,而且,只有当它们与一般图景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

一、麦克: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获得高分的男子

这个被试 24 岁,大学一年级学生。他想学习法律,并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公司法律顾问或刑事律师。^[2]他的学业分数平均为 B。中学毕业后曾读过一年商校,嗣后在华盛顿特区民用服务中心工作。接着,就读于预备军官学校,但是,一纸医学鉴定结束了他短暂的军旅生涯——因为医学报告证明他胃部有病。

他与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Methodist),但他不参加礼拜,并且认为宗教对他并不重要。他的政党倾向与其父亲一样属于民主党。他“同意”由反新政(Anti New Deal)的民主党人表示的政治倾向,却“不同意”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他“不同意”传统的共和党人,却“同意”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3]

该被试有“爱尔兰”血统,生于旧金山。他的父母均出生于美国。他在问卷中声称父亲是一个退休的伐木工人,退休金为 1000 美元。从访谈中了解到,其父是一个林业工人,同时也在磨坊工作,由此推断他的收入主要来自年金。当被试 6 岁时,母亲去世。他有个比他大 4 岁的姐姐。

他的访谈报告如下:^[4]

职业

这个学生决定将法律作为其职业。他说他离开中学已经三年,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不过,他读过两年商校,此外还上过夜校;他认为,大学才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他曾在华盛顿一个民用服务中心工作,一度成为国防部某个部门的预备生。

(是什么东西使你决定成为一名律师?)“当我还在华盛顿工作

时,我就作出了决定。当然,我在商校时作了一半决定,因为那里强调商业法。当我在中学读书时,鉴于财力的原因,我认为最好接受一般的商业教育,然后找一份工作。”

(你如何看待法律?)“哦,在我看来,法律如同用钥匙开启一扇扇可怕的大门。无论在何种职业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总会撞见它。法律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实际上,它也是我们企业的基础。有时,我曾希望法律能为人民免费服务,从而使人们在法庭上都能获得平等地位。将来,法律会变得更加重要。存在一种严肃法律的倾向,或者说更加严格的管理。不论政府形式是否改变,法律总是需要的。经济学家认为,为了每个人的利益,必须执行中央控制。”

(你父亲怎样看待法律?)“我父亲对法律也很感兴趣。当然,他为我而放弃了这个事业。他有商业能力,但他又是一个十分胆怯的人。他不善交际。他虽然拥有一片林地,但更喜欢替别人工作。他并不傲慢;他在林场和磨坊工作。现在,他的1000美元收入来自投资、股票和债券。他已经有30年不工作了。在这之前,他的月薪约75美元。他有胃病。对啊,他在小镇上建立了家庭。我们有自己的蓄水池和一台电泵。他自己盖起了房子并且拥有一切现代化设施。他凭能力和权利每年获得1000美元。”

收入

(你想每年赚5000美元吗?)“哦,听起来5000美元是一大笔钱了。这要看你住在什么地方和如何生活。在普通的环境中,你可以靠这笔钱舒舒服服地生活了。虽然生活在小镇上,一名律师的机会是有限的,但是,我却十分喜欢小镇,尤其是那些依山傍水的小镇。我喜欢打猎、捕鱼和野营。但是,城市生活却又十分便利。城市里有更为漂亮的房子和戏院。我到过许多地方旅行,但是,没有找到比加利福尼亚更好的地方了。我还打算到阿拉斯加去旅

行。我父亲的弟弟死在育空河(Yu Kon)地区,那里也有极大的发展可能性。如果一个人仔细地研究一下阿拉斯加,并且正确地定位,他便会到那儿的小镇上去谋生。去年夏季,我与一些在阿拉斯加干活的人一起伐木。他们认为这种活很艰苦。但是,如果能获利,这些困难就可以克服。你知道,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油田,应该得到开发。”

政治

“我投杜威(Dewey)的票。以前,我总是投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 D. Roosevelt)的票,但是,我在华盛顿工作过,并且看到了我认为应该制止的事情。在一些部门里,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在那里工作的人们抱有不同的态度。在民用服务中心,你的薪金高低完全取决于你争取到多少主顾,因为他们希望人们都进入民用服务中心。他们只想到自己。我还没有惟利是图到这种地步。我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管理,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战时,我进入作战新闻处,成为将军的得力助手。他们花了60万美元建造这幢大楼,但目的却不明确。他们干着军队监控服务已经在干的事情,并且想把这些事情接管下来。甚至在作战新闻处把它接管下来以后,国防部仍要为其准备公报;但是,作战新闻处要的是名分。花了那么多钱进行这种复制毫无意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部门还一直在嚷嚷缺人。我超时工作,但却是无偿的,因为我是在民用服务中心。在那里,我从1940年9月一直干到1942年9月。美国参战时,我就在那里了。有时,我连续工作37小时。在华盛顿生活是十分辛苦的,但我喜欢住在华盛顿。我喜欢接近事物的中心。在那里你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政府如何运作的情况。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件,到达这里时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解背景是有趣的,也就是说,了解幕后运作是有趣的。我的年薪是2000美元。当然,生活条件很可怕。”

(你特别喜欢杜威的哪些方面?)“我喜欢杜威的背景,他的直率、诚实,他处理问题时那种干净利落的方式。我想他是一个十分诚实的人,对于保持政府的传统颇感兴趣。”

(你认为事情会向何处发展?)“如果我们维持目前的政府体制,而且,我认为能够维持一段时间,那么有些情况将会发生变化。华盛顿的制度已经超出了一个人所能控制的范围。我们必须消除混乱。管理政府的人必须谨慎地选择副手,譬如副州长。现在这种方式没有明显的权威。如果你想办成某件事情的话,你必须与许多机构打交道。战后,这种情况也不会‘退潮’。总统最终不得不任命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为他办事。毫无疑问,这个制度正在朝权力集中化的方向发展。我猜想,罗斯福总统也许会重新当选,当然,这要视战事发展的方式而定。从罗斯福总统的演讲来看,人们似乎看到,他自以为他对美国是不可缺少的。他控制了政党,只要他身体健康,他将一直会控制下去。上次选举时,公众的投票十分接近。正是玩弄政治的伎俩,使一个年迈的卫兵获胜了。杜威干得很好,他考虑到他的障碍。若在正常年代,他也许会在竞选中获胜。战时,一些有子女参战的家庭感到,改换总统有可能会延长战争。这样想就错了。陆军和海军提前10年准备战争。不管谁当选,马歇尔(Marshall)将军都有许多话要说。我曾坐在他旁边听他讲话。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地位。改换总统可能会改变我们与英国的关系,而不是改变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丘吉尔(Churchill)有许多机会。他在战争中干得不错,但在和平时期表现怎样,仍然是个疑问。当然,罗斯福和丘吉尔有着亲密的感情。但是,如果与温斯顿·丘吉尔相比的话,罗斯福只是二流角色。应该承认罗斯福的许多思想来自胡佛(Hoover)。”

(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斯大林(J. Stalin)会与我们公平交易。杜威则会诚实到死。他有良好的背景,尽管不属于富有阶层,他心中有老百

姓。他的真诚和直率极大地感染了我。但是,一个人必须用些欺诈手段,以便实现最高理想。”

宗教

“我站在我父亲一边。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天主教徒。父亲并不笃信宗教,但他是个好人。他几乎不喝酒,而且从不吸烟。他做生意时十分诚实和严肃。他遵循教会规矩,但不去教堂,因为他不想与人们接触。他十分胆怯,对此,我无法理解。他的兄弟姐妹没有那种特征。他的兄弟姐妹十分普通。我母亲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相当严格,一直到死。童年时期我经常生病。她以相当严格的管教方式抚养我长大。母亲死后,她的姑妈带着我们,并且要我与她的孩子一起上主日学校。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我12岁或13岁,后来,我改变了习惯。我喜欢教会,尽管我不同意它的一些教义。我喜欢教堂里的音乐和歌曲。自入中学以来,我由于太忙,就不去教堂了。我喜欢社交,并不考虑社交会给人带来一些恐惧。我关注父亲的态度,并且发现我不得不违背他的有些意志。确实,主日学校的教育意味着某种东西,其中,武断的信仰太多了。我顺利成长。父亲开始尊重我的意见,尽管他也不时将一些决定强加于我。关于吸烟,他说,如果我想吸的话,必须当着他的面吸。他还在冰柜里贮藏了葡萄酒和白酒。我很快厌倦了吸烟,而且饮酒也不多。我脾气倔强,如果父亲想制止我,我也许会听而不闻,继续做我想做的事。”

(在何种情况下你会转向宗教?)“是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会转向宗教。我童年时经常生病,12岁起就患胃病。有一次,我住院达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我喜欢翻阅《圣经》。我喜欢历史和耶稣的话。我喜欢对《圣经》的话进行思考、分析,并估计这些话如何影响我。我对布道者的话并不那么感兴趣——由于他们的话不是第一手的,因此我并不完全接受。我用事实说话。我设法按照基督教

的‘十戒’(Ten Commandments)来生活。我喜欢接受公正的处理,并以此对待别人。”

(你关于上帝的概念是什么?)“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我的概念是,在我参加礼拜时,上帝严肃地说,人类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上帝对待我们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并不认为上帝在执行最后审判时是可怕的。如果一个人公正地生活,那么他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问题是我们应使地球上的一切变得更幸福、更公正。”

少数民族

“我母亲有着爱尔兰—美国—德国等背景。我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也许是因为我父亲认为他是爱尔兰人,而且为此而感到自豪。父亲喜欢圣巴特里克节。^[5]我有点像爱尔兰人,也是个急性子。如果人们中间有许多爱尔兰人的话,他们应该是非常快乐的。他们为人慷慨,尽管他们的钱并不多。他们有能力使他人快乐。他们处事机智。我希望我更像那种人。但是,在爱尔兰人的某些阶层中,懒汉太多。”

(你会用哪些团体与爱尔兰人进行对照?)“爱尔兰人与德国人或荷兰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许还有波兰人或白俄罗斯人——十分不同,在后面这些人中间,你将会发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易激动的人。我遇到的那些人,他们体格强壮,但不易激动。”

(关于爱尔兰人的同化问题。)"我喜欢探究爱尔兰人的血缘问题,这种想法令人快活。不过,在有些人群中,爱尔兰人占据优势。这要视不同的人而定。我没有成为爱尔兰人的欲望,但是我喜欢爱尔兰人。我不会与我不喜欢的爱尔兰人结交。我的小舅子是一个地道的爱尔兰人。”

(你不喜欢什么样的团体?)“一般说来,是我还不太了解的那些人。对于奥地利人和日本人,我从不不在乎;菲律宾人——我不了

解——我想我会远离他们。还有波兰人,尽管我发现波兰人十分有趣。我多少有点不喜欢犹太人。我认为他们的人性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彬彬有礼或者有趣。对此,我非常不满,尽管我与他们很少打交道。他们在宗派和物质利益方面特别在行。这也许是我的想像,但是,在我看来,当你递给他们一枚硬币时,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发亮。我不用犹太裁缝,因为他们用的布料都是二等货。我不得不对自己如何穿着十分小心。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少购物,我谨慎选择,以便购得好货色。”

(你能说出哪种人是犹太人吗?)“可以,只要我获得他们的想法,我就能做到。正如在那儿演说的女孩子中的那个人一样,她有女孩子的一切特征,但是她给我留下印象,因为她的想法是我不同意的。”

(你的意思是说,有些思想构成了犹太人的特征吗?)“对的,不管什么思想,只要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显出特征;这些思想始终体现在一个团体之中,例如,体现在犹太人妇女团体和犹太人组织之中。如果一个犹太商人经商失败,他会重新开始。他们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指向财富。犹太妇女联谊会上的姑娘们都穿毛皮外套,虽然价格昂贵,但没有品味,她们之所以如此,也许出自一种比人优越的想法。我对在人们中间显示优越的人很不满,因此我设法使自己不要有这种表现。我喜欢与劳动人民交谈。”

(你是否认为你不喜欢犹太人的程度正在增强吗?)“不,我认为这场战争已经使得美国人民彼此更加贴近。我曾偶然遇到过犹太士兵和水手;如果他们愿意结交,他们将受到欢迎并被接受,但是他们宁愿孤独,尽管我也会像别人一样接纳他们。我认为他们有着有趣的想法,但是他们必须索取某种回报。”

(你认为犹太人在战争中尽责了吗?)“也许他们尽了责任,但是他们是商人,况且他们也充分地得到了回报。”

(你认为犹太人在美国这个国家里是一股政治力量吗?)“对

的,在纽约,有一个称做犹太人移民的组织。它们组织得很好,这是不该被允许的。”

(你认为有危险吗?)“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危险,除了财富集中在某个阶层之外。我不愿看到这个国家里人们为别的国家里不称职的人承受负担。我们国内已有够多的问题,用不着帮助其他国家里的受压迫者。犹太人不愿同化,因此他们对我们的国家不会有巨大的贡献——尽管犹太科学家和医生作出了很多贡献。我考察了移民情况,3/4的移民离开欧洲到达这里。他们在移民问题上很坚决。他们是商人,从而会对国会施加压力。我们必须避免进一步移民,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他们同化的问题上,使之成为我国人民的一个部分。”

(如果他们感到别人对他们没有任何偏见的話,你认为他们是否会同化?)“如果他们愿意同化,那么他们就应该拆除他们与其他民族的障碍。当然,他们一直遭受践踏,有理由不满。”

(我注意到你曾声称你不会娶犹太女人为妻。)*“当然不会。我会与演说班的某个女孩约会,只要她不强调她的犹太人特质。她被她的那个犹太团体接纳了。如果她能抛弃她的犹太人特质,我也许会娶她,但是我不能与她的团体结成联盟。”

二、拉里: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上获得低分的男子

被试 28 岁,大学二年级学生,求学于商业管理系,学业平均成绩为 B。像麦克一样,拉里在离开中学数年后才对职业作出选择——中学毕业后从事兼职工作,并在结核病疗养院呆过一段时间。

他具有“美国”血统,出生于芝加哥。父母都生于美国。父

亲是咖啡馆和酒吧老板(一个小商人,在自己的店里干活),现在的收入是 12000 美元,与战前的 3000 美元收入形成对照,父亲拥有自己的家和一些房地产。

被试与其父母一样是卫理公会教徒,尽管他极少到教堂去。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这也与他的父母一样。他与威尔基的共和党人观点一致,而与传统的共和党人“观点不一致”;他还与新政的民主党人“意见不合”,同时却与反新政的民主党人“意见一致”。在问卷上,这种反应模式与麦克的反应模式一样,而麦克却是得高分的人。因此,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在访谈中的政治思想,应该说是很有趣的。这样的比较将表明,一个被试的“官方思想”与他的实际政治倾向之间有时是多么的不一致。

职业

“我有着明确的计划;我想进入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我想拥有自己的企业,并成为一名高级官员。我想把房地产和金融结合起来,后者主要用做贷款,如果成功的话,我想从事掮客业务,买卖股票和债券。”

(钱的问题呢?)“我的几位亲戚有钱,我的父亲也有钱,他们会支持我。我为他们工作,父亲从事咖啡和酒吧业,还从事房地产,我可以成为父亲的副经理。我曾为 CPA 会计公司工作了几年,而且学习过会计和商业课程。我读了一年大专,但是我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我得到相当好的分数,但是与我应当得到的相比,还不怎么好。我患过一种病,在医院里住了四年(折腾了好久,才知道我患了结核病,并且住进医院)。但是,我并不灰心。我一直打算返回大学。过去两年中,当我住院时(拉里始终称它为医院,从不称它为疗养院),我攻读了函授课程。在会计、商业管理课程中,我加强阅读,以改进我的脑力。我几乎还记得戴尔·卡内基

(Dale Carnegie)的《如何赢得朋友》(How to Win Friends)……因为我认为它有助于我进行商务洽谈。我对整个一生进行过规划,包括在哪里定居,结果选择了洛杉矶。那就是我在医院里所干的一切,我躺在病床上,计划着我的整个未来,包括我将干什么,以及如何干。”

(你喜欢你规划中的何种事业?)“我的祖母有一家相当成功的饭馆;她是一个十分讲究效率的商人,我钦佩她。我的整个环境都是关于商业的;它不仅令我荣耀,而且使我学到了同样的经商态度。对你来说,经商为你提供了独立性、金钱、你所需要的假期,以及在一年的365天的工作中你十分想得到的自由。我从不关心诸如化学、动物学、齿科学等科学。”

(那么医学呢?)“那门科学是不错的,如果我想挣得社会地位的话。但是,一般的人即便呆在顶层的办公室里,一个月也赚不到2000美元以上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与经商相比,尽管商人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生活的方式。可是,钱看来显然是重要的。我返回学校有三个原因:(1)知识——能够哲学化,并且知晓许多事情;(2)安全——谋求一种适当的生活;(3)社会威望。”(这是拉里倾向于将每一样东西都组织起来使之清晰的一个佳例。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干这件事,甚至还设法为这种倾向作出心理学解释。他说话时,常常边说边扳弄着手指指数1、2、3。)

收入

“我想至少一年赚25000美元,个人资本达到10万美元,也就是说,除了商业,我还拥有金钱,这样,我就可以旅行,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做我看到其他人能做的任何事情,譬如,去欧洲,参加肯塔基赛马会,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将坐头等舱去旅行,去南美洲观光,甚至到世界各地去。迄今为止,我的旅行少得可怜。或者,如果我想去的话,可去东方参加会议。我不是百万富翁,只是

为未来的安全做这些事情。”

(你对生活抱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我是很乐观的。我不知道我有多乐观,但是我至少相当成功,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已经获得了一点成功。去年,在芝加哥,我有机会与‘卡巴莱’餐馆和保龄球馆中的几个人一起经商。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投资,而且我也不喜欢保龄球行业。除此以外,我想回到学校,为我的最后计划奠定基础,并拥有我自己的企业。”

(如果你失败,你将怎么办?)“我不会自杀或者极度沮丧。那种病(他从来不提该病的名字)促使我去进行哲学探讨,也即对于偶发的事件一笑了之,或者说,在遭遇困难之后,我会精神抖擞地重新开始。”

(你的家庭怎么样?)“在经济萧条时期,我父亲找到个好工作。我家并不富裕,但是比一般人家好些,我猜想年收入约3000美元;但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有6个孩子,我排行居中。后来,我父亲经商,并且干得不错;他现在有酒吧。他在一年中赚到的钱比他期望一生中赚的钱还要多。他还买了一些房地产,也赚得很多。他像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和他都只热衷于经商。他不要假期,不要社会威望,也不要财富。他就是想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成功的商人,他的一切快乐均源于此。我想,这取决于顾客是否感到满意,只要顾客满意,他们就会经常来,成为常客。”

(你父亲是哪一种类型的老板?)“他仁慈但又坚定。他为两个雇员买了房子,让他们逐年偿还买房的钱。他给了他们圣诞奖金,但是他也要求效率和质量。他是一个理想的雇主。事实上,如果我有雇员,我也许不会像他对雇员这般好,如出钱为他们买房,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离开我。”

政治

“我的父母都是共和党人。他们从不投罗斯福的票。但是,我

们的亲戚是民主党人,我们的朋友也是民主党人。全家多年来一直都是共和党人,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共和党人,为什么我的父亲也是共和党人的原因。此外,全家成为共和党人,还因为商人通常不喜欢税务和限制,不喜欢繁琐拖拉的官样文章。罗斯福作为一名政治家太过分了;他没有足够的原则,就像上次选举时他拒绝接受华莱士(Wallace)的那种方式。我更喜欢琼斯(Jones)而非华莱士成为商业部长,因为琼斯是一位好商人,而且更有效率;一般说来,我喜欢华莱士和威尔基,尽管我不喜欢华莱士的农业计划。”

(谁是最佳的共和党人?)“是威尔基。我之所以投杜威的票,主要还是表示对罗斯福的抗议。但是,杜威太年轻,而且经验不足。”

(杜威和华莱士相比怎么样?)“华莱士是一个好人,我通常投好人的票,但是,我认为这次我首先考虑的是政治而不是人品了,这样一来,我可能不会投共和党人的票。我想,这是政党变革的时候了。”

少数民族

(关于这个国家里少数民族的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可以说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尝试着不带偏见。”

(你对黑人怎么看呢?)“应当给他们社会的平等权,他们有资格从事任何工作,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任何一条街道,等等。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偏见,但是,自战争以来,我了解了关于世界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少数民族问题似乎有点微不足道,与其他国家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相比,有点小巫见大巫。”

(能举例说明吗?)“例如俄国,我不喜欢他们平分财富的经济学,但是,我认为他们强调统一;他们的作战如此出色,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接着,他对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表了一通议论,并

且表现出他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开发等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对少数民族问题也有充分了解。但是,对经济问题却不太清楚)。我信奉自由,我追求幸福。我们并不强调统一,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而战,其中,歧视是一个主要根源。种族问题和经济问题是战争之源。我不赞成对人施行压制。我认为把日本侨民逐出海岸地区是一种不民主的做法,原因是有些人想在那儿建立他们的农庄和商店。对此,没有真正的民主。民族的隔阂会导致更多的隔离,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人们之所以歧视黑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黑人,也因为黑人在生理上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对犹太人的歧视则是由于他们的经商能力——人们害怕他们会掌握国家商业的控制权。例如,黑人应当接受教育,使他们在国家的发展中起作用;教育在其他少数民族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犹太人又为什么会受迫害?他们中有些人为什么会成功?这与上述的歧视有关。”

宗教

“我是卫理公会教徒,我的家人也是卫理公会教徒,只有一个兄弟除外,他准备成为一个天主教教士。他15岁,就喜欢当传教士——他是靠自己进入教士队伍的。哦,我母亲在年轻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当她的嫁后就成了卫理公会教徒,而且她不想使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成为天主教徒。”

(你认为宗教的价值观是什么?)“它教给我们关于正确和错误的伦理学,那是主要的价值观。但是,当我研究了科学和哲学以后——当我了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可把人类历史追溯至《圣经》以前的事实之后——我开始对许多宗教教义产生疑问。我去教堂,设法使自己相信宗教,但有时却对它产生许多疑问。我喜欢教堂,在那里可以听到有关道德伦理的善意布道,听到如何生活和如何进步的布道。那就是我关于宗教的主要评价。”

(你父母的态度呢?)“他们是教堂的常客,相当宗教化;他们送

我去主日学校；他们每顿就餐前总要谢恩。但是，在教堂外面，他们不讨论宗教，也不经常想到它。”

三、上述两例的分析

在我们分析上述两个访谈之前，先来谈谈对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具有意义的一些话。人们也许会同意，每份访谈报告都提供了完整的印象。尽管每份报告包含了一些矛盾，但它们看来是相对地有组织的，并在心理上是相对地自我一致的。这一完整的模式对偏见或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特定情境中的外显行为是社会歧视的关键线索，而且人们需要了解今天有多少人会在特定条件下参与这种或那种歧视活动。这种信息是重要的，但它不是目前研究的关注之点。对于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个国家里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可能性。由于我们不是法西斯主义，由于明显的反民主行为不为官方所赞许，因此，对人们的实际行为进行调查很可能会低估这种危险性。这里，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反民主的行为不再受到制约，那么反民主的情况又将如何？根据目前的理论，这种反民主的情况是与这里正在讨论的整个心理结构相联系的。

虽然每种思想模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整体(whole)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含许多特征，这些特征把人与人之间明显地区分开来，光说一个人“具有偏见”，另一个人“没有偏见”，并且以此为基础作出价值判断、计划如何行动，这样做是不够的。那么，区分有偏见和无偏见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这些特征？它们在个体的顺应中起着什么作用？它们如何与其他特征相互作用以形成有组织的整体？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任务似乎是描述方面的任务：首先，有必要询问，贯穿个体思想讨论的倾向和主题是什么；其次，这些内容(变量)有何相似，又有何不同。

伴随着上述访谈报告的考察被设计用来说明目前研究运用的那些描述性概念，并揭示它们起源的方式。这一分析以理论研究为指导，否则，有可能把注意力引向案例的其他方面；然而，看来没有理由怀疑这里区分的一些特征，因为它们是最重要的。

随着描述性概念的提出，有可能对研究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1) 决定个体内部一贯倾向的因素以及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因素；(2) 对众多变量的概括，以及以某些案例研究为基础的系统阐述的解释关系。

访谈报告中的项目顺序出自访谈技术的考虑：从被试觉得最容易谈论的东西开始，中间插入一些充满感情的问题，例如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直到访谈结束。然而，我们在后面阐述的顺序不同于访谈的顺序，我们的顺序是用一种与研究的发展顺序和本书的一般计划相一致的方式来排列项目的，例如，先是反犹太主义，接着是民族中心主义，再后才是一般思想。

(一) 对犹太人的看法

麦克对犹太人的谴责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1) 违反惯常的价值观；(2) 内团体(ingroup)特征(宗教的和谋取权力的)；(3) 负担和品味。犹太人违反惯常的价值观的表现是，他们“不礼貌，对人性不感兴趣”，但是，他们都是唯物主义的，会赚钱的。作为商人，他们常常兜售“二等材料”，并伴以欺诈手段；在社会交往中，他们为体现优越而追求昂贵的东西，却又缺乏品味。

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想像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团体成员盲目地忠诚团体，彼此结合在一起，以便相互安慰和相互

帮助。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不愿与非犹太人混合。通过彼此结合,他们积累财富和权力,借此造福自己而非别人。

但是,如果说犹太人有强项的话,那么他们也会有弱项,因为在他们中间存在负担,存在内容与形式不相称的东西,而且,作为团体,他们始终被人家踩在脚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考虑到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考虑到他们积累财富的能力,个中的原因是被试无法解释的。在被试看来,这似乎是犹太人自己的错,因为他们“不该对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表示不满”。弱小的犹太人处于一种特别没有希望的情境之中,即无法期望非犹太人会帮助他们,就是强大的犹太人,尽管可以运用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也不会去援助他们团体中弱小的成员,而是宁愿帮助非犹太人。强大的犹太人由此可以逃脱人们对他们结帮谋利和漠视人性等的指责。一般说来,犹太人应当抛弃他们的犹太人性,与人口中的其他民族同化,这样,被试与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方可消除(然而,可以推测,也许演说班里的那个女孩不会作出一些事情来使被试完全接受她。她的犹太人性也许会继续保留,既用做排斥他的手段,又用做引发他兴趣的东西)。

正如麦克花了许多时间来谈论“犹太人出了什么毛病”和“犹太人对此该怎么办”一样,拉里也花了许多时间来谈论“非犹太人出了什么毛病”和“非犹太人对此该怎么办”的问题。拉里反对下述的想法,即认为犹太人追求权力和控制;希望人们去了解关于犹太人的真实面貌。两个被试之间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歧是,拉里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面,而麦克则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拉里说他信奉与每个人平等相处,公开地进行相互作用。歧视是战争之源;歧视构成了对一切团体的威胁,是人们必须一起予以解决的问题。

这些讨论提供了那些对犹太人的看法具有什么含义的例

子。人们在这里需要处理的东西不是单一的特定态度,而是具有内容、范围和结构的一个系统,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

可以注意到,麦克对犹太人持否定的态度(他们结帮谋利,信奉唯我主义等),对犹太人持敌对的态度(首要的问题是改变他们),并对那些形成意见和证明态度的价值观作了界定(如礼貌、诚实、品味等)。与此相对照,拉里对犹太人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不要歧视,需要理解等),并谈到了不同的价值观(摆脱偏见、社会平等)。

于是,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些问题:麦克所作的那些指责在我们的人口是否具有普遍性?还能找到哪些类型的指责?它们出现的频数如何?在我们的社会里,哪些东西是与犹太人有关的最具特征的意象?是否存在接受这种否定意见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像麦克那样的个体在何种程度上会自发地表示否定意见,以便与其他一些持否定意见的人取得一致?反犹主义思想在何种意义上说是非理性的?有没有其他非理性的特征与那些具有偏见的被试的非理性特征相似:把犹太人说成是如出一辙的,并将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特征归因于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的首要任务是同化,明确表示他无法接受犹太人。这些非理性的倾向对于高分者是否典型?被试所表示的犹太人的态度,对于持偏见的和不持偏见的个体来说是否典型?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找到的主要态度是什么?持否定意见的人是否通常也持敌对态度?对于接受或反对反犹主义的态度和意见的模式来说,是否存在一种一般的准备状态?

上述所有这些问题涉及反犹主义的思想内容,这些问题同样可以指向反犹主义的强度。如果在个体身上存在一种一般的准备状态,用于接受或反对反犹主义的意见和态度,那么能不能将个体按维度分类,其范围从极端地反犹到温和地反犹,再到一

个表现为满不在乎、不闻不问或混合感情的中立态度,或者从温和到极端的反反犹主义呢?这是有可能的,这种想法促使人们制定一份量表以测量反犹主义,该量表同时又十分广泛,包括大多数反犹思想的主要内容。该量表的成功使得人们有可能调查反犹主义的量化关系,以及众多的其他变量,包括那些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

麦克在访谈中对这类反犹太人谈话的各种解释表明:这是对犹太人的真实评价。麦克具有其特殊的不悦经历,他从这一经历中过激地概括出一般的结论,他不过是在重复他的圈内人士的普遍的谈话内容,尤其是那些对他来说具有威望的人。他在自己的经济、社会和职业志向等方面或多或少感到受挫,并且借此向犹太人发泄,通过把责任归因于外团体(outgroup)以谋求将自己的失败和弱点合理化(rationalize)。在对这些假设给予适当注意的同时,本研究的过程不是马上探究决定因素的问题,不是询问为什么他以这种方式谈论犹太人,而是首先寻求他是如何谈论其他民族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探究其原委之前,尽可能充分地理解被试的准备状态及其性质。如果在他关于反犹主义的讨论中发现的一些特征,在他讨论其他民族时没有出现,那么,他的反犹主义就必须在本讨论的范围内予以解释。另一方面,如果在他关于犹太人的想法中找到的倾向,在他对其他民族团体的想法中也能找到,那么,这些倾向就可以作为原因来考虑。由此可见,仅仅用来解释反犹主义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适当的。

(二) 一般的民族中心主义

我们注意到,麦克在讨论犹太人时,倾向于用内团体—外团体(ingroup outgroup)的术语来进行思考:他认为,犹太人构成了

相对来说同质的团体(homogeneous group),从类别上看,与他所属的团体有所不同。依此逻辑,接下来便是进一步探索关于他自己团体的概念,借此引发他关于其他各种团体的意见和态度。

在与麦克进行访谈时,关于少数民族团体的意象和态度的一般论题,通过引发他讨论他对自己的内团体的归属而得到介绍。在这次讨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他在谈论爱尔兰人和其他民族团体时所采用的一套方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两者恰成对照。每一个民族团体都被视做是一个同质的统一体,极少有例外。除了假设不同的“血统”之外,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团体如何成为目前状态的。一个人像什么样子取决于他身上有多少“爱尔兰血统”或“犹太人血统”。至于爱尔兰血统,有着某些受人赞许的特征,如急性子,花钱慷慨,能使别人欢笑和快乐等,当然,也有某些属于缺点的特征,主要是懒惰。

将这种内团体的评价与他对犹太人的评价相比较是颇为有趣的,他以同样的术语来描述犹太人,只不过犹太人被想像为缺乏爱尔兰人那些良好品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野心和权力的矛盾态度:由于他在评价外团体时批判了野心和权力,因此在评价内团体时,为内团体缺乏野心和权力而感到遗憾。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消除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而是如何确信权力主体应在正确的内团体手中,鉴于上面指出的犹太人的主要缺点是“结帮谋利”以及不愿同化,因此一种不能同化的爱尔兰血统的存在便是“令人高兴”的了。我们再次看到,那些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当它出现在内团体身上时,却成了一种美德。内团体和外团体两者均以同一种术语被思考,也以同样的评估标准来判断。这样一来,一种特定的特征(例如结帮谋利或者权力)究竟是好是坏,就要看是哪个团体拥有它。

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时间去探究被试对其他团体的想法(这些团体是作为他不喜欢的对象被提到的——如奥地利人、日本人、菲律宾人等),也没有时间去探究这份列举的名单可能会扩展得多远。但是,被试拒绝其他团体就像拒绝犹太人一样,光是这一事实本身也够重要的了。

拉里在评论时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一事实,即人们有可能歪曲对团体的看法,或者至少在评论时被个人因素所左右。另一方面,麦克却极少表现出这种自我定向或自我意识;他并没有暗示他的那种充满信心的概括可能包含着不正确的个人意见,也不感到应以真实的经验为基础去说明它们的原因。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倾向于对个体和社会问题采取主观的、心理的和人性的评价方式的差别,能否作为一般的规律来把非民族中心主义的个体与民族中心主义的个体区分开来。

在麦克关于少数民族的思想中,可以发现的一些特征,恰恰是在拉里关于少数民族的思想中所缺乏的,这些特征是:(1) 定型(stereotype)——机械地将事物以刻板的类目进行归类的倾向。(2) 认为团体是同质单位的想法(这些单位或多或少地决定了其成员的性质)。这就把团体间张力的责任完全置于作为独立实体的外团体上。可以询问的一个问题是,外团体如何改变才能为内团体所接受;没有任何暗示表明,内团体需要改变其行为和态度。与此相对照的是,拉里把责任主要置于内团体上,强调内团体的理解和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基础。(3) 用“血统”来解释团体差别的倾向,即一个人的急性子程度,取决于他身上有多少爱尔兰血统。这与拉里试图用社会的、心理的和历史的术语来进行解释恰成对照。(4) 麦克认为外团体需要彻底同化,赞成对那些拒绝同化的外团体成员进行彻底隔离。可是,在拉里看来,他似乎既不用隔离来进行威胁,也不要求同化。他说他

关注充分的“社会平等”和相互作用,而不是内团体支配和外团体屈从。(5) 由于拉里相对来说并不受制于内团体和外团体定型的影响,由于在他看来团体并不是社会描述的单位,因此他站在与麦克的思想倾向相反的立场上。麦克按照团体的一致性,并根据一种层次的安排(即强大的内团体位于层面的顶部,而弱小的外团体位于层面的底部)来考虑团体问题。

前面提到的问题(即反对犹太人的个体是否倾向于对其他少数民族团体也抱有敌意的问题)至少在个体的情境里找到了答案。麦克对各种少数民族团体均持排斥态度,而拉里是反对所有这些“偏见”的。因此,关于该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排斥某种少数民族团体的人也倾向于排斥其他少数民族,这样说正确吗?或者,存在一种倾向,即个体指向一个特定团体的敌意态度会经常发生吗?民族中心主义的排斥态度有多大的涉及面,也就是说,有多少不同的团体被归入外团体的概念之内?它们既是民族内的又是民族外的吗?这些团体的主要的客观特征是什么?哪些特征是被民族中心主义个体最普遍地归于这些团体的?哪些意象应用于特定的外团体?在麦克身上(而非在拉里身上)找到的关于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刻板区分的倾向在人口中是否普遍?麦克关于团体的思想方法——刻板的类别,经常谴责外团体,等等——在民族中心主义的个体中是否典型?

如果民族中心主义所表示的意见和态度被认为是对一些少数民族团体怀有敌意,不加批判地对那些与个人相一致的团体持赞同态度,那么是否有可能按照这些个体的民族中心主义程度来给他们分层,像在反犹主义的案例中所提示的情况那样呢?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决定民族中心主义与其他一些因素——个体所处的当前的社会情境,他的历史和他的人格——的量化关系。但是,为了追求上面所勾勒的一般研究方法,看来,最好首先去

探索民族中心主义个体的观点,也就是说,在提出决定因素这一根本问题之前进行这种探索:他关于其他团体而非民族团体的意见和态度是什么?他是怎样一般地探索社会问题的?

(三) 政治

麦克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曾以相当的篇幅探讨了在他看来外团体是什么的一些属性。外团体的结构和动力被构想如下:它是一致的和谋权的。谋权是外团体的目的,为了获得权力,它可以不择手段,不管对他人多么有害。自私和金钱成为权力驱动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将其他一些特征归于外团体:外团体是无效率的(表现为笨拙和混乱),组织极差;这些不利特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内部力量被不恰当地安排,没有明显的权威,副手太少而且选择不当。除了组织上的弱点以外,还有体质上的弱点(联系到罗斯福的体能,使人想起他的政敌声称他的身体太差,以至于无法担负起总统的重任)。将弱点进一步归因于新政,基本上出于这样的主张,即认为罗斯福向更为强大的领袖屈服——“与丘吉尔相比,他只是二流角色”,并说他的思想来自胡佛,意味着他将输给斯大林(如果后者不公平地对待我们的话)。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麦克在一般的民族中心主义和他接受斯大林之间有着明显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可以用被试关于权力的态度来进行解释:他对权力的仰慕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接受并且暂时将他自己与一个遥远的外团体结成同盟,尤其是当该团体未被看成是对他构成一种直接威胁的时候。可以推测,像许多支持战时应与俄国进行合作的人们一样,麦克的态度现在已经改变,俄国被认为是对内团体的威胁。麦克关于外团体和内团体之间关系的概念是较为简单的:一方面,外团体具

有自私、贪婪和谋权的内驱力;另一方面,有着无效率、失去控制、利用内团体等弱点——从内团体那里谋得权力,接替内团体的功能,骗取其一切信用,通过熟练操作诱使人们入其圈套。总之,削弱内团体,由自己来经营一切,为自己狭隘而又自私的目的服务。

当麦克谈到政治上的内团体时,他提到了他所敬仰的一些特征,而且所涉及的惟一政治机构和力量是军队和杜威。像那些归于外团体的特征一样,内团体的特征也归入同样的范围,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对立的地方。不论一致还是对立,似乎均遵循着一个简单的规则:涉及权力的那些外团体特征在内团体中保持不变,只不过现在它们被认为是好的;对每一个外团体来说,涉及弱点或不道德的特征,在内团体中却以相反的特征呈现。

让我们首先考虑对立的方面。新政的无效与杜威的干净利落形成对照。罗斯福的“玩弄政治”与杜威的直率和诚实形成对照。罗斯福屈从于更为强大的领袖与杜威决心克服障碍和马歇尔将军不屈不挠的坚定性形成对照。外团体的组织混乱可以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权力被集中在一个小而精干的组织之中)来得到纠正,这样的组织具有清晰界定的权威水平,体现为有一个强大的领袖位于层面的顶部,以及一群经过认真挑选的副手组成的内阁。

很清楚,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后者有着更大的弱点。若把外团体的弱点搁在一边,我们发现,在其他一切方面,外团体和内团体的概念是一致的:两者都希望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小而一致的组织之中,它的惟一目标是维持其自身。当外团体被谴责为自私和贪婪时,内团体的惟一美德是它的诚实和效率;至于其目的,则未提及。

但是,不论内团体的目的是什么,据假设,它们是有利于内

团体的,因为麦克告诉我们,他支持杜威的原因之一是“杜威总是想到普通百姓”,看来,被试是以普通百姓自居的。我们从麦克关于民族团体的讨论中得知,所谓“普通百姓”并非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确切地说,它指的是一种内团体,这种内团体排除了人口中的其他部分。我们也看到,富人被排斥在他的“普通百姓”的概念之外。然而,对富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富人属于“普通百姓”,这是由他想成为一名律师的欲望所显示的,也是由他赞同一种社会结构的分层形式所显示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层形式在经济领域里能使财富的分配永久化。看来,被试又处于保守的一边。他以赞同的态度引述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许多口号,他对我们说,杜威将得到支持,因为他对“维持原有的政府传统感兴趣”。但是,有理由相信,他的保守主义并不属于那种传统的类别。他赞成的中央集权的方式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原则相一致,这些保守主义原则就是自由竞争和限制的管理功能。确实,也可以说,他的明显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保守主义(anticonservatism)。我们注意到他的评论:“如果我们维持目前的政府体制,而且,我认为我们能够维持一段时间,那么,有些情况将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他提出我们的政府体制难以维持,为什么他认为政府至多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呢?他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维持保守主义传统的手段实际上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彻底推翻这种保守主义传统。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主要论点是,麦克将权力和弱点两者归属于外团体,而只将权力归属于内团体。不过,必须指出,在麦克看来,内团体中也存在弱点,尽管形式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当麦克把美国作战新闻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描述成谋求权力的庞然大物时,国防部就被描述为处于沮丧的情境之中:“我们的部门还一直在嚷嚷缺人。”再有,杜威的竞选运动被看成

是大卫(David)和戈利亚斯(Goliath)之间的一场斗争,结果直率的年轻人输了,仅仅因为那种压倒一切的权力:“正是玩弄政治的伎俩,使得那个年迈的卫兵获胜了。杜威干得很好,他考虑到他的障碍。若在正常年代,他也许会在竞选中获胜。”这种被迫害的意象不仅在麦克的政治思想中表示出来,而且还在他关于自己的讨论和关于他在华盛顿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在他的下列评论中显然有一种自怜的注释,他说他不停地“连续工作 37 小时”,而且“生活条件很可怕”。

指出下列一点是重要的:麦克的弱点在这些陈述中得以显现。看来,他正在试图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如果说内团体有可能表现出虚弱,主要是因为外团体的迫害,重要的是因为外团体暂时地——而且不公正地——比内团体更强大一些。进一步指明下述一点也是重要的:他感到遭受迫害并不导致对其他受迫害人士的同情,也不导致消除这种迫害的任何倾向,而仅仅导致这样的想法,即凡是拥有公正的团体才是真正强有力的团体。这里,正如那些具有迫害幻想的人所典型表现的那样,麦克认为,他和他的团体基本上是强大的,与此同时,又处于虚弱的困境之中;只有通过把那些邪恶的东西(不诚实、不公平等等)和那些不该得到的权力归因于他的对手,才有可能解决他的这种困境。他意欲依附于同样的权力(他在评论外团体时诋毁这种权力),这种意图表现在他想“接近事物的中心”,“了解背景的情况”,“了解有关政府如何动作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拉里,业已表明,他关于政治的评论,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缺乏组织和信念。这与他在其他思想领域(例如少数民族问题)中的观念恰成对照,在那些领域,他的评论具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性和定论性。然而,在他偶尔发表的关于政治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麦克不同的观点。这里,正如

两人在对政治标签的偏爱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两人都表现出保守态度,对新政予以保守主义的谴责。但是,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两人的差异突显出来。

主要的差异在于,拉里并没有对那些导致麦克保守主义疑问的特征进行思考。拉里的思想并未围绕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来展开:不存在把内团体作为静止的、同质的、可以不受任何批判的实体概念;外团体同样也未被想像为由一群虚弱而又邪恶的人所组成。或者说,拉里并不认为他们通过搞阴谋诡计来获取不该得到的权力,并用此去迫害内团体。确实,他甚至把自己与一个人等同起来,这个人就是华莱士。华莱士不仅属于外团体,而且按照流行的宣传,是一个“无能”之辈。

关于两人之间的第二种主要差别,已有证据表明,拉里的保守主义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手段,拉里借此手段来使自己得到承认。由于他想成为一个商人,他就不得不支持政党,因为政党能对商业提供许多帮助。这与麦克不同,麦克强调无私的世俗思想,以便否认他对权力的潜在兴趣。

可以肯定,拉里发现他难以把这种“现实主义”与他在其他领域中表现的“理想主义”调和起来。他意识到这种困难——这又表明他与麦克不同。后者发言时好像他的话是充分客观的,因此没有必要提及个人的看法等等。另一方面,拉里意识到,他的观点既反映了自己的亲身体验又反映了外部现实,从而使这些观点成为尝试性的、两可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他感到有必要解释自己观点的缘由,承认某种内部冲突,并且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可能不会以最为理智的方式阐释自己的观点。这些特点既有助于被试避免对任何事情都十分好斗,又保证他可以反对极端的保守主义(reactionism)。

如果有两个人的政治主张与麦克和拉里一样不同,但却结

成了政治联盟(两人都同意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和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如果他们理解这些党派的标签意味着什么,那么人们就会问政治同盟是否导致对民族中心主义的赞许。或者,如果两者有关联,那么在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和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关于少数民族团体的思想中哪种思想更加典型,是麦克的思想更典型还是拉里的思想更典型?

那些赞同新政的民主党人的思想更典型还是传统的共和党人的思想更典型?根据我们的理论,我们应该期望政治自由主义能够相对地摆脱偏见,而政治保守主义(至少是它的极端形式即极端保守)则趋向于民族中心主义。确实,论证这一观点的证据已经存在。本研究的自然步骤是构建一个连续体,从极端保守主义到极端自由主义,借此组成一个量表,它使个体沿着这一连续体来定位。这样做有助于决定保守主义、反犹主义,以及一般的民族中心主义的量化关系。但是,它是基于麦克和拉里的访谈内容为依据的:(1)保守主义并非一种单一维度的态度,而是一种复杂的思想模式;(2)保守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决非一对一的关系。

当然,不能认为这两个被试在自发的评论中涉及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一切方面。我们的研究任务不只是探究这里所说的一些特征——例如保守的价值观、经商态度,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否可以综合起来,而且还要探究哪些意见、态度和价值可以归入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模式。换言之,组成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成分是什么?是否存在一种一致的模式,其容量足以容纳麦克和拉里所共同具有的东西,而且,与此同时又容许描述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在麦克身上可以看到而在拉里身上却看不到的一般的保守主义或特殊的保守主义问题,对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来说,哪一种更为重要?

可以充分肯定的是,麦克的立场并不保守,相反,却是“假保守主义”(pseudoconservative)的。如上所述,尽管他声称自己信奉传统的保守主义原则,但是很清楚,他认为这是“应当予以改变的时候了”,并且强烈地暗示说,他希望这种变化是取消那些他借此来认同自己的制度。人们经常评论道,如果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得逞,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那么它就会在传统的美国民主的旗帜下游行。这样一来,〔“赤裸裸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口号(它反映了独立的和大胆的企业家之间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概念)实际上意指商业巨头的那种不受控制的和武断的政治——庞大的联合企业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已经减少了单干户的数目。〕很清楚,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调查,必须把这种现象考虑进去。那么,能否用客观的术语来界定“假保守主义”,对个体的“假保守主义”进行诊断,并且对它在人口中的力量进行估计呢?假保守主义是否像在麦克的例子中那样被认为是与民族中心主义和其他反民主倾向相联系的呢?

在任何一种测量保守主义的量表上,假保守主义也许总会获得高分;被试同意关于保守主义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的一般陈述。如何构建量表项目,使它们不仅反映保守主义,而且能够诱使被试表现他对激烈变革的潜在的准备状态,这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临的问题是被试的不同的表达水平,它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惟一可以求助的技术是利用临床方法,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可以涉足深层的倾向,并且提供对他们的充分了解。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临床技术来系统地阐述量表项目。

政治—经济的保守主义量表(PEC)将在第五章进行介绍,该量表被设计用来估计个体对保守主义思想的一般准备状态,与此同时,把假保守主义思想与其他思想相区别。为了更加充

分地描述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模式,必须借助其他量表和其他技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有可能调查“假保守主义”与“真保守主义”(genuineconservatism)的关系——如果能够区分的话。于是,问题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提出:个体身上是否存在约束一个人反叛倾向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它的能量主要不是来自个体的需要)?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麦克的政治思想与拉里的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当麦克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被认为与他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团体所说的话有联系时,这种差异尤为突出。正如他的反犹主义只有在他关于其他民族团体的思想得到考察以后才能被理解和评估一样,他的政治观点也只有在他的民族中心主义背景上被了解时,才为人们所注目。他在谈论新政、民用服务和美国作战新闻处时,采用的方式与他谈论犹太人时所采用的方式相似,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似乎暗示着,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一组特定的政治信念和一组关于民族团体的特定意见,而是一种涉及团体和团体与关系的思想方式(way of thinking)。这种思想方式(一种非黑即白的刻板类别)能否在那些对少数民族团体持有偏见的人们中间找到呢?有没有一种团体(除了被试认同的团体以外)不受这里所说的那种完全排斥的和潜在敌意的影响呢?在思想方式和关于团体关系的思想内容之间是否存在一般的关系?在麦克身上,传统的思想伴随着权力的意象与弱点,道德纯洁与道德低下的对立,以及层级化的结构。这些倾向是否在一般的人口均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它们的关系是否是一种动力的关系?其本质又是什么?

看来,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越是受到在麦克身上找到的那些一般倾向的支配,那么他对一个特定团体的态度便越不会依靠该团体的客观特征,或者说不会依靠该团体成员所涉及的任何

实际经验。正是这样的观察,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作为思想决定因素的人格问题。如果人格在态度和意见的领域中具有如此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望它在一切重要的领域都会影响被试的思维?要想了解麦克对每件事情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考察他对宗教、收入和职业的看法,从中了解哪些因素与他的总体看法相一致。

(四) 宗教

访谈者在向麦克提出有关宗教的问题时,考虑了他在问卷中所作的陈述。访谈者的问题是:“在你看来,宗教和教会究竟是否重要?”麦克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对于那些需要维持生计的人来说,或者说对于那些高度飘忽不定的人来说,宗教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却主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生活用品,因此我也就难以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精神方面。”拉里则从他的立场出发写道:“宗教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它十分重要。”

对宗教的排斥是否(像在麦克例子中那样)与反民主的观点相关联,而接受宗教(像在拉里例子中那样)与相对地摆脱偏见相关联,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当然,也有某种理由期望相反的倾向:摆脱宗教教条将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相关联,从而也与摆脱偏见相关联,而接受宗教将与保守主义和权力主义相关联,从而也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联。事实上,问题不可能那么简单。光是接受或拒绝宗教的问题,不可能像一个人“如何”接受或拒绝宗教(也就是说,一个人关于宗教的思想模式)同样重要。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表达清楚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麦克和拉里的访谈中,两人都屈从于相当常见的习俗压力。在这两个案例中,该压力的应用主要是一种母系功能(maternal function),并且在这两个案例的背景中,有着

卫理公会和天主教的一种混合影响,麦克在区分父亲和母亲的作用方面要比拉里做得更多一些,而且,由于麦克的父亲不去教堂也能成为好人,这对麦克来说似乎十分重要。在麦克看来,母亲高度地认同教会,这种行为代表着一个衰弱的、难以自立的人的心志,尤其是当她需要维持生计的时候。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麦克在背离教会之后,是否找到某种东西去替代它;这种东西就是权威,首先以父亲为代表,后来又由一位“严格地说是一个人的上帝”为代表,可以这样设想,这位“伟人”在被试身上引起的那种宗教感情,如同他坐在马歇尔将军身边聆听他讲话时的那种感情。在麦克对耶稣教导的尊重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对绝对权威的态度差异,耶稣的教导与信徒们或布道者的话“并非第一手”适成对照。

但是,麦克对权威的尊重与他的独立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如何调节这两者,是他的宗教思想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显然,他可以武断地声称,他是执拗的、讲究实效的,并且拒绝“需要维持生计”的人们,以便获得某种独立性。如果权威十分强大,便有可能在不丧失独立感的情况下表示屈服。如果希冀有所依赖,那么这种心态一定是在他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在他生病时才会发生。

访谈记录表明,麦克想独立,也想有所依赖。他承认自己喜欢教堂的乐曲;他告诉我们他曾经病得多么厉害,但是,他又强调说,自幼年以来,他就不得不依靠自己。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不仅是一种骄傲,而且还有一丝自怜。一种潜在的依赖的需要(被动、同情、安慰)与维持男性骄傲的欲望和自尊发生冲突,有可能引发一种夸大的独立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它可以接受一种满足的测量(measure of gratification),也即以有一种有点伪装的形式,通过屈从于强有力的权威而接受这种满足的测量。看来,这

将成为一个相当清晰的例子,该例子表明,有一种深层的需要运作着,以影响外显的努力、公开表达的价值观,以及关于上帝和人类的想法。

由于麦克并不参加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宗教派别,因此他在谈到他的团体时,并不与各种宗教的外团体相对应。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把一切信教的人都看做是外团体,并将一些相同的特征——虚弱、依赖等等——归属于他们,而这些弱点正是他在犹太人身上和新政中看到的。

然而,在拉里看来,宗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是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的一种东西。对他来说,宗教的功能在于促进道德水准、良好生活和事业进步,而不是仅仅在一个人沮丧时提供安慰。此外,与麦克形成对照的是(麦克把道德与“上帝”等同起来),拉里认为宗教的道德价值存在于作为一种机构的教会之中。两人之间的进一步比较在于这样的事实,拉里接受宗教但能批判它,而麦克则排斥宗教,却又无法提供特别的批判。在从理智上批判宗教内容时,拉里表明,他不可能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目的而利用宗教。麦克则表现出他那独特的对待思想问题的非黑即白的研究方式,而且,对于那些引人注目的人们——耶稣、信徒、作为人的上帝——不作任何分析,他们(耶稣、信徒、作为人的上帝)要么完全被接纳,要么完全被拒绝。

我们暂不考虑在人口中发现的对宗教的接受或拒绝是否与反民主倾向相联系,但是,我们有必要研究麦克和拉里那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思想特征是否具有意义。本研究并不试图在宗教思想领域测量任何变量(尽管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被试确实他们的问卷中声称宗教和教会多么重要),相反,我们在与被试进行访谈性讨论时,力求发现宗教思想的模式。在我们的社会里,由麦克和拉里反映出来的思想模式是否普遍?这些模式与其他

领域中的思想是否有着与这两个例子一样的关系?还可以发现哪些其他的宗教思想模式?它们对民主或反民主的意义是什么?代表着信仰系统的不同教派是否与偏见相关?“民族偏见”和“宗教偏见”是否有关联?是否如我们经常假设的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

在麦克的例子中,一种深层的人格需要(即依附)在讨论宗教时突显出来。能否表明这些需要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动力关系?它们是不是既表现在宗教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同样,麦克的例子表明,在宗教思想和家庭关系模式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密切的关联。一般说来,情况是否如此?也许,家庭关系模式不仅对宗教思想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对其他思想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

(五) 职业和收入

前面的讨论表明,麦克倾向于把任何一种团体结构看成是权力的层级系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发现他把我们的整个社会看做是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系统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政府中看到不断增强的集权和严密的组织,也就是说,越来越少的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控制权;在经济方面,重要的发展操纵在大资本家的手中。不管这种观点具有多少客观性和真实性,重要的是,麦克认为他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一旦知道了这种社会结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向上爬”,“打开仕途之门”,“成为圈内人物”,而这也就成了他关于职业、收入的认知的主要倾向。他想归属于统治集团,或者“挤入”统治集团。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多么想掌握权力,确切地说,而是因为他想为权力利益服务,从而参与到权力表现中去。从他对政治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内团体和外团体的权力属性,在他看来是一

样的;因此,作出这样的假设并不过分,即他谴责犹太人、民用服务、美国战事新闻处和新政的理由,是想建立一个高度一致而又自私的内团体;谴责的目的在于他自己也想做同样的事情。当然,需要补充的是,他无法充分地向自己证明这种反民主愿望的正确性,尽管受其影响,却无法承认它,结果只能把它看做是不存在于自身,而是存在于周围世界中的。

拉里也认同商业,并且想在这个世界里“向上爬”,但是,这两个被试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对拉里来说,“向上爬”意味着改善自己的运气,这是从一般的社会意义上讲的;但是,对麦克来说,它却意味着改变自己在一个等级系统中的地位。换言之,拉里主要是从个人意义上考虑“向上爬”的,而麦克则更多地从阶层意义上思考这个问题的。拉里看来不在乎竞争,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得到支持的话,他是不会与人拼得你死我活的,但是,麦克则想通过屈从于那些得胜的人而达到目的。拉里坦率地表示他对金钱感兴趣,而麦克对金钱的考虑则是适度的;拉里需要欢乐,而麦克则似乎更加热衷于权力;拉里感到工作和效率的主要目的是使一个人享受人生,而麦克则认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目的。一般说来,两个被试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与他们的政治思想相一致。

两个被试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区别(这种区别可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它表现为拉里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动机:他完全公开自己追求金钱和欢乐的欲望,坦率承认自己愿意接受帮助,并容易接受自己家庭的影响,甚至坦率承认自己对社会声望感兴趣。可是,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在麦克身上也存在着同样的动机(如果说不是强烈的话,也是很明显的)。他并没有把它们作为自我的组成部分而充分地加以接受。这种情况促使我们探究这样的问题。即麦克把重要的人格需要置于意识之外,

让它们成为“自我的异己”(ego-alien),这种倾向是否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一种常见特征呢?

在职业—收入领域中,要比在其他任何领域更为明显的是,被试知道他们讨论的东西是与他们需要的东西密切相关的。换言之,人格需要在整个情境中占据核心位置:为了在社会上“向上爬”,为了独立,为了拥有欢乐和安全,为了向赢得权力的人低头并获得权力感——这些都是人格需要。从道德上对金钱加以蔑视,过于担心贫穷但又持不现实的态度——这些都可视为防御机制,或者说手段,与保持自尊的需要相冲突的需要通过这些手段得到遏制。这些变量在麦克和拉里身上有所不同,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本研究的一个主要假设是:具有偏见的人和不具有偏见的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变量不同,当相同变量的个体结合在一起时,便形成了从心理学上讲有意义的模式。为了测验这种假设,根据被试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反民族中心主义的访谈报告——以及其他材料——以上述可区分的特征而加以梳理,然后把它们放入问卷的量表项目中,供被试测验之用。喜欢“精致的装备”,喜欢打猎和捕鱼,偏爱住在小镇上——许多虽小但却具有提示性的项目被逐一考虑。根据这样的假设,在人格水平上,潜在的反民主表现是一种倾向,对此倾向,个体在量的方面有所差异,测量这种倾向的一个量表可用上述的那种方式来制定。这为我们证明以群众为基础的某关系提供了手段,因为这些关系存在于正在讨论的两个被试之中。即使与两个被试进行了访谈,人格因素并没有完整地突显出来,人格概念要求我们对这些因素予以一致性(consistency)的观察,随着我们的讨论从一个思想领域转向另一个思想领域,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思想方法应以这种一致性而重新出现。鉴于社会的事实,由于这种一致性不可能凭借构想来推导,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各个

领域中均有表现的个体的一些核心倾向。其中就涉及人格的动力因素这一概念,借此解释在交叉的表现中一些共同的倾向。例如,在人格中,权力的需要在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领域均有表现。由此提醒我们,心理学家之所以迄今为止尚未关注人格的这一领域,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研究过全部思想。如果我们对此进行正确的测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发现,特定的社会态度是与形形色色的外部因素和当代因素相关联的。如果我们对这一特定态度进行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即这便是问题的一切了。个体身上的一致性倾向,只有通过个体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方能被反映出来;或者,将被试置于一系列不同的情境之中,或者,用一系列问题对他们进行提问,来揭示被试身上的一致性倾向。如果这样的设计是科学的,那么,根据目前的假设,一致性倾向(即人格)将会始终得到反映。在本研究中,左右着被试的各种刺激并不限于态度、意见和价值观等问题,还有临床技术,它被专门设计用来使人格因素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揭示人格因素的协变(co-variation)和上面讨论过的思想倾向,尽可能揭示相应的特征,使潜在的反民主个体暴露出来。已知一种人格变量和一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假设,因果程序是从前者到后者——从人格的形成开始,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构可以追溯至童年时代。这样一来就导致一种尝试,为了了解儿童时代决定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因素,就需要对童年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调查。但是,这个论题要到后面才能考虑,要到思想的若干领域已被详尽地分析过以后才能予以考虑。

注 释

[1] 本章为 R. 尼维特·桑福德(R. Nevitt Sanferl)所撰。

- [2] 这一简介的材料取自被试的问卷,尽管有些材料来自他的访谈。在后面部分,我们将把他对问卷的回答与临床材料联系起来考虑,但是,这里的目的仅仅是让我们认识他,可以这样说,在讨论他的思想之前认识他。
- [3] 威尔基(Willkie, 1892 ~ 1944),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940年),曾任纽约市联邦与南方公司律师,总经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战后国际合作,著有《天下一家》。——译者注
- [4] 访谈者写得十分快,他在整个访谈期间运用他自己的一种“速记方式”,然后用录音机将他写的东西录下来。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把被试说过的内容逐句记录下来。本书中,凡涉及访谈者报告的内容,均用仿体表示,这篇材料中用引号表示的内容,是对被试陈述的逐字逐句的记录。
- [5] 圣巴特里克(St. Patrick, 389? ~ 461)是一位在爱尔兰建立基督教会英国传教士,爱尔兰主保圣人,著有记述其传教经历的《信仰声明》。在爱尔兰,每年3月17日为圣巴特里克节。——译者注

第三章 反犹思想研究^[1]

社会思想中最为明显的一种反民主形式是偏见(prejudice)。以此为背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意义的起点。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组织的反犹主义是对民主的主要威胁:它是反民主政治运动中最为有力的心理载体(psychological vehicles)之一,而且,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它提供了也许是最为锋利的矛头,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实施正面攻击。

根据心理学的观点,反犹主义是可以揭露的,那些以心理学为定向的作者们关于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fascism)所说的许多东西已经表明,这些思想的更为深层的缘由是十分相似的。反犹主义的非理性性质(irrational quality)甚至在日常交谈中也会显现出来。当犹太人被视为异质(heterogeneous)时——属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代表不同程度的同化——人们通常一律指称为“The Jew”(犹太人),这一事实生动地证明了这种非理性。在犹太人的复杂性和他们被想像为同质性之间,这种明显的对照暗示了这样一种假设:人们反对犹太人的那些言论,更多的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心理感受,而不是出自犹太人的实际特性。例如,当人们认为犹太人拥有的财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时,他们会产生怀疑,不仅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对权力具有不同寻常的偏见,而且他可能自己就很可能得到在他看来犹太人所拥有的这种

权力。显然,我们需要研究思想的情感来源,以便了解上述现象。

这些考虑告诉我们把反犹主义作为研究之起点的好处,同样,它也是我们某些假设(把本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出发点。研究反犹主义是研究思想中反民主倾向的第一步,也是研究人格中和社会运动中反民主倾向的第一步。

反犹主义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种思想(ideology),也就是关于犹太人和犹太人—非犹太人关系的一种相对来说有组织的、比较稳定的意见、价值观和态度系统。具体地说,它涉及对犹太人的否定意见(认为他们无所顾忌、结帮图利、谋求权力等等);至于一些道德价值观念,则渗透着这些意见,证明着这些态度。关于反犹主义的结构和内容的许多问题在第二章已经陈述过。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指导我们设计一份意见—态度量表,以便对反犹主义思想进行测量。量表的材料来源包括:恶毒攻击犹太人的作品;关于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技术、文学和报道性著作;最重要的是日常的反犹主义,它反映在客厅闲聊中,反映在商业和机构的歧视实践中,反映在各种组织的文献中(这些组织正在试图用理性辩解的手段反对许多反犹主义的谴责,但成效甚微)。

这份量表像本研究所使用的其他量表一样具有若干功能。它产生一种量化的测量,可以与其他一些理论上相关的测量相关联。它为选择极高分者和极低分者的标准团体提供了基础,以使我们对这些极高分者和极低分者实施集中的临床研究。作为问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能对大型团体的被试实施相对来说详尽的、可以量化的研究。最后,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致使其特性的统计分析可以揭示结构、范围和反犹的思想内容等情况。

一、反犹太主义(AS)量表的设计

这种意见—态度量表由一系列陈述所组成,这些陈述处理一个特定的论题。在本研究中,这个特定的论题便是反犹太主义思想。要求被试用同意或不同意的方式对每一条陈述作出反应。于是,将他的反应转化成分数,高分表示意欲测量的东西(在本量表中是反犹太主义),低分则表示相反的情况。评分过程在下面讨论(见第三节)。

李克特(Likert)制订量表的方式(73,84)得到运用。该量表容易使用,虽然它比塞斯顿(Thunstone)的方式(118)项目更少,但同样产生高度可靠和可资比较的结果(22,84)。人们希望在运用塞斯顿方式时,对所需的判断避免假设和困难。由于人们希望在研究的深入阶段从措词上修改项目,因此避免重复使用判断是十分恰当的。我们从李克特量表中获得了关于意见和态度强度的测量,方法是要求被试标记对每一项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这对于把握团体和个体的差异能够作出更为恰当的抉择,同时有助于对个体的反应模式予以质的分析。这种方式也许能够涵盖范围广泛的意见和态度。最后,李克特关于项目分析的技术(见下面所述)尤其适用于本研究的一般理论方法。

(一) 项目阐述的一般规律

在选择和阐述项目时所采取的过程,与常见的做法形成对照。本研究并不把测试几百个项目作为最后选择简短量表的基础。确切地说,它阐述了52个项目,所有这些项目,在我们对该量表的初步形式进行统计分析时,始终得到运用(为了期望下面

提出的结果,从统计角度上讲,只有少数几个项目是不恰当的,但这种不恰当就其本身而言是有趣的)。在研究的连续阶段,不存在关于修改、删除或补充项目的疑虑。

本研究的量表与大多数意见—态度量表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它只包括否定项目,也就是说,它们都对讨论中的问题陈述了反犹太主义的立场。只使用否定项目的理由,以及对某些可能批评的回答[在以往的著述(71)中曾详尽地提出过],可以在这里予以概述。首先,否定项目的一个好处是:它们倾向于更具分辨力。其次,否定项目可以表示出细微的敌意,但是又不至于冒犯民主的价值观(这种民主的价值观是大多数怀有偏见的人感到必须保持的)。由于量表试图测量反犹思想的可接受性,因此它只使用反犹太主义的陈述似乎是合适的。反对本设计的主要论据是:它可能会始终产生同意或不同意的“心向”或机械倾向。我们对这种论据的回答是:(1)大多数个体在回答时表现出易变性,正如项目的相关性平均为0.3~0.4所表示的那样;(2)被试中间存在一种变化的倾向,以便避免显示极端的立场;(3)在本研究的后继阶段(即当一个全面否定的量表随机插入肯定项目的系列时)已经获得十分相似的结果;(4)由于“心向”的论点暗示着,得高分者不一定是反犹太主义的,或者得低分者不一定是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因此最终的检验是量表的效度,也就是说,得高分者在各种有意义的特征方面与得低分者显著不同。正如后面将要说明的那样,量表确实具有相当的效度。

由于反犹太主义量表像其他量表一样,其意图不仅在于提供对某种思想的量化测量,而且也有助于对该思想进行质的描述(以及对个体思想模式进行质的描述),因此它的设计遵循着某些一般规律。这些规律涉及下述两点:(1)个别项目的阐述;(2)把整个量表分成若干亚量表(subscales)。

鉴于实际操作的原因,量表不应当包含 50 个以上的项目(比 50 个项目更少),每个项目在思想上应达到最大程度的涵盖面,并在措辞或基本的内容上做到最小程度的重复。本研究的项目要比其他量表的项目更加复杂一些,对此做法,不能认为是一种缺点。与此同时,项目的含义应当清楚,不能模棱两可,也就是说,“同意”通常表示反犹主义,“不同意”则表示反对反犹主义。避免“双重目的”项目是颇为重要的。所谓“双重目的”是指,项目由两部分组成,被试可能同意其中一部分而不同意另一部分,从而不知道如何去回答才好。

关于激烈而又公开的反民主类型的那种极端偏见,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得不到广泛传播,尤其在中产阶级中得不到广泛传播。^[2]由于本量表的意图是测量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反犹主义,因此项目以反映流行形式的方式来阐述,反犹主义便包含在这些流行的形式之中。

人们在企业中、邻里间和一般的社交中发现的大多数偏见是假民主的(pseudodemocratic),而不是公开地反民主的;这种区分在分析反犹主义的思想时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对反犹主义思想的分析,指导着量表的设计和项目的阐述。当一种主张涉及仇恨时,它便可以被认为是公开地反民主的;当一种主张涉及暴力,目的在于消灭一个少数民族团体,或者将它置于永久性的从属地位时,这种主张也可以被认为是公开地反民主的。另一方面,所谓假民主的思想,意指对一个团体的敌意在某种程度上稍稍软化,并且通过与民主理想的妥协而被伪装。关于犹太人的假民主陈述常由修饰性短语引出,这些修饰性短语否认敌意,或者试图表示讲话者的民主态度,例如“这并不是说我有偏见,而是……”;“犹太人理应拥有他们的权利,但是……”。

相对地说,当前的大多数文献尚未触及这种假民主的表现,

它们只是把偏见贬为“种族憎恨”“非美国化”,等等。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态度内容中,并不存在任何憎恨,它们已被某些民主的价值观所修正。修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也即持有这些价值观的个体显然感觉不到是否存在任何反民主的意识。当然,仅仅对这种思想方法扣上“非美国化”的帽子,是于事无补的。首先,光扣帽子是不够的;其次,这种思想可以归入美国社会史的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中找到。更为确切地说,我们既要了解它在美国文化和传统中的外部根源,又要了解它的内部根源(这些内部根源使某些个体对这些文化压力尤其容易接受)。

把假民主的妥协表现看做是由偏见者故意且熟练运用的一种表面的伪装,以便为他们实际的、自觉的反民主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在社会问题研究中属于假民主的人,实际上是与其研究方法属于公开的反民主的人有所不同的。鉴于各种原因——也许是由于前者已经把民主的价值观内化了,也许是出于与目前的社会标准趋向一致——假民主主义者并不接受明显的暴力和无情的镇压等主张。对民主价值观念的关注,以及对反民主价值观念的抗拒,可以被视做是心理上和社会上的重要事实,它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人的偏见和美国人的多样性。毫无疑问,许多假民主的人实际上是潜在的反民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危机时有可能支持或实行对少数民族团体的暴力行为。然而,了解一下这些人试图与民主价值观的妥协也是重要的:它会反映出一种民主的潜力,如果这种潜力得到支持和增强,有可能最终占据上风;它会给假民主的社会思想染上颜色;而且,由于这种妥协反映了这个国家里公开歧视的流行形式——例如,雇员配额(指政府为用人单位规定的各人种雇员的比例限额)、种族隔离、排斥、机会的剥夺,等等——因此,

假民主的人有可能为此而斗争。

如果思想模式能被设想为属于这样一个范围,即从民主到反民主的范围,那么假民主的思想也许位于该范围的中间阶段和极端的反民主之间。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范围问题;还有许多思想方法可以归于这些广泛类别中的每一种类别之中,而该范围也不是像长度或重量那样简单的量的范围。个体身上某些倾向的改变,可能从该范围的一端到另一端产生质的重组和转化。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了解作为整体的个体,而且(特别是在假民主主义的例子中),测量心理潜力,既为了探究民主,也为了探究公开的反民主。

反犹主义量表中的大多数项目尽可能被阐述为假民主。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利用否定项目的一个主要理由。量表中的项目遵循以下规律:为使每个项目尽可能富有感染力,而且易被吸引,应该避免使用明显的暴力字眼,避免使用明显的反民主主张,避免从道德上证明其为正确的做法。多利用修饰性短语,例如“犹太人的一个麻烦问题是……”;“尽管有一些例外,但是……”;“如果……,这将符合全体的利益”,等等,以便避免一种攻击性的谴责。项目的措辞是这样的,它允许被调查人可以在最后附言:“不过,我并不是反犹主义的。”由于运用了一些限定词,例如“似乎是”、“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问卷中的项目显得好像是尝试性的。最后,试图给每一项目套上“似曾相识”的光环,也就是说,在设计项目时,其内容在被试看来好像在日常讨论中经常会碰到似的。

如果遵循上述规律,则假民主的被试很可能像那些反民主的被试一样在该量表上得高分,或者几乎得高分。嗣后的任务是问卷与临床结合起来,以便提供关于这两组被试如何区分的进一步信息。

(二) 主要的再分或领域:亚量表

上述的项目阐述的一般规律主要是指项目的形式结构,它们可以用于每个项目而无须考虑项目表示的思想内容。项目的内容主要是由反犹思想的一般概念决定的,也是由上面讨论的特定假设决定的。此外,还设计了若干亚量表,目的是为了系统地涵盖所想像的各个方面,并对某些假设进行检验。亚量表并非从统计意义上处理反犹主义的组成成分;它们不是以先前结果的统计处理为基础的,也不是对目前项目的相关分析。确切地说,亚量表是构思和归纳项目的一种便利方法。

反犹主义量表包含5个亚量表,它们分别把人们对犹太人的意象(包括观点)处理成个体方面的冒犯和社会方面的威胁;把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处理成犹太人该做什么,或者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去反对犹太人;并对两种对立看法[即认为犹太人过于隐居或犹太人过于侵入(同化)]进行处理。从统计意义上讲,根据项目的实际内容,这些亚量表也许不是完全独立的;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某些项目与它们所属的亚量表相比,不可能放在这些不同的亚量表里。可是,作为整体的每个亚量表,似乎处理了相当确定的反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可界定状态。现在,让我们按顺序讨论这些亚量表。

1. 亚量表:“冒犯性”(S₀)

该亚量表体现在表3-1中。其中,项目均以数字表示,根据它们在量表中的出现的先后,分成I和II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有26个项目,例如,I-4表示第I部分第4个项目。这些项目描述了各种“犹太人的特征”,有冒犯性、不愉快、干扰等。项目中对“犹太人”的定型(stereotype)是含蓄的——含蓄地用“全部犹太人”或“大多数犹太人”——无须承认个体的差异。可是,在项

目 I-13 中就不含蓄了,该项目特别声称“犹太人之间是很相似的”,从而体现了把“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想的定型。

表 3-1 反犹主义亚量表:“冒犯性”

-
- | | |
|--------|--|
| I- 1 | 犹太人似乎更喜欢豪华的、奢侈的和沉溺于享受之中的生活方式。 |
| I- 4 | 犹太人的主要缺点是骄傲、自负,并认为他们的民族是百里挑一的民族。 |
| I- 7 | 不论一个犹太人看上去多么美国化,他始终都有着某些基本上属于犹太人的东西,例如,对犹太民族的忠诚,以及不愿有所改变的态度。 |
| I- 10 | 犹太人的居住区始终是臭气熏天的、肮脏的、破烂的和没有吸引力的。 |
| I- 13 | 尽管有一些例外,但一般而言,犹太人之间十分相似。 |
| I- 16 | 犹太人不该如此打听基督教的活动和组织,也不该从基督徒那里谋求那么多的认可和声望。 |
| II- 1 | 如果犹太人真的不想被人迫害,那么他们就应当真诚地作出努力,去除他们身上那些引人注目和令人恼怒的缺点。 |
| II- 4 | 犹太人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和奇怪的东西;人们无法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或规划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他们不停地活动。 |
| II- 7 | 如果让犹太人移居到环境良好的社区,那么,由此造成的麻烦是,他们会在那儿逐步营造一种典型的犹太氛围。 |
| II- 10 | 我想我决计不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 |
| II- 13 | 犹太人的一个普遍缺点是他们的过度挑衅性,这种强烈倾向常常通过犹太人的外观、态度和血统表现出来。 |
| II- 16 | 犹太人应当更加关注他们的个人外表,不要这样肮脏、臭气熏天和邋遢。 |
-

那么,这种定型化意象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项目说“犹太人”是奢侈的,注重享受的,自负的和具有冒犯性的;但是,有些项目又说“犹太人”是“臭气熏天”的,邋遢的,不关心自己外表的。有些项目把犹太人谴责为过度犹太化,但是他们又想同化到“基督教”的活动中去,这一企图用“打听”一词来

指称。犹太人的缺点被认为是反犹太主义的主要原因(项目 II-1),如果犹太人真诚地作出改进的努力,反犹太主义原本是可以消除的。至于犹太人是否能够被美国化,这是多少有点令人怀疑的(项目 II-7)。在项目 II-10 中,“我想我决计不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之所以列出这一项目,原因在于该项目似乎更指向一种不愉快的意象,而不是一种明显的敌意态度。它代表了一种假民主的态度,与“态度”亚量表中的项目 I-15 相当(见下面描述)。人们是否始终如一地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些项目?这将在下面报告的结果中看到。

2. 亚量表:“威胁”(S_T)

该量表的项目如表 3-2 所示,它们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危险的、统治的和腐败的社会团体。犹太人被武断地认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着强大的力量,肆无忌惮地谋划着如何对付非犹太人。他们不喜欢艰苦工作(项目 II-11),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卑贱的工作和过低的生活水准而降低了一般的生活要求(项目 I-14)。犹太人除了既富裕又贫穷,既强大又具寄生性等特点之外,他们还会成为资本家和革命者。他们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并对国家构成威胁,对文明构成威胁。

除了这样描述“犹太人”的复杂性以外,还认为犹太人的团体数目虽小但却十分强大,基本上成为一种社会威胁。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该意象似乎是潜在的偏执狂倾向的一种思想表现。在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犹太人不仅被视做“卑下和低劣”,而且具有“细菌般的能力”和“魔鬼般的狡猾”。不过,大多数美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并非精神病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或偏执狂。在美国人中间,与此意象有关的人格倾向将在后面几章讨论。

表 3-2 反犹太主义亚量表：“威胁性的”

- I- 2 犹太人被认为对基督教文化和文明具有不良的影响。
- I- 5 犹太商人的麻烦是,他们结帮谋利,因此非犹太人在竞争中得不到公平的机会。
- I- 8 犹太人在金钱上的力量与他们在整个人口中的人数相比极不对称。
- I- 11 在华盛顿各联邦机构里的犹太人太多了,因此他们对我们国家政策的控制也太多了。
- I- 14 犹太人倾向于干一些最为卑贱的工作,并且生活水平远低于平均水平,借以降低他们的一般生活要求。
- II- 2 战争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并不爱国,不愿为国捐躯。
- II- 5 犹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在与基督徒相处时,他们是肆无忌惮的、残忍的和不可靠的。
- II- 8 犹太人的第一忠诚是忠于犹太人,而不是忠于国家。
- II- 11 犹太人似乎厌烦平凡的艰苦工作;他们倾向于成为社会的寄生虫,寻找轻松而无生产力的工作。

3. 亚量表：“态度”(S_A)

该亚量表所包含的一切态度(参见表 3-3),被认为对犹太人是抱否定的或敌意的态度,而且,这一假设已为统计结果所证明。设计这些态度项目的意图是反映各种程度的歧视,其范围从简单的回避到迫害和攻击,还有一些中介的行动,如排斥、雇员按人种的定额分配(属于部分排斥)和隔离。为了涵盖各种形式的歧视,量表列举了歧视得以发生的主要社会领域,以便供项目的阐述。这些领域是:雇用、居住(社区、公寓、旅馆等)、教育、职业、婚姻、社会组织、政治、国家。项目 II- 21 是假民主的一个例子:它假设犹太人实际上是一种威胁(其意象为:强大的、冒犯的等等),同时建议犹太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内涵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愿制约他们自己,非犹太人可能会被迫采取更为严厉的行动。对此说法,许多人是在容忍和民主的名义下这

样做的。但是,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一种反犹太主义思想:首先,由于事实上它与作为整体的量表相关;其次,由于它以敌视的意象和压迫的态度为基础,并依据这样一种假设:反犹太主义是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劣根性所作的一种理性反应。

表 3-3 反犹太主义亚量表：“态度”

- I- 3 为了保持良好的社区环境,最好不要让犹太人入住。
- I- 6 大学应当采用定额分配体制,以便限制在已有太多犹太人的领域里犹太人的数目。
- I- 9 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做法是,阻止犹太人在社会上获得优越的和有利可图的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如此。
- I- 12 犹太人问题如此普遍和深刻,以至于人们怀疑民主方式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 I- 15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是错误的。
- I- 18 犹太人最好有自己的大学生联谊会 and 大学女生联谊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活动,这是他们参与这些活动的最佳方式,正像参与由基督徒组成的大学生联谊会基督徒的最佳方式一样。
- I- 21 有时,禁止犹太人进入某些公寓是正确的。
- I- 24 任何雇用工作人员的机构务必小心,雇用犹太人时,其百分比不要太高。
- II- 3 如果犹太雇员太多,会对一个大型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害。
- II- 9 为了对付犹太人问题,非犹太人必须以牙还牙,用犹太人对付非犹太人的同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犹太人。
- II- 12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被人家看到与犹太人过于亲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能被人家视做犹太人,或者被他的基督徒朋友们看不起。
- II- 15 整顿电影市场,改善好莱坞形势所要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是:结束犹太人在那里的统治。
- II- 18 大多数旅馆不该让犹太人进入,这应该成为一条规则。
- II- 21 犹太人的领袖应当告诫犹太人凡事应有所顾忌,脱离业已充斥着犹太人的职业和活动,并且不要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
- II- 24 如果犹太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管好自己,这将符合全民的利益。

4 和 5. 亚量表：“爱隐居的”(S₅)和“侵入的”(S₁)

人们经常声称反犹主义的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犹太人是不同的”,并认为同化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惟一办法。确实,许多犹太人也持同样的观点,试图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让美国文化在他们所处的社区里流行起来,并且对于他们家庭和友人中的“异端”迹象感到焦虑。这里,我们不准讨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如何适应美国文化的问题。上述的问题涉及反犹主义者的心理学:犹太人的同化问题是不是反犹分子真正关注的东西?如果犹太人以一种彻底的遵奉方式行事,这能满足反犹分子吗?这些问题将得到否定的回答,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高度同化的犹太人通常遇到其他犹太人遇到的同样歧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反犹主义的定型化观点。人们对他们自行创制的标签或“犹太人”的意象作出反应,而不是对他们实际面临的那个特定的犹太个体作出反应。“犹太人恕不雇用”的广告牌,对于正在找工作的特定个体来说(不论他是强是弱)都是一视同仁的。

表 3-4 反犹主义亚量表：“隐居的和侵入的”

A. “隐居的”	
I-5	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结帮谋利,以至于使非犹太人在竞争中得不到公平的机会。
I-17	人们对犹太人之所以愤懑不已,是因为犹太人不合群,他们将非犹太人排除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之外。
I-20	犹太人应该放弃他们的非基督教的宗教,以及那些奇异的习俗(例如,犹太教规所规定的洁净食物、特殊的假日,等等),并且积极地、真诚地参与基督教的活动。
I-23	犹太人倾向于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异己分子,他们坚持自己那套陈旧的社会标准,拒绝美国的生活方式。
II-13	犹太人的一个普遍缺点是他们的过度挑衅性,这种强烈倾向常常

通过犹太人的外观、态度和血统表现出来。

- II-17 大多数城市之所以会出现犹太人聚居区,是犹太人结帮的结果。
- II-20 犹太人中间的百万富翁可能会帮助他们自己人,但他们的钱极少花在有价值的美国事业上。
- II-23 犹太人只关心自己,对社区问题和政府不感兴趣。

B. “侵入性”

- I-11 在华盛顿各联邦机构里犹太人太多了,因此他们对我们国家政策的控制也太多了。
- I-16 犹太人不该如此打听基督教的活动和组织,也不该从基督徒那里谋求那么多的认可和声望。
- I-19 阻碍犹太人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文化;作为替代,他们倾向于模拟对当地市民来说重要的东西,而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
- I-25 犹太人在隐匿他们的犹太特性方面有点过分了,特别是一些极端的做法,如改名,将鼻子弄直,模拟基督徒的方式和习俗。
- II-3 如果犹太雇员太多,会对一个大型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害。
- II-7 如果让犹太人移居到好的社区,那么,由此造成的麻烦是,他们会在那儿逐步营造一种典型的犹太氛围。
- II-19 真正的基督徒决不宽恕犹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 II-25 犹太人之所以筹集大量资金供教育或科学研究之用[罗森沃尔德(Rosenwald)、海勒(Heller)等],主要是出于一种想得到名声和公众注意的欲望,而不是出于真诚的科学利益。

为了将同化的态度进行量化,有两个分别代表对立双方的亚量表包括在反犹主义量表中(表 3-4)。对亚量表“隐居的”(S₅)议题,采取的立场是,犹太人是外来的和不愿同化的;项目内容谴责他们搞宗派、搞分裂,对其他团体不关心,等等。这些项目提供这样的暗示:犹太人必须大量同化,他们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美国的生活,更加自觉地与美国的习俗和标准保持一致,惟有这样,他们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反犹主义的问题(这些项目中有两条也包括在其他亚量表中,项目 I-5 在亚量表

“态度”中列出,而项目 II-13 在亚量表“冒犯”中列出)。

另一方面,亚量表“侵入性”(S_I)则谴责犹太人过分同化和过分参与。当犹太人与美国的社会行为保持一致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模仿”,而且是在隐匿他们的“犹太性质”(项目 I-25)。他们加入组织也是以谋求声望和打听消息为目的的(项目 I-16)。他们进入政府机构或进入社区,结果会导致他们控制和支配非犹太人(项目 I-11, II-7)。他们表面上的慈善是以自私的动机为基础的(项目 II-25)。最后,他们缺乏自己的文化,从而必然会抄袭或者“吸收”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些项目的含义(与“隐居的”亚量表中的那些项目形成对照)在于说明犹太人更关心他们自己,意欲发展一种文化,甚至一个国家,也即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国家(这些项目中有 4 条也包括在其他亚量表中,项目 I-11 包括在亚量表“威胁”中,项目 I-16 和 II-7 包括在亚量表“冒犯”中,而项目 II-3 则包括在亚量表“态度”中)。

6. 不在亚量表内的“中立”(表 3-5)

在反犹太主义量表中,有 4 个项目不包括在上述 5 个亚量表中。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代表反犹太主义“组成成分”的亚量表仅仅是在一般的前统计(prestatistical)意义上的亚量表。如果对量表作一相关分析,我们就可能发现它应该包含这 4 个项目的组成成分,不只因为它们涉及反犹太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而且也因为它们与整个量表显著相关。

表 3-5 反犹太主义量表中的“中性”项目

- | | |
|------|-----------------------------------|
| I-22 | 犹太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永不知足,始终想得到最好的工作和最多的钱。 |
| I-26 | 不容置疑,犹太人应对美国向德国开战负主要责任。 |

II-22 要想纠正犹太人的民族缺陷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些缺陷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之中。

II-26 总的说来,与其他团体相比,犹太人对美国生活的贡献最少。

项目 II-22 尤其值得注意;它在关于犹太人的“缺陷”方面采取了一种遗传论者和种族主义者的立场,而且,如同一切遗传论者的思想方法一样,它对沿着民主路线改善团体关系抱着悲观的态度。在那些认为犹太人有着特殊的无法改掉的基本缺点的人看来,与犹太人奢谈什么结束歧视,改善犹太人—非犹太人的关系,以及“犹太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自己”等等的话,完全是没有意义和不相干的。许多持有这种“犹太人本性不可改变”论点的人,也倾向于告诉犹太人,他们必须改变,这一事实是反犹太主义非逻辑性的另一个标志。有关该问题的不可解决性的想法,也在项目 I-7 和 I-12 中得到反映。

(三) 整个反犹太主义(A-S)量表

整个反犹太主义量表由 52 个项目组成,所有项目分成 5 个亚量表,还有上面讨论过的 4 个中性项目。表 3-6 展示了量表的两个部分,附有对被试的指导语。

表 3-6 整个反犹太主义量表
民意问卷 A

本调查是关于犹太人的民意问卷。对以下的陈述,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则不同意。请在左边空档处对每一陈述标上记号,根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的态度,在下述 6 个选择中选择一种:

- | | |
|--------------|---------------|
| +1: 有点支持, 同意 | -1: 有点反对, 不同意 |
| +2: 中等支持, 同意 | -2: 中等反对, 不同意 |
| +3: 强烈支持, 同意 | -3: 强烈反对, 不同意 |

- 1. 犹太人似乎更喜欢豪华的、奢侈的和沉溺于享受之中的生活方式。
- 2. 犹太人被认为对基督教文化和文明具有不良的影响。
- 3. 为了保持良好的社区环境,最好不要让犹太人入住。
- 4. 犹太人的主要缺点是骄傲、自负,并认为他们的民族是百里挑一的民族。
- 5. 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结帮谋利,因此非犹太人在竞争中得不到公平的机会。
- 6. 大学应当采取定额分配体制,以便限制在已有太多犹太人的领域里犹太人的数目。
- 7. 不论一个犹太人看来可能多么美国化,但他始终有着某种基本上属于犹太人的东西,例如,对犹太民族的忠诚,以及抱着不愿改变的态度。
- 8. 犹太人在金钱问题上的力量与他们在整个人口中的人数相比极不相称。
- 9. 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做法是,阻止犹太人在社会中获得优越的和有利可图的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如此。
- 10. 犹太人的居住区始终是臭气熏天的、肮脏的、破烂的和没有吸引力的。
- 11. 在华盛顿各联邦机构里的犹太人太多了,因此他们对我们国家政策的控制也太多了。
- 12. 犹太人问题如此普遍和深刻,以至于人们怀疑民主方式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 13. 尽管有一些例外,但是,一般说来,犹太人之间十分相似。
- 14. 犹太人倾向于干最为卑贱的工作,并且生活水平远低于平均水平,借以降低他们的一般生活要求。
- 15.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是错误的。
- 16. 犹太人不该如此打听基督教的活动和组织,也不该从基督徒那里谋求那么多的认可和声望。
- 17. 人们对犹太人之所以愤懑不已,是因为犹太人不合群,他们将非犹太人排除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之外。
- 18. 犹太人最好有自己的大学生联谊会 and 大学女生联谊会,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活动,这是他们参与这些活动的最佳方式,正像参与由基督徒组成的大学生联谊会 is 基督徒的最佳方式一样。
- 19. 阻碍犹太人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文化;作为替代,他们倾向于模拟对当地市民来说重要的东西,而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

- 20. 犹太人应当放弃他们的非基督教的宗教,以及那些奇异的习俗(例如,犹太教规规定的洁净食物、特殊的假日,等等),并且积极地、真诚地参与基督教的活动。
- 21. 有时,禁止犹太人进入某些公寓是正确的。
- 22. 犹太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永不知足,始终想得到最好的工作和最多的钱。
- 23. 犹太人倾向于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异己分子,他们坚持自己那套陈旧的社会标准,拒绝美国的生活方式。
- 24. 任何雇用工作人员的单位务必小心,雇用犹太人时百分比不要太高。
- 25. 犹太人在隐匿他们的犹太特性方面有点过分了,特别是一些极端做法,如改名,将鼻子弄直,模拟基督徒的方式和习俗。
- 26. 不容置疑,犹太人应对美国向德国开战负主要责任。

整个反犹主义量表 民意问卷 S

本调查是关于犹太人的民意问卷。对以下的陈述,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则不同意。请在左边空档处对每一陈述标上记号,根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的态度,在下述6个选择中选择一种:

- | | |
|--------------|---------------|
| +1: 有点支持, 同意 | -1: 有点反对, 不同意 |
| +2: 中等支持, 同意 | -2: 中等反对, 不同意 |
| +3: 强烈支持, 同意 | -3: 强烈反对, 不同意 |

- 1. 如果犹太人真的不想被人迫害,那么他们就应当真诚地作出努力,去除他们身上那些引人注目和令人恼怒的缺点。
- 2. 战争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并不爱国,不愿为国捐躯。
- 3. 如果犹太雇员太多,会对一个大型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害。
- 4. 犹太人身上有着与众不同和奇怪的东西;人们无法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或规划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他们不停地活动。
- 5. 犹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在与基督徒相处时,他们是肆无忌惮的、残忍的和不可靠的。
- 6. ……
- 7. 如果让犹太人移居到好的社区,那么,由此造成的麻烦是,他们会在那儿逐步营造一种典型的犹太氛围。

- 8. 犹太人的第一忠诚是忠于犹太人,而不是忠于国家。
- 9. 为了对付犹太人问题,非犹太人必须以牙还牙,用犹太人对付非犹太人的同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犹太人。
- 10. 我想我决计不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
- 11. 犹太人似乎厌烦平凡的艰苦工作;他们倾向于成为社会中的寄生虫,找轻松而无生产力的工作。
- 12.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被人家看到与犹太人过于亲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能被人家视做犹太人,或者被他的基督徒朋友们看不起。
- 13. 犹太人的一个普遍缺点是他们的过度挑衅性,这种强烈倾向常常通过犹太人的外观、态度和血统表现出来。
- 14. ……
- 15. 整顿电影市场,改善好莱坞形势,所要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是:结束犹太人在那里的统治。
- 16. 犹太人应当更加关注他们的个人外表,不要这样肮脏、臭气熏人和邋遢。
- 17. 大多数城市之所以会出现犹太人聚居区,是犹太人结帮的结果。
- 18. 大多数旅馆不该让犹太人进入,这应该成为一条规则。
- 19. 真正的基督徒决不能宽恕犹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 20. 犹太人中间的百万富翁可能会帮助他们自己人,但他们的钱极少花在有价值的美国事业上。
- 21. 犹太人的领袖应当告诫犹太人凡事应有所顾忌,脱离业已充斥着犹太人的职业和活动,并且不要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
- 22. 要想纠正犹太人的民族缺陷几无可能,因为这些缺陷已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之中。
- 23. 犹太人只关心他们自己,对社区问题和政府不感兴趣。
- 24. 如果犹太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管好自己,这将符合全民的利益。
- 25. 犹太人之所以筹集大量资金供教育或科学研究之用(罗森沃尔德、海勒等),主要是出于一种想得到名声和公众注意的欲望,而不是出于真诚的科学利益。
- 26. 总的说来,与其他团体相比,犹太人对美国生活的贡献最少。

本量表的目的是测量个体在支持或反对反犹主义思想时的准备状态。根据量表赖以构建的概念,这种思想由下列意见和

态度组成:把犹太人描绘成具有威胁性的、不道德的、在类别上与非犹太人不同(这属于定型化了的否定意见),并且要求对犹太人施以各种形式的限制、排斥和迫害,借此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手段(这属于敌意的态度)。因此,可以把反犹主义构想为关于犹太人和犹太人—非犹太人关系的一般思想方法。

被试能否合情合理地论及个体的准备状态,以便把反犹主义思想作为整体来接受呢?具体地说,人们能否期望被试会对这些量表项目作出相对来说始终如一的反应呢?这个问题正是我们意欲从经验主义角度予以回答的问题。反犹主义思想的内容和概括,以及由本量表来进行测量的正确性,可由量表结果的统计分析来表明。量表的效度可由该量表与理论上相关的其他变量的相关性来表明,并且可以通过对第二章讨论过的两个被试的反应进行分析来表明。

二、结果:量表的统计分析

在本研究中,所有量表的应用过程是,每一项目有6种选择:有点同意、中等同意或强烈同意,同样也有三种程度的不同意,没有任何中性反应。每个被试用+1,+2或+3标记的办法来表示他同意的程度,用-1,-2或-3标记的办法来表示他不同意的程度。

看来,上述三种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能为被试容易地区分,因为这三种程度为他们清楚地记录同意或不同意的强度提供了可以感觉到的差异。调查的数据表明,所有这6种回答都被用上了。至于被试用“不知道”来标记的回答产生了困难,这在心理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是有争议的。如果在调查中允许使用“不知道”这种回答,那么被选择的频率肯定是最高的。如果不

用这种“不知道”的回答,那么,被试就必须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表明立场,尽管有点同意或有点不同意允许他差不多表示中立。如果被试无法作出决定,他当然可以略去该项目;但是,在填写问卷的被试中,不会有超过 2%~3% 的被试作出省略,而且,在实施该调查的团体中,也不会有超过 1% 的团体不会正确填写问卷。此外,在被试的回答中,“中等的”和“强烈的”程度经常被运用,它表明这些项目相对而言并非是模棱两可的。

被试的回答用统一的评分标准转换成分数。由于高分表示增强的反犹主义,因此,对回答的评分办法如下:

-3 = 1 分	+1 = 5 分
-2 = 2 分	+2 = 6 分
-1 = 3 分	+3 = 7 分

必须指出,在 -1 和 +1 之间,分数从 3 分跳到 5 分。我们假设,4 分代表中性回答,当项目未被回答时,就给以这个分数。使用这种方案而非 6 分方案(其中 +1 将得 4 分),这在统计上几乎不会造成什么差别。我们之所以运用这套方案,主要是因为 -1 和 +1 回答之间的心理差距显著大于任何其他两个相邻回答之间的心理差距。而且,在作出省略时也很方便。

被试的量表得分实际上是他在各个项目上的得分之和。对于总共 52 个项目来说,分数的变动范围从 52 分(如果每个项目得 1 分,表明强烈反对反犹主义)到 364 分之间(如果每个项目得 7 分,表明强烈赞成反犹主义)。若用量表分数除以 52,我们便可得到每个项目的平均分,例如,总分 78 分表明每个项目的得分为 1.5 分。

关于反犹主义的初步调查结果,已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本讨论将探讨量表的第二次实施;在实施问卷时,除了反犹主义量表以外,还包含了在研究的后继阶段所使用的许多其他技术。

问卷于 1944 年 4 月正式实施,被试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基础心理学”班的学生。调查按学期分两部分进行,中间相隔一个星期:反犹主义量表的第一部分(问卷 A)在第一学期末实施,第二部分(问卷 S)在第二学期初实施。我们所调查的那个班级的学生并非是主修心理学的学生(“基础心理学”课程只是他们的公共课),这样对主修学科和学年而言是相当异质的(也就是说,这个班级的学生可能来自不同的系科和不同的年级)。

鉴于可能的性别差异,出于统计的目的,对男性和女性的问卷是分开进行的。不过,由于战时的客观条件,参与调查的男性不到 30 人,这样一来,便无法计算男性方面的任何统计资料。这里提出的数据是以 144 个女性被试的问卷为基础的,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成员 19 人:犹太人、黑人、中国人和生于外国的美国人。在所有后来的各组调查中,统计分析限于当地出生的人、白人、非犹太人的美国人等问卷。

(一) 信度

反犹主义量表及其亚量表的信度(reliability)和相关的统计特征在表 3-7 中列出。整个量表的 0.92 的信度符合严格的统计标准,尤其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二部分是在第一部分之后一星期实施的(关于最早那组的量表信度,正如以前已发表的那样,为 0.98)。这两个部分在亚量表上是相等的,这样一来,每个部分呈现的是来自每个亚量表的相等数目的项目。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平均数和标准差方面也大致相等。鉴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也鉴于它们之间的相等性和高信度(0.94 和 0.91),看来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都单独提供了良好的量化测量,正如整个量表提供的一样。

表 3-7 反犹主义量表及其亚量表的信度

特 性	整个 量表	第一 部分	第二 部分	亚量 表(冒 犯的)	亚量 表(威 胁的)	亚量 表(态 度)	亚量 表(隐 居的)	亚量 表(侵 入的)
信度 ^b	0.92	0.94	0.91	0.84	0.89	0.89	0.71	0.84
项目数	52	26	26	12	10	16	8	8
平均数(总数) ^c	2.70	2.74	2.66	3.80	2.59	2.47	3.28	2.55
平均数(奇数一半)	2.74	2.94	2.86	3.52	2.84	2.48	3.00	2.60
平均数(偶数一半)	2.66	2.54	2.46	2.65	2.34	2.46	3.55	2.50
标准差(总数) ^c	1.11	1.21	1.12	1.33	1.23	1.18	1.26	1.24
标准差(奇数一半)	1.21	1.31	1.19	1.55	1.34	1.21	1.35	1.30
标准差(偶数一半)	1.12	1.15	1.15	1.30	1.32	1.25	1.45	1.35
区 间 ^c	1.0~ 5.5	1.0~ 5.7	1.0~ 5.8	1.0~ 6.5	1.0~ 5.7	1.0~ 5.8	1.0~ 6.3	1.0~ 5.9

- a. 亚量表所使用的缩写如下:亚量表“冒犯的”(S₀),“威胁的”(S_T),“态度”(S_A),“隐居的”(S_S),“侵入的”(S_I)。
- b. 整个量表的信度是通过将第一部分的分数(问卷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分数(问卷的第二部分)进行相关处理后获得的。所有其他的信度则依据奇数项目和偶数项目之间的相关处理。这些相关处理用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Brown)公式加以校正,以便为本表提供信度值。
- c. 平均数、标准差和区间值均按照每个项目的平均分给出。如果将量表的项目数或亚量表的项目数相乘,那么,它们就转化为代表整个量表或亚量表的平均数的值。

还需说明的是,整个平均数相对低下(与理论上的中性分208分相比,为140.2分),而获得的区间包括极端的低分,但并不包括最高的可能分。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项目分

析揭示的原因是:尽管我们试图将量表限制在假民主的陈述方面,但是许多项目仍过于公开或持有偏见,而且平均分极低(3.0以下)。不过,目前的那组学生比以前研究过的那组被试,在平均数上较少反犹主义,后者的平均分为158,区间为52~303。两个例子中的分数分布相当对称,呈低峰分布,很少有分数集中在平均数周围。

整个量表的信度和两个部分的信度差不多可由亚量表的高信度来匹配。0.8~0.9的信度十分令人满意,即使对长于它们3~4倍的量表而言也是如此。

鉴于上述的信度、两半的等价,以及分布的形态,得出下列结论是靠得住的:反犹主义量表(以及亚量表)提供了一种合适的测量工具。它用一种相对小的测量误差将被试沿着一个连续体或维度(continuum or dimension)进行分级。这种维度可以称做一般的反犹主义,它须以项目分析和效度(validity)等数据来证明。不能认为该维度是“纯粹的”或同质的。只要该量表是有效的,它就会以其概括性和复杂性提供对反犹主义的测量。具体地说,可以认为,个体的得分越高,他接受反犹主义宣传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参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犹谴责和计划的倾向也就越大。

(二) 亚量表的相关

上述的信度数据表明,人们不仅在对反犹主义量表所作的反应方面是一致的,而且在对(处理特定的意象和态度的)个别量表所作的反应方面也是一致的。亚量表中的相关如表3-8所示。

表 3-8 反犹太主义亚量表的相关^a

亚量表	“威胁的”	“态度”	“隐居的”	合计
“冒犯的”	0.85	0.83	0.75	0.92
“威胁的”		0.82		0.93
“态度”			0.74	0.94
“侵入的”			0.74	

a. 这些都是原始的相关系数。如果为了相关数减微(attenuation)而进行校正,以便提供理论上可得的最大值(用可靠的工具),那么它们都将超过 0.90。

从 0.74~0.85 的相关有着重大的意义。由于它们涉及处理各种意见和态度的亚量表,因此这一事实是支持下列假设的重要依据,该假设认为,反犹太主义是心灵的一般框架(general frame of mind),也即观察犹太人和犹太人—非犹太人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把犹太人想像为:从个人角度上说是冒犯的,从社会角度上说是具有威胁性的,应予限制和排斥的等等,既认为犹太人太容易同化,又认为他们过于结帮图利——所有这些,看来反映了广泛的思想模式的各个侧面。与这些问题有关的个人立场,不论在方向上还是在程度上均与他关于他人的立场很相似。

三个主要亚量表中的每一个亚量表和整个反犹太主义量表之间有着从 0.92~0.94 的相关,这种相关如此之高,以至于了解一个人在任何一个亚量表上的得分,有助于我们以相当的正确性预言他在整个反犹太主义量表上的分数。总之,由于每个被试在对个别项目的回答上多少有点变化(这将在下面呈示),因此每个被试总会表现出一般程度上的对反犹太主义的支持或拒绝,相对来说,从一种类型的态度到另一种类型的态度是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量表中所包含的一切思想,对每一个反犹太主义分子来说,在感情上都是同样重要的。可能的情况是(这种看法得到了访谈的支持),对每一个得高分者来说,都有一些关键的意见(如把犹太人想像为狡诈的、谋权的和追求享受的,等等),以及一些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态度;这些“得意的”想法似乎为人们去接受差不多任何一种反犹思想提供了基础或一般的准备。当然,这种概括尚不完整,因为反犹思想的各种模式都有可能存在,而且可供研究(正如这里所描述的一般框架的各种变式所示)。

亚量表“隐居”和“侵入”之间 0.74 的相关反映了反犹太主义思想的一种深刻矛盾。作为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不可能既是极端地隐居的和独处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是过于侵入性的和爱打听消息的。可是,对一个完整团体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拒绝超过了错误的逻辑问题。从心理学上看,该结果提示了一种深藏的非理性敌意,它引导着一种定型化了的意象,只有个别犹太人部分地符合这种定型化的意象(如果有点符合的话)。

通过比较这两份量表的有关项目,表明了敌对态度在其中得以运作的非逻辑态度。于是,“隐居的”项目 II-20 声称富裕的犹太人帮助“他们自己人”,而不是帮助“美国事业”。不过,“侵入的”项目 II-25 则关心任何一种例外情况:犹太人之所以捐款,并不是出于慷慨,确切地说,是出于追求名誉和声望的欲望。与此相似的是,犹太人对社区和政府不感兴趣(隐居的),或者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国家政策却实施了太多的控制(侵入的)。因此,反犹太主义的敌对态度导致了否认一些明显的事实(例如,犹太人的慈善举动,人数很少,等等),或者导致了认为犹太人有问题的解释。

在亚量表“隐居的”和“态度”之间的高相关(0.74)中,同样的自相矛盾和同样的含意是明显的。一方面,被试责备犹太人结帮和独处,另一方面,又认为应对犹太人实施隔离和限制,这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接受否定意象的一般敌意和准备状态是反犹主义者心理作用的基本部分(这些反犹主义者认为,各种各样的特定责备,尽管相互矛盾,却是正确的)。

将这些信度和亚量表的相关结合在一起,可以得出关于反犹主义本质和内在根源的若干结论。这是一种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和否定意见占了上风的思想方法。由亚量表引出的若干意象模式,似乎构成单一的广泛的思想框架的组成部分。当这些思想相对普遍时,看来把这些思想十分轻易地接收过来的人(得高分者)与那些并不这样做的人在心理作用上是不同的。反犹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一种相对盲目的敌视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他们关于犹太人的定型的、自相矛盾的和贬黜的评价之中。

(三) 内在一致性:个别项目的统计分析

对反犹主义量表持批评态度的读者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感到某些项目不能令人满意:它们并不测量其他一些项目所测量的内容;人人都会同意量表所表述的想法;某些项目太可笑,以至于得不到人们支持,等等。他可能特别注意一些项目,怀疑它们是怎么成功的。或者,他可能关心量表的压缩和改进,并且为项目的选择和改善要求一种统计依据。鉴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理由,项目的统计分析具有相当的价值。

这个问题可以用统计术语来提出。如果一个项目相对于整个量表而言是好的,那么项目分数便应当与整个量表分数显著相关。由于极少有高分者同意一切项目,也由于某些低分者同意若干项目,因此一种统计技术有必要确定项目分数和量表分

数之间关系的密切性(the clos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对于项目分析来说,最常使用的技术是计算项目分数和量表分数之间的相关,尤其是在考虑某种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的情况下。李克特的“分辨力”技术(Likert“Discriminatory Power”technique)尽管从统计角度讲有其局限性,但它却有省时的好处。此外,墨菲和李克特(Murphy and Likert, 84)在就单一量表如何获得分辨力和项目—量表的相关时发现,一个项目值的两次测量之间有0.91的相关。换言之,项目的优度(goodness)顺序(正如分辨力技术所确定的那样)实际上与相关技术所确定的顺序是一样的。因此,李克特技术便被用于本研究之中。

每个项目的分辨力(缩写为D.P.)通过下列程序而获得。总分属于最高位25%分布范围的被试是得高分者,而总分属最低位25%分布范围的被试是得低分者。

每一项目获得其高分平均值,而且发现,项目不同,平均值也不同。低分者也有类似情况。如果一个项目很好地测量了反犹主义,那么,正如整个量表分数所确定的那样,要比反对反犹主义的人在量表上得到更高的分数。得高分者的项目平均分和得低分者的项目平均分之间差距越大,该项目的分辨力也就越大,它所提供的反犹主义测量也就越好。一个正的分辨力(positive D.P.)表明项目是反犹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由整个量表所确定的反犹主义者要比没有偏见的被试更有可能同意该项目。如果一个项目具有负的分辨力(negative D.P.),那么它的得分显然会颠倒过来,得低分者要比得高分者更有可能同意该项目。本量表中的所有项目均具有正的分辨力。

表3-9列出了关于反犹主义量表项目分析的数据。每个项目用一个关键短语(或关键词)加以标明,字母O、T、A、S和I分别指亚量表“冒犯”“威胁”“态度”“隐居”和“侵入”。

对每一项目来说,最为重要的数据是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团体平均分反映了被试对同意或不同意的一般团体倾向。接近4.0的平均分表明团体在该问题上的赞成和反对是相当均衡地分配的。3.0和5.0之间的团体平均分可能涉及那些充分涵盖从1~7的整个区间的分数。3.0以下的平均分则表明强烈地表示不同意的团体倾向,也即很少获得6或7分的被试回答(+2和+3的回答)。与此相反,5.0以上的团体平均分表明相对一致的同意。

表3-9 反犹主义量表: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第一部分)

编号	项 目	平均分		分辨力	整个团体 平均分
		高四分位 数(25%)	低四分位 数(25%)		
1.	(O:奢侈的)	4.44	2.03	2.41	3.11
2.	(T:坏影响)	2.75	1.11	1.64	1.85
3.	(A:限制犹太人)	4.25	1.03	3.22	2.30
4.	(O:自负)	4.50	1.30	3.20	2.71
5.	(S,T:商人)	5.86	1.38	4.48	3.45
6.	(A:定额分配)	2.89	1.00	1.89	1.67
7.	(O:犹太人一样)	5.78	1.99	3.79	3.59
8.	(T:权力和控制)	5.33	2.30	3.03	3.80
9.	(A:迫害犹太人)	3.61	1.05	2.56	1.84
10.	(O:肮脏的居住区)	2.94	1.24	1.70	1.98
11.	(I,T:华盛顿)	4.55	1.24	3.31	2.56
12.	(A:民主方式)	4.75	1.13	3.62	2.76
13.	(O:全部一样)	5.50	1.67	3.83	3.64
14.	(T:低生活水准)	3.00	1.24	1.76	2.05

编号	项 目	平均分		分辨力	整个团体 平均分
		高四分位 数(25%)	低四分位 数(25%)		
15.	(A:通婚是错误的)	4.19	1.19	3.00	2.57
16.	(I,O:打听消息)	3.89	1.03	2.86	2.24
17.	(S:排斥非犹太人)	4.22	2.11	2.11	3.53
18.	(A:大学生联谊会)	5.89	2.13	3.76	3.84
19.	(I:没有文化)	4.86	1.73	3.13	3.19
20.	(S:放弃宗教)	3.03	1.30	1.73	2.66
21.	(A:不准进入公寓)	4.47	1.30	3.17	2.52
22.	(N:永不知足)	5.42	1.22	4.20	3.17
23.	(S:外来因素)	4.28	1.38	2.90	2.88
24.	(A:不雇犹太人)	5.30	1.19	4.11	2.84
25.	(I:隐匿犹太性质)	4.33	1.62	2.71	2.87
26.	(N:对德国宣战)	2.86	1.05	1.81	1.69
平 均		4.34	1.42	2.92	2.74

表3-9 反犹主义量表: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第二部分)

编号	项 目	平均分		分辨力	整个团体 平均分
		高四分位 数(25%)	低四分位 数(25%)		
1.	(O:自身缺点)	5.89	2.51	3.38	4.31
2.	(T:不爱国)	2.97	1.05	1.92	1.75
3.	(I,A:雇员太多)	4.89	1.30	3.59	2.95
4.	(O:不同和奇异)	4.17	1.19	2.98	2.23
5.	(T:肆无忌惮的)	4.47	1.16	3.31	2.45

编号	项目	平均分		分辨力	整个团体 平均分
		高四分位 数(25%)	低四分位 数(25%)		
6.	……				
7.	(I,O:典型氛围)	5.28	1.32	3.96	3.23
8.	(T:第一忠诚)	5.05	1.81	3.24	3.10
9.	(A:非犹太人残忍)	3.22	1.00	2.22	1.84
10.	(O:与犹太人结婚)	6.58	2.30	4.28	4.22
11.	(T:寄生的)	4.36	1.27	3.09	2.19
12.	(A:避开犹太人)	3.89	1.13	2.76	2.09
13.	(S,O:过度挑衅)	4.97	1.73	3.24	3.44
14.	……				
15.	(A:好莱坞)	3.94	1.13	2.81	2.47
16.	(O:肮脏的)	3.78	1.24	2.54	2.30
17.	(S:结帮)	5.78	2.32	3.46	4.57
18.	(A:旅馆)	2.22	1.05	1.17	1.46
19.	(I:钉死在十字架上)	2.69	1.08	1.61	1.66
20.	(S:百万富翁)	3.97	1.32	2.65	2.44
21.	(A:犹太领袖)	4.64	1.62	3.02	3.07
22.	(N:种族缺陷)	3.86	1.08	2.78	2.40
23.	(S:犹太人离群)	4.03	1.94	2.09	3.21
24.	(A:建立自己的国家)	4.78	1.70	3.08	3.23
25.	(I:罗森沃尔德)	2.89	1.16	1.73	1.74
26.	(N:贡献最少)	2.89	1.19	1.70	1.97
	平均	4.19	1.42	2.77	2.66
	整个量表平均分	4.27	1.42	2.85	2.70

人数: 全组 = 144; 高四分位数 = 36; 低四分位数 = 37

总分区间: 全组: 52 ~ 286; 高四分位数: 183 ~ 286; 低四分位数: 52 ~ 89

另一方面,分辨力是对围绕着团体平均分的高分者和低分者之可变性的一种测量,也是对他们的回答中平均差异的一种测量。那么,分辨力要达到多大才能在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表明没有重叠呢?这就要看分布形态和团体平均分的大小了。团体平均分为2.0的一个项目,一个1.0的低的四分位数平均分,一个3.0的高的四分位数平均分,以及一个2.0的分辨力等等,毫无疑问都是很有分辨性的;低分者一致地用-3来作答,而高分者尽管有变化,但极少围绕-1来作答。一般说来,团体平均分越是极端化(尤其是低于3.0或者高于5.0),分辨力也就越低,但低分者仍能适当地从高分者那里分离出来。不过,广义地说,最佳项目应当具有接近于4.0的平均数;当项目平均分高于5.0或者低于3.0时,项目的措辞应当重新组织,以便让更少的人或更多的人分别去同意它。^[3]

对于团体平均分处于3.0~5.0区间的项目,分辨力可以按照下列标准来评价:4.0以上的分辨力是很高的了,它表明高分者的一致同意和低分者的一致不同意,其间几乎没有重叠。3.0~4.0的分辨力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它表明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2.0~3.0的分辨力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但却表明低分者和高分者的回答有着更大的可变性,以及一定程度的重叠。1.0~2.0之间的分辨力涉及低分者相当多的同意和高分者相当多的不同意,不过从统计角度上讲,仍然表明低平均分和高平均分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差异。^[4]随着分辨力降至1.0以下,有意义的可能性也迅速下降。

让我们根据这些讨论再来考察表9中的数据。一般说来,分辨力相当令人满意,整个团体平均分为2.85。^[5]对于52个项目而言,有5个项目分辨力超过4.0,21个项目分辨力在3.0~3.9之间,15个项目在2.0~2.9之间。只有11个项目的分辨

力在 1.0~1.9 之间,最低为 1.2。

因此,所有项目的分辨力都在可接受性的最低标准之上。从统计角度讲,分辨力超过 3.0 的 26 个项目都十分令人满意。为什么其他项目不大适当呢?答案已由这些项目的团体平均分表明了。在分辨力小于 2.0 的 11 个项目中,有 10 个项目的平均分低于 2.1。与此相反的是,所有平均分超过 3.0 的项目都具有超过 3.0 的分辨力。在差不多每一项目中,低四分位数的平均分是很低的(2.0 以下)。可是,另一方面,高四分位数的平均分却因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几乎在每一种情形里,具有低分辨力的一些项目实际上是高四分位数倾向于不予同意的那些陈述。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项目缺乏假民主的色彩,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明显的不合逻辑或者缺乏真实性,此外,还由于在这些被试中缺乏极端的反犹分子。由此可见,在所有 52 个项目中,高四分位数的平均分为 4.3,其变化区间从 2.2 至 6.6。不过,对于具有最高分辨力的 10 个项目来说,高四分位数平均分超过 5.0。

项目平均数和分辨力的可依赖性可由本研究的团体和以前检验过并加以报道的大学生团体之间的比较来说明。以前检验过的大学生团体曾在一次调查中对整个量表(和其他问卷材料)作出反应;信度为 0.98,而且亚量表的相关也比本研究的团体稍稍高一些。把以前检验过的大学生团体与本研究的团体作比较,前者的每个项目的团体平均分为 3.0,后者为 2.7;前者的平均分辨力为 3.4,后者为 2.85。两个团体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中得高分者人数更多。低四分位数的平均数在两个团体之间几乎一致:当初为 1.39,现在为 1.42。但是,就高四分位数的平均数而言,当初为 4.80,现在为 4.27。在非大学生团体中,人们已经发现有较多的高分者和较大的分辨力。不过,尽管这两

个团体之间有着这些差异,个别项目的适合性却十分相似。由此可见,分辨力之间的排序相关为 0.78,而项目平均分的相关为 0.92。总之,对一个团体来说最具有分辨力的项目,对另一个团体来说也是最好的项目,差的项目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从本研究的团体中提取的关于项目平均分和可分辨性的一般结论,对于以前的团体也是适用的。

表 3-9 显示,最佳项目涉及各种议题。反犹主义意象的定型在过分概括犹太人的缺点中表现出来,而项目 I-13(“犹太人全部一样”)是最具分辨力的一个项目,其分辨力为 3.83。认为犹太人是一种政治威胁的想法(种族主义:项目 II-6, II-14)与认为犹太人是一种经济威胁的想法(财富和力量:项目 I-5, I-8, I-22, II-5, II-11)相比,或者与认为犹太人是一种道德威胁的想法(不道德:项目 I-1, II-1, II-7, II-13)相比,前者的看法并不流行。站在宗教立场上的谴责极少受到支持,^[6]这已由项目 I-20 和 II-19 的低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所表明。各种歧视态度(排斥、限制、迫害;在“态度”亚量表中的大多数项目)可以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并且具有较高的分辨力。

认真阐述项目的重要性已由好差两种项目的比较所表明。按照上述讨论的标准,最具分辨力的项目通常也是最具假民主的项目。例如,考虑一下讨论通婚问题的两个项目。项目 II-10(“我想我决计不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的团体平均分为 4.2,分辨力为 4.3,高四分位数平均为 6.6(差不多所有 +2 和 +3 的回答全用上了)。可是,另一方面,项目 I-15(“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是错误的”)的团体平均分只有 2.6,分辨力为 3.0,高四分位数平均为 4.2。前面那个项目的较高平均分和可分辨性也许是由于它的更大程度的间接性,以及并不露骨的反犹主义。那么,凭什么标准说这个项目是反犹主义的呢?标准在于下列

事实:该项目与整个量表显著相关,也就是说,它在整个量表上得高分的被试和得低分的被试之间具有清晰的区分度(相关并不显著的事实表明,对任何单一项目的回答不是反犹太主义的明显标志,也不是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明显标志;标准必须是整个量表的分数)。

同样的理由也可用于住房限制的项目。下述项目具有很低的团体平均分(1.5~2.5):项目Ⅱ-18(大多数旅馆不该让犹太人进入),Ⅰ-3(把犹太人从居民区驱逐出去),Ⅰ-21(不让犹太人入住公寓)。项目Ⅱ-7(犹太人会逐步在居住区营造“典型的犹太氛围”)是更为间接的和假民主的,因此具有较高的平均分(3.2)和分辨力(4.0)。看来有许多个体不愿积极支持反犹太主义计划,却具有否定的意象和潜在的敌意,从而构成了明确的潜力。即便更加公开和露骨的关于住房的项目,也具有一定的分辨力和高的四分位数(平均分为4.3及其以上,除了Ⅱ-18以外),这一事实似乎表明对这些思想的微弱抗拒。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职业的项目。那些敦促对犹太人实施明确限制和压迫政策的项目(Ⅰ-6,Ⅰ-9,Ⅱ-9,Ⅱ-15),倾向于具有低的平均分。但是,那些强调对犹太人的缺点下结论的项目,以及那些详细介绍歧视做法的项目,却倾向于获得较高的平均分;这样一来,犹太人就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和图谋不轨的(项目Ⅰ-5),并且认为他们拥有太多财力(Ⅰ-8)。鉴于正面的迫害并不妥当(项目Ⅰ-9,低平均分),因此对一个雇主来说,雇用许多犹太人是明智的(项目Ⅰ-24,Ⅱ-3,高平均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消除压迫的需要——是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Ⅱ-24)。

高分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悲观态度在许多项目中反映出来。一方面,他们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反犹太主义完全是(或者主要

是)犹太人自作自受,因此,犹太人应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负主要责任(项目Ⅱ-1,Ⅱ-21)。非犹太人是犹太人缺点的受害者;如果犹太人想改变,变得与“其他人”一样好,那么反犹太主义便会消除。另一方面,犹太人似乎是无法纠正的,因此任何一种明显的改变仅仅是掩盖了犹太特征而已(项目Ⅰ-7,Ⅰ-13,Ⅱ-4,Ⅱ-8,Ⅱ-22)。这里,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是由于犹太人的缺点,但犹太人又是无法改变的;犹太人应当诚心诚意来改变自己,但是他们的“基本犹太特性”又是不可改变的。对于反民主的反犹太主义者来说,惟一的答案是施以公开的和直接的制约;对于假民主主义者来说,惟一的答案是施以轻微的排斥,以及对不良行为的“忍受”。假民主主义者似乎通过对解决该问题的民主方法表示怀疑(项目Ⅰ-12)来背离一种威胁感和反民主潜力。

三、反犹太主义量表的简短形式

本研究的一个策略是,淡化业已证实的技术,引进新的技术,以便对具有理论意义的额外倾向进行测量。为了体现这一策略,鉴于原来那个有52个项目组成的量表的高信度和内在一致性,我们从中选择10个项目,组成简化的问卷,作为问卷的第一次修改。

简化的问卷如表3-10所示。在既考虑统计又考虑理论的基础上,从原来的52个项目中选出了10个项目。由于统计的适合性(分辨力)是包容性的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因此新项目实际上选自15个或20个项目,这15个或20个项目是在冗长的问卷的两次实施中已证明最具分辨力的一些项目。在这些项目中,选择是由下述的考虑来决定的:每一项目的意思应当尽可能丰富;在项目之间,意义和内容的重复越少越

好;它们应当涉及大多数亚量表和大多数谴责与歧视的领域。这些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并没有完全实现;还有其他一些项目也应该包括进去,而且,鉴于某些目的,它们也许更优越些。原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表明,可以构成若干统计上适合的简表形式。然而,目前的问卷形式是为大多数测量目的提供一个合适的工具。对某些项目的措词略作修改,目的是为了使它们在含义上更为简洁。提出此问卷的方式与以前使用的方式不同,因为以前的每个量表是在一页或几页上“一锅端”地显示的,在这种问卷的连续形式中各个量表纵横交错,结果没有一个量表是特别突出或集中的,而且相邻的项目广泛涉及不同的议题。^[7]

新的问卷称为问卷 78(因为它有 78 个量表项目),于 1945 年春对下列团体实施调查。其中,第一和第二组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在校生组成,他们是演说班的全体成员(缺席者除外)。这里,如在一切团体中那样,男生和女生在统计处理中分开,分析仅限于当地出生的人、白人、非犹太族的美国人。因此,这两个组是演说班女生(N = 140)和演说班男生(N = 52)。第三组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系在职班的 40 个女生组成。该组的大多数被试年龄在 30 岁左右,比我们大学样本中的那些被试平均年龄偏大些。第四组为职业妇女(N = 63),该组实际上由三方面人员组成:(1)24 个公共卫生护士,这是附近一个卫生部门的全体护士。该部门的主任持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已经尝试为公共卫生选择具有进步思想、年龄又轻的护士;(2)公立学校教师;(3)社会工作者,我们借助通信手段与他们取得联系。在后两类人员中,只有大约 20% 的被试寄回了他们的问卷,于是这种取样调查便不再尝试了。

表 3-10 由 10 个项目组成的反犹太主义量表(问卷 78)

旧编号	新编号 ^a	
I-24	11	任何雇用工作人员的单位务必小心,雇用犹太人时百分比不要太高。
I-5	16	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经常有所图谋,因此非犹太人在竞争中得不到公平的机会。
II-17	21	大多数城市之所以会出现犹太人聚居区,是犹太人结帮的结果。
II-1	26	如果犹太人真的不想被人迫害,那么他们就应当真诚地作出努力,去除他们身上那些引人注目和令人恼怒的缺点。
II-21	33	犹太人领袖应当告诫犹太人凡事应有所顾忌,脱离业已充斥着犹太人的职业和活动,并且不要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
II-10	40	我想我决计不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
II-7	49	如果让犹太人移居到好的社区,那么由此造成的麻烦是,他们会在那儿逐步营造一种典型的犹太氛围。
I-7	62	不论一个犹太人看来多么美国化,但他始终有着某种不同的和奇特的东西,也即基本上属于犹太人的东西。
I-13	69	尽管有一些例外,但是,一般说来,犹太人之间十分相似。
I-11	72	在华盛顿各联邦机构里的犹太人太多了,因此他们对我们国家政策的控制也太多了。

a. “新编号”是指问卷 78 中项目的号数,“旧编号”是指前面讨论过的问卷的号数。你们将会发现若干项目的措词已略作修改。

反犹太主义量表的简表信度在表 3-11 中列出。信度在 0.89 ~ 0.94 之间,这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对由 10 个项目组成的量表来说),它们与那些从冗长的问卷中获得的数据相似。^[8]对于大学生和在职班学生来说,3.3 ~ 3.4 的平均分实际上与那些以前在采用冗长度量表的班级里对 10 个项目进行反应的 3.55 的

平均分相似。不过,对职业妇女来说,平均分 2.6 似乎比其他被试显著地低了一些(从统计上说,超过一个百分点水平)。这一差异可能部分由于样本误差;教师和社会工作者通过邮件自发地作出回答,在填写探讨偏见和个人情感的问卷中,他们的合作倾向也许与缺乏偏见是相关的。^[9]对于该组来说,量表的高信度(0.94)可能反映了大龄组更高的思想一致性。

表 3-11 反犹主义量表的信度(问卷 78)

性质 ^c	A 组 ^a	B 组 ^a	C 组 ^a	D 组	全体 ^b
信度	0.89	0.93	0.90	0.94	0.92
平均(全部)	3.33	3.36	3.40	2.57	3.16
平均(奇数一半)	2.89	3.30	3.20	2.34	2.96
平均(偶数一半)	3.66	3.42	3.63	2.83	3.38
标准差(全部)	1.43	1.48	1.36	1.37	1.41
标准差(奇数一半)	1.42	1.51	1.38	1.27	1.40
标准差(偶数一半)	1.62	1.56	1.48	1.58	1.56
区间	1.0~ 7.0	1.1~ 6.3	1.2~ 6.1	1.0~ 6.2	1.0~ 7.0

- a. 这些数据所依据的四个组是:A 组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N=140);B 组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N=52);C 组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成人在职班女生(N=40);D 组为职业妇女(护士、教师、社会工作者, N=63)。
- b. 在获得全体平均数方面,个别组的平均数未因人数而加权。
- c. 平均分、标准差和区间值按照平均数/人/项目来给出。如果乘以 10(项目数),它们就转化成代表每个被试在整个量表上的分数值。

关于项目分析的分辨力研究,其结果在表 3-12 中列出。平均分分辨力 3.68 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它表明,在大多数项目上,

只有少数四分位数成员表示同意,也只有少数四分位数成员表示不同意。最佳的项目涉及下列议题,如有所图谋的商人,犹太人之间十分相似,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把犹太人从居民区驱逐出去等。

项目的呈现形式对其个别平均分和分辨力究竟有多大影响?项目以整块形式呈现(如冗长量表的项目那样)还是在一系列项目中随机地分散提出(如问卷 78 那样),这与平均分和分辨力有否关系?证明这个问题的论据,可以通过比较这 10 个项目的两种呈现方式的结果来获得。心理学班的女生在这 10 个项目上的平均分(冗长量表,不包括其余 42 个项目)为 3.55,与演说班的女生相比,后者为 3.32,采用问卷 78,这两个最可比较的组的平均分分辨力分别为 3.76 和 3.68。这里的差异从统计学上讲并不显著。此外,对这两个组来说,个别项目平均分之间的排序相关为 0.62,而相关的分辨力为 0.90。当人们考虑到某些项目的措词已经变化,而且两个组并不系统地相等时,这些相关似乎更加有意义了。我们也把冗长量表的结果与采用问卷 78 的所有四个组的全体平均数作了比较。个别项目平均分相关为 0.88,而分辨力相关为 0.80。由此看来,项目的相对分辨性(分辨力)和接受水平(平均分),主要由于项目本身的性质,而不是由于它们在问卷中呈现的方式。

尽管我们在采用问卷 78 的四个组中没有计算过任何相关,但全体平均分和分辨力的可变性表明,在不同的被试组,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对一个组来说是最佳的项目,对另一个组来说也是最佳的;至于最差的项目,情况也如此。平均分和分辨力排序中的这种一致性,甚至也适用于职业妇女,即使事实上项目平均数的绝对值对这个组来说要比其他组低得多。

表 3-12 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a
反犹太主义量表——问卷 78

编号	项目	A 组		B 组		C 组		D 组		全部 ^b		等级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11	(雇用犹太人)	2.76	4.25	3.10	3.69	3.40	4.13	1.71	2.36	2.74	3.61	(6)
16	(商人)	3.79	4.58	3.62	4.10	3.58	4.35	2.63	4.35	3.40	4.34	(1)
21	(犹太人聚居区)	3.46	2.97	3.81	3.17	3.92	3.35	2.86	2.00	3.51	2.87	(9)
26	(去除缺点)	3.41	3.20	3.42	3.96	3.92	3.83	3.16	4.58	3.48	3.89	(5)
33	(犹太领袖)	2.29	2.28	2.96	3.09	2.12	1.25	2.10	2.86	2.37	2.37	(10)
40	(娶犹太女人)	4.44	4.60	3.92	4.67	4.42	4.09	3.04	3.77	3.96	4.28	(3)
49	(好社区)	3.03	3.57	3.31	4.35	3.15	3.88	2.29	4.70	2.94	4.12	(4)
62	(犹太性质)	3.54	3.85	3.31	3.29	3.60	2.76	2.94	4.12	3.35	3.50	(7)
69	(都相似)	3.44	4.02	3.19	4.20	3.22	4.24	2.73	4.76	3.14	4.30	(2)
72	(联邦机构)	3.07	3.49	2.81	3.50	2.60	2.63	2.27	4.30	2.69	3.48	(8)
	平均/人/项目	3.32	3.68	3.35	3.80	3.39	3.45	2.57	3.78	3.16	3.68	

a. 这些数据所依据的四个组是:A 组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N = 140); B 组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N = 52); C 组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成人在职班女生(N = 40); D 组为职业妇女(护士、教师、社会工作, N = 63)。

b. 在获得全体平均分方面,个别组的平均分不因人数而加权。

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证据,可由 1945 年 9 月获得的结果来提供。该调查在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实施,由 153 个学生组成,女生占大多数。^[10] 10 个反犹太主义量表项目在一页纸上一锅端地提出,不包含其他任何量表。连填表的指导语也是照抄冗长量表上的内容。获得的信度为 0.91,这个数值几乎与其他组获得的数值一致。每个项目的团体平均分为 4.52,平均分分辨力为 4.02。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平均分相比,这个平均分显著不同(超过 1% 的水平),它表明(像其他研究也曾表明过的那样)在反犹太主义中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西部边缘地区显然比东部更少偏见。虽然华盛顿的学生始终获得高分,但项目平均分显示,在华盛顿学生组和四个加利福尼亚组的平均分之间等级次序相关(rank-order correlation),为 0.84,表明在项目的相对可接受性方面有着一种引人注目的相似性。这个组也提供证据表明,极端高分者确实存在,而采用问卷 78 的团体的有限区间,主要由于缺乏极端的反犹成员。在华盛顿的组里,个人分数涵盖可能分数的整个区间(10 ~ 70),高四分位数的每个项目平均分为 6.27,低四分位数为 2.25。

华盛顿组的分辨力相关为 0.54,这是与四个加利福尼亚组的平均分分辨力相比而得出的。这个数值之小(与项目平均分的数值恰成对照);主要是由于项目 72 排行的变化,因为该项目断言“在华盛顿各机构里犹太人太多”。该项目的分辨力在加利福尼亚组里排行为 8,但在华盛顿组里排行为 2(分辨力为 4.5)。可是,两个组关于这个项目的平均分的等级倒是一致的(两个组均为 9),低分者和高分者之间的差别,在华盛顿要比加利福尼亚相对而言大得多。人们也许会期望,生活在华盛顿,理应为个体提供一个现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该项目作出反应,从而使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差别缩至最小。不过,情况看来并非如

此。确切地说,一个人如何吸纳和解释社会现实,很大程度上似乎由他先前存在的思想所决定。

根据上述讨论,可以暂时得出以下结论:

(1) 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并不随呈现形式的变化(从 52 个按序排列的反犹主义项目到 10 个按序排列的反犹主义项目,再到总数达 78 的一系列项目中随机散布的 10 个项目)而变化。

(2) 虽然不同的组在平均分和平均分辩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每个项目的相对可分辨性和可接受水平(等级分辨力和平均分)却倾向于保持相当恒定,例外情况是存在某些地区差(如在项目 72 中,关于华盛顿各机构里犹太人太多的问题)。也就是说,某些项目具有较高的分辨力,其他项目则具有较低的分辨力,对于项目平均数,也有类似情况。

(3) 项目平均分,尤其是分辨力,在统计上十分令人满意。在 10 个项目中,有 8 个项目的分辨力平均为 3.5~4.3(当华盛顿组也包括进去时,数值甚至会更高),即使是最低的平均分辨力 2.4 和 2.9,也是适合的。

(4) 犹太商人、定型化意象、婚姻、把犹太人从居民区驱逐出去,以及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应该负主要责任等项目是最有分辨力的项目。然而,有趣的是,那些表示经常听到的责难和公开的对抗态度的项目,却具有较低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5) 鉴于量表的高信度和内在一致性,反犹主义量表的简短形式——简表,可以取代原来冗长的问卷而用于许多科研目的。

四、个案研究的证据:麦克和拉里对反犹主义量表的反应

经常用于心理测验的一个正确概念是,测验虽然只涉及个体反应的小样本,但却告诉我们有关该个体的真实情况,正如对他进行集中研究所得的判断那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反犹主义量表就具有这种效用,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被试在对该量表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反映出与他们在访谈中的表现相同的倾向。因此,将麦克和拉里(Mack and Larry)对反犹主义量表所作的反应与他们在访谈时所说的话作一比较是值得的。

表 3-13 中列出了麦克和拉里的分数(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这是就反犹主义量表(问卷 78)的简表中 10 个项目的每一个项目而言的。麦克的平均分为 4.6,显然超过(但不是大大超过)全体的团体平均分 3.16。他正好勉强地位于演说班男生高四分位数的范围内(他是该演说班的一员)。这种情况与他在访谈中整个思想部分的适度性是相一致的,从而构成了我们在第二章中所下结论的依据(我们在第二章中指出,麦克相对来说是一个适中的例子)。他的反犹主义是相当一般的,他在 10 个项目中同意 6 个,除了一个项目之外,他的得分高于团体平均分;但是,对个别项目的反应所进行的研究却反映了一个清晰的模式,该模式能与反犹主义的其他模式相区别。

在项目 11(雇用犹太人)、项目 33(犹太领袖)和项目 72(联邦机构)等例子中,他稍稍表示不同意,从而得分接近团体平均分。他说,如果犹太人能够自觉而又充分地参与美国生活,他不会强烈反对,而且认为这确实是他们应该做的。在对项目 16(商人)和 21(犹太人聚居区)所作的反应中,他认为主要问题在

表 3-13 麦克和拉里在反犹主义量表上的反应

项 目	麦克	拉里	团体 ^a 平均分	团体 ^a 分辨力
11 (雇用犹太人集)	3	1	2.74	3.61
16 (商人)	6	1	3.40	4.34
21 (犹太人聚居区)	5	1	3.51	2.87
26 (去掉缺点)	6	1	3.48	3.89
33 (犹太领袖)	3	1	2.37	2.37
40 (娶犹太女人)	7	3	3.96	4.28
49 (好的社区)	5	1	2.94	4.12
62 (犹太性质)	5	1	3.35	3.50
69 (全部相似)	3	1	3.14	4.30
72 (联邦机构)	3	1	2.69	3.48
全体平均分	4.6	1.2	3.16	3.68

a. 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是以采用问卷 78 的所有四个组为基础的。

于犹太人宁愿结帮图谋,并为他们自己的团体积累财富和权力。如果犹太人去除他们身上的缺点(项目 26),对他们的迫害就会去除,但是他们不可能真正“美国化”(项目 62),仍然会在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保持某种距离(项目 40 和 49)。

这差不多是麦克在他的访谈中对我们讲的话,也是他试图阐释的主要论点:他们热衷于结帮图谋和物质利益……如果一个犹太人在经商中失败,他会得到帮助,以便重新开始……如果犹太人愿意与人家结交,他们就会被人们喜欢和接受……犹太人不会同化……我肯定不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我会与那个演说班的女孩子约会,但是她不该强调她的犹太人特性。如果她抛弃她的犹太人特性,我也许会与她结婚,但是我不能接受她的班级。

有趣的是,项目 40(与犹太人结婚)是麦克感觉最强烈的一个项目,同时,在这个项目上,他十分明显地偏离团体平均分。看来,他在访谈中之所以说“我会娶那个犹太女孩,如果她抛弃她的犹太人特性”,是因为他感到这样说保险。实际上,麦克并没有真正相信她能够改变,因为在她身上始终会有“某种基本上属于犹太人的东西”(项目 62)。

麦克在项目 69(犹太人全都相似)上的得分略低于团体平均分。这里,量表与访谈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对访谈的分析似乎表明,定型化的意象是这个被试思想中的突出之点,然而当这种特点遇上项目时,而且该项目又十分接近这一特点时,他又不同意了。这倒不是由于该项目不好(因为它的分辨力仅次于从反犹主义简表中所得的最高分),也不是由于麦克的定型化思想中有什么特别的特征无法适应项目 69。若要期望量表和访谈在每个特定的方面都趋一致,也许是一种奢望:这些工具并不绝对精确,大多数被试也不这样始终如一。

人们也可能注意到,麦克在他自由发挥的访谈中,为他的关于犹太人的讨论引进了某些思想,例如,犹太人的“弱点”,这是反犹主义量表中 10 个项目均未触及的。看来,如果他对原来的反犹主义量表的 52 个项目都作过反应的话,那么上述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由此可见,量表的简表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我们曾声称,就目的而言,该简表可以取代原始的冗长的问卷。在麦克的例子中,似乎没有理由对于用简表来测量他的反犹主义程度表示不满;关于他的反犹主义思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回答量表的模式与他自发讨论时关注的内容是一致的。10 个项目的量表应当同时反映出—个被试在评论犹太人时那些偶发的和个人的特征。

拉里对反犹主义量表的回答是真实的。除了项目 40(娶犹

太女人)以外,他在每个项目上得到了最低可能的分数,甚至对项目 40,他也稍稍有点不同意。我们在第二章里曾说过,拉里不是得低分者中的一个极端例子,这一说法是就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一切诊断手段均是为了对他的了解而言的。他在访谈中声称,他强烈反对对少数民族团体持有偏见,正因如此,如果他在反犹主义量表上未以极端低分出现的话,我们便有理由怀疑量表的效度了。在项目 40 上,他之所以没有获得可能的最低分,是因为他没有以一种自动方式(automatic way)对反犹主义项目作出回答。看来,在这一点上,他对与犹太人的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冲动和他的因袭主义(依从俗例)相冲突,我们业已看到这一特性在他身上得到充分发展,致使他无法在该项目上越出哪怕是稍稍不同意的范围。

一般说来,这两个被试对反犹主义量表的反应,与他们在访谈中就犹太人问题所谈的话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反犹主义的程度上,而且也表现在被试关于犹太人想法的内容上。根据这些结果,可以作出一般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反犹主义量表是关于人们对犹太人看法的有效指标。

五、讨论:反犹主义思想的结构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反犹主义在心理上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的厌恶,而是一种思想,即关于犹太人和犹太人—非犹太人相互作用的一般思想方法。这是由探讨各种思想的量表的高信度来表明的,是由亚量表的信度和相关来表明的,也是由量表的高度内在一致性来表明的(这种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项目分辨力上)。统计结果表明,整个反犹主义思想的量化测量可以成立。任何个体都可以在一个等级上予以定

位,其误差相对较小。该等级的一端(高的一端)为强烈支持反犹主义思想,而另一端(低的一端)则是强烈反对反犹主义思想。这一等级范围内的中间分数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中间分数可以代表无所谓、无知,也可以代表部分支持反犹主义和部分反对反犹主义的矛盾的结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亚量表上获得中间分数的个体,也倾向于在其他亚量表上获得中间分数。尽管项目之间有所不同,但个体在对若干亚量表的反应中倾向于高度一致。

一个人对一组项目的立场与他对其他项目的立场相似,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一切反犹主义思想对每个个体来说具有同等的心理重要性。反犹分子的自发讨论,不论在访谈中抑或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对每个个体而言,有某种“核心思想”——把犹太人想像为图谋的,或者种族主义的,以及其他一些相应的基本态度——这些“核心思想”具有基本的情绪意义。然而,这些核心思想显然使个体容易接受各种其他的思想。也就是说,核心思想或者中心思想一旦形成,便倾向于“吸收”众多的其他意见和态度,从而形成广泛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为该体系中的任何一种特定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满足和同化新的社会条件提供基础。

关于反犹主义的这种概念有助于我们了解本研究的一些结果。它也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为什么在细节上新颖的反犹主义谣传会被反犹主义分子轻易地相信,例如,传闻说战时只有犹太人能够免于兵役或者得到一官半职等;一般说来,这是由于否定意象的可接受性,以及由于新思想容易被同化的一种思想体系。

反犹思想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这一概念与众多的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按照某些特定的责难或动机来构想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概念作为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形式,似乎以这样一

种思想为基础,即对犹太人的主要责难涉及到他们的“种族上继承”的特质(缺点)。另外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反犹太主义是“宗教偏见”的一种形式,它以某种明确的或含蓄的假设为基础,认为宗教分歧,以及站在宗教立场上的谴责,是反犹太主义的中心问题。第三种“具体的”观点认为,反犹太主义主要建立在对事实进行歪曲的基础上,有些个体错误地把这些已被歪曲的事实视做是正确的,并予以接受;例如,认为犹太人不同寻常地富裕、不诚实、种族主义等等。这最后一个理论导致众多的尝试,意欲通过提供“正确的事实”来与反犹太主义作斗争——但是,这些尝试均缺乏成功的例子。该理论忽视了许多人容易接受对犹太人的怀有敌意的意象,以及从情感上拒斥那些持有较少敌意和较少定型化思想方法的个体。最后,反犹太主义有时根据金融原因和责难来进行解释:据断言,许多人之所以反对犹太人,主要是由于经济竞争和金融方面的自身利益所致。该理论对其他责难视而不见(关于谋求权力、不道德等等),尽管其他责难也具有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情感强度。但是,它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反犹太主义者在维持他们的偏见时如此经常地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反犹太主义的这些概念中,没有一种概念正确地进行了概括,没有一种概念把握了反犹太主义的心理复杂性,以及它在个体情绪生活中的功能。它们也未能提示为什么有许多人反对反犹太主义,尽管他们具有与反犹太主义者相似的经济情况、宗教背景、信息来源等等。根据我们的观点,当前需要的是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既谋求抓住反犹太主义思想,又谋求抓住反对反犹太主义思想,或者说从反犹太主义的复杂性和范围两个方面抓住这两种思想,然后试图去发现每种思想的各种根源,包括个体的心理发展的根源和社会背景的根源。^[11]

在对组成反犹太主义思想的主要思想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

先就量表和量表数据的问题说上几句。我们认为,美国反犹太主义的大多数日常倾向在量表中已有所反映,尽管我们尚未声称它包含了当前流行的一切反犹太主义思想。量表数据从下列意义上为本讨论提供了一种经验主义的基础:(1)本讨论所涉及的每一种思想,得到大多数反犹太主义者的支持(属于量表上得分最高的25%的被试),也得到大多数反反犹太主义者的支持,其差异从统计学上讲是有意义的;(2)每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基本上支持该思想的大多数项目,而每一个得分低者则反对该思想的大多数项目。由此,人们可以谈论关于反犹太主义思想的一般框架,因为这种思想的整体性虽为少数人所掌握,但它在不同程度上却为许多人所支持。人们也许会问,构成反犹太主义思想的主要意见、价值观和态度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织或形成体系的?这一体系与其他的非反犹太主义观点有何不同?在反犹太主义思想中,意象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定型化想法。该定型有几种表现形式:首先,存在一种过度概括单一特性的倾向,一些陈述句的开头往往是“犹太人是……”或者“犹太人并不……”;其次,作为整体的团体存在一种定型的否定意象,似乎“了解了部分就等于了解了全部”,因为犹太人全部都相似;再次,对构成意象的特征所进行的考察,揭示出一种基本的矛盾,即没有一个个体或作为整体的团体具有这些特征。

由量表项目所揭示的并在访谈中直接产生的定型化思想的另一方面,可以称做“人际关系和经验的定型”。它涉及到无法把犹太人作为个体来体验的一种失能现象。确切地说,每个犹太人均被作为一种定型的样本(团体的具体化意象)来看待。这种定型的形式在麦克关于犹太人的讨论中(见第二章)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虽然我们手头尚缺可靠的统计,但是其他访谈和日常会话表明他的思想方法是普遍的。

个体经验中的这种局限性,对下列理论具有某些涵义,该理论认为,与“好的犹太人”接触会减弱反犹主义。看来,社会接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个体经验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不是遗传决定的,但在成人中可能难以改变。当一个人缺乏这种能力时,新的社会经验很可能不会导向新的学习和发展,而是导致业已建立的意象的机械性增强。

关于反犹主义思想的定型和其他特征的进一步分析,以及来自访谈材料的一些具体例子,将在第十六章讨论。

这些考虑提出了若干问题,它们在本研究的后述部分进行讨论。反犹主义者在涉及其他团体和问题时,是否也表现出思想和经验方面的同样的定型模式呢?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理功能是否定型和刻板呢?对于反犹主义者,为什么从一切立场上排斥犹太人会显得如此重要呢?矛盾和过度简化(contradictions and oversimplifications)是否会是一种深藏的焦虑和敌意表面化呢?如果有此可能的话,那么涉及到人格倾向的究竟是什么,它们与那些在非反犹主义者身上发现的人格倾向有何不同?

让我们考虑一下对犹太人定型的负面意象之深层的心理含义。由于特定的表面意见包含着众多的议题,因此,可以肯定,某些同意的思想或主题构成了意见的基础,并为它们提供了一致性和结构。也许最为集中的主题是“犹太人具有威胁性”这种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几乎一切量表项目之中。在亚量表“冒犯”中,犹太人被描述成是一种道德威胁,也就是说,犹太人被视做重要准则和价值观的叛逆者。这些价值观包括清洁、整齐和遵奉;还包括与追求享受、奢华、打听、社会性挑衅等相反的东西。把犹太人视做价值观的叛逆者,致使他们不仅显得冒犯,而且还十分烦人。在项目II-4中(“犹太人身上有某些异样和奇怪的东西……”),这种焦虑变得十分清晰。

当然,这些价值观并不单单限于反犹主义者。事实上,这些价值观中有许多是属于当今中产阶级流行的价值观,而大多数美国人在心理上把自己视做是中产阶级。也许,反犹主义者和非反犹主义者在某些价值观方面是不同的,例如在追求享受或遵奉主义方面不同。但是,许多不具偏见的个体也有可能具有与反犹主义者同样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这些价值观会成为一个团体中反犹主义者进行责难的基础,却没有成为另一个团体的基础呢?有一种假设认为,非反犹主义者在对这些价值观予以支持方面更加灵活,不大会受到价值观破坏者的扰乱,不大会倾向于陷入定型和过度概括的圈子里去。

此外,正如后面所示的那样,高分被试强烈坚持这些价值观,它们经常出现在这些个体关于自己的思想,关于别人的思想,关于社会问题的思想之中。鉴于这些价值观所获得的情感支持,鉴于假设中的价值观违背者被拒斥的强度,人们有理由要问,表面意见和态度是否由深层的情感倾向所激发。例如,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反犹主义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无意识地压抑他们在犹太人身上所发现的那些无法容忍的倾向。犹太人可能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将其无意识欲望和恐惧投射于其上的目标。这难以解释为什么反犹主义者对于违背他们的道德价值会感到如此有威胁,也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发展了对“道德上不纯”的犹太人的一种夸大的和定型的意象,认为这是对“道德上纯洁的”非犹太人的一种威胁。价值观违背者(自我相异的、道德上有威胁的团体)和价值观支持者(自我共振的、道德上纯洁的团体)之间的类别区分是否也出现在这些个体的思想之中(它们涉及后面几章要讨论的各种思想领域),这样的联想是有意义的。如果把本主题与其他主题联系起来,统一作为整个反犹主义者社会思想的基础,那么他们的特定意见和态度可以部

分地被认为是表达了深匿的人格、焦虑和冲突。

认为犹太人是一种社会威胁,这在亚量表“威胁”中直接表现出来,因为在亚量表“威胁”中,犹太人被描述成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均具有有害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到犹太人的力量,它是我们的量表项目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也是被试在后来的访谈中和反犹主义量表中一个反复发生的主题。根据上面提到的道德价值观,暗示着非犹太人与犹太人是対立的:非犹太人清洁、遵奉、谦虚,等等。然而,虽然在犹太人身上这种力量具有威胁性,但它却被得到证明,甚至在非犹太人中间得到价值评价。^[12]例如,实行种族隔离,坚持排斥态度,是建立在下列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即非犹太人应当比犹太人更强大,以便增强隔离和排斥的政策。为什么这种对力量的关注会如此经常并以如此众多的形式反复发生呢?虽然真正强大的、居支配地位的团体不断地得到支持而不是感到害怕,那么为什么犹太人团体(实际上不仅小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弱)还被认为如此具有威胁性呢?是不是因为对反犹主义者最为困扰的犹太人的弱点?如果在高分者身上对力量的关注和对虚弱的恐惧代表着深层的人格倾向的话,那么,这些倾向应当通过临床技术得以反映,而且它们也应当在其他思想领域得到反映。

犹太人的团体忠诚和犹太人的同化等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看,反映了反犹主义思想中的若干核心主题。乍一看,对犹太人的批评和要求似乎既简单又合理。据断言,犹太人太宗派主义了:他们以一种势利的隐居方式相互隔离、互不来往,或者,如果他们参与社区事务,他们便会结帮,并且利用别人。因此,犹太人必须克服他们的傲慢和宗派倾向,以及他们意欲控制其他团体的企图。只有当他们彻底同化了,只有当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挣钱方式,以及牺牲别人谋得权利的想法,他们才能

被大家所喜欢和接受。在他们改变以前,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排斥,或以某些方式受到限制,他们是用不着感到惊讶的。对犹太人的根本要求是:犹太人要排除他们的文化特性,坚持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方式。与这种狭隘性相联系的是,对主导价值观的违背者持以惩罚态度而非理解态度。犹太人对他们的痛苦经历罪有应得,也是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一报复性的思想方法中,并不存在复杂的解释,并不存在把歧视视做犹太人之特性的原因而非犹太人之特性的结果。

但是,这种同化要求并不像乍一看那样简单。试图同化的犹太人显然要比其他人更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打听消息”“谋求权力”“实施模仿”等,而且,犹太人给人的慷慨感觉也隐匿着他们的自私动机(参见亚量表“侵入的”)。一方面,被试敦促犹太人应像非犹太人一样,消除他们的犹太特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在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对犹太人实施限制和排挤,对此,似乎缺乏逻辑的基础。

在犹太人中间确有结帮和谋权的人,但是,在非犹太人团体中也有这种人,这是非反犹主义者所强调的。那么,为什么得高分者不反对自己团体中的谋权者,或者说不反对他们团体中利用别人的那些个体呢?那些把结帮、打听消息和谋权看做是“犹太人特性”的人,在非犹太人中间却以其他名义珍视同样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每个人都支持自己的团体(“血浓于水”),每个团体以其物质利益而将其成员统一起来,这一现象已被人们作为“人性”而接受。只要存在犹太人团体,人们就会期盼每个犹太人从根本上忠于该团体。虽然这种“宗派主义”为人们所痛恨,但反犹主义者却倾向于蔑视任何一个对自己团体缺乏“忠诚和自豪”的人,并对他们自己团体的这些特性给以夸大的评价。

上面描述的这些意象,揭示了大多数反犹主义者思想方法的主要特征。在受到支持的“态度”模式中,个体差异(行动计划)主要取决于坚持民主价值观的力量。公开的反民主个体有着一种直接的计划:对犹太人施以暴力攻击,完全消灭犹太人,予以永久的迫害和限制。但是,对于那些具有同样意象,但又想支持平等、非暴力等民主价值观的人而言,他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个更大的心理问题。

对犹太人的负面意象,不仅伴随着一种威胁感,而且涉及两种恐惧(它们构成了态度的基础):第一种恐惧是害怕污染,也即一旦允许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密切接触,犹太人对非犹太人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以各种形式在道德、政治、娱乐等领域表现出来。已被列入“犹太人污染”的许多思想涉及自由恋爱、种族主义、无神论、道德相对论、文学艺术中的现代倾向等。那些支持这类思想的非犹太人,常被认为是不明智的受害者,他们在心理上受到污染的方式与他们受到疾病感染的方式是一样的。认为一个犹太人可以“污染”许多非犹太人的想法,在使许多明显的矛盾理性化方面很有用处。它容许人们将有关影响归因于犹太人,从而将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他们,尽管犹太人相对来说人数很少。同样,它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敌对情绪和歧视行为是正确的。此外,他们可以把某个主张或社会运动称之为是“犹太人的”,即便当大多数支持者是犹太人时也是如此,因为后者被认为是犹太人污染的受骗者和牺牲品。接受这种推理的个人会感到有必要(不论他的容忍价值如何)通过限制犹太人团体的活动来保护非犹太人的团体。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若干问题。对于反犹主义者来说,为什么认为犹太人是所有这些思想的源头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他们看来这些强加于非犹太人身上的思想

起源于犹太人呢?一种假设认为,它反映了具有偏见的个体在解决内在道德冲突时表现出来的企图,即通过外部化或将其不道德倾向予以投射来解决内在冲突。内在冲突被下述两个团体的一种新冲突所取代,这两个团体是:定型化的道德的“我们”和定型化的不道德的“他们”。内在冲突被无意识地坚持着,它不仅由强调外在的不道德来展示,而且也由害怕不道德给人们带来腐化而展示出来。在后面几章,我们将报道关于这种假设和其他一些假设的调查。

除了害怕污染以外,还害怕被别人控制。这种焦虑与对犹太人的下列意象有关;把犹太人想像为爱打听的和谋权的。如果为犹太人提供自由地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那么,由于他们具有上述倾向,他们将形成一个地区性的小集团,只对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感兴趣。为达此目的,他们甚至会运用最为残忍和不诚实的手段。于是,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非犹太人团体受迫害、受剥削,非犹太人会变成受害者——总之,被控制。

对于具有这种敌意意象和焦虑的人来说,确实难以对犹太人—非犹太人的相互作用抱以完全民主的态度。大多数假民主态度试图有意或无意地在下述两种倾向之间作出妥协,这两种倾向是:直接地表示潜在的敌意(挑衅性攻击)和遵奉民主的价值观(容忍、平等)。要求犹太人完全同化,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妥协,因为完全同化是消灭犹太人的一种非暴力方式。如果不存在犹太人的话,那么焦虑的源泉和敌意的目标也就会消除。遗憾的是,部分同化(指有些犹太人试图同化而另一些犹太人则不试图同化)似乎比不愿同化更令反犹主义者心烦。只要反犹主义者有着犹太人团体仍然存在的意识——由此产生关于“犹太人”的意象,它可以按定型化的方式用于一切个别的犹太人

——那么正在实施同化的犹太人就会被怀疑为具有不良的动机。正是这种经常发生的自相矛盾现象,使得那些要求犹太人全部同化的被试尽力防止同化的发生,因为他们的敌意和歧视一方面倾向于增强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为排挤那些试图融入统治团体中去的犹太人设置了障碍。相反,在那些既接纳犹太人又不对他们提出顺从或全面同化要求的社区里,犹太人的同化却进行得十分迅速。

用非暴力手段消灭犹太人的第二种方式是:让犹太人“留在篱笆的那一边,我们则留在篱笆的这一边”,借此解决相互作用的问题。如果犹太人不能被完全同化——那么,尽管他们要求同化,但大多数反犹主义者却感到“基本的犹太特性”是永恒的——因此,应对他们实施完全的隔离。如果犹太人想“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自己管好自己,那么这种隔离就可以做得十分彻底”(项目 II-24)。^[13]

有些个体,包括犹太人在内,支持隔离的主张(见大学生联谊会、社区等项目反应),他们的根据是兴趣和文化的差异。然而,从民主的观点看,对于一个致力于犹太文化并推行依地语(yiddish language,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言)的组织,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对于一个关注基督教文化或任何其他文化形式的组织,也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是,坚持民主价值要求:一旦组织的基本目的和作用确立后,它应当向接受其原则并满足其要求的任何个体敞开。排斥任何团体都是不民主的,也就是说,不能根据团体成员的个人优点和缺点取舍团体。犹太人团体的排外主义(可被视做是一种防御性的“自豪”反应)如同其他团体的相同策略。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的排斥,无论是表现在民族的、宗教的、社会阶层的、肤色的等方面,抑或表现在其他方面,肯定是以定型、敌意和焦虑为基础的,不管你是否

意识到。人们有时说,“一个犹太人(或黑人或天主教徒)在这里不会感到舒服”。这种说法暴露了某种程度的偏见,闻此说法的人又怎么会感到舒服呢?

歧视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形式,目的是为了限制犹太人—非犹太人的相互作用,限制犹太人全面参与社区和国家的事务。一切歧视形式(排挤、隔离、迫害等等)都具有这种双重作用:一方面,限制团体间接触;另一方面,确保实施这种歧视的团体的社会统治地位。

美国的各种团体归属涉及许多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和习俗的力量。但是,这些宽泛的社会力量已超越本研究的范围。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陈述的那样,我们关心的是个体的思想问题;如果这些思想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那么为什么有些个体采取(吸纳、接收)不民主的形式而其他个体则采取民主的形式呢?一般的假设认为,个体之间有着选择的可能性,一个人会十分容易地接受那种对他来说具有心理意义,并在他的顺应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相应地,关注反犹主义思想的心理内容,有助于形成关于深藏的心理倾向的假设(如果存在这种倾向的话),因为正是这些倾向,激发了表面的意见和态度,并构成了它们的基础。

本量表的结果提示了反犹主义思想的众多倾向:定型;固执地坚持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认为自己的团体是道德的,而外团体则是不道德的;反对和夸大打听、追求享乐等;极度关注统治和权力(害怕犹太人的力量,要求非犹太人的力量);恐惧道德污染;害怕被控制,害怕成为受害者;试图设置社会障碍,以便将一个团体与另一个团体相分隔,并维持自己团体的道德和统治。

能否表明这些人格倾向实际上存在于反犹主义者身上呢?在下面几章,有些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这个问题:(1)如果存在这

些倾向的话,那么它们也应该在其他思想领域被找到;(2)这些倾向应当以非思想的形式表示出来,也就是说,以那些关于人们和生活的思维方式表示出来;(3)临床研究应当直接揭示这些倾向和其他倾向,反映它们在整个人格中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的发展过程。

注 释

- [1] 本章由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所撰。
- [2] 这种情况已为各种公开的民意调查和报告所证实,尽管综合的和严格的数据尚嫌不足。本研究得到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 [3] 最小的项目平均分为 2.5。由于各种研究业已表明大学生要比一般民众更少偏见,因此,也许应当为大学生团体确定这个数字。对于本研究中的其他团体而言,许多项目平均分均偏高。
- [4] 虽然没有获得所有项目的标准差,但仍可表明(团体人数 = 100 ~ 150)低分者和高分者平均分之间差异的标准误几乎不会超过 0.5,极少低于 0.25。因此,根据临界比(critical ratio)1.0 以上的分辨力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尽管分布部分地重叠,平均数却是不同的。
- [5] 虽然对这个团体来说,项目之间的相关或每个项目和整个量表之间的相关还没有计算过,但是相似量表的后来数据提示,平均的项目间相关约 0.4,每个项目和余下项目之和的平均相关约 0.6(参见第四章)。
- [6] 人们常常认为,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教育是反犹太主义的主要原因,因此它被视作是一种“宗教偏见”的形式。至少在本研究的团体里,宗教立场上的拒绝并不经常发生。从反犹思想的概括性和非理性角度上讲,显然涉及各种谴责,而且使一个特定的个体接受反犹太主义的那种潜在的敌意也有许多原因。关于偏见方面宗教作用的讨论请参见第六章和第十八章。
- [7] 以此形式呈现的其他量表,将在后面几章讨论。这些量表涉及一般偏见(黑人、其他少数民族、爱国主义)、政治—经济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潜在的反民主人格倾向。它们总共有 78 个项目。该问卷像

其他所有问卷一样,额外地包含了探讨团体成员资格、人格等其他一些问题。

- [8] 该量表的信度与冗长的问卷中获得的那些数据相似,这一事实反驳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后者的高信度是由于对所有否定项目的“定势”(set)。
- [9] 这一假设得到有关人格倾向的问卷和临床材料的支持(与怀有偏见的被试所说的“打听”和“进行分析”相反)。此外,在这个被试组里,高分被试要比低分被试更愿意接受访谈。
- [10] 我们要感谢当时执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G. H. 史密斯博士(Dr. G. H. Smith),感谢他的合作。这些结果尚未并入数据的主题中去,因为该组未被提供问卷的其余部分。
- [11]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研究只是一种心理学研究。社会学家(至少在社会科学发展的今天)倾向于沿着另一条平行的路线进行探索,因此,按照纯宗教的动机和纯经济的动机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是并不完善的。根据宗教或政治—经济的结构,以及它们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倾向的反犹太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在我们看来)既有效又有重大意义的。然而,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必须反对的是,把心理学机械地归入社会学的类目之下,把基本的经济的或宗教的社会力量与个体表面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动机相混淆。关于社会的力量,我们将在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中予以考虑。
- [12] 比较一下第十七章中描述的“掠夺者情结”(usurper complex)。
- [13] 关于建立犹太人自己国家的想法,尤其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问题,已经得到各种思想阵营的支持。在美国,许多支持来自公开的或假民主主义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定居在巴勒斯坦,同时,他们又害怕一俟巴勒斯坦的大门紧闭,美国将不得不向难民敞开大门。许多非反犹太主义者也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计划,但并不出于隔离和排挤的原因。一般说来,主要的民主推理是,应当存在一个地理的和政治的单位,在那里,犹太文化可以成为主要的文化,这样的(犹太人)国家应当成为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可以自由地定居在他们所选择的无论哪个国家里,而不要求完全同

化,或受到排挤的威胁。由于犹太团体像任何其他团体一样包含着思想和人格的多样性,因此在犹太人中间对此问题抱以许多不赞同的意见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本讨论中,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非犹太人。

第四章 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1]

现在,让我们转向偏见问题的讨论。这里的所谓“偏见”,是从广义上构想的。使用“偏见”这个术语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具有许多意义和内涵,它们会使指导本研究的思想变得模糊不清。“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个术语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它的传统意义更接近于本研究所涉及的内涵。该术语最早由萨姆纳(sumner)于1906年引进,并予以描述性的使用,其一般含义涉及地方主义或狭隘主义,意指个体身上以“民族为中心”的种族倾向,刻板地接受文化上“相似的东西”,并且拒斥文化上不相似的东西。

传统的民族中心主义概念(我们目前使用的概念就是由此派生出来的)通常被认为是对某个特定团体抱有厌恶感;可是,另一方面,本研究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则是意指相对来说一贯的思路,一般涉及“外来者”。人们在讨论团体的偏见时,经常借此提及“种族偏见”或者“种族的、宗教的、少数民族的偏见”。也有人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把“种族”的提法视做社会上有害的想法,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他们看来,许多团体[佐特风格者(zootsuiters,指某些爵士音乐迷的穿着风格,他们的服装上衣及膝,裤子窄小),美国流动农业工人,等等]之所以受到歧视,既不是由于种族原因,也不是由于宗教原因。民族中心主义一般涉及团体关系;它不仅与个体对某些团体怀有敌视的意见和态

度有关,而且还与个体对某些团体抱有积极倾向有关。

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理论为我们了解团体关系的心理学提供了基础——为什么个体之间倾向于竞争、对抗或和谐的相互作用等。该理论关注这样一些问题:个体对他们自己的团体和其他团体持哪种态度?哪些潜在的想法或主题贯穿于个体关于团体和团体关系的思想之中?这些思想如何发展?这些思想与个体关于其他社会过程和思想倾向如何联系?如果存在人格倾向的话,哪些人格倾向与上述思想有关?它们以何种方式相关?这些思想如何与阶层、教会、政党等社会因素相联系?

我们把“民族中心主义”这个术语的重点从“种族”转向“民族团体”。关于“种族”(race)这个术语的日常运用已在许多方面遭到批评。过去,曾有人提出过根据肤色来对人类进行分类;也出现过这样的人类学测量,即根据头形和血型来对人类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方法把人类分成不同的群体或人种,他们依照某些机体特征而被混合起来。于是,根据肤色标准,黑人与某种头形和血型混合起来。然而,除了强调机体分类方法之外,种族概念的最大危险在于它的遗传心理学含意,在于它对文化的误用。从心理学角度讲,种族理论暗示着,特定种族的人群(例如具有某种肤色的人种)在心理上也颇为相似,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遗传谱系。这种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引发了争论,该争论体现在心理学上关于“遗传与环境”问题的著述之中,以及文化人类学关于特定文化与心理变化的著述之中。此外,“种族”这个术语也常被用于原本不属种族问题的团体之中。有时,这个术语甚至用于国家,例如“德意志民族”,或者“美利坚民族”等。有时它被误用于与美国少数民族有关的民族之中,例如意大利人或希腊人。看来,除了“民族的”(ethnic)这一术语以外,似乎没有一个适当的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不具政治、地理实体的文化,包

括社交方式、体制、传统、语言等等。这种混淆远远超越了术语上的混淆,它们渗透进社会问题的思想之中,并对犹太人造成了损害;犹太人是民族团体的一个良好例证。这样的团体既非形式上的国家,也非一个种族。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概念不是种族和遗传,而是社会组织(国家的、地区的、亚文化的、社区的),以及社会形式与个体人格的相互作用。在任何一种文化团体中,如果发现心理特征相对一致的情况,则这样的一致性必须根据社会组织来解释,而不是根据“种族遗传”来解释。“民族团体”(ethnic group)这一概念的运用和发展(作为探讨个体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一种广义教育计划的组成部分),有助于澄清关于社会过程和问题的一些思想。

前面各章提出的思想概念,在这里也会加以利用。我们把民族中心主义界定为属于团体和团体关系的一种思想体系,并在内团体(ingroups)和外团体(outgroups)之间作出了区分。所谓内团体是指个体借此自居或认同的那些团体,而所谓外团体是指个体并不具有归属感的团体,或者认为是与内团体相对的团体。外团体是负面意见和敌意态度的对象;内团体是正面意见和支持态度的对象;一般倾向是,外团体应当在社会上屈从于内团体。

我们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已在第二章提出。这些问题涉及对于一个特定团体的思想包容性,以及评述团体时的思想定型(stereotype)。

有关研究已经揭示了个体关于内团体和外团体思想的一般原则(13、25、85、90)。萨姆纳在其人类研究中发现了这种一致性,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运动已经表明它们反对各种少数民族团体的一致倾向。许多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也已经用非技术性的和非量化的方法阐释了这种思想概念(21、69、72、

92、93、95、101)。在日常的讨论和闲聊中,人们均会遇到拒斥外团体的情况。

以往关于反犹主义的研究(71)已经发现了一致性的量化标志。反犹主义的不断增强程度可以用来表明反对工会和种族平等的程度,以及支持康林神父(Father Conghlin)的程度。大学女生联谊会的成员(她们倾向于拥有强烈的内团体思想)要比非联谊会成员具有更加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而那些与父母有着某种思想磨擦的被试(对那些强调内团体的家庭持批判态度的被试)比起那些没有这种磨擦的被试,具有较少的反犹主义倾向。

为了就第二章提出的问题获得更具结论性的答案以及精确原则和量化原则,我们认为,最佳方法是运用一种测量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见—态度量表。因此,首先需要建构该量表。它是以此样的方式来建构的,其统计特性和内部关系的分析有助于回答那些涉及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结构的主要问题。

一、民族中心主义(E)量表的构建

我们在构建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时所遵循的过程与构建反犹主义量表(第三章)时所遵循的过程是相同的。此外,鉴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利用了李克特(Likert)量表。所有项目都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对于讨论中的团体抱有敌意。最后我们遵循了项目阐述的一般规则。

(一) 主要的分类或领域:亚量表

亚量表被用来包含研究所涉及的全部领域,并对民族中心主义的某些关系予以统计分析。由于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涉及民族中心主义的一般原则,因此每个亚量表便需探讨不同的内

团体—外团体的关系。在每个亚量表中,我们还试图包含各种假民主(pseudodemocratic)的意见和态度,以及公开的反民主的意见和态度。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E量表)的最初形式并不包含有关犹太人的项目;也就是说,反犹太主义量表被分散地包含在问卷中,这样做有助于获得两个量表之间的相关。至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完整形式,也即包括有关犹太人项目的量表,将在本章的后述部分予以报告。

最初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由34个项目组成,安排在3个亚量表中,分别研究黑人,各种少数民族,以及爱国主义(超越国家的外团体)。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些内容。

1. 黑人

由于黑人是一个深受压迫的大型团体,由于“黑人”的意象在美国的文化神话中被精心编织,因此黑人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亚量表。在表4-1中呈现的12个项目,构成了黑人的亚量表(表中项目的编号是它们在整个量表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这些项目试图包括目前关于黑人和黑人—白人关系的主要思想。黑人被描述为懒惰的和无知的(项目5),而且实际上不想与白人平等相处(项目22:“由激进的煽动者挑起的问题”)。当黑人努力奋斗以争取较高的地位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即认为黑人是“天生”懒惰的,没有雄心壮志的)会不会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认为黑人应当“被置于原来的地位上”呢(项目34)?会不会仍然阻止黑人取得领导地位呢(项目11)?认为黑人应当被隔离的人(项目2、8、14)是否同样认为黑人是劣等民族,具有威胁性,从而赞成使黑人处于屈从地位呢?这些都是构成这一亚量表的一些问题,而统计结果至少应当提供对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

表 4-1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黑人亚量表(N)

2. 如果有许多黑人想在当地以有色人种为特色的舞厅中跳舞,那么安排该事的一个最佳办法是专门举办一个全部由黑人参加的晚会,这样白人就可以在其他时间安安稳稳地跳舞了。
5. 如果黑人不这样渎职、懒惰和无知,他们就有可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8. 有时,黑人乐师在摇滚乐和爵士乐方面与白人乐师一样棒,但是不能因此而专门组织一个黑人—白人的混合乐队。
11. 让黑人担任工头和领导来管理白人是一个错误。
14. 黑人对白人的文明可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最好让黑人呆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和学校里,以防他们与白人过多地接触。
16. 比起更加熟练或更需负责的工作来,体力劳动和下等工作似乎更加适合于黑人的脑子和能力。
19. 在由 1000 个白人和 50 个黑人组成的社区里,一个喝醉了酒的黑人开枪打死了一个试图逮捕他的白人警官。鉴于此,全体白人就应当将全体黑人逐出该社区。
22. 有些人提出,应将黑人置于与白人同等的地位,并给他们同样的特权,这些人事实上是一些试图挑起冲突的激进的煽动分子。
25. 在南方,偶然发生对黑人施以私刑的情况,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许多社区,为防止比例较高的黑人惹是生非,需要不时地对他们进行恫吓。
28. 最好把黑人限制在文法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教育水准上,因为更多的学校教育只会向他们提供他们在与白人竞争中得不到满足的野心和欲望。
31. 黑人身上有着某种天生不文明的东西,这可以在他们的音乐和攻击中看到。
34. 如果不对黑人加以约束的话,那么大多数黑人会变得十分傲慢,好管闲事,难以相处。

表 4-2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少数民族亚量表(M)

1. 许多政党总是混淆民族问题,增补选举的开支,引发不必要的骚动。鉴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除了两党之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4. 某些教派的信仰使其信徒不向国旗致敬,对此,应当强迫它们履行这种爱国举动,否则便取缔它们。
6. 对于任何一种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团体或社会运动,应当用怀疑态度予以监视,而且,只要有可能,联邦调查局应该出面进行调查。
9. 尽管武装部队和企业都需要妇女,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她们就应当立即回家,回到原本属于她们的特定岗位上去。
15. 如果允许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参与政府事务(包括选举等),则其中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天生有缺陷的和无能的人所占百分比比较高。
17. 允许日本人离开拘留营并参加军队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可能在军队里随心所欲地搞破坏活动。
21. 奥克拉俄马人(美国流动农业工人)的缺点在于,他们普遍难以相处,并纷纷涌入加利福尼亚州。这一事实证明,一旦条件许可,我们就应该把他们送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
24. 大规模的绝育制度是消灭罪犯的一种好方法,也是消灭我们社会中其他不良分子的一种好方法。这样方能提高我们的总体水平和生活条件。
27. 菲律宾人如果认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此处理生活,那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当他们穿着奢华,购买豪华轿车,并且与白种姑娘鬼混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越界了。
29. 佐特风格者的存在表明,当劣等团体获得过多的自由和金钱时,就会误用他们的特权,并不断制造麻烦。
30. 在大多数情况下,最邪恶、最不负责、最具诈骗性的工会是那些由外国人充当领袖的工会。
32. 我们把那么多钱花在罪犯、精神错乱者和天生无能者的教育上是不值得的。

2. 少数民族

第二个亚量表可参见表 4-2,该量表包含 12 个项目,分别讨论美国的各种少数民族团体(除了黑人和犹太人以外)。关于

这些少数民族团体,人们之间存在着许多负面的意见和意向,包括社会性屈从、社会作用的限制、隔离等。属于这些少数民族团体的还有一些组织良好的团体,如少数民族政党、宗教派别、社会运动和“接纳许多外国人”的工会;至于日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拉俄马人,以及菲律宾人^[2]也归入少数民族风格者、罪犯、神经错乱者、“天生无能的人”,以及“不受欢迎者”等行列,成了道德方面的少数民族或外团体,同样也成了负面意见和态度的对象。

如果说社会性偏见可能指向少数民族的话(这里的少数民族是就“少数”的意义而言的,也即与“多数”相反),那么人们也许会问,这样的偏见难道不会指向一个包括半数以上人口的团体吗?“蔑视公众”,妇女的从属地位等,被认为是这类民族中心主义的例子;项目9和15涉及这些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态度与其他项目的相关程度。认为“妇女的地位在家中”,这样的态度能不能算做是一种偏见?看来,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也持有其他一些明显地属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若要得出结论性的断言,还须详尽研究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和想法,并在民族中心的研究方法和非民族中心的研究方法之间作出定向。

3. 爱国主义

该亚量表(4-3)包含了10个项目,专门用来讨论国际关系,并把美国看做内团体,借此与作为外团体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里所用的“爱国主义”术语并不指“热爱国家”。确切地说,目前这个概念涉及盲目地依附于某些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毫无批判地与流行的团体方式保持一致,同时拒斥作为外团体的其他国家。因此,最好把它称做“假爱国主义”(psendopatriotism),以便与真正的爱国主义区别开来。在真正的爱国主义中,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价值观的依附,是以批判性理解为基

础的。看来,真正的爱国者应该能够理解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方式,真正的爱国者应该能够容许自己不能接受的许多东西。真正的爱国者既不受刻板的遵奉主义的支配,也不会去拒斥外团体,或鼓吹帝国主义性质的霸权。

表 4-3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爱国主义亚量表(P)

3. 对一个良好的公民来说,爱国主义和忠诚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7. 在这个世界上,将始终存在强国和弱国。为了考虑全体的利益,最好由强国来支配世界事务。
10. 各种形式的军训、服从和纪律,例如操练、行军和简单的命令,应当成为小学教育大纲的组成部分。
12. 在过去的50年里,对美国制度的主要威胁来自外来思想、外来教义和煽动者的渗透。
13. 目前,出于道德上或宗教上的考虑,我们对拒服兵役者和异己分子的处理太轻了。如果一个人不愿为自己的国家而战,那么他理应受到比坐牢或苦役更严厉的惩罚。
18. 鉴于目前国家的局势,政府工作的要职应当由土生土长的、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白人承担。
20. 欧洲难民需要帮助,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我们的移民政策。让他们大量涌入我们的国家将铸成大错。
23. 现在,很清楚,从种族角度讲,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具有战争头脑和谋权实力的。因此对未来的和平来说,有效的措施是消灭他们中的一些人,并将剩余的人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26. 墨西哥不可能达到美国文明和生活标准那样的先进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墨西哥人肮脏、懒惰和普遍的落后。
33. 战争将始终存在,因为总有这样一些民族不择手段地试图去攫取比它们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内团体的意见和态度在项目3、7和10中得到反映。这些项目试图表达服从和纪律的一般价值观,以及这样一种意见,即国家(民族)是按从强到弱的顺序来分级的,包括这样的态度,即认为强国应当居统治地位——假设是,美国属强国之一。对于

服从来说,价值观的定型是由这样的态度来表示的,即对那些拒绝服从的人采取惩罚措施(项目 13:出于道德上或宗教上的考虑,对那些拒服兵役者实施惩罚)。

把地理上遥远的一些国家视做弱国(项目 26),这种思想倾向进一步显示了国家内团体的荣耀感;把地理上接近的一些国家视做威胁(项目 12、20 和 23),显示了强国的支配感。这样一来,排斥难民在道德上就有充分理由了;至于“消灭”德国人和日本人,^[3]把外国人和其他人从政府部门中排除出去,以及让我们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等等,在道德上也都有充分理由了。对于和平的评价,以及从道德上把战争归因于“残忍的、掠夺的民族”,也表明了来自外国团体的威胁感和内团体的正义性。关于战争原因之理论,是许多大学生所持有的,他们根据社会经济组织和冲突来对此作出社会学解释,从而使这一事实派生出下列问题:在有些人身上,哪些内部障碍使他们不愿接受非道德的解释?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几章予以讨论,因为它涉及构成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基础的人格动力学。

如果在这个亚量表上得高分的人也在其他亚量表上得高分,那么他们尽管认为美国是优越的和不可侵犯的,但他们实际上排斥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项目 18 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土生土长的、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白人是可以信任的。“少数民族”亚量表的各个项目也表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被归入外团体的类别之中。

(二) 完整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E)

完整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即 E 量表),意在测量个体接受或反对整个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准备状况。量表由 34 个项目组成,^[4]并构成 3 个亚量表(黑人、少数民族和爱国主义)。该量

表如表 4-4 所示,附有给被试的指导语。

二、结果:量表的统计分析

让被试对每一项目进行 6 种选择回答,从 +3 到 -3,没有表示中立的答案。回答以同样方式转换成分数(-3=1 分,-2=2 分等),与反犹太主义量表的情况一样。所有项目均被认为是赞同民族中心主义的。对于 34 个项目来说,总分的范围可以从 34 分(每个项目 1 分,表示强烈的反民族中心主义)到 238 分(每个项目 7 分,表示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将总分除以 34,便可得到每个项目的平均分;因此,总分 51,表示每个项目的平均分为 1.5 分。

该量表是整个问卷实施的组成部分,而整个问卷还包括最初进行的反犹太主义量表(52 个项目)。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报告的那样,本问卷于 1944 年 4 月被提供给加利福尼亚大学普通心理学班。这里提供的数据是以 144 个女性被试的问卷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主要少数民族的 19 个成员。

表 4-4 完整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民意问卷(E)

下列陈述涉及人们对一些社会团体和问题的看法。关于这些问题,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则不同意。请在左边空档处按照你同意或不同意为每一陈述标上记号:

- | | |
|------------|-------------|
| +1:稍微支持、同意 | -1:稍微反对、不同意 |
| +2:中等支持、同意 | -2:中等反对、不同意 |
| +3:强烈支持、同意 | -3:强烈反对、不同意 |

1. 许多政党总是混淆民族问题,增加选举开支,并且引发不必要的骚动。鉴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如果除了两大政党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那确是一件好事。

-
- __ 2. 如果有许多黑人想在当地以有色人种为特色的舞厅中跳舞,那么安排此事的一个最佳办法是专门举办一个全部由黑人参加的晚会,这样白人就可以在其他时间安安稳稳地跳舞了。
 - __ 3. 对一个好公民来说,爱国主义和忠诚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 __ 4. 某些教派的信仰使其信徒不向国旗敬礼,对此,应当强迫它们履行这种爱国举动,否则便取缔它们。
 - __ 5. 如果黑人不这样懒惰和无知,他们就有可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 __ 6. 对于任何一种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团体或社会运动,应当用怀疑态度予以监视,而且,只要有可能,联邦调查局应该出面进行调查。
 - __ 7. 在这个世界上,将始终存在强国和弱国。为了考虑全体的利益,最好由强国来支配世界事务。
 - __ 8. 有时,黑人乐师在摇滚乐和爵士乐方面与白人乐师一样棒,但是不能因此而去组织一个由黑人—白人混合而成的乐队。
 - __ 9. 尽管武装部队和企业都需要妇女,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她们应当立即回家,回到原本属于她们的特定岗位上去。
 - __ 10. 各种形式的军训、服从和纪律,例如操练、行军和简单的命令,应当成为小学教育大纲的组成部分。
 - __ 11. 让黑人担任工头和领导来管理白人是一个错误。
 - __ 12. 在本世纪,对美国制度的主要威胁来自外来思想、外来教义和煽动者的渗透。
 - __ 13. 目前,出于道德上或宗教上的考虑,我们对拒服兵役者和异己分子的处理太轻了。如果一个人不愿为自己的国家而战,那么他理应受到比坐牢和苦役更严厉的惩罚。
 - __ 14. 黑人对白人的文明可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最好让黑人呆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和学校里,以防他们与白人过多地接触。
 - __ 15. 如果允许所有人都能充分参与政府事务(包括选举等),则其中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天生有缺陷的和无能的人所占百分比比较高。
 - __ 16. 比起更加熟练或更需负责的工作来,体力劳动和下等工作似乎更加适合于黑人的脑子和能力。
 - __ 17. 允许日本人离开拘留营并参加军队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可能在军队里随心所欲地搞破坏活动。
 - __ 18. 鉴于目前国家的局势,政府工作应当由土生土长的、信奉基督教的美白人来承担。
 - __ 19. 在由 1000 个白人和 50 个黑人组成的社区里,一个喝醉了酒的黑人开枪打死了一个试图逮捕他的警官。鉴于此,全体白人就将全体黑人逐出该社区。
-

-
- __ 20. 欧洲难民需要帮助,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我们的移民政策。让他们大量涌入我国将铸成大错。
 - __ 21. 奥克拉俄马人(美国流动农业工人)的缺点在于,他们普遍难以相处,并纷纷涌入加利福尼亚州。这一事实证明,一旦条件许可,我们应当把他们送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
 - __ 22. 有些人提出,应将黑人置于与白人同等的地位,并给他们同样的特权,这些事实上是一些试图挑起冲突的激进分子。
 - __ 23. 现在,很清楚,从种族角度讲,德国人和日本是具有战争头脑和谋权实力的。因此,对未来的和平来说,惟一有效的措施是消灭他们中的一些人,并将剩余的人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 __ 24. 大规模的绝育制度是一种消灭罪犯的好方法,也是消灭我们社会中其他不良分子的好方法。惟有这样,方能提高我们的总体水平和生活条件。
 - __ 25. 在南方,偶尔发生对黑人施以私刑的情况,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许多社区,为防止比例较高的黑人惹事生非,需要不时地对他们加以恫吓。
 - __ 26. 墨西哥不可能达到美国文明和生活标准那样的先进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墨西哥人肮脏、懒惰和普遍的落后。
 - __ 27. 菲律宾人如果认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此处理生活,那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当他们穿着华丽,购买豪华轿车,并且与白种姑娘鬼混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越界了。
 - __ 28. 最好把黑人限制在文法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教育水准上,因为再多的学校教育只会向他们提供他们在与白人竞争中得不到满足的野心和欲望。
 - __ 29. 佐特风格者的存在表明,当劣等团体获得过多的自由和金钱时,就会误用他们的特权,并不断制造麻烦。
 - __ 30. 在大多数情况下,最邪恶、最不负责、最具诈骗性的工会是那些由外国人充当领袖的工会。
 - __ 31. 在黑人身上有着某种天生不文明的东西,这可以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中,以及对别人的攻击中。
 - __ 32. 我们把那么多钱花在罪犯、精神错乱者和天生无能者的教育上是不值得的。
 - __ 33. 战争将始终存在,因为总有这样一些民族不择手段地攫取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 __ 34. 如果不对黑人加以约束的话,那么大多数黑人会变得十分傲慢,好管闲事,难以相处。
-

(一) 信度

表 4-5 提供了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信度和相关统计数据,包括亚量表的数据。

表 4-5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及其亚量表的信度

特 性	完整的民族 中心主义量表	黑人	亚量表 少数民族	爱国主义
信度 ^a	0.91	0.91	0.82	0.80
项目数	34	12	12	10
平均分(总) ^b	3.17	2.72	3.32	3.53
平均分(奇数一半)	3.02	2.65	3.23	3.88
平均分(偶数一半)	3.32	2.78	3.40	3.18
标准差(总) ^b	1.15	1.25	1.21	1.26
标准差(奇数一半)	1.17	1.25	1.37	1.26
标准差(偶数一半)	1.21	1.42	1.28	1.46
区 间 ^b	1.2~5.6	1.0~5.6	1.0~6.0	1.0~6.1

a. 每个量表裂半的信度是通过将奇数项目的分数之和与偶数项目的分数之和相关而获得的,并用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 Brown)公式对这个数值进行纠正。

b. 平均分、标准差和区间是按照本讨论中量表或亚量表的每个项目的平均分来提供的。若将这个值乘以量表或亚量表中的项目数,就可以转化成平均总分。

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裂半信度为 0.91,这一数值满足了可以接受的统计标准。^[5]奇数和偶数的各半在下列意义上大致相当,即它们包括来自 3 个亚量表的相等数目。奇数占半的

较低平均数看来是由于低平均分的黑人项目的略微加权。获得的区间涵盖大多数可能的区间,例外在于极高的一端。相对来说较低的团体平均分(3.17)也表明极高分的缺乏(极高分是指每个项目超过 6 分的平均数),这是与每个项目的中间分为 4 分相比较而言的。分数的分布十分对称,平均分把区间一分为二,中位数是 3.2。但是分布形态呈宽平状,平均分周围聚集极小的分数。

亚量表的高信度值得注意,尤其是在每个亚量表的项目并不多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信度。因此,根据信度、两个占半的相等,以及分布的形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及其亚量表提供了正确的测量工具。在量表是有效的这一意义上说,以其普遍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对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可以这样认为,个体的得分越高,他接受民族中心主义宣传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参与民族中心主义的谴责,并实施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倾向也就越强烈。

(二) 亚量表之间的相关

信度数据支持下列假设:存在一种被称做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可以根据人们接受还是拒绝这种思想的强度来对他们进行分级。对这一假设的支持可由亚量表之间的显著相关来提供,如表 4-6 所示。

亚量表的相关(区间从 0.74~0.83)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包含着处理团体和思想的一些项目,这一事实表明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心理的框架,一个人对诸如黑人这样一种团体的立场,与他对团体关系中大多数问题的立场,在方向和程度上多少有些相似。

表 4-6 民族中心主义亚量表之间的相关,以及与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a 的相关

	黑人	少数民族	爱国主义	整个量表
黑人	—	0.74	0.76	0.90
少数民族	0.74	—	0.83	0.91
爱国主义	0.76	0.83	—	0.92

a. 这些都是原始的相关系数。如果为了减微而对它们进行纠正,以便提供理论上可获得的最大值(用完全可信的工具),它们都将是 0.9 或 0.9 以上。

每个亚量表与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之间的相关从 0.90 ~ 0.92,由此可以得出同样的论点:在任何一个亚量表上,从一个人的得分可以预测他在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分数。或者,换一种说法:由于差不多每个被试在对个别项目的回答中总会表现出某种变化(正如下面所示),因此每个被试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亲民族中心主义或者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亲”或“反”的态度在不同的团体或团体类型之间相对来说是一致的。对外团体的民族中心主义敌意与对内团体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是显著相关的。

(三) 内部一致性:个别项目的统计

项目分析的作用,以及项目分析的过程,已经在前面一章讨论过了。关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项目分析,其数据在表 4-7 中列出。每个项目用一个关键词或短语来表示,字母 N、M 和 P 是指黑人、少数民族和爱国主义的亚量表。我们已经知道,分辨力(D.P.)等于高四分位数平均数减去低四分位数平均数。当然,整个团体平均分是以所有 4 个四分位数为基础的。

一般说来,表 4-7 中的分辨力(D.P.)平均为 2.9,这是十分令人满意的。^[6]对于 34 个项目来说,5 个项目的分辨力超过 4.0,13 个项目的分辨力在 3.0 ~ 3.9 之间,10 个项目的分辨力在 2.0 ~ 2.9 之间,3 个项目的分辨力在 1.0 ~ 1.9 之间,3 个项目的分辨力小于 1.0。此外,有 6 个项目的分辨力小于 2.0,团体平均分小于 3.0,因此分辨力看上去更具意义。^[7]

3 个最低分辨力的项目是 19、25 和 28,它们都属“黑人”亚量表,团体平均分小于 2.0。这一低平均分表明,差不多所有被试都一致地表示不同意。此种结果是可以期望的,因为这些项目是明显地倾向于暴力和压抑的:黑人应当被逐出社区,施以私刑,继续处于无知和剥夺教育的状态。但是,这些数据也表明了三种程度的同意和三种程度的不同意的优点,它们反映在得高分的被试对公开的反民主计划的接受上。在 36 个低分者中间只有一个被试以 -2 作了反应(对项目 28),对所有 3 个项目的所有其他回答均为 -3(低平均分为 1.00)。另一方面,在 3 个项目的每一个项目上,高的四分位数具有 1.8 的平均分;差不多有半数以 -2 或 -2 以上作出反应。人们也许会问,这是否表明了法西斯主义曾经猖獗一时的时期,存在一种潜在的反应。当然,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者并非全都容易接受激进的反民主思想;它取决于更为深层的心理力量,该力量作为民族中心主义的终极,倾向于潜在地接受或反对法西斯主义。

项目分析表明,黑人、少数民族和爱国主义亚量表对整个量表的高低四分位数的分化作出了同等的贡献,平均分辨力分别为 3.0、2.9 和 3.1。撇开上面讨论过的项目 19、25 和 28,黑人项目具有显著分辨力。正如整个量表所测量的那样,民族中心主义者和反民族中心主义者可以清楚地根据包含在黑人项目中的大多数思想来加以区分。低四分位数的平均分,均小于 2.0,表

明低得分者极少同意这些项目,甚至强烈地表示不同意。可是高得分者的立场并非如此坦率;他们的反应处于-1~+2的区间内;但是,“同意”的频数却超过了“稍微不同意”的频数。

表 4-7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目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序 列	项 目	平 均 分			整个团体 的平均分
		高四分 位 数	低四分 位 数	分辨力	
1.	(M:政党)	3.72	2.17	1.55	2.85
2.	(N:跳舞)	6.17	1.97	4.20	4.04
3.	(P:爱国主义)	6.48	3.86	2.62	5.21
4.	(M:教派)	5.08	1.61	3.47	3.26
5.	(N:懒惰)	3.10	1.53	3.19	3.19
6.	(M:外来团体)	4.50	1.69	2.81	3.02
7.	(P:强国)	3.67	1.25	2.42	2.54
8.	(N:乐队)	5.08	1.25	3.83	2.77
9.	(M:妇女)	5.86	3.75	2.11	4.76
10.	(P:军训)	5.06	2.47	2.59	3.83
11.	(N:工头)	6.05	1.69	4.36	3.99
12.	(P:逃避兵役者)	4.64	1.44	3.20	2.90
13.	(N:呆在社区)	6.33	1.72	4.61	4.08
14.	(M:选举)	5.06	2.33	2.73	3.71
15.	(N:下等工作)	5.22	1.58	3.64	3.17
16.	(M:军队中的日本人)	5.86	1.92	3.94	3.87
17.	(P: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	4.75	1.08	3.67	2.80
18.	(N:逐出社区)	1.86	1.00	.86	1.26
19.	(P:难民)	6.39	3.50	2.89	5.28
20.	(M:流动农业工人)	5.39	1.81	3.58	5.70

序 列	项 目	平 均 分			整个团体 的平均分
		高四分 位 数	低四分 位 数	分辨力	
21.	(N:煽动者)	4.53	1.08	3.45	2.51
22.	(P:日本人和德国人)	5.28	1.50	3.78	3.07
23.	(M:绝育)	3.11	2.03	1.08	2.71
24.	(N:私刑)	1.81	1.00	.81	1.32
25.	(P:墨西哥)	3.69	1.06	2.63	2.15
26.	(M:菲律宾人)	5.64	1.22	4.42	3.68
27.	(N:文法学校)	1.86	1.03	.83	1.30
28.	(M:佐特风格者)	5.58	1.39	4.19	3.62
39.	(M:有外国人的工会)	4.08	1.17	2.91	2.42
30.	(N:天生不文明)	3.72	1.17	2.55	2.42
31.	(M:花钱不值得)	3.22	1.53	1.69	2.20
32.	(P:始终有战争)	5.89	2.64	3.25	4.37
33.	(N:变得傲慢)	4.70	1.06	3.69	2.67
平均分:总量表		4.70	1.73	2.97	3.17
亚量表:黑人		4.34	1.34	3.00	2.72
亚量表:少数民族		4.76	1.89	2.87	3.32
亚量表:爱国主义		5.07	2.00	3.07	3.53

人数:整个团体=144;高四分位数=36;低四分位数=36

分数区间:整个团体=1.2~5.6;高四分位数=4.2~5.6;低四分位数=1.2~2.2

在少数民族亚量表上平均分有点高,但是,暂且不管所描述的团体的多样性,高低得分者在大多数项目上明显分化。3个少数民族项目(1、24、32)得到3.0以下的团体平均分,而分辨力在1.1~1.7之间。这些分辨力表明了统计上有意义的倾向,但

却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分化。高得分者显然没有赞同下述项目中的建议——对少数民族政党加以迫害(也许因为这些政党并没有被描述成不道德的或具有威胁性的,但是,对教派的迫害在项目4中却被接受)——对不受欢迎的人施以绝育处理,把钱花在罪犯、精神错乱者、“天生无能者”的教育上不值得。“妇女的岗位在家里”,这种主张显然被大多数妇女所接受(项目9;平均=4.76)。当然低四分位数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平分的,但高得分者明确地赞成它;2.1的分辨力显然是有意义的。人们也许会怀疑这个项目是否与男子中间的民族中心主义有关。在这个亚量表中,最具分辨力的项目涉及各种团体:教派(项目4)、外来思想(项目12)、日本人(项目17)、涌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拉俄马的流动农业工人(项目21)、菲律宾人(项目27)、佐特风格者(项目29)。

像其他亚量表一样,爱国主义亚量表也区分了高分和低分的得分者,并对各种团体进行了同样程度的区分。分辨力的区间为2.42~3.78,平均分辨力为3.07。对项目的基本假设再次被实体化,也即证明有根据。其他民族(一般说来是指日本人、墨西哥人、难民和“弱国”)被认为是落后的、不道德的、具有威胁性的。美国民族的优越性证实了其他民族的破坏性和屈从性。对内团体的屈服和顺从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惩罚的态度——它明显地是针对国外和国内的外团体的——指向拒服兵役者。项目33涉及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它具有高度分化性(分辨力=3.25),这一现象是有趣的。看来,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以及团体之间的敌对态度,构成了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而且,除了确信内团体居于统治地位外,别无他法。

(四)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第二种形式(问卷78)

为了符合简洁的策略,压缩已有的问卷,以便将新的技术包括在内(这些新的技术可能扩大研究的领域),我们将原始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34个项目)在接下来的问卷中压缩成14个项目,也即问卷78。这份问卷已在第三章中得到充分的描述,包括4个亚量表,总共78个项目被随机地分布在单一的系列里。修订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在表4-8中呈示。

指导语的一般规则与前面描述过的反犹主义量表的规则是一样的。统计的正确性对保留一个项目来说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认为,项目必须具有涵盖面,并保持思想的意义。有些项目的措词作了修改,目的是为了更加简洁。原始问卷的项目9提出“妇女的岗位在家里”,现在的项目34对此作了修改,以便改善其分辨力。鉴于情况的变化,原始项目17(即反对日裔美国人进入军队)在新问卷中改为项目64,内容也改为反对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去。

在压缩的问卷中有4个新项目。项目4为反对歧视性立法;这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正面的民族中心主义项目,也就是说,在这一正面的项目中,对表示同意的被试给予低分。项目25是一个“爱国主义”项目,目的是既向公开的闭关自守者呼吁,又向伪国际主义者呼吁,他们在或多或少接受世界组织的想法的同时,试图保持的美国主权完整性和全面的控制力。项目41取代了若干先前项目,目的是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内团体表示一种不加批判的理想化关系。最后,项目51是指道德上的外团体;它提示不道德是我们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不仅仅是一种征候,而且它还含蓄地包括了反对不道德者的一种惩罚态度,尽管尚未明显提出惩戒的行动。该项目在“好人”和“坏人”

表 4-8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第二种形式(问卷 78)

旧序号	新序号 ^a	
—	4.	应当把一切种族的和宗教的歧视都视做是非法的,并且予以惩罚。
29.	7.	佐特风格者的存在表明,当劣等团体获得过多的自由和金钱时,就会误用他们的特权,不断制造麻烦。
12.	18.	在本世纪,对美国制度的主要威胁来自外来思想、外来教义和煽动者的渗透。
—	25.	既然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建立起来,美国必须明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应丧失任何独立和完整的权力。
14.	29.	黑人有他们的权利,但是最好让黑人呆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和学校里,以防他们与白人过多地接触。
9.	34.	如果妇女参加工作的话,她们应当进入女性化的岗位,例如护理、秘书或儿童照料工作。
5.	37.	如果说黑人生活得并不理想,这是因为他们天生懒惰、无知和缺乏自控力。
—	41.	美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却使我们接近人类可能达到的完美社会。
11.	45.	让黑人担任工头或领导来管理白人是一种错误。
23.	48.	为了实现未来的和平,应当尽可能消灭一些德国人和日本人,并将其余的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
—	51.	如果把不道德的、腐败的和有缺陷的人从我们身边赶走,那么我们的许多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15.	54.	如果允许所有人都充分参与政府事务,则其中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天生有缺陷的和无能的人所占百分比比较高。
22.	57.	有些人提出,应将黑人置于与白人同等的地位,并给他们同样的特权,这些人事实上是一些试图挑起冲突的激进分子。
17.	64.	不论日本人是否是公民,不应当让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去。

a. “新序号”是指问卷 78 中项目的数码。“旧序号”是指前面讨论过的最初问卷的项目数码。有若干项目的措词已作了些许的改动。

之间进行的传统区分值得注意——“坏人”实际上是“好人”不幸

的原因。这种思想方法包括在项目 54 中,表现为“蔑视群众”。

原始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中的 3 个亚量表,在新的问卷中也按比例得到反映。有 4 个黑人项目(29、37、45、57),4 个爱国主义项目(18、25、41、48),6 个少数民族的项目(4、7、34、51、54、64)。

我们从前面一章可以看到,问卷 78 于 1945 年春天向 4 个群体开展调查,它们是:演说班女生(人数 = 140)、演说班男生(人数 = 52)、心理学班女生(人数 = 40),以上均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第四组为职业妇女(护士、社会工作者、教师,人数 = 63)。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78)的信度数据在表 4-9 中列出。

表 4-9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78)的信度

特 性 ^a	团 体 ^b				总体 ^c
	A	B	C	D	
信度	0.80	0.74	0.80	0.88	0.80
平均(总)	3.44	3.33	3.68	2.72	3.29
平均(奇数一半)	3.36	3.11	3.68	2.56	3.18
平均(偶数一半)	3.55	3.52	3.68	2.87	3.40
标准差(总)	1.07	1.04	1.13	1.21	1.11
标准差(奇数一半)	1.16	1.12	1.29	1.22	1.20
标准差(偶数一半)	1.15	1.18	1.25	1.37	1.24
人数	140	52	40	63	295
区间	1.4~5.9	1.2~5.9	1.2~6.1	1.0~5.9	1.0~6.1

a. 平均值、标准差和区间按照每个项目的平均分来提供。如果乘以 14(项目数),它们就转换成代表每个人总的量表分的值。

b. 这些数据所依据的 4 个团体是:A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B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C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班女生;D 组:职业妇女。

c. 在获得总体平均分,个别团体平均分不因人数而加权。

根据对个体的精确测量,平均信度 0.80 处于较低的水平,但

是对于团体比较,以及为之而利用的相关分析,都是相当令人满意的。^[8]这也许是简短的量表可以期望的一切了。但是,随着排除了分辨力很差的项目,或者给以适当的修改,而且,由于缺乏极端的高分者(限制“天才区间”),致使在这些群体中出现降低信度的情况,这一事实也提出了改进的希望。正如在反犹主义量表那样,职业妇女获得了最低平均分和最高信度,从而成为最无偏见的、最具一致性的团体(在两个量表上)。一般来说,所有4个群体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和区间表明,他们对民族中心主义稍微不同意,许多人表示反对,极少有人表示强烈支持。

表4-10呈示了量表的项目分析。对于这样的量表来说,平均分辩力2.90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只有一个项目的分辨力小于2.1,即便是在最低水平的统计意义上处理这一项目(项目4)。正如原始的较长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那样,本调查的一些项目探讨了对黑人的隔离和迫害,反对“外来的渗透”和佐特风格者,意欲“消灭德国人和日本人”等等,这些项目具有高分辨力。4个新项目中有2个项目也具代表性:项目25把美国主权放在世界组织之上,按照总的分辨力,排行为4;项目41在“美国方式”的理想化方面表示了民族中心主义的保守主义,按照总的分辨力,排行为7。

也有若干项目为最差的项目,它们只在原始的问卷中相当成功,但是为了问卷78,对它们作了修改。因此,项目34认为妇女应当局限于“女性岗位”上,例如护理工作,这在14个等级中排行12。有趣的是,妇女团体(表4-10中的A、C、D)不同意这一项目,获得的平均分仅为1.9~2.7,而大学男生团体则表示了稍稍同意的倾向,平均分为4.4。尽管男性和女性的分辨力相似,但女性的分辨力在统计上更具意义,因为她们的平均分要低得多。看来,民族中心主义的妇女至少在表面上更加倾向于

传统的女性形象,非民族中心主义的妇女则主张解放妇女,无论在职业方面抑或在其他方面,均把妇女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虽然这一关系并不完美,但是数据表明,在两个团体中存在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不同思想模式。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几章将予以充分地探讨。

对项目37和54试图进行修改,但未获成功。项目37声称黑人要对他们自己的贫穷负责,这样的措词显然过分激烈,以至于未能获得很多赞同(平均分=1.92)。低的平均分表明,2.16的分辨力是很有意义的;在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之间极少重叠。得低分者几乎倾向于一致的强烈反对(-3),而得高分者一般说来只是稍微的不同意(-1)。与此相似的是,项目64(不让日本人返回加利福尼亚)相对来说分辨力较低(2.7),而2.2的平均分可能会更高些,要是该项目被提供一种假民主的色彩,则它就可能允许民族中心主义者在对该项目表示同意时有着更多的道德上的依据。项目54在指出群众主体“天生有缺陷和无能”时,对民族中心主义产生了更加模棱两可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被试分化均衡,2.7的分辨力既表示高低四分位数之间的显著差别,也体现了得低分者的同意和得高分者的不同意。

在4个全新的项目中,有2个项目的分辨力较低。项目51认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消灭“坏人”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改变潜在的社会力量和制度来解决),其分辨力为2.3,排行11,表明高低四分位数之间有着明确的差别,但也隐含着许多例外。

最差的项目分辨力只有1.5,其序号为4(认为歧视是非法的)。被试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分化,相对来说很少有人愿意用任何一种方式采取极端立场。职业妇女在这个项目上的平均分为4.1,与她们的量表平均分2.7相比,表明194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公正雇佣法律”(公民投票)并未得到大力支持。从访谈中

表 4-10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目(问卷 78)的平均数和分辨力^a

序号	项目	A 组 平均分辨力	B 组 平均分辨力	C 组 平均分辨力	D 组 平均分辨力	总体 ^b 平均分辨力	分辨力 排行					
4.	(歧视是非法的)	3.99	0.17	3.44	2.29	4.30	1.45	4.06	2.12	3.95	1.51	(14)
7.	(佐特风格者)	3.73	3.94	3.29	2.93	3.58	4.07	2.90	5.12	3.38	4.02	(1)
18.	(外来思想)	3.36	3.01	3.69	2.15	3.32	3.95	2.30	3.92	3.17	3.26	(5)
25.	(世界组织)	4.89	2.76	3.90	3.35	5.60	2.29	4.02	4.74	4.60	3.28	(4)
29.	(黑人有权利)	3.69	4.54	3.12	3.29	4.52	4.04	2.30	4.12	3.41	4.00	(2)
34.	(女性岗位)	2.66	1.89	4.42	2.36	2.00	1.91	1.89	2.57	2.74	2.18	(12)
37.	(黑人懒惰)	2.06	2.85	1.75	1.86	2.35	2.34	1.50	1.60	1.92	2.16	(13)
41.	(美国方式)	4.11	3.76	3.60	3.58	5.28	3.54	4.33	3.98	4.34	3.05	(7)
45.	(黑人工头)	4.26	3.76	3.60	3.58	5.28	3.54	3.21	3.06	4.09	3.48	(3)
48.	(德国人,日本人)	2.49	2.27	2.56	2.00	2.90	4.72	2.03	3.33	2.50	3.08	(6)
51.	(迁走腐败的人)	3.59	2.70	3.37	1.50	3.22	1.95	2.43	3.21	3.15	2.34	(11)
54.	(群众无能)	4.44	2.44	4.33	1.86	3.95	3.11	3.17	3.22	3.15	2.34	(10)
57.	(激进的煽动者)	2.51	2.52	2.75	2.21	2.98	3.65	2.14	3.05	2.60	2.86	(8)
64.	(加州无日本人)	2.52	2.96	2.46	2.93	2.25	1.87	1.75	3.00	2.24	2.69	(9)
	每个项目平均	3.45	2.73	3.31	2.53	3.68	2.97	2.72	3.36	3.29	2.90	

a. 这些数据依据的 4 个团体是:A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人数 = 140);B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人数 = 52)。C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班女生(人数 = 40);D 组,职业妇女(人数 = 63)。

b. 在获得总体平均分时,个别组的平均数未因人数的加而加。

得悉,许多强烈地反对民族中心主义的被试——他们清楚地认识歧视在维持内团体—外团体冲突中的关键作用——就他们不愿意好战地反对歧视的意义上说,他们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者。关于这一观点的心理原因,将在后面几章加以讨论。

为使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78)更适合于调查意向,应该根据上述的讨论予以修正。这种修正必须考虑到现在将要讨论的相关问题,也就是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与反犹太主义量表的相关性。

三、民族中心主义所包含的反犹太主义

我们在本章开篇中说过,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并不包括任何犹太人的项目。更加确切地说,反犹太主义量表是整个问卷的独立组成部分。现在我们要考虑这两个量表之间的相关。

最初的问卷于 1944 年向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班女生进行调查,包括反犹太主义量表的 52 个项目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 34 个项目。反犹太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及其亚量表)的相关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反犹太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最初的问卷)^a 之间的相关

反犹太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亚量表			
	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黑人”	“少数民族”	“爱国主义”
	0.80	0.74	0.76	0.69

a. 这些量表的信度如下:反犹太主义量表 = 0.92;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 0.91;“黑人” = 0.91;“少数民族” = 0.82;“爱国主义” = 0.80

民族中心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的 0.80 相关允许我们在民族中心主义的概念方面作出进一步拓展。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亚量表之间的 0.69 ~ 0.76 相关只是稍低于民族中心主义亚量表之间的 0.74 ~ 0.83 相关(参见上述第三节)。这些数值再次表明了民族中心主义研究方法对团体关系的一般影响。看来,反犹主义可以被视做这种广义的心理框架的一个侧面;正是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而非对任何一个团体的偏见,才是需要予以解释的。反犹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亚量表之间的相关稍为低一些(这是与民族中心主义亚量表之间的相关相比较而言的),这一事实可能部分由于反犹主义分数压缩了的区间(缺乏极高分);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即除了那些对一般民族中心主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外,还存在某些特殊的决定因素。

在问卷 78 中,反犹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之间的相关(见表 4-12 所反映的内容),提供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进一步标志。比起表 4-11 中获得的 0.80 相关,表 12 平均相关 0.68 要低一些。这一差别部分是由于压缩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降低了信度。不过,它再次提示,反犹主义是广义的民族中心主义模式的一个侧面,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决定因素。

表 4-12 反犹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问卷 78)之间的相关

小组	人数	相关
演说班女生	140	0.71
演说班男生	52	0.75
心理学班女生	40	0.63
职业妇女	63	0.63
平均 r^a	295	0.68

a. 平均 r 没有因人数而加权,也未基于 Z_r 。

(一)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第三种形式(问卷 60)

反犹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78)之间的关系(尽管还不完善),在构成问卷 60 的过程中,被压缩成包括 12 个项目在内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这个量表如表 4-13 所示,包含 4 个反犹主义项目(8、21、38、47),3 个黑人项目(14、28、42)和 5 个探讨少数民族和爱国主义的项目。同样,项目措词也作了相应修改,目的是为了简明扼要。项目的选择同样基于统计的适当性和理论的重要性。其中有 2 个项目(42、55)被包括进去了,尽管它们在先前的测量中具有低平均分和低分辨力,但由于它们表示了重要的思想,所以仍包括在问卷之中,至于平均分和分辨力,我们期望在某些测试的团体中会上升。项目 59(“奥克拉俄马的流动农业工人”)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中得以再现。

1. 研究的团体

问卷 60 于 1945 年夏向下列团体实施调查:(1) 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夏季班学生(我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人在那儿担任教学工作)。(2)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学夏季班学生。^[9]俄勒冈学生差不多正值大学生年龄,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班的学生年龄有点偏大(大约 25 ~ 45 岁)。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教师,尽管也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人。(3) 俄勒冈大学附近的男子服务俱乐部(基瓦尼斯、狮子、旋转等俱乐部)。

为了从男性和女性中分别获得数据,鉴于统计的目的,将上述团体先分开后结合。第一个俄勒冈大学班有足够的女生,可以形成一个统计组(第一组,人数 = 47)。可是,第二个俄勒冈大学班人数太少,难以分成适合统计的男生和女生小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情况亦如此。相应地说,第二组包括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

尼亚大学女生的结合(人数 = 54),第三组是男生的结合(人数 = 57)。最后,第四组涉及俄勒冈男子服务俱乐部成员(人数 = 68)。

表 4-13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第三种形式(问卷 60)

3. 佐特风格者的存在表明,当这种类型的人获得过多的金钱和自由时,他们就会加以滥用,并不断制造麻烦。
8. 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结帮谋利,在竞争过程中不给他人以公平的机会。
14. 黑人有他们的权利,但是最好让黑人呆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和学校里,以防他们与白人过多接触。
21. 我几乎无法想像自己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
28. 让黑人担任工头和领导来管理白人是一个错误。
33. 既然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建立起来,美国必须明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应丧失任何独立和完整的权力。
38. 一般而言,犹太人是十分相似的。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例外。
42. 犹太人之所以生活得很差,主要是因为他们天生懒惰、无知和缺乏自制力。
47. 如果让犹太人进入良好的居民小区,他们会逐渐在该小区营造典型的犹太氛围。
51. 在过去的 50 年间,美国所面临的最为糟糕的问题是外来的思想和煽动者。
55. 不论日本人是否是公民,都不应当让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去。
59. 最近,奥克拉俄马的流动农业工人大批涌入加利福尼亚州,为了全民的利益,应该尽快把他们送回老家去。

2. 信度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60)的信度数据如表 4-14 所示。对于所有 4 个小组来说,信度范围从 0.82 ~ 0.88,平均为 0.86,根据目前的可接受性标准,这是完全合适的。获得的分数包括大多数可能的区间(1.0 ~ 7.0),例外是极高分的一端;还有少数超过 6.0 的分数。团体平均分在中间分 4.0 以下,该平均分表明,低分略占优势。

各组之间的差异引人注目。最高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可从俄勒冈男子服务俱乐部看出。他们的平均分 3.55 比大学男生获得的最低平均分 2.96 显著要高(高出一个百分点)。我们注意到,男子服务俱乐部在其分数区间(1.3 ~ 5.8)和内部变化(标准差 = 1.11)方面也是比较集中的;这就是说,它的成员倾向于聚集在中间位置,这样一来就很少有极端高分或极端低分的得分者了。

表 4-14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60)^a 的信度

特 性	组				总体
	I	II	III	IV	
信度	0.88	0.88	0.86	0.82	0.86
平均分(总)	3.43	3.25	2.96	3.55	3.30
平均分(奇数一半)	3.48	3.24	2.95	3.72	3.35
平均分(偶数一半)	3.38	3.26	2.97	3.43	3.26
标准差(总)	1.38	1.29	1.26	1.11	1.26
标准差(奇数一半)	1.63	1.77	1.38	1.21	1.50
标准差(偶数一半)	1.30	1.53	1.23	1.17	1.31
人数	47	54	57	68	226
区间	1.0 ~ 6.3	1.1 ~ 5.9	1.0 ~ 6.3	1.3 ~ 5.5	1.0 ~ 6.3

a. 上述这些数据取自下述 4 个小组:第一组,俄勒冈大学女生;第二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第三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第四组,俄勒冈男子服务俱乐部

这些考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在这个小组里具有低的信度,以及为什么平均分辨力(正如下面将要说的那样)在这个小组里要比其他小组更低一些。这个小组所表现出

的“一致性”应该不会令人惊奇,因为一致是它的核心价值之一。不过,对有些人来说,该结果可能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这种形式处在中间位置而非两极的位置。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被试比俄勒冈大学的被试稍稍少些民族中心主义,这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第一组完全由俄勒冈大学生组成,比第二组(3.43~3.25)平均分稍高。地区差的可能性为下列事实提供了更大的权重,即至少有2个项目[项目55(“日本人”)和项目59(“奥克拉俄马的流动农业工人”),也许还有项目3(“佐特风格者”)]特别提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在可比较的性别之间也找到了相应的差异,尽管该差异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大学女生组(第二组,3.25)比大学男生组(第三组,2.96)具有更高的平均分。在可比较的男生组和女生组之间尚未发现一致的有意义的差异,这可在后面所述的一些补充小组的结果中看到。

3. 项目分析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60)的项目分析结果在表4-15中列出。平均分辨力3.15是较为令人满意的。3个最低的分辨力(1.8~2.1)是从最低平均分(2.1~2.3)的项目中获得的。其中有2个项目(即42和55)在量表的早先形式中也得出相似的平均分。本研究包括了这些项目,但稍作修正,希望目前的被试能够强烈地同意这些项目。不过,这种期望尚未得到证明。鉴于被试对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拉俄马的流动农业工人予以强烈的排斥,因此项目59的低平均分和分辨力也许主要是由于阐述中的问题,而非由于我们意欲表达的思想的不合适性。但是,即便这3个最差的项目,也显著地体现出分化,并在高低四分位数之间很少重叠,得低分者强烈地反对(反应几乎一致,为-3),但得高分者则稍不同意。^[10]

表4-15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目(问卷60)^a
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编号	项目	第一组 平均分	第二组 平均分	第三组 平均分	第四组 平均分	总体 平均分	分辨力 等级					
3.	(佐特风格者)	3.34	2.31	3.41	3.06	2.77	3.07	3.11	3.40	2.89	(9)	
8.	(犹太商人)	4.11	3.47	3.65	3.87	3.40	3.47	3.78	2.22	3.74	3.26	(7)
14.	(黑人权利)	3.79	4.55	3.70	5.26	3.46	3.93	4.57	2.28	3.88	4.00	(2)
21.	(娶犹太人为妻)	4.94	4.15	4.50	2.87	3.61	3.60	4.47	3.22	4.38	3.46	(5)
28.	(犹太工头)	4.00	4.69	3.87	4.46	3.53	3.67	4.31	4.05	3.93	4.22	(1)
33.	(世界组织)	4.49	4.23	4.54	2.73	3.91	3.80	4.32	4.00	4.32	3.69	(4)
38.	(犹太人之间相似)	3.70	4.38	3.15	3.33	2.93	3.66	3.99	3.89	3.44	3.82	(3)
42.	(黑人懒惰)	1.81	1.46	2.04	1.93	1.86	1.80	2.82	2.87	2.13	2.02	(11)
47.	(犹太邻居)	3.30	4.00	3.07	3.07	3.00	3.93	3.38	2.54	3.19	3.38	(6)
51.	(外国思想)	2.74	3.54	2.56	3.13	2.75	2.27	3.25	3.61	2.82	3.14	(8)
55.	(驱逐日本人)	2.34	2.69	2.13	1.87	1.93	1.13	2.00	1.50	2.10	1.80	(12)
59.	(流动农业工人)	2.62	2.39	2.41	2.86	2.19	2.26	1.81	0.84	2.26	2.09	(10)
每个项目平均数		3.43	3.49	3.25	3.20	2.95	3.05	3.05	3.56	2.84	3.30	3.15

a. 这些数据取自下述4个小组:第一组,俄勒冈大学女生(人数=47);第二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人数=54);第三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人数=57);第四组,俄勒冈男性服务部(人数=68)。

总的来说,项目的排序情况是与早先的结果相一致的。在5个最佳项目中(14、21、28、33、38),两个涉及黑人,两个涉及犹太人,一个涉及世界组织;这些项目在先前的表列中,其排行也颇为相似。项目3(佐特风格者)的排行为9,与问卷78作比较,后者排行为1。这种排序的下降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佐特风格者”的问题并不那么受人注意,在俄勒冈要比在加利福尼亚更可能出现极端的同意或不同意。接受问卷60调查的团体,在关于项目的相对可接受水平(平均分)和可分辨水平上是予以充分同意的。当团体之间的级序相关不作计算时,根据对表4-15的检验,每个项目的平均分或分辨力之等级(档次),从一个被试组到另一个被试组是相当稳定的。

(二)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第四种形式(问卷45和40)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形式见表4-16。该量表用于问卷45中,删除了早先问卷中的两个项目(“日本人”和“奥克拉俄马的流动农业工人”),其余10个项目则保持不变。据认为,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这种压缩会排除它的许多功能,使其信度降低到目前研究所需要的最低程度。将问卷散发到各个团体中去,而这些团体中的许多人很少有时间填写问卷,因此需要压缩问卷篇幅。相应地说,整个问卷45可能在大约30分钟填写完毕。例如,一个俱乐部成员或一个组织成员能够在听一个与问卷并不直接相关的报告之前,抓紧时间填写完毕。

鉴于方便性的考虑,我们对项目作了部分修订。问卷40比问卷45更为简洁一些;除了技术方面的压缩之外,这种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减少至5个项目,如表4-16所示。压缩问卷40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某些团体甚至还抽不出30分钟的时

表4-16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第四种形式(问卷45和40)^a

EA	5.	佐特风格者的存在明,当劣等团体获得过多的金钱和自由时,就会误用他们的特权,并不断制造麻烦。
EA	10.	黑人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但是最好让他们呆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和学校里,以防他们与白人更多接触。
EA	15.	在过去的50年里,对美国制度的主要威胁来自外国思想和煽动者的渗透。
EA	20.	让黑人担任工头和领导来管理白人是一个错误。
EB	24.	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结帮谋利,不让其他人在竞争中获得公平的机会。
EB	28.	我几乎难以想像自己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
EB	32.	黑人之所以生活贫困,主要是因为他们天性懒惰、无知和缺乏自制力。
EB	36.	一般而言,犹太人之间十分相似。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例外。
EB	40.	不能让犹太人进入良好的居民小区,因为他们会在那里逐渐营造一种典型的犹太氛围。
EA	45.	既然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建立起来,美国必须明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应丧失任何独立和完整的权力。

a. 5个EA项目构成了问卷40中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个项目的量表均在问卷45中提供,编号如上所示。问卷45的信度通过将5个EA项目与剩下的5个EB项目求相关而获得。值得注意的是,在EA中没有关于犹太人的项目,这符合构成本问卷的实际目的,也即问卷中既要显示反犹太主义的标志,又应基本上不提及犹太人。

间来填写该问卷,如问卷45所要求的那样。不过,在压缩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过程中,一个附加的考虑是这样的:至少在某些团体中,提到犹太人的项目可能会“引起争议”,或者他们可能把注意力更加直接地集中在偏见问题上。相应地说,问卷40中的5个EA项目并没有直接提到犹太人,而是提到了黑人、佐特风格者、外国人和“世界组织”。在问卷45中,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除了这些项目外,还包含 5 个 EB 项目,其中 4 个提到犹太人,1 个涉及黑人。据认为,这 5 个 EA 项目从技术角度而言并不构成一个量表,但是它对各种团体具有方便性和实用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合适的。

问卷 40 除了节省填表时间这一益处之外,也考虑到人们所面临的类似问题。尽管它避开了把注意力集中于犹太人的项目,但是,鉴于研究的目的,其损失并不由于时间上的节省而得到补偿,也不由于排除了被试的抗拒心态而得到补偿。因为抗拒的心态也会出现在问卷的其他方面,如同出现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一样。也许,从心理学上讲,抗拒的心态可以采取集中调查的方式。与民意调查不同,问卷 40 对于许多被试来说,似乎更易有顾虑,尽管他们知道填表所采取的是匿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顾虑是会产生焦虑的,尽管我们负责地予以保证,并按照一种可以公开的研究方式来解释这个过程。在有些情境里,我们的问卷得不到一个团体领导的合作;在有些情境里,即便领导合作也不一定能把主张贯彻始终。这种困难不仅出现在问卷 40 中,也出现在问卷 45 中。一旦某个组进行了合作,那么不论何种问卷,便很少有省略问题或省略量表项目的情况。总之,抗拒心态主要与问卷的一般性质有关,而不是与特定的个别项目有关。实际上,问卷 45 可以用于一切团体。当必须删除某些项目时,例如,当我们在对有着大量犹太人成员或黑人成员的团体进行测验,而涉及这些团体的项目又可能产生摩擦时,最好的办法是选择其他一些项目来替代那些被删除的项目。

虽然不愿合作的团体并不多,但他们的抗拒心态与民族中心主义呈正相关。例如,在“中产阶级妇女”中间(表 4-15)有一个排他的俱乐部,它“仅仅勉强地”同意合作,但拒绝考虑我们关

于组织志愿者进行访谈的要求。该组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中的得分是一切被测团体中最高的。此类抗拒性在民族中心主义色彩并不浓烈的团体里是很少会遇到的。上述情况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这种困难可在民族中心主义者关于自我欺骗的倾向中看到。这种自我欺骗的表现在对反犹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回答中间接地反映出来,并在后面几章中直接地反映出来。

这样的考虑在我们试图对人口众多的大样本研究进行概括时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民族中心主义者对心理问卷抱有更大的抗拒性,因此很有可能的是,在我们的大样本中,民族中心主义的平均程度(民族中心主义总体平均分)比在随机抽取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中可以找到的平均程度要低一些。在那些符合习俗的民意调查中,人口范围常常是预先划定的,因此不大可能获得一种合适的样本。这是因为,在挨家挨户的调查中,访谈者无法接触到那些反对所测主张的被试。^[11]

因此,在对上述那些团体进行描述时,有必要简要地提一下样本抽取程序的合适性。

1. 样本和抽取样本的程序

问卷 45 和 40 的分发是在 1945 年下半年和 1946 年上半年进行的,共计有 9 个月的时间。问卷 45 分发给下列团体:^[12]

(1) 心理测验班女生(人数 = 59)。这是一个成人夜校班,由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部负责。由于这是一个专修心理测验的班级,因此它更能吸引各种各样的团体。可以期望,它不仅包含一些对更好地了解自己十分感兴趣的个体(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人不大可能抱有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态度),还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之所以对心理学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把心理学视做一种可以操纵他人的手段。这个班级在年龄上颇为

不同(年龄跨度在 20~50 岁),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上也有差异。因此,尽管我们并不想去涉及那些在我们先前的样本中曾经占据的大学生组,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拒绝这样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测试。问卷是在一次班会上进行填写的,全班成员都在。男生人数太少,无法构成独立的统计组。我们将性别分开处理的策略(也许我们过于坚持这一点了)阻碍了我们把男女两性结合起来进行处理的可能。

(2) 加利福尼亚州圣昆丁监狱的囚犯(人数 = 110)。由于这些人既在心理学上又在社会学上构成了特殊的团体,因此他们要比其他人接受更为集中的研究;抽取样本的实际结果将在第二十一章进行详细讨论。这里,可以说样本是充分地随机抽取的。

(3)(4) 精神病诊所的病人(女 71 人,男 50 人)。这个组与圣昆丁组一样,被认为不仅在实践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充分理解我们的问题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作为一个“重点团体”,它是值得研究和分析的(见第十二章)。被试个别填写问卷(每个被试自己独立填表),以门诊常规形式进行。因此在个案的选择方面不存在任何偏见。

(5) 工人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它由若干小组结合起来形成“工人阶级”样本,统计以此样本进行计算。在该样本的 53 个妇女中,19 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这是一所对劳动人民来说极端自由的学校,其专业涉及各个领域),8 个是联合电气工人委员会的成员,10 个是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委员会的新成员,还有 16 个则是由雇主选出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该样本的 61 个男子以相似方式获得:15 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12 个来自联合电气工人委员会,26 个来自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委员会,还有 8 个则来自联合海关工会。所有各组均取自旧

金山海湾地区。劳动学校的被试以班级为单位参加。问卷在班级中进行填写。^[13]20 个电气工人是在工会大厅里物色到的,当时他们因为业务上的一些问题正好进入大厅。36 个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是在一次新学员开班式上发放问卷的。女性办公室工作人员则是在对调查颇感兴趣的雇主要求下领到问卷的,她们知道此项调查不记名。海员工会的男子只有 8 个,比之那些在工会里进进出出的海员来,他们所占比例极小。整体上说,工人阶级的样本并不反映实际的工人阶级的人数(不论在随机形式上还是在描述方式上都没有反映),这要求我们对数据的概括必须小心。

对工人阶级的样本主要提供问卷 40,只有 19 个妇女和 31 个男子得到问卷 45。因此,为了达到将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与其他量表联系起来这一统计学的目的(参见第五章至第七章),所有问卷都被作为问卷 40 那样对待,也就是说,只有 EA 以问卷 45 的形式进行统计。结果,对工人阶级女性(人数 = 53)和工人阶级男性(人数 = 61)来说,产生的数据是问卷 40 的数据。

然而,若要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5 上取得附加数据,就应该将 19 个妇女和 31 个男子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样本,^[14]也即工人阶级男性和女性问卷 45(人数 = 50)。这个样本实际上是较大的问卷 45 样本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问卷样本中,男性被试是从上述一些团体中得到的,与那些从问卷 40 中得到的人数差不多。但是,问卷 45 的女性主要来自劳动学校和联合电气工会,因此,其结果可能与其他人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的结果明显不同。

问卷 40 提供给这样一些组,它们形成下列统计样本:

(6)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人数 = 132)。这个组由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几个日班和夜班的女性成员组

成。^[15]由于男性人数很少,因此他们的问卷未作统计。看一看加利福尼亚州和东部之间的地区差异是有趣的,因为从这样选择的一个样本中推导出哪怕是十分有限的原理,也是值得的。

(7) 加利福尼亚男子服务俱乐部(人数 = 63)。我们选择了其中的服务俱乐部,即基瓦尼斯俱乐部和旋转俱乐部,由此组成这个样本。问卷在午餐会上填写。在这之前进行了一场有特色的报告会,它是由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作。报告会期间并不通知被试过后要填写问卷。

(8)(9) 前者为中产阶级男性(人数 = 69),后者为中产阶级女性(人数 = 154)。

这两个样本代表了下列各团体的组合(注意,那是为了统计的目的而这样处理的):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次报告会的中产阶级家长和教师(46个妇女,29个男子),在论述儿童培养的报告之前发下问卷。在旧金山郊外一个小镇上从事新教工会工作的成员(29个妇女,31个男子)。当地“惟一神教会团体”的15个妇女。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成员,他们按其职业似乎属于“中产阶级”(例如律师、工程师、商人等等),他们的收入也表明他们属于“中产阶级”(11个妇女,9个男子);对这部分人若有疑问,则归入上面讨论过的“工人阶级”样本中。当地妇女投票者同盟中的17个妇女。最后,是专门为中上阶层妇女设立的俱乐部成员,有36个妇女。看来,这两个样本,尤其是妇女样本,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多种组成部分。

(10)(11) 前者为工人阶级男性(人数 = 61),后者为工人阶级女性(人数 = 53)。这些团体已经在上面描述问卷45时(工人阶级男性和女性样本)介绍过了。

(12)(13) 前者为洛杉矶男性(人数 = 117),后者为洛杉矶女性(人数 = 130)。^[16]为了获得整个样本的多样性,在洛杉矶地

区对一组男子和女子进行了测验。由于时间仓促,获取样本的过程并未得到充分控制:就组成样本的每一个被试组而言,被试人数的确切数字还无法取得。被试是从下列团体获得的(每个团体并不超过其总人数的25%):大学生的家长(志愿者)、中学老师、咨询中心的老年工作人员、电台撰稿人(在一次会议上进行测验)、妇女投票者同盟、男童子军领导人、反犹太主义组织成员(在约100份问卷中,有12份是通过邮寄形式发放的),以及当地几个俱乐部和街坊团体。样本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尽管它并不代表中产阶级的全体。除此之外,由于相对来说被试均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试是以志愿者的形式获得的,因此它的意义也可能系统地降低。不过,这对目前的研究目的而言是合适的,因为它与民族中心主义一样是高度多样性的,也与社会的和心理的特征一样是高度多样性的(后者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正在进行调查)。

除了上面的团体以外,下面两个被试组也接到了问卷45和40:

(14) 职业介绍所的男性退伍军人(人数 = 106)。看来,很有可能的是,早在1946年,问卷(尤其是F量表,参见第七章)和投射问题(参见第十五章)可能反映出许多对诊所医生和职业咨询者颇感兴趣的東西。因此,当问卷发给一些正在当地职业介绍所寻求职业指导的退伍军人时,我们主要基于这样的想法,即它对本研究有帮助,也对社会机构有帮助。除了一些例外,所有的男性退伍军人(白人、基督徒),即在参加1946年开始的为期7个月的职业咨询的退伍军人中,第一批51人得到问卷45,第二批55人得到问卷40。一些例外的情况是,有些男子教育水平极低,难以处理问卷,而且他们也无法安排出时间来填写问卷。因此,这个团体可被认为是咨询者中间的一个随机样本。不过,很有可能的是,一个团体的咨询者并不代表退伍军人全体。由此

推导,我们的样本在社会经济水平上超过了平均水平(见第五章),而且在教育方面和理智方面也处于平均水平之上(参见第八章)。此外,根据后面几章提出的证据,尤其是第十一章提出的证据,看来在谋求指导的意愿上,尤其是在接受适度的心理治疗方面,非民族中心主义者要比其他人更为普遍。由此产生的严重的抽样偏见,部分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它们可能迫使民族中心主义个体去寻求帮助(例如,外部压力,或者倾向于把职业介绍所想像成慈善机构)。无论如何,这个样本的平均民族中心主义分数不可能比退伍军人全体更低一些。

(15) 海事学校男生(人数 = 343)。这个被试组由一个政府创办的商船高级船员培训学校的全体成员组成。这所学校位于阿拉米达(旧金山海湾地区)。它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员入学以后约有 14 个月的时间是作为无执照的海员从事学习的。问卷在学习期间实施:在有充分控制的条件下,由心理学科的教职员主持这项调查。看来,他们与学员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极为融洽。研究对象中,一半人员接受问卷 45,另一半人员接受问卷 40,对半选择的根据是学员在校的能力和时间的。这个被试组像上面描述过的那个被试组一样,不能被认为代表了全体海员的充分样本。选择按以下方式进行:占绝对优势的是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成员,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成员相对来说极少,中产阶级以上的成员相对来说也极少;这些人的社会流动性基本上是向上发展的——希望“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提升自己”;他们的智力超常,这是准许入学的基本资格(平均 AGCT 分为 126.2,区间是 102 ~ 153)。^[17]尽管有着这些相对的一致性,但是这个被试组仍在许多方面十分多样化。

2. 信度和团体差异

问卷 45 和 40 的信度数据在表 4-17 中列出。正如上面提

到过的那样,问卷 40 中的 5 个项目(EA 量表)不包括涉及犹太人的项目;问卷 45 包含这 5 个项目,并加上 5 个 EB 项目,其中 4 个项目取自前反犹主义量表。由于问卷 40 中项目数目甚少,使得计算信度系数成为不合适的事情,因此我们决定通过对 EA 和 EB 求相关后再确定整个量表的信度,而不是通过对奇数和偶数(各一半人员)求相关来确定。这种做法提供了关于问卷 40 的分数和问卷 45 的分数之间相等性的程度;例如,它提供了对问题的部分答案:在 EA 量表上低四分位数的团体评分,在 EA + B 的低四分位数上会出现哪种百分比?采用问卷 45 的 7 个组平均信度为 0.79(表 4-17A 和表 4-17C),这表明重叠现象相对来说是明显的——尽管利用容量较大的量表也有其好处。

目前计算信度的方式,在决定 EA 和 EA + B 之间关系的程度时,以及在表明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中存在的一致性(尽管是不完整的)时,也有它的不利一面,那就是它要比奇数—偶数(各组一半人员)求相关获得的分数信度低。两个在内容上相等的问卷肯定要比两个在内容上不同的问卷(例如 EA 和 EB)具有更高的相关性。这一假设在两个团体中进行了测试。在圣昆丁的男子个案中,他们得到的 EA 和 EB 的信度为 0.65,这在被测的团体中是最低的,但是当使用奇数—偶数对半处理方式时,信度便升至 0.79。在由 517 个妇女组成的团体中,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18]在 EA 和 EB 上获得的信度为 0.79,而奇数—偶数的信度则为 0.87。由于在通常的意义上,“信度”指的是“同一事物相等量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信度平均约为 0.85 左右。这个数值符合目前的测验标准。

表 4-17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5 和 40)的信度

A. 采用问卷 45(EA + B)的一些被试组

特 性	被试组 ^a					总体 ^b
	I	II	III	IX	V	
信 度 ^c	0.82	0.65	0.84	0.75	0.91	0.79
平均分(总)	3.41	4.60	3.65	3.67	3.34	3.74
平均分(A半)	3.77	5.33	4.23	3.92	3.62	4.17
平均分(B半)	3.06	3.86	3.06	3.42	3.07	3.29
标准差(总)	1.40	1.28	1.60	1.59	1.78	1.53
标准差(A半)	1.68	1.31	1.81	1.78	1.91	1.70
标准差(B半)	1.35	1.60	1.64	1.70	1.77	1.61
人数	59	110	70	50	50	339
区间	1.0~6.1	1.6~7.0	1.0~7.0	1.0~6.2	1.0~7.0	1.0~7.0

a. 采用该问卷的团体如下:第一组:心理测验班女生;第二组:圣昆丁监狱犯人;第三组:精神病诊所女病人;第四组:精神病诊所男病人;第五组:工人阶级男女。

b. 在获得总体平均分时,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没有因人数而加权。

c. 问卷 45 的信度不是根据奇数—偶数或人数相等的对半求得的,而是根据 EA 和 EB 求得的。因此,它们要比使用奇数—偶数的处理方法(参见本章)稍低一些。

鉴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0 是一种压缩的问卷形式,因此对它进行信度检验是不适宜的。作为替代,平均分辨力(D. P.)在表 4-17 里面为每个被试组作了报道。总体的平均分辨力为 4.87,它既提示了总的民族中心主义信度,也提示了这样的信息:被试在回答所有项目时,表现出相对来说较高程度的一致性。8 个组中有 4 个组的平均分辨力超过 5.0;这表明分数的分配是双峰的,也就是说,被试既有倾向于强烈的同意,也有倾向于强烈的不同意(与早先研究中一般的结果形成对照:在早先的研究中,分数聚集在“不确定”的中间分周围)。高的标准差,

以及区间宽泛的分数,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

民族中心主义方面的团体差别也是令人感兴趣的。在采用问卷 45 的团体中,按照民族中心主义的平均分,位居名单之首的 3 个团体是:圣·昆丁监狱男犯(4.61)、海事学校男生(4.34)、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4.26)。这些平均分要比其他平均分明显地高一些(其他平均分为 3.34~3.67)。圣·昆丁监狱男犯在民族中心主义方面得分最高,这表明,即使身处一个从属的团体,并不能保证他们是反对民族中心主义的。从圣·昆丁被试组得出的结果,以及犯罪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将在第二十一章加以详尽讨论。

表 4-17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5 和 40)的信度

B. 采用问卷 40(BA)^a的团体

特 性	被 试 组 ^b								总体 ^c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平均	4.04	4.31	3.89	3.64	3.92	3.91	3.82	3.71	3.90
标准差	1.58	1.73	2.08	1.96	1.71	2.25	1.89	1.78	1.87
平均分辨力	4.10	4.54	5.28	5.11	4.53	5.64	5.08	4.67	4.87
人数	132	63	69	154	61	53	117	130	779
区间 ^d									

a. 问卷 40 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只包含 5 个项目,以 EA 项目形式提出,并且与问卷 45 中的 EA 项目相一致。

b. 采用本问卷的被试组如下:第六组: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第七组:加利福尼亚州男子服务俱乐部;第八组:中产阶级男性;第九组:中产阶级女性;第十组:工人阶级男性;第十一组:工人阶级女性;第十二组:洛杉矶男子;第十三组:洛杉矶女子。

c. 在求总平均分时,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不因人数而加权。

d. 每组个案的区间均为 1.0~7.0。

不过,有一点还不清楚:在退伍军人和海事学校两个被试组里,为什么 EA 平均分在问卷 40 中与问卷 45 相比竟如此不同(表 4-17C)。对于退伍军人来说,EA 平均分从 4.67 下降到 4.21,而对海事学校来说,则从 4.82 增加至 5.08。尽管这些差别在统计上并不重要(处于 5% 的水平上),但是,如果两者都处

表 4-17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5 和 40)^a 的信度
C. 采用问卷 45 和 40 的一些被试组

特 性	被试组 ^a		总 体
	职业介绍所 男性退伍军人	海事学校 男 生	
问卷 45:			
信度	0.86	0.73	0.80
平均(总)	4.26	4.34	4.30
平均(A 半)	4.67	4.82	4.74
平均(B 半)	3.85	3.85	3.85
标准差(总)	1.60	1.25	1.42
标准差(A 半)	1.63	1.40	1.52
标准差(B 半)	1.71	1.36	1.54
人数	51	179	230
区间	1.1~6.6	1.2~6.6	1.1~6.6
问卷 40:			
平均(BA)	4.21	5.08	4.64
标准差(BA)	1.75	1.47	1.61
人数	55	164	219
区间	1.0~7.0	1.2~7.0	1.0~7.0

a. 问卷 45 和 40 中的个案数如下:

	问卷 45	问卷 40	总计
个案数	570	998	1568

于同一方向,那么它们便提示了两个问卷之间存在一种系统的差别。例如,可以这样假设,在 EB 中出现反犹主义项目,使得有些人采取守势,从而在问卷 45 的整个量表上降低了平均分。不过,这一假设遭到下列事实的反驳:两种差别均不重要,海事学校的 EA 平均分在问卷 40 中比在问卷 45 中更高,而且 EA 平均分在其他各组中(表 4-17B),其具有的大小顺序与问卷 40 在其他各组中一样。总之,问卷 45 中出现 EB 项目,在其他项目的得分上,并不产生系统的增加或减少。

对于精神病诊所的病人来说,民族中心主义的平均分数,以及宽泛的区间和显著的标准差都表明在心理障碍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一种简单的关系。在这一被试组中,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民族中心主义程度——尤其是神经症患者——与所有被测各组的平均程度相等,因此,从心理学角度说,如果认为在民族中心主义者中间要比在非民族中心主义者中间存在更多的病理状态,似乎是不正确的。^[19] 不过,后面显示的证据(见第十二章)将表明,按病理类型,高低得分者有明显的不同。在采用问卷 45 和 40 的各个团体中,最不民族中心主义的团体是测验班女生和工人阶级的男女。前面一组的平均分与以前取得的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大学被试组的结果相一致。采用问卷 45 的工人阶级被试组,其 EA 平均分稍稍低于(而不是明显低于)采用问卷 40 的工人阶级被试组。这个差异显然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问卷 45 的样本包含了较大比例的来自加利福尼亚劳动学校的被试,这是一个具有极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的小组。至于经济层面和政治—经济思想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将在第五章讨论。从表 4-17 的结果看,尤其是对采用问卷 40 的那些被试组而言,社会经济层面并不是造成民族中心主义差异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例如,中产阶级组的平均分与工人

阶级组的平均分几乎一致,这就是一个证明。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力量对民族中心主义不起任何作用,或者说阶级的身份已经不重要了。可是,在测量工作有效,而且样本又恰当的条件下,这两个团体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似乎是相同的。此外,每个团体中间也有广泛的变化,有些被试组在民族中心主义方面得分很高,有些则低。由此可见,就中产阶级而言,俱乐部要比大学组更加民族中心主义。在每个团体中,民族中心主义的个体和团体的得分差异,既与思想的差异相关联(这里的思想指政治的、宗教的思想),也与人格的差异相关联(正如后面一些章节所提示的那样)。

3. 项目分析:问卷 45 和 40

对采用问卷 45 和 40 的各组被试来说,其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如表 4-18 所示。由于男性的项目平均分一般略高于女性的项目平均分,因此个别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的排序对两种性别来说均是相似的。除此之外,总的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的区间也提示了这样的情况:存在相似的一致性。换言之,在各男子组和女子组中间,项目的可接受性(平均分)和“良好性”(分辨力)在组与组之间是相当稳定的。

在问卷 45 中,最好的项目是那些讨论黑人、犹太人、佐特风格者,以及外国人的项目。对女性来说,有 2 个项目[即 32(黑人自身的缺点)和 40(犹太人的居住小区)]的平均分在 3.0 以下,其分辨力分别排序为 10 和 9。即便是男子和女子的最低分辨力(也即 3.0 或 3.0 以下),也足以把得高分者从得低分者中间区分出来,并将重叠降至最低限度。在问卷 45 中,有一个项目即 45(世界组织),男子和女子的平均分超过 5.0。由于这个项目在整个量表上对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作了很好的分辨,因此得低分者显然在国家主要问题上,比起他们对其他问题来,似

乎更少确信;得高分者差不多一致地把这个项目定级为 +3,但是,得低分者却较少采取断然态度,而呈多级分化。

在两个问卷上,男子明显地比女子获得更高的平均分,但这并不反映真正的性别差异,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男子和女子进行团体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4 个得分最高的男子组(圣·昆丁、退伍军人、海事学校、服务俱乐部)在女子组中没有得高分的对应组。通过比较性别而获得的十分相似的平均数,也表明性别差异并不显著(参见表 4-17B)。进行性别比较的团体有工人阶级、中产阶级、洛杉矶男子和女子。可比较的男子组和女子组之间的显著差别,当然能在个别项目中找到;不过,这个问题尚未作过系统的探讨。

表 4-18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目(问卷 45 和 40)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编号	项 目	问卷 45(人数 = 440)		问卷 40(人数 = 529)	
		平均分	分辨力等级	平均分	分辨力等级
男子组 ^a (人数 = 969)					
5.	(佐特风格者)	4.14	3.57 (7)	4.10	4.26 (5)
10.	(黑人权利)	4.57	4.58 (1)	4.25	4.92 (2)
15.	(外国思想)	3.81	3.34 (9)	3.64	4.44 (3)
20.	(黑人工头)	4.32	4.54 (2)	4.07	4.93 (1)
24.	(犹太商人)	4.11	4.04 (4)		
28.	(娶犹太女人)	3.25	3.49 (8)		
32.	(黑人生活)	3.10	3.82 (5)		
36.	(犹太人之间相似)	4.03	4.35 (3)		
40.	(犹太人居民区)	3.55	3.71 (6)		
45.	(世界组织)	5.54	3.01 (10)	4.97	4.38 (4)
每个项目的平均分 ^c		4.04	3.84	4.20	4.59

编号	项目	平均分	分辨力	分辨力等级	平均分	分辨力	分辨力等级
女子组 ^b (人数 = 599)							
		问卷 45(人数 = 130)			问卷 40(人数 = 469)		
5.	(佐特风格者)	3.64	4.05	(4)	3.48	4.50	(4)
10.	(黑人权利)	3.93	4.91	(1)	3.96	5.21	(4)
15.	(外国思想)	3.26	3.99	(5)	3.25	4.49	(5)
20.	(黑人工头)	4.00	4.60	(2)	3.86	5.15	(2)
24.	(犹太商人)	3.48	3.88	(6)			
28.	(娶犹太女人)	3.24	3.50	(7.5)			
32.	(黑人生活)	2.42	2.99	(10)			
36.	(犹太人之间相似)	3.02	4.24	(3)			
40.	(犹太居民区)	2.96	3.26	(9)			
45.	(世界组织)	5.16	3.05	(7.5)	4.58	5.07	(3)
每个项目的平均分 ^c		3.53	3.89		3.83	4.88	

- a. 圣·昆丁监狱男犯人(人数 = 110)。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人数 = 106)。海事学校男生(人数 = 343)。加利福尼亚男子服务俱乐部(人数 = 63)。精神病诊所男病人(人数 = 50)。中产阶级男性(人数 = 69)。工人阶级男性(人数 = 61)。洛杉矶男子(人数 = 177)。这里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男女(人数 = 50),因为 50 名被试中有 34 个是男子。
- b. 本数据是从下列女子组获得的:心理测验班女生(人数 = 59)。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人数 = 132)。精神病诊所女病人(人数 = 71)。中产阶级女性(人数 = 154)。工人阶级女性(人数 = 53)。洛杉矶女子(人数 = 130)。
- c. 求总的平均分和分辨力时,个别团体的数值没有因人数而加权。

在问卷 45 和 40 之间,平均分与分辨力的差异也不明显。男女两组在问卷 40 上的平均分分辨力比问卷 45 稍微高出一点,部分原因在于问卷 40 中项目数较少(因此,每个项目对总分的

贡献更大),部分原因在于抽样的因素:采用问卷 40 的各个样本的组成有着更多的异质成分,结果导致更大的标准差(表 4-17),更加极端的得分者,以及更高的分辨力。男子和女子在问卷 40 上比问卷 45 具有稍低的 EA 平均分(男子为 4.48 ~ 4.20,女子为 4.00 ~ 3.83)。鉴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这些平均分的差异可能主要由于抽样的差异(既系统又随机)。

4. 相关分析:问卷 45

根据上面提到的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517 人)组成的团体,我们有可能对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5)作一相关的分析。^[20]这里呈现的是这些结果的最重要部分。该组在平均分(3.64)、标准差(1.52)和信度(EA 和 EB 为 0.79,奇数一半和偶数一半为 0.87)等方面接近整个样本的平均数。对于单个项目来说,平均分的区间从项目 32 的 2.25(黑人的自身缺点)到项目 45(世界组织)的 5.00,而标准差的变动区间则从项目 32 的 1.77 到项目 28(娶犹太女人)的 2.47。项目之间相关的平均分为 0.42。项目最低之间的相关是 0.25 和 0.26,分别位于项目 15(外国思想)、项目 40(犹太居民区)和项目 32(黑人的自身缺点)之间。项目之间最高的相关是 0.61 和 0.62,分别位于项目 24(犹太商人)和项目 36(犹太人之间相似)之间,也位于项目 10(黑人权利)和项目 20(黑人工头)之间。每一项目与剩余的项目总和之间的相关,平均为 0.59;两个最低值是 0.43 和 0.46,涉及项目 15 和 45;两个最高值是 0.67 和 0.69,涉及项目 10 和 36。10 个项目中有 6 个与余下项目之和的相关为 0.60,或更高一些。这些结果(包括项目的等级顺序和相关大小)与其他各组的结果相一致。对于涉及一个特定团体的项目而言,有一种集聚的倾向,也即具有广泛的内在一致性。当然,这种一致尚不完整,因为相关尚不完善。根据严格的统计,量表显示了同等程度的维度(一

致性),正如标准的智力测验那样。

5. 年龄和民族中心主义

本研究的整个样本,在年龄方面,不是随机分布的。其成员年龄主要在 20 多岁和 30 多岁,也有少数成员的年龄在 40 多岁或更大些。据假设,年轻者比年长者不易保守,也较不民族中心主义,而目前样本中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数可能比总人数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数要低一些。出于对这一假设的检验,我们借精神病诊所的男女病人(人数 121)计算了年龄和民族中心主义(问卷 45)分数之间的相关。尽管从心理健康角度而言,这个被试组是不典型的,但它似乎是采用问卷 45 的一个特殊团体,它的民族中心主义测量结果(平均分、信度、内在一致性,以及与其他量表的相关性)基本上代表了整个样本。这个组大约 80% 的人年龄在 18~4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4 岁。男子的数字与女子的数字十分相似。

男女两组的年龄与民族中心主义分数之间的相关为 0.19。男子组和女子组结合起来的值在零以上,处于 5%(最低可接受的)信任水平上。它表明,年轻人有一种持续的倾向,比中年人或老年人更少一点民族中心主义。对于一般的人口而言,其相关性不大可能更高,因为下列事实表明:很高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是从年轻人团体(例如职业介绍所退伍军人和海事学校男生)中取得的。因此,这种偏爱年轻人的抽样方式,鉴于我们的研究结果,似乎并不十分重要:男女病人样本中发现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平均程度,比起更具代表性的其他样本来,显著地偏低。

(三) 一个最终实施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上述数据表明,在问卷 45 中,即使由简短的 10 个项目组成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也可以用做对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但

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设计一份项目更多的问卷看来还是有利的,因为容量较大的问卷可能更可靠些,并且能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涵盖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表 4-19 包含了一个由 20 个项目组成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它也是最终实施的量表——既能满足实践性的要求,又具有篇幅适当的特点,以满足理论和统计的要求。这些项目依据统计的合适性和理论的重要性来选择,也就是从以前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反犹主义量表中进行选择。若干项目的措词已经缩短和简化。亚量表也被恢复:6 个项目涉及犹太人,6 个项目涉及黑人,8 个项目涉及少数民族和爱国主义。

在有些情况下,鉴于时间的要求或调查的方便,可能缩短量表,或者删除某些项目。根据目前研究的经验,似乎可以作出这类变化,而不严重损害量表提供民族中心主义指标的有效性。从更加宽泛的观点来看,有必要获得关于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内在结构的进一步数据(正如整个量表所反映的那样),同时有必要获得与这种思想相联系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的进一步数据。

表 4-19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一个最终实施的问卷

A. 犹太人

1. 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结帮图利,阻止其他人在竞争中获得公平的机会。
2. 我无法想像自己会娶一个犹太女人为妻。
3. 可能会有一些例外,但是一般而言,犹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
4. 不该让犹太人进入良好的居民小区,因为他们会在那里逐步营造一种典型的犹太氛围。
5. 若要改变对犹太人的偏见,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首先应该诚心诚意地消除他们那些有害的和令人恼怒的缺点。
6. 在犹太人身上存在一些与众不同的和奇异的东西;难以说清他们正在想什么和计划些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使他们像钟表一样刻板地持续活动。

B. 黑人

1. 黑人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但是最好让他们呆在自己的社区和学校里,以防他们与白人过多地接触。
2. 让黑人担任工头和领导来管理白人是一个错误。
3. 黑人乐师有时与白人乐师一样棒,但是不能因此去组织一个黑人—白人混合的乐队。
4. 比起更加熟练或更需负责的工作来,体力劳动和下等工作似乎更加适合黑人的脑子和能力。
5. 有人提出,应将黑人置于与白人同等的地位,这些人事实上是一些试图挑起冲突的激进的种族主义分子。
6. 如果不对黑人加以约束的话,那么大多数黑人会变得十分傲慢和难以相处。

C. 少数民族和爱国主义

1. 佐特风格者的存在表明,当他们获得过多的金钱和自由时,他们就会误用他们的特权,并不断制造麻烦。
2. 在过去的50年里,对美国的最为严重的威胁来自外国的思想和煽动者的渗透。
3. 既然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建立起来,美国必须明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应丧失任何独立和完整的权力。
4. 某些教派拒绝对国旗致敬,应当迫使它们与这种爱国行动保持一致,否则便取缔它们。
5. 菲律宾人如果认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处理生活,那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当他们在穿着奢华,并且与白种女孩鬼混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越界了。
6. 美国也许并不十全十美,但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告诉人们怎样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
7. 对每个人来说,认为自己的家庭比别人的家庭好,这是十分自然而又正确的。
8. 对美国安全来说,最好的保证是拥有全球最为庞大的陆军和海军,以及核弹头。

四、个案研究:麦克和拉里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反应

为了清晰地提示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我们可以把麦克(Mack)和拉里(Larry)对量表的反应与他们关于团体和团体关系的想法(通过访谈而获得)进行比较。这两个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78)的每一个项目上的得分,以及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如表4-20所示。

我们在第二章分析麦克的访谈时,可以看到他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所有的倾向。按照目前的理论,这些倾向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特征。因此,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得分接近高四分位数的上端,可以被认为是该量表效度的证明。他在14个项目中赞成12个,从而显示出十分普遍的民族中心主义图景。他对内团体的理想可以用做对外团体表示敌意的标志。他对黑人、佐特风格者和日本人的排他态度尤为显著,而且比他对犹太人的排他性还要极端一些。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下述两个数据:他在属于少数民族团体的5个项目上,平均分为5.8,而在反犹主义量表上的平均分为4.6。人们可能还记得,麦克关于犹太人的想法具有一种特别的性质。他想提出这样的观点,即犹太人应当更加充分地参与到美国生活中去。如果他们不想脱离美国生活的话,他们原本是会被人们喜欢和接纳的。为了提出这样的论点,对他来说,必须对排挤犹太人的说法表示不同意,从而降低了他的平均分。他对他所想像的犹太人的权力颇具印象。遗憾的是,访谈的重点(如在反犹主义的访谈重点中一样)并没有探索麦克对少数民族团体的意象。但是,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假设,麦克认为黑人、佐特风格者和日本人更差劲,

或者说比犹太人更低劣,因此必须对他们抱以敌对态度,这是一个最为适宜的目标。他在量表上的回答,表明他强烈反对这些团体,反对他们参与到美国生活中去。鉴于上述意象,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十分自然了。

表 4-20 麦克和拉里对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反应

编号	条 目	麦克	拉里	团体 ^a 平均分	团体 ^a 分辨力
4.	(歧视是非法的)	5	1	3.95	1.51
7.	(佐特风格者)	6	1	3.38	4.02
18.	(外国思想)	5	1	3.17	3.26
25.	(世界格局)	7	7	4.60	3.28
29.	(黑人有权)	6	1	3.41	4.00
34.	(女性岗位)	3	1	2.74	2.18
37.	(黑人懒惰)	5	1	1.92	2.16
41.	(美国方式)	5	2	4.34	3.05
45.	(黑人工头)	6	1	4.09	3.48
48.	(德国人和日本人)	6	1	2.50	3.08
51.	(迁走社会败类)	5	1	3.15	2.34
54.	(大多数人无能)	3	5	3.79	2.66
57.	(亲黑人激进分子)	6	1	2.60	2.86
64.	(加州无日本人)	6	1	2.24	2.69
	总平均	5.3	1.8	3.29	2.90

a. 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取自采用问卷 78 的所有 4 个被试组。

麦克之所以不同意项目 34(女性岗位),可能与下列事实有关,即他打算娶一个学校教师为妻;这个问题后面还将充分地讨论。他不同意的另一个项目,而且他的得分低于团体分的项目是项目 54(大多数人无能);如果把项目 54 视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陈述,那么也可以使这种不一致性清晰地显示出来。我们认

为,项目 54 并不包含任何一种假民主的合理化(文饰作用),麦克在访谈中也不作出极端挑衅性的反民主陈述。看来,这一事实是与他作为法西斯运动中的一个潜在的追随者的一般形象相符合的,而不是与他作为一个法西斯运动的领袖的形象相符合的。

可是,拉里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平均分为 1.8,这个分数是很低的。它与下列事实相符,即在访谈中,拉里尽力使自己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一边,争取少数民族的社会平等。在 14 个项目他强烈地不同意其中的 12 个,他的总分由于同意项目 25(世界格局)而提高了,也由于同意项目 54(大多数人是无能的)而提高了。尽管项目 25 的团体平均分是高的(这表明赞成国家主权的强烈思想感情是这个团体的基本特点),但是,该项目对整个量表的高低得分者作出了十分显著的分。拉里之所以强烈地同意该项目,也许不是由于对权力的关注(如麦克的例子中那样),而是由于他的保守主义,以及他将世界格局与罗斯福的经济政策相联系(他不同意罗斯福的经济政策)。这一解释得到访谈材料的支持,对此后面将予以说明。

有趣的是,在项目 54 的例子中,两个被试都表现出不一致的情况。尽管这个项目的原意是想表现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但是持有偏见的被试却对它表示不同意,而不持偏见的被试则表示同意。这种情况与下列事实是一致的:在量表的各个项目中,该项目具有最低的分辨力分数。原因可能是,有些得低分者并不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反人类的方式来解释这一陈述的,把无能归罪于外团体(得高分者的情况表明,在他们对其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项目进行回答时,他们认为大多数人是无能的),更加确切地说,是指有许多人因为社会条件的缘故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这种解释对拉里来说也是站得住脚的。

五、结论: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结构

根据上面提出的各种测量结果,以及来自访谈的支持性证据,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性地阐述关于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详尽理论了。这样一种理论应当展示民族中心主义心理框架的一般原理,把各种模式的表面意见和态度看做是同一种潜在观点的选择性反映,并将我们关于团体和团体关系的民族中心主义探索方式与其他方式区分开来。

要理解这样一种理论,首先要说一说上面提到过的数据的含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把民族中心主义视做是一种一致的思想体系呢?基于量表统计,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论点:项目之间的答案表明,大多数人在他们对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方面并非是始终一致的。相关统计反映了这一点,即在个别项目之间,这种相关平均约为0.4。还有,对个人回答量表时高低四分位数的考察也表明,即使极端的高低得分者,也视一般的民族中心主义立场或反民族中心主义立场而变化。由此看来,按照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来了解一个人是否是民族中心主义者,依据的只是他在量表的单个项目上的立场,借此进行合理的预示而已(单个项目和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之间的相关平均约0.6)。另一方面,亚量表之间存在更大的一致性。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高信度和压缩形式的亚量表的高信度表明,不论项目之间的统计如何波动,每个亚量表还是测出相当一致的倾向。此外,对黑人、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等量表的统计表明,这些倾向是密切的,人们对一般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接受或拒绝是显著地一致的。不过,为了把这一思想作为整体进行测量,我们并不否认它的有些组成成分会随个体的变化而变

化。确实,每种倾向都是复杂的,这一假设构成了我们系统阐述亚量表的基础,并使每个亚量表尽可能具有一定的涵盖面。

当一个人的总分(同意项目的平均分)很高,表明他接受量表中所反映的大多数思想时,这个人便被认为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不论何时,本章中提到的“一般性”或“一致性”,始终是以亚量表或整个量表为背景的,而且承认被试会因项目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反应。不论何时,本章中提到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及其特定的组成成分,始终被理解成大多数民族中心主义者(尽管不是全部)都具有的想法;也就是说,这里所提及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每个组成成分,都会被大多数得高分者接受,并为大多数得低分者拒绝。^[21]是否存在民族中心主义思想,是由大多数极端得高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得分来体现的。高四分位数较不极端的成员,已经接受了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非绝对地描述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因此,认为得高分者“都相似”是不对的;他们对某种团体持有共同的思想方法,但是在对各种团体的意象和态度方面,却存在着广泛的个体差异。对于得低分者也可运用类似的推理方法。^[22]

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民族中心主义的界定上来,从内团体和外团体,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考虑民族中心主义。

“团体”这个术语从广义上说是指一个为个体构建心理统一体的组织,它也是由个体组成的。如果我们把个体的社会概念视做是一种包括各种区域的地图,那么每个区域都被认为是一个团体。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定义涉及诸如国家、民族、阶层、政党等社会团体。但是,它有时也指某些人的组合,他们具有一种或多种共同的特征。当然,就表现方式和规律而言,这样的团体并非正式团体。因此,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把诸如罪犯、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偏执者等个体的组合作为团体来考虑,也

是合情合理的。同样,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一个人的社会观念——意见、态度、感情和奋斗的目标——是社会地图上的一个类别或区域,因此也可以视做是一个“团体”。

“内团体”和“外团体”是社会心理学概念而不是社会学概念,因为它们指的是团体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团体中的成员资格。一个人可以与他并不从属的团体保持一致。这可以从下列情况中得到佐证:一个爬上社会高层的人,常被认同为比他现在所属的团体在阶层、职业、政治派别等方面具有更高的地位和力量;同样,我们从自以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身上也能得到类似的佐证,^[23]他们常被认同为一个社会阶层低下、缺乏实力的团体,例如黑人、犹太人、“弱者和受害者”。

当然,一个人可能关注许多团体,对他来说,它们既非内团体又非外团体。一个人可能同情黑人或天主教徒工会,但实际上却并不认同这些团体。相反,一个人可能因为利益或价值方面的差距而反对许多团体,或者感到这些团体的目的和存在与他无关。但是,如果不存在认同不一的情况,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不存在相互排斥和违背价值观念等现象,这样的团体仍然不会被视做外团体。

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普遍地排斥外团体。具有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人似乎感觉自己正面临一些并非他所归属的团体的威胁;如果他无法认同该团体,那么,他就必然会反对该团体;如果一个团体是难以接受的,那么该团体就是“异己的”。这样一来,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便成为他的大多数社会思想的基础了。人们基本上是按照他们所属的团体来归类的。外团体通常是一些附属的团体(黑人、墨西哥人),或者相对而言在地位和力量方面较低的团体(这些团体正在努力奋斗,以改善它们的社会地位)。在今日美国,主要的外团体似乎是犹太人、

黑人、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群体、工会、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等等。其他一些团体,其外团体地位有所变化,如天主教徒、艺术家、知识分子、奥克拉俄马流动农业工人、日本人(在西部)、和平主义者、菲律宾人、墨西哥人、同性恋者等。在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工业上落后的国家,以及那些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十分不同的国家,常被视做是外团体。由于地区的、阶层的和个别的差异,有些团体也据此被认为是外团体;如果一个人认为这些团体中有一些属于外团体,那么他就会倾向于排斥它们。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可能对一个团体特别讨厌,由此泛化,他很可能会对其他许多团体也持有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见和态度。

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在社会组织的各种水平上进行转换。供讨论的社会背景一旦确立,民族中心主义者便可能找到一种外团体—内团体的区分。因此,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民族中心主义采取了假爱国主义的形式:“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们要么采取孤立的立场,对世界事务撒手不管,要么采取参与的姿态——但不丧失我们的完整主权、力量和经济利益(帝国主义)。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应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并垄断核武器。

但是,当背景转换成国内事务时,优越的“我们”便瓦解了。例如,宗教背景下的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可借各种方式转换:宗教向非宗教转换,基督教向犹太教转换,新教向天主教转换,或者在新教内进行这些转换。类似的外团体—内团体区分也可以在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找到。因此,在针对其他国家的问题时,一些人采取以美国为核心的假爱国主义方式,把其他国家看做外团体;但是,当问题转向国内时,他们实际上把美国的大多数人看成是一个外团体:各种宗教、非白人、“群众”,受教育太多

的人和不受教育的人、罪犯、激进分子等等,都倾向于被归入外团体类别。这并不意味着非民族中心主义者会把所有这些团体都视为内团体;确切地说,非民族中心主义者可能采取一种支持的态度,但不一定认同;也可能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不一定具有“异己”感,或者将其归入另册。

大多数民族中心主义者是以公牛眼睛的同心圆方式来看社会的。每个圆代表着一个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每条线起着界限作用,一切外来团体均被排斥在圆心之外,而每个团体又轮流地被一个更狭隘的团体所排斥。表明这种越来越狭隘的内团体的一个样板是:白人—美国人—当地出生的美国人—基督徒—新教徒—加利福尼亚人—我的家庭—最后是我。

民族中心主义者对外团体的态度阻碍了他们把人类作为整体来认同的思想方法,而反民族中心主义者则相反,他们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认同。这种认同的缺乏是与民族中心主义者不能把个体作为个体来看待有关。可以这样说,他们的人际关系受制于他们对团体的定型化意见。这种不能认同的态度,导致了他们对世界与和平采取民族中心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政治形式。虽然它也采取其他形式,但都以人类本性的固有邪恶为基础(例如挑衅性、懒惰、谋取权力等等);认为这种邪恶不可改变的主张,被伪科学的人类本性遗传理论合理化了。正因为这种邪恶不可改变,因此必须加以攻击,加以消除,或者一经发现便予以隔离,以免它玷污了美好的东西。民主的选择(人性论),“对每个人的爱”,并不是模糊的和抽象的,而是以具体的、特定的经验为基础来对个体表示喜欢或讨厌,珍视或反对;它必然涉及消除定型化了的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以及与此并存的一切。

那么,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关于外团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当

然,这里存在个体差异,而且同一个人对不同的外团体具有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态度。可是,似乎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倾向,这些倾向一般说来与反犹主义思想中发现的那些倾向是相同的。一种基本的倾向是,把外团体看做是具有威胁性的和谋取权力的。对外团体的谴责往往是从道德上着手的,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对大多数外团体来说,一个基本的特征是,它们客观上比它们所威胁的那些团体要弱一些。有时,这种虚弱被民族中心主义者觉察到了,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减弱民族中心主义者的被威胁感。他是在一个内团体和一个外团体之间看这种冲突的,内团体试图维持或重新获得它的优越地位,而外团体则对过去的创伤耿耿于怀,设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有甚者,这种冲突被认为是永久的和不可解决的;惟一的选择是统治和屈服;所谓的正义就是要由优越的内团体来实行统治,但附属的团体总会愤愤不平,甚至背叛。由于民族中心主义者认为等级制度和权力冲突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他就难以掌握团体关系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取消强权,没有一个团体可以任意控制其他团体的生活)。

对外团体的道德谴责与在反犹主义情境中看到的谴责是相似的;我们再次发现了定型化的东西,即民族中心主义者缺乏理论——除了简单的遗传论之外——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所认为的团体是那样的,以及为什么把团体冲突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团体。

看来,上述的一般观点与民族中心主义者的心理倾向有关,而不是与外团体的实际特征有关。举例来说,许多人对少数民族团体成员有着不好的体验——甚至对包括内团体在内的许多团体成员有着不愉快的体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象和态度,只不过听到了有关这些团体的损毁性评论。从心理学角度上讲,这不是经验本身使然,而是吸收经验的方式

使然。再者,具有偏见的个体容易拒斥他从未接触过的一些团体;他之所以接近一个陌生人,或者接近(探索)一种新颖的文化,并非出于好奇和兴趣,也不是为了接受他(它),确切地说,是出于怀疑和排斥。差异感常常会转化为一种威胁和一种敌对态度。因此,新团体很容易被视做一个外团体。定型,不合逻辑,以及关于外团体的意象——所有这些都与民族中心主义者的心理作用相关,正是这种心理作用,使他们与反民族中心主义者区别开来。

民族中心主义关于内团体的思想,与它关于外团体的思想有着相似的倾向,尽管方向相反。内团体被想像为在道德上、能力上和一般发展上都处于优越地位;它们应当在权力和地位上也占据优势。当内团体的地位降低或受到威胁时,民族中心主义者便倾向于认为自己正在受迫害,变成了受害者。如果一些从属团体试图改善它们的地位,就会被认为是威胁;民族中心主义者无法想像自己会为平等和相互作用而奋斗,因为他们并非以这样的目标来进行思考的。内团体被理想化,并被盲目地服从。服从和忠诚是内团体成员的第一要求。在外团体中被称为谋取权力和结帮图利的东西,到了内团体就转化为正确、自卫和忠诚了。在所有其他方面,内团体均被视做是外团体的对立面:清洁、不挑衅、勤劳、有志向、诚实、遵纪守法和彬彬有礼。因此,同样的价值观,既可用于外团体,也可用于内团体,只是褒贬不一,方式仍是定型化的。

在民族中心主义者的心目中,内团体和外团体的相互作用(而且是一切社会性的相互作用)都是以等级的和权力的关系来加以构想的。团体也好,个体也好,都必须“明确其位置”,而最大危险是某些外团体试图提升它们的地位。同样的概念也用于内团体的结构和功能。例如,在军队里,应当有一系列级别,拥

有特定级别的个体应当服从上级并统治下级。对于儿童来说,理想的家庭情境亦如此:孩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母和长辈,自上而下按指示办事,禁止自发性,遵奉外部强加的价值观。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民族中心主义解决团体冲突问题的办法了。内团体必须保持纯洁和强大。为要实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①消灭外团体;②使它们处于服从地位;③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隔离它们,以防止它们过多地与内团体接触。第一种方式代表了政治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民主价值观的解体。这种方式明显地违背了传统的美国价值观——非暴力、公正、机会均等,致使它在这个国家里极少得到支持。不过,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隔离外团体,使外团体处于从属或服从地位,这种态度是美国民族中心主义的特征。它一方面将民族中心主义者的意象和威胁感完美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其民主价值观在民族中心主义者中间仍旧流行。尽管民主价值观阻碍了民族中心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但是它们也可能在假民主的掩盖下实施歧视和压迫。

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

民族中心主义以定型化了的内团体—外团体区分为基础;它涉及对外团体的负面意象和敌对态度,对内团体的正面意象和顺从态度,以及对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等级考虑和归属(在这些相互作用中,内团体理所当然地占据统治地位,外团体理所当然地处于从属地位)。

注 释

[1]本章由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所撰。

[2]至少在职时,上述这些团体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热点问题——比其他一

些州更加引人注目。

- [3]本项目(23)在战时十分贴切,当然现在不再适用了。应当指出,一个人可能积极支持战争,而对敌人并不持有这种惩罚性的态度,或者说并不持有这种民族优越感。如果这些态度与拒斥大多数其他国家相关,那么,在该量表上得到(民族中心主义)高分的人可能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战时盟友持同样的态度,支持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强硬政策,以保证美国的主权和利益。
- [4]本量表的项目1、3、4、7、9、10取自爱德华兹(Edeards)的“未加标签的法西斯态度”(Unlabelled Fascist Attitudes)量表(24)。爱德华兹的研究和我们的研究均得益于肯德拉(Gundlach, 46)、卡兹和坎特里尔(Katz and Cantril, 117),以及斯塔格纳(Stagner, 112, 113)等人曾经进行过的研究。若干“黑人”的项目则取自墨菲和利克特(Murphy and Likert, 84)。
- [5]由于19个少数民族团体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典型,因此为125个余下的被试计算了分离的信度。得到的值是0.91,与整个团体数值一致。
- [6]如果这个团体中的“天才区间”包括更多的极端民族中心主义分子,则分辨力就会高得多。这种情况由随后被测试的团体的结果所显示。
- [7]虽然项目之间的相关,或每个项目与整个量表之间的相关,对这个团体来说未被计算,但是,相似量表的后来数据表明,单一项目之间的平均相关约为0.4,而每个项目与余下项目之和之间的平均相关为0.6左右。
- [8]关于什么是一种正确的信度没有绝对标准,它们随着测量的变量而变化,随着工具的用途而变化。在本研究中,下列近似的信度标准得到了运用。①0.85以上:允许对个体作出相对精确的测量。②从0.75~0.85:允许对个体作出四分位数系列的顺序安排,即“较低”“较高”和“高”。对于团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来说,结果令人满意。③从0.60~0.75:低水平的正确性,但足以决定一般关系和比较极端的得分者。
- [9]我们感谢哈罗德·卡特博士(Dr. Harold Carter),因为他对他所执教的班级进行了调查。
- [10]每一项目的团体平均分通常是高低四分位数平均分之间的中间值。

在这个意义上说,从项目平均分和分辨力推测四分位数平均分是合理的。

- [11]一般的假设是,在一个特定区域或特定的收入水平上理应抽取“50个人”以上的样本,因为个体水平上的抽样错误将会彼此抵消。这种一般的假设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接受性”是与正在被调查的内容相关联的。
- [12]如果没有许多人的慷慨合作,从如此众多的团体中回收问卷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对下列人士表示感谢:H·伊利奥特博士(Dr. H. Elliott)从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部的班级里回收了问卷;戴维·G·斯密特博士(Dr. David. G. Schmidt)为圣·昆丁的被试组作了必要的安排;卡尔·博曼博士和罗伯特·哈里斯博士(Dr. Karl Bowman and Dr. Rabere Harris)使我们有可能在兰利·波特诊所觅得被试;巴巴拉·寇奇海默博士(Dr. Barbar Kircheimer)为问卷作了安排;埃米利·莫尔顿(Emily moulton)夫人在美国劳务服务处收集问卷;M. E. 克罗斯曼(Malcolm E. Crossman)船长提供了相应的支持;B. R. 麦克肯德莱斯博士(Dr. Boyd R. McCandless)在阿拉米达海事商务官员学校花了许多时间回收问卷。
- [13]看来,有必要在劳动学校中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进行区分,并将前者置于更为广义的“中产阶级”样本中(参见问卷40关于中产阶级样本的讨论)。目前的数字仅指工人阶级成员。
- [14]这个样本仅用来获取问卷45中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信度数据;在其他量表上没有进行过此类统计。
- [15]如前面所说,当问卷向所有到场者进行发放时,只对本地人、白人、非犹太人等被试进行统计处理。这里所报告的人数(N),指的是统计上处理的个案数。
- [16]这些问卷由J. F. 布朗博士(Dr. J. F. Brown)在埃米利·格鲁恩和卡罗尔·克里顿(Emily Gruen and Carol Creedon)的帮助下进行回收。
- [17]本章对各个被试组的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将不作详细描述。每一被试组的特征在相应的章节中提出和讨论,例如,第五章讨论政治经济,第六章讨论宗教背景等等。
- [18]这个被试组没有包括在总体样本之中,因为在该样本中,学生的比例

已很大了。这个被试组主要是为了对问卷 45 的量表进行相关分析而选择的,尤其是为了对 F 量表进行相关分析而选择的(参见第七章)。

[19]当然,该结论有赖于我们样本的代表性。可以明确表示的是,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每个四分位数均包含了一些心理上受困的个体。不过,我们也可以假定,由严重受困的个体组成的随机样本,将比目前的样本显示出更高层次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因为目前的样本主要涉及这样一些个体,他们承认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受心理治疗——正如后面几章将会说明的那样,这种人格倾向是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缺乏相联系的。

[20]我们对社会科学理事会深表谢意,他们所赞助的资金使得本研究成为可能。

[21]高低得分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由每个项目的分辨力与总量表的相关来表示;对亚量表来说,由亚量表之间,以及亚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来表示。

[22]关于各种类型的“高”“低”思想,正如我们在访谈材料中所发现的那样,将在第十九章讨论。

[23]“自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思想是一种“动机”。“动机”一词可以用来区分向上或向下的运动(也即在心理上所希望的和所谋求的),也可以用来指受到压抑,或者由于经济失败而导致的外部强加的地位丧失(其中个人仍与较高的社会阶层保持认同)。与此相似的是,一个人可能希望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这种“动机”主要是由于追求舒适和悠闲的欲望;这在心理上与向上运动不同,在向上运动中,“动机”表现为追求地位和权力的欲望,与强大的团体保持认同。

第五章 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团体成员身份^[1]

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促成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以其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以其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此,社会科学家不会提出疑问,甚至大多数外行人也不会提出疑问。在现代工业社会,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已经被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所利用,这些社会政治运动以法西斯主义的、前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特征表现出来。但是,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直接调查这些社会运动和结构——诸如垄断、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工会、政府功能的变化、衰落的中产阶级等——虽然这些东西对于消除民族中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对于民族中心主义借助战争和刻板的社会经济分层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相反,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团体的思想,个体的思想结构,以及与这些广泛的思想模式有关的某些因素。^[2]

那么,哪种模式的政治经济思想与民族中心主义和反民族中心主义的“团体关系”的思想有关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政治角度说,政治倾向的“左—右”维度是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的。法西斯主义代表了最为极端的右翼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也是最为狠毒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民主形式。在民族中心主义中,有一种强调静态的、严格的团体分层思想,这在法西斯

国家可以找到其政治经济的对应表现。反之,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想则强调经济平等,反对经济分层,也就是说,消灭社会分层,因为社会分层是以经济力量的不均等分配为基础的。反对经济分层的思想是最终消除社会分层和外团体剥削的一个重要条件。

……本研究的重点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思想——同时兼顾它们潜在的左—右两极的分化。

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以及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心理学上所说的密切关系。莱文森(Levinson)和桑福德(Sanford, 71)曾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反犹主义与反对工会和社会主义制度(诸如社会化医疗、政府控制计划等)有着显著的相关。再者,一般而言,共和党人要比民主党人更加反犹。纽科姆(Newcomb, 91)、伦兹(Lenz, 67, 68)、墨菲和利克特(Murphy & Likert, 84)、爱得华兹(Edwards)、斯塔格纳(Stagner),以及其他一些学者(63)也都获得过相似的结果。在本研究中,尚未发表的数据表明,保守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都与非美活动委员会,赫斯特舆论,^[3]美国军团(美国退伍军人组织之一)和军事化(战后扩军)的支持明显相关。

右倾—左倾的区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区间。不仅在“左”—“右”之间可以找到至关重要的质的差别,而且在“右”或“左”之间的同一位置上也有着具有质的差别的各种思想阵营。此外,今天出现的许多思想,是与公认的标准相悖的,更不用说它们之间的混淆了。因此,可以期望在许多个体中间出现不同形式的政治思想类别。

尽管存在这些复杂的因素,我们仍想通过类似于前面讨论过的意见—态度量表,沿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区间来测量

政治经济思想。在下面的几节中,我们将关注此类量表的构成和获得的结果;并且,把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与政治经济思想相联系。除了这些量化的结果外,我们还准备对民族中心主义被试和非民族中心主义被试的政治观点进行系统的但非量化的观察(正如访谈所反映的那样)。至于这方面的观察结果,我们将在第十七章讨论。

一、政治经济保守主义(PEC)量表的构成

本研究的量化形式始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PEC)量表的构成,该量表的高分表示极端的保守主义,低分表示极端的自由主义。研究所遵循的程序与构成反犹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程序是相似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区别在于,它既有正面的项目又有负面的项目,而且没有亚量表。本研究使用了同样的测量方式,遵循着相似的项目阐述规则。正如在其他量表的例子中那样,本研究对这种思想领域内的主要倾向也作了初步分析。该分析的意图在于,既要为系统阐述的量表项目提供基础,又要为解释个别的反应模式提供基础。

(一) 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一些主要倾向^[4]

在构建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想包括所有的形式,也就是说,不准备涉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全部表现形式。相反,我们所关注的是某些更加潜在的,从而也是更加稳定的思想倾向,这些思想倾向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可以与政治经济问题形成对照的。由于一些专门的问题[例如,“物价管理”(1941~1946年)、租金控制、邓巴顿

马赛、田纳西河谷当局等问题]始终在变化着,因此,随着问题的变化,可以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对此,我们可以揭示这些问题的深层背景,也就是说,从纯粹的政治水平转向心理水平,以此作为一种区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思想模式的手段。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下列思想倾向上存在明显差别。我们认为,这些倾向是相互关联的,只不过为了分析的目的而将它们分离开来;确实,项目阐述的一个原则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每个项目都应当反映一个以上的潜在倾向。

1. 支持美国的现状

也许,保守主义的组成成分是维护“事物的本来面目”,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和方式。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与这样一种想法(即“现实是正确的”)相联系的是一种使现存当局理想化的倾向,以及鼓吹“美国方式”运作得很好的倾向。至于社会问题,已被置之脑后,不闻不问,或者被归因于外部影响,而不是归因于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固有缺陷。把一些长期的问题合理化的一条途径是,让它们变得“自然”起来,例如,“经济萧条好像偶尔的头痛和胃痛;它对健康的社会来讲,发生一两次也是很自然的”(项目5)。或者,如一位极端保守的电台评论家最近所说的那样:“美国制度没有一点错。它像往常那样优良。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新的一年里消灭诈骗分子和煽动分子,因为他们要对现存的社会问题负责。”很清楚,从这位评论家的演说中可以看到,他的所谓“诈骗分子”主要是指劳工运动的领袖,或者是自由主义政治团体的领袖——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人对当前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下面的一个项目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也就是说,个体的成熟需要遵奉,需要克服“反叛”倾向:“年轻人有时有反叛思想,但是,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应该克服这

种思想,使自己安定下来。”(项目27)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积极地批判现存的当局。这种批判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从适度的改革(例如,扩大政府对商业的控制)到彻底否定现状。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本量表试图区分政治上的右倾和左倾,而不是鉴别各种形式的左翼和右翼思想。

2. 拒绝社会变革

保守主义的另一举措是反对现存的政治经济改革,或者说反对更新的倾向。保守主义者认为,既然现存的东西不错,那么任何变革都可能越搞越糟。有时,对变革的潜在抗拒会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强调谨慎,不容“极端”。例如:“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坚持中间道路,缓慢前进,避免极端。”(项目15)

反对变革的思想被一些精心编撰的关于人性的神话给合理化了,按照这种神话,人类生活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是一对最为理想的搭档。至于自由主义者,却是一群“乌托邦的梦想者”。他们并不依据人类的本来面目看人类。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人类受制于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和利润动机。“一般说来,充分的经济安全有害无益;如果大多数人无须用钱来支付吃住,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工作了”(项目61)。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战争和经济萧条)被认为是人类本性的基本表现,而不是现存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那些改变社会结构的人,主要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一些制造麻烦以便达到其自私目的的煽动分子。总之,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治经济形势是不可能的;人类始终是人类,因此社会变革是不适宜的。

3. 支持保守的价值观

如同在其他思想领域中那样,价值观在组织整个政治经济

思想模式,并赋予其意义中起着关键作用。构成保守主义思想基础的价值体系之一是:关注实践、雄心和上流社会。成功的标志是财富和实力,并以此作为成功与否的条件;商业作为一种职业,被赋予十分高扬的声望。当这些价值观反映在儿童抚育和思想灌输方面时,儿童“应当从幼年起便了解一个美元的价值”(项目 1)。这些价值观还反映在对那些成功的楷模的选择上:“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他必须钦佩像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大王)或 J.P. 摩根(美国金融家)等人,因为他们在成功的道路上战胜了一切竞争。”(项目 71)

实践性和竞争性的价值观正好与另一种价值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与心理活动相联系,也即关于慈善事业和社区服务的价值观。据假设,一方面“许多人已经获得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项目 78)。一个人的能力大小是与其获得社会—经济报酬成正比的。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阶梯低端的人,无须表示怜悯。另一方面,我们的宗教传统又是仁慈和容忍的传统;如果一个人不能原谅穷人,他至少能够减弱他们的困境——用圣诞节聚会、感恩节义卖、孤儿院施恩,以及诸如此类的举措来减弱他们的困境。像卡内基(Carnegie)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那样,把工作日的艰辛与星期天的行善结合起来。对此,项目 8 试图测量:“每个成人应当花点时间或金钱去从事一些有价值的服务(慈善事业、医疗保健等),这是他帮助乡亲的最佳办法。”

可是,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慈善事业主要是一种良心上的安慰。自由主义者认为,贫穷的原因不是穷人天生愚蠢,而是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由于这种政治经济结构鼓吹经济力量的集中,因此贫穷便成了这种集中的表现。消除贫穷的方法不应该在出发点很好但效果甚微的慈善事业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改变社会体制的行动中去寻找。

看来,自由主义者把社会问题看做是社会结构的潜在症状,而保守主义者则把它们看做是个体无能或个体缺德的结果。这种差异也反映在对政治候选人的评价中。保守主义的政客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竞选运动建立在个体性格特征和道德立场的基础上。成为家庭生活的好丈夫和社会运动的领袖,被认为要比了解社会科学或了解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更加重要。律师或商人要比大学教授或劳工领袖具有更多的优点。总之,政治问题应从道德标准而非社会标准来观察。项目 22 的意图就是测量这种倾向:“如果一位政治候选人希望得到人家的投票,那他必须首先具有良好的性格,也即具有与不讲效率、贪污腐化作斗争的性格。”自由主义者的选择并不拒绝“良好的性格”,但认为,在政治事务中,在了解问题和为人民谋福利方面,性格的问题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问题。

4. 关于商业、劳工和政府之间权利平衡的主张

这是一个最具技术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当代政治思想中最易混淆的问题。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数美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成熟,或者消息不灵;他们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大多是比较抽象的问题;两大政党的竞争,少数民族中左翼和右翼集团的宗派主义,美国的反政治和反知识分子传统,等等。语义上的混淆尤其明显。由此推论,“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尤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原本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特征,现在都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了。由于这种混淆,有必要明确这里所运用的保守主义概念,并且使之与其他观点相对照。

保守主义的原意是指传统的经济上放任自流的个人主义。根据这种个人主义,我们的经济生活应以自由的(不加调节的)个体企业家的竞争来予以构思。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为商业提供了巨大的声望,它在与劳工和政府的关系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

社会力量。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工会是具有威胁性的,谋取权利的,干扰经营管理的,鼓吹急剧变革的。只有当工会的实际力量弱于商业的力量时,它才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意味着剥夺罢工的权利,不让员工参与公司的决策,消除工会的功能——总之,不容许改变现存的政治经济力量。项目 68 表达了关于工会的一种自由主义观点:“工会应当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出版专供劳工大众阅读的报刊而变得更为强大。”

传统上,保守主义思想一直主张应将政府的经济干预功能缩至最小程度。对政府力量的恐惧(正如对工会力量的恐惧一样)得到了强化,对个体的自由(尤其是对个体商人)表示巨大关心。这里的问题由于下列事实而被复杂化了:我们的经济已经从大量竞争的企业转变为少数强大的经济单位;第五节将进一步阐述这一情况。例如,“美国的传统里,个人不应受政府干涉的影响,自由地赚钱,随心所欲地花钱。”(项目 63)这种思想方法假设,个人在经济上具有这样的“自由”,没有一种政府的限制可以对他发生作用;但是,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垄断中的经济力量所限制。最大程度地缩减政府的功能,这一试图也延伸到社会安全领域、社会化医疗,以及用来帮助“老百姓”的各种其他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许多左翼思想模式。构成左翼特征,并且使之与右翼区分开来的东西,是变革的愿望,不论这种变革是小还是大,总之,变革的目的是争取力量平衡。对微小改革的支持,可借新政策的自由主义作为例证,它主张强化政府功能,以便减弱商人的控制;加强劳工的力量,消除目前存在的两极性阶级差别。极端的(“激进的”)左翼思想支持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他们的论点是,资本主义必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经济萧条、战争和民众的贫困。因此,惟有通过变革,才能解决

这些问题。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对商业的控制,还有工业的国有化,计划生产,以及为消费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他们认为,只有当生产过程以社会主义为基础而组织起来时,才会有真正的经济民主、经营管理和劳工平等,以及高度的国民生活水平。

然而,本研究并不详尽考察各种左翼思想或右翼思想之间的差别。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试图测量一般的左—右区间(希望个体的反映模式能够精确地反映他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本质)。我们的基本意图是,高分应当表示上述倾向的高程度:对现状的支持,尤其是对商业的支持;支持保守主义价值观;意欲维持一种力量平衡,其中商业居支配地位,劳工居从属地位,而政治的经济功能则缩减至最低程度;以及抵制社会变革等。反之,低分则应当反映对大多数以左为中心的那种倾向的支持:反对现状;从社会视角而非道德或遗传等视角思考社会问题;认同劳工和“百姓”,反对商业力量;支持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功能的延伸。在得出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之后,可以尝试进行各种自由主义模式和保守主义模式的进一步分化。

(二) 第一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78)

问卷 78 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如表 5-1 所示。16 个项目中有 11 个项目采用“保守主义”立场,因此,同意者得高分(+3=7 分, -3=1 分);在 5 个“自由主义”项目中,得分正好颠倒过来。正如从编号中可以看到的那样,项目是随机分布的,遍布 78 个项目组成的系列。问卷于 1945 年春天向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3 个组发放:演讲班女生(人数=140)、男生(人数=52),成人在职心理学班女生(人数=40),以及由 63 个职业妇女组成的一个组(教师、护士、社会工作者)。^[5]

表 5-1 第一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78)

1. 儿童应当从小了解一元美金的价值和效率。
5. 经济萧条犹如偶尔的头痛和胃痛;对于健康的社会来说,偶尔出现一两次萧条是很自然的。
8. 每个成人都应当在某种有价值的服务机构(慈善机构、医疗服务中心等)里花点时间或金钱,这是帮助乡亲的最佳途径。
13. 商人、制造业主、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比起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理论家来,对社会具有更大的价值。
15. 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是走中间道路,缓慢前进,避免走极端。
22. 一位政治候选人若想获得人们的投票,他首先必须具有一种良好的性格,一个与不讲效率和贪污腐化作斗争的性格。
27. 年轻人不免有反叛思想,但是,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必须克服这些思想,并且安定下来。
- 36^a. 社会的责任在于,借助政府的力量,保证人人都有合适的住房、收入和闲暇。
- 44^a. 为全体人民提供适当的医疗保健的惟一途径是实施某种社会化的医疗计划。
- 52^a. 战后,维持或增加公司和富人的所得税是十分基本的。
- 61^a. 一般说来,充分的经济保障是有害无益的;如果人们无须把钱花在吃和住的方面,那么大多数人就不会工作了。
- 63^a. 生活在美国,个体不应受到政府的干预,自由地赚钱,随心所欲地花钱,这是一种基本的美国传统。
- 68^a. 工会应当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出版供大众阅读的劳工报刊等办法来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71. 不管一个人是否喜欢,他必须钦佩像亨利·福特或 J.P. 摩根等人,因为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战胜了一切竞争。
- 76^a. 战后,政府在国家的经济和商务生活中必须比以前起更大作用。
78. 性格、诚实和能力将最终产生影响;大多数人会因此而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标 a 的 5 个项目是“自由主义的”,其他各个项目是“保守主义的”。同意保守主义的项目得高分,不同意自由主义的项目也得高分。

表 5-2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78)的信度

特性	被试组 ^a				
	A	B	C	D	总分
信度	0.74	0.64	0.72	0.81	0.73
平均分(总)	4.30	4.81	4.29	3.91	4.17
平均分(奇数一半)	4.39	4.23	4.34	3.96	4.23
平均分(偶数一半)	4.24	4.12	4.26	3.85	4.11
标准差(总)	0.81	0.75	0.83	1.10	0.87
标准差(奇数一半)	0.96	0.88	0.86	1.28	1.00
标准差(偶数一半)	0.86	0.84	0.96	1.09	0.94
区间	1.5~5.9	2.3~6.0	1.6~5.6	1.5~6.4	1.5~6.4

a. 这 4 个被试组是:A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班女生(人数 = 140);B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班男生(人数 = 52);C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心理学班女生(人数 = 40);D 组:职业妇女(人数 = 63)。

表 5-2 提供了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信度数据。平均信度 0.73 比反犹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信度 0.8~0.9 要低得多;虽然该信度对于精确测量个体并不合适,但是它用于团体比较的目的已经足够了,而且用来求出与其他测量的相关也已经足够了。之所以出现相对来说较低的信度数值,主要原因在于:有些项目可能并未按照计划而设计,或者由于系统阐述不够理想,或者由于错误的导向性假设;这些可能性在下述的项目分析中得到调查。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即极端得分者之所以很少,是因为“天才范围”有限,它降低了所获的信度,而不是因为量表固有的不可靠性。这一假设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由于职业妇女是 4 个组里最为异质的,因此该组获得最高的信度(0.81),以及最大的标准差和区间。最后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很可能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思想实际上缺乏一致性和模式。极端得分者的缺乏也许反映了一种思想的现实,那就是在当代美国缺乏一种充分发展的和清晰可见的政治左倾和政治

右倾。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要想在政治经济思想的量表测量中对各种倾向获得超过 0.80 的平均信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有趣的是,对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所有各组来说,平均分差不多比反犹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高出一分,而职业妇女的平均分则显著地低于其他被试。因此,当保守主义的等级次序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等级次序相似时,保守主义的一般水平要高出很多。可以这样说,与民族中心主义相比,人们更趋向于保守主义,至少从这些量表的测量中可以看出。保守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将在下面充分地予以考虑(见第三节)。我们根据第三章描述的过程对项目进行了分析。表 5-3 显示了项目的平均分和分辨力(属于政治经济量表问卷 78 的数值)。平均分辨率为 2.14,如同信度一样,低于早先量表测量所获得的相应数值。低的平均分辨力(从而还有低的信度)并不是由于若干差项目和若干好项目之间产生抗衡;最佳的项目具有 3.0 的分辨力——从早先测量的标准看并不特别高——而数值却逐渐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最佳的项目探讨了多种倾向:把经济萧条视为自然规律(项目 5);“中间道路”和缓慢的社会变革(项目 15);对现存当局的遵奉(项目 27);还有支持经济保障的“自由主义”项目,强化政府职能和工会的项目(项目 36、61、68、76)。

在具有最低分辨力的 7 个项目中,6 个项目的平均分大于 5.3 或小于 2.4;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倾向于引发几乎一致的同意或不同意的回答(在 9 个最佳项目中,没有哪一项目具有如此极端的平均分)。鉴于回答这些项目的变化大为减少,因此其分辨力要比它们最初出现时更值得注意。只有最低分辨力为 0.32(项目 22)的项目才可被认为是明显的无意义的。对于其他低分辨力来说,高低四分位数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

就一个特定的项目而言,差别不在于一个四分位数表示始终同意而另一个四分位数表示始终不同意;确切地说,它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一个四分位数总是获得极端分而另一个四分位数却更趋中间状态。由此可见,在教导孩子关于一美元的价值这一重要问题上(项目 1),极端保守主义者经常用 +3 来回答,而极端自由主义者则趋向于用 +1 来回答;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而不是实际的对立。还有 4 个这样的项目(1、8、22、71)都谈到了习俗方面的价值观,在这些项目上得极端低分的被试很少,而有 2 个项目(3、44)得了极为少见的高分。对于这些项目,有些以成功的量表形式予以重新阐述,目的是想消除可能存在的不明含意,从而增加分辨力。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对这些项目的一致回答反映了被试(就这些组的被试而言)的实际信念的一致。

由于在 78 个项目系列中大多数项目得到那些在反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等量表上得高分者的同意,也得到得低分者的拒绝,因此,人们也许会提出关于同意或不同意的一个机械“组合”的问题。例如,一个人一旦表示过几个不同意,他是否会在后来不顾项目的内容继续表示不同意呢?这里,“心向”因素得到考虑,尽管在先前的量表中该作用微不足道。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我们可以考虑 5 个“自由主义”项目,也就是那些为通常不同意其他项目的个体所同意的项目。这 5 个项目的分辨力等级区间从 1~13,平均为 7.1,或者说比量表平均分 8.5 稍稍好一些。此外,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极端自由主义者趋向于同意某些甚至“保守主义”的项目。项目平均分的可变性也是对每个项目选择性答案的一个标志。看来,下这样的结论是可靠的,即心向并非是决定回答的主要因素,尽管它也可能作为一个复杂的因素参与其中。

表 5-3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78)^a 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编号	项目	A组		B组		C组		D组		总 ^b		分辨力等级
		平均分	分辨力	平均分	分辨力	平均分	分辨力	平均分	分辨力	平均分	分辨力	
1.	(美元价值)	6.20	1.69	5.94	0.81	6.25	0.88	6.02	1.27	6.10	1.16	(15)
5.	(经济萧条)	3.23	2.09	3.75	1.86	3.40	3.36	2.95	3.73	3.33	2.76	(4.5)
8.	(慈善事业)	5.66	1.35	5.06	1.17	5.73	1.18	5.37	2.20	5.46	1.48	(14)
13.	(商人等)	2.24	1.73	2.54	1.25	2.05	1.94	2.32	1.87	2.29	1.70	(12)
15.	(中间道路)	4.03	2.60	4.44	2.45	4.60	2.71	4.32	3.86	4.35	2.90	(2)
22.	(政治候选人)	6.44	0.31	6.17	0.39	6.50	0.03	6.41	0.60	6.38	0.32	(16)
27.	(反叛思想)	3.71	2.90	3.62	2.05	4.03	2.06	3.83	4.33	3.86	2.84	(3)
36.	(政府责任)	3.46	2.73	3.35	2.41	3.65	3.82	2.43	3.07	3.22	3.01	(1)
44.	(社会化医疗)	2.49	1.64	2.58	1.72	2.45	1.39	1.98	2.00	2.38	1.69	(13)
52.	(税收)	3.73	2.02	3.69	2.58	3.78	1.76	3.43	2.80	3.66	2.29	(9)
61.	(经济保障)	4.19	2.05	3.94	2.44	3.78	2.85	3.10	3.40	3.75	2.68	(6)
63.	(政府干预)	4.11	1.81	3.95	1.34	4.43	2.02	3.56	4.40	4.01	2.39	(7)
68.	(工会更强)	5.11	2.36	4.83	1.75	4.48	1.74	3.90	3.33	4.58	2.30	(8)
71.	(福特, 摩根)	5.42	1.89	5.21	1.67	5.45	1.46	5.13	3.00	5.30	2.00	(10)
76.	(政府活动)	3.69	2.32	3.35	4.07	3.05	1.11	3.21	3.53	3.32	2.76	(4.5)
78.	(能力作用)	5.14	1.96	4.42	1.52	4.80	2.74	4.62	1.73	4.74	1.99	(11)
	每个项目的平均分	4.30	1.97	4.18	1.84	4.29	1.94	3.91	2.82	4.17	2.14	

a. 4个团体(被试组)是:A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班女生(人数=140);B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班男生(人数=52);C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心理学班女生(人数=40);D组:职业妇女(人数=63)。

b. 在计算总平均分,个别团体平均分时没有因人数的加权。

表 5-3 的项目平均分也值得注意。最高平均分出现在表示习俗价值的一些项目之中(项目 1、8、22、71)。项目 2 的平均分(6.38)很高,但其分辨力却微不足道,也许部分原因在于不恰当的阐述,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倾向(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是反对腐败的斗士,而不只是关注民主政府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两个关于“习俗价值”的项目,其分辨力很高,它们的平均分接近中点 4.0,这尤为重要。下列这些项目,即项目 5(中间道路)和 27(反叛思想),似乎反映了基本的人格倾向(它们构成了思想上保守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表面上接受权威并克服反叛倾向。也许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反叛倾向实际上并没有过度发展,而是得到了相当的抑制,因此,对遵奉的强调现在起着一种防御作用,防止对接受的权威抱有潜在的敌意。这一假设(先前在关于民族中心主义者毫无批判地顺从内团体权威的事例中提出过)将在后面几章详加讨论。

在一些直接表露思想的项目中,最高平均分是项目 68(工会更强大),为 4.58。该结果表明,有些被试对工会力量表示恐惧,也许这来自一种对工人阶级的异己感,尤其在众多的中产阶级个体中,表现出这种恐惧。根据量表中反映出来的其他政治倾向,他们是属于“自由主义”的。例如,若干项目(项目 36、44、52、61、76)谈到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的拓展,其平均分都在 4.0 以下,这表明被试对自由主义观点予以相当大的支持。

在“政府”项目上的低平均分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在其他项目上表现出保守主义,但在政府功能上却主张强化政府活动呢?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不一致也许反映了思想的混乱,或者开始从右倾转向左倾。不过,这种明显的矛盾也可能反映了某种更加基本的东西,也就是从传统的放任自流的保

守主义(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放任自流,它的经济单位是个别竞争的商人)向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的转化,这种新型的保守主义的经济单位是有组织的大型企业。正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假设成一种简单的量化维度,只在一般意义上行得通。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指导量表建构的理论是比较详细地被提出的。因此,对一个人来说,他有可能得到一个适度的高分,而不是十分高的分数,这不是因为他具有真正的自由主义倾向,而是因为他的保守主义本质的一种变式。他现在之所以主张拓展政府的职能,并非出于自由主义,相反,他把政府设想成是一种商业工具,而非控制公司资本和防止经济力量集中的一项措施。在讨论了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将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三) 第二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60)

在问卷 60 中,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见表 5-4)被压缩至 14 个项目,并在内容和措辞方面作了许多修改。项目 27 和 60 分别指政治候选人和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它们是在问卷 78 中未获成功的项目,这里予以重新阐述。据假设,目前的阐述是对最初假设的倾向的一种更加明确的表达。在问卷 78 中,有两个项目相对而言运作得很好,它们是项目 27(反叛思想)和项目 61(安全问题),在问卷中它们被置于法西斯主义量表之中(参见第七章),因为从理论上说,将它们置于那里较为合适。

本量表也补充了若干新的项目。项目 13(美国方式)取自问卷 78 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参见第四章);它是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既表示了对政治经济现状的保守主义的支持,也表示了对内团体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理想化。不过,从字面上讲,它似乎应该归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在把这个

项目恰当地置于一个量表或另一个量表之中以前,需要进行相关分析。

表 5-4 第二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60)

- 4^a. 工会应当更加强大,并且具有更大的影响。
- 9^a. 政府对商业的控制应该在战后得以继续。
13. 美国虽然并不十全十美,但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接近了一个人类可能到达的完美社会。
- 15^a. 如果美国有更多的像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那样的人就任,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
- 20^a. 艺术家和教授对社会的价值与商人和制造业主一样多。
26. 美国与俄罗斯合作过密,那将是危险的。
27. 人民想选的最佳政治候选人是这样的人,他的最大兴趣在于与贪污腐化作斗争。
- 31^a. 不该允许一个人的年收入超过 25000 美元。
- 37^a. 政府的责任是保证人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生活水准。
- 43^a. 政府应当拥有并经营一切公共设施(运输、煤气、电力、铁路等)。
- 48^a. 经济萧条可以通过适当的政府规划来加以防止。
- 54^a. 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制,那么我们便可以完全消除贫困。
56. 像亨利·福特或 J. P. 摩根等人,由于他们在成功的道路上战胜了一切竞争,他们应该成为年轻人敬仰和模仿的对象。
60. 一般说来,帮助乡亲的最佳方式是向某种有价值的慈善事业贡献时间或金钱。

标 a 的 9 个项目是“自由主义的”,其他 5 个项目是“保守主义的”。同意保守主义项目得高分,不同意自由主义项目也得高分。

这里有 3 个新项目生动地提示了历史变革的速度。选择项目 15(华莱士)是因为亨利·华莱士正好出任商务部长,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问题。项目 26(俄罗斯)反映了战后出现的一种气氛;当时,在俄国问题上,美国采取合作态度而不是遏制态度。项目 31 是指罗斯福总统关于年收入限制在 25000 美元的建议。

应该指出的是,问卷 60 要比问卷 78 更少阐述一般原理,而更具体地提到一些特定问题。

问卷 60 在 1945 年夏季向若干团体发放。这些团体为了统计的目的而被结合如下:(a)俄勒冈大学女生(人数 = 47),她们是参加夏季心理学课程学习班的学生。(b)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人数 = 54),俄勒冈大学组由于建组太晚而未能被包括进(a)组;加利福尼亚组是夏季教育班,主要涉及教师和大学年龄以上的其他人。(c)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人数 = 57),他们来自与(b)组女生相同的班级。(d)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人数 = 68),包括基瓦尼斯俱乐部、狮子俱乐部和旋转俱乐部等。^[6]

后面 3 个组在一次调查会上接受了整个问卷 60 的调查。可是,俄勒冈大学女生接受 A 和 B 两部分问卷。A 部分包括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一半量表,B 部分包括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余下一半量表。这样组合的目的是想确定民族中心主义项目的存在是否会对法西斯主义项目的回答产生影响,其结果将在第七章讨论。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问卷 60 的信度数据如表 5-5 所示。平均信度 0.70 实质上与原表的 0.73 信度是一样的,说明措辞和内容的更改并未影响量表的特性。在这 4 个被试组之间,信度、标准差和区间的变化十分小,从第一个量表(问卷 78)得到的信度、标准差和区间也非常之小。该事实说明,这样长度的量表和这种程度的包容性几乎不能期望获得大于 0.7~0.8 的平均信度。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相比,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相对来说信度较低,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在今天的个体身上,与团体关系的思想相比,政治思想较少具有组织性和一致性。

表 5-5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60)的信度

特 性	被试组 ^a				总分 ^b
	I	II	III	IV	
信度	0.73	0.69	0.69	0.70	0.70
平均分(总)	3.72	3.82	3.77	4.40	3.92
平均分(奇数一半)	3.86(A) ^c	3.60	3.55	4.06	3.74 ^d
平均分(偶数一半)	3.85(B) ^c	4.03	3.99	4.68	4.23 ^d
标准差(总)	0.90		0.80	0.92	
标准差(奇数一半)	0.97(A) ^c		0.78	0.95	
标准差(偶数一半)	1.02(B) ^c		1.05	1.14	
区间	1.2~5.6	1.0~5.5	1.2~5.0	1.6~6.1	1.0~6.1

- a. 4 个被试组是:第一组:俄勒冈大学女生(人数 = 47);第二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人数 = 54);第三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人数 = 57);第四组: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人数 = 68)。
- b. 在计算总平均分时,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没有因人数而加权。
- c. 符号(A)和(B)指的是为第一组提供的两个部分问卷;(A)部分包括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一半量表,(B)部分包括其余的一半量表。这个组的信度建立在 A 和 B 之间的相关之上。
- d. 由于问卷(A)和(B)与整个问卷的奇数和偶数不对应,因此,总平均(奇数)(偶数)和标准差(奇数)(偶数)只包括采用整个问卷的三个组。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团体平均分再次比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第四章)上的团体平均分显著地高出一截,这表明保守主义水平要比民族中心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团体平均分的等级次序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等级次序相似,服务俱乐部男子要比结合而成的大学生组更具保守主义(处于一个百分点水平以上)。这些事实引导我们期望: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之间存在一种明显

的相关(参见第三节)。由于服务俱乐部男子相当保守(平均分为4.4,最低分为1.6),因此不能认为这个组在思想上是异质的;事实上,它像其他组一样,显示出同样程度的内在变化性(区间和标准差)。我们被再次告诫,不要仍按老一套的思路把团体和团体成员想像成思想的决定因素。按照本研究的策略,服务俱乐部是“保守主义的团体”,因为团体策略和团体领导(至少在这个例子中是如此)反映出平均程度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传统,以及团体的商业利益。但是,如果根据这样一个保守主义团体,推导出全体成员都是强硬的保守主义者,那是不科学的。与此相似的是,并不是所有自称为“新政的民主党人”在其个体思想中都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的,也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支持信仰天主教的议员的政治纲领,等等。这是一个将心理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时产生的问题;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只是团体身份的一个产物。对于这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关于项目分析的数据如表5-6所示。

正如可以从相似的信度中所期望的那样,总分辨力2.08差不多与第一个量表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总分辨力2.14是一致的。最佳项目大部分集中在政府职能、设施的所有权、对商业的控制、对收入的限制等方面。项目4(工会)运作得比较好(等级排序为6),尽管它的总平均分很高,为5.35;甚至在大学组里,平均分也没有落到5.0以下。项目5(华莱士)的情况相似,它的分辨力居于第三位,尽管平均分为5.0。其他一些超过2.0分辨力的项目有13(美国方式)、54(贫穷)和56(福特,摩根)。

5个最差的项目也值得一议。其中的3个项目,即项目20(艺术家,商人)、项目7(政治候选人)和项目60(慈善机构),是问卷78中较差项目的重新阐述。在所有被试中,几乎人人都同

表5-6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项目(问卷60)^a的平均数和分辨力

编号	项目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总 ^b		分辨力等级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平均	分辨力	
4.	(工会)	5.43	2.65	5.06	2.64	5.26	1.60	5.65	2.76	5.35	2.41	(6)
9.	(政府控制)	4.43	3.54	4.81	2.26	4.39	2.29	5.87	2.82	4.88	2.89	(2)
13.	(美国方式)	4.15	1.97	4.91	2.22	3.77	3.08	4.68	2.16	4.38	2.36	(7)
15.	(华莱士)	4.79	3.00	4.72	2.64	4.65	2.33	5.84	2.51	5.00	2.62	(3)
20.	(艺术家和教授)	1.17	0.03	1.22	0.38	1.51	0.14	1.87	1.15	1.44	0.41	(14)
26.	(俄罗斯)	2.94	2.49	2.54	1.47	2.30	1.52	2.51	0.93	2.57	1.60	(10.5)
27.	(政治候选人)	4.00	0.74	3.30	0.34	3.44	1.19	3.21	1.99	3.49	1.06	(13)
31.	(年收人)	4.51	2.22	4.74	1.98	5.17	3.42	5.56	2.12	5.00	2.44	(5)
37.	(政府和工作)	4.21	2.46	4.72	3.72	4.67	1.27	5.38	2.99	4.74	2.61	(4)
43.	(设施)	4.47	3.94	4.93	2.77	4.61	3.48	5.82	3.23	4.96	3.36	(1)
48.	(经济萧条)	2.87	1.90	2.76	0.85	3.09	1.30	4.41	1.94	3.28	1.50	(12)
54.	(贫困)	4.02	2.69	3.63	2.02	4.21	1.86	4.31	2.38	4.04	2.24	(8)
56.	(福特,摩根)	2.77	1.13	3.22	2.12	3.00	1.75	3.34	3.13	3.08	2.03	(9)
60.	(慈善事业)	2.38	1.54	2.87	1.73	2.47	0.91	2.88	2.22	2.65	1.60	(10.5)
	每个项目平均分	3.72	2.16	3.82	1.94	3.77	1.91	4.40	2.31	3.92	2.08	

a. 第一组:俄勒冈大学女生(人数=47);第二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人数=54);第三组: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人数=57);第四组: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人数=68)。
b. 在计算总平均分时,个别团体平均数没有因人数的不同而加权。

意这样的主张,即艺术家和教授像商人一样重要,尽管自由主义者要比保守主义者更强烈地表示同意(只有在服务俱乐部男子组里,这一项目差异才具有统计意义)。项目 27 的分辨力为 1.06,在统计上有意义,表明高低四分位数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进一步的研究是需要的,以便确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关于“良好的政治候选人”的潜在想像的差异。项目 48(经济萧条)是一个充分予以理会的例子。在第一个量表中,该项目的分辨力等级为 4.5;在第二个量表中,经过项目修改以后,它的等级为 12。项目 26(与俄国合作是危险的)的平均分和分辨力有点令人惊奇。平均分 2.57 表明极少数人同意这个项目;1.60 的分辨力比它在第一个量表中更引人注目。虽然平均分较低,但它表明,随着战争的结束,即使在保守主义者中间,对俄国问题也有分歧。在服务俱乐部男子组里,这种情况更加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他们尽管在许多国内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但是在俄罗斯项目上却得到了 2.51 的平均分和 0.93 的分辨力。至于为什么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试的态度由支持变成了对抗,这已超越本研究的范围了。

这些被试组在一些特殊问题上的得分表明,比之总量表 3.92 的平均分,他们似乎更趋保守。在下列一些项目上(论述工会、商业和政府职能的项目 4、9、15、31、37、43),总平均的区间为 4.74~5.35,因此也是最具分辨力的。看来,在什么东西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最具限定性的问题上(主要集中在劳工、商业和政府之间力量关系的看法等方面),自由主义立场要比保守主义立场较少具体化和较少好斗性。当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从目前的样本中得出的结果究竟有多大的概括性?^[7]不过,一般来说,它们与当代政治舞台上的其他许多发现是一致的。更困难也是更需测定的东西是,面临变幻的政治经济形势,未来的思想

会呈何种基本走向?其发展的心理潜力又如何?也许,在系统地测量并作出心理学解释以后,政治思想的其他组成成分,会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基础。

(四) 第三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45 和 40)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的那样,问卷 45 和 40 的结构主要出于实践性的考虑。有鉴于此,为了容纳其他材料,我们必须腾出一定的空间,并对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进行较大程度的削减。由于两个问卷都只包含 5 个项目(项目之少尚不足以获得可靠的正确测量),所以,严格地说,它们几乎够不上一个“量表”。关于 5 个项目组成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其使用后的推理在第四章已作过讨论和评价;同样的评价也用于目前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看来,运用 10 个项目的量表是较为明智的;但是,目前所用的简短量表有助于我们比较各个被试组,也使研究该量表和其他量表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

问卷 45 和 40 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在表 5-7 中呈示。你们将会看到,5 个项目并不单纯地从统计角度加以选择;确切地说,我们试图将一些分辨力处于最低水平的项目包括在内,而且,重要的是,尽可能包含以前讨论过的思想倾向。头 4 个项目取自问卷 60,作了轻微的改动。项目 17(经济安全性)所涉历史已经缩短;原先,在问卷 78 中,它位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但在问卷 60 中,已被移到法西斯主义量表(见第七章);现在,它又回到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之中,以便与现存的关于政治经济或少数民族团体的思想相联系。项目 17 以及还有其他一些项目,可以包括在我们所实施的各种量表之中;正确定位必须视统计分析而定。

表 5-7 第三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问卷 45 和 40)

- 3^a. 工会应当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具有更大影响。
 7. 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十全十美,但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接近人类可以达到的完美社会。
 11^a. 即便战争已经结束,政府对商业的控制仍应当继续。
 14. 像亨利·福特或 J.P. 摩根等人,由于他们在成功的道路上战胜了一切竞争,因此他们是所有年轻人敬仰和模仿的对象。
 17. 一般说来,充分的经济保障有害无益;这是因为,如果大多数人不愁吃和住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工作了。

标 a 的两个项目是“自由主义的”,其他各个项目是“保守主义的”。同意保守主义项目和不同意自由主义项目者均得高分。

问卷 45 和 40 于 1945 年下半年和 1946 年上半年实施。关于抽样的方式和问题,以及团体的组成(包括为了统计的目的而进行的被试结合),已经在第四章中讨论过了。这里,仅列举一下构成样本的一些被试组。

问卷 45 的样本包括 4 个组:(a)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测验班女生(人数 = 59);(b)加利福尼亚州圣·昆丁监狱男犯(人数 = 110);(c)和(d)精神病诊所女病人(人数 = 71)和男病人(人数 = 50),他们主要是旧金山一个社区诊所的门诊病人。

问卷 40 的样本包括下列几组:(e)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人数 = 132),他们是心理学日校班和夜校班的成员;(f)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人数 = 63),主要来自旧金山海湾地区基瓦尼斯俱乐部和旋转俱乐部的成员;(g)和(h)中产阶级男子(人数 = 69)和女子(人数 = 154),主要来自当地各种团体的成员,如教会、女子俱乐部等;(i)和(j)工人阶级男子(人数 = 61)和女子(人数 = 53),成员来自当地的团体,例如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仓库工人工会、加利福尼亚劳工学校等;(k)和(l)洛杉矶男子(人

数 = 117)和女子(人数 = 130),该组成分不同,主要是一个有洛杉矶当地团体组成的中产阶级样本。在这些统计单位中,关于某些亚团体的数据,将在后面的第五节加以考虑。

此外,还有两个组也被提供了问卷 45 和问卷 40。第一个组是商船高级船员学校(前面,我们曾以“海事学校”的名称提到过这组被试)(人数 = 343),其中为一半人发放问卷 45,为另一半人发放问卷 40,他们在智力、求学时间,以及作为高级船员的基本职能(甲板管理工作或发动机操作)方面均相等。第二个组来自美国职业介绍所从事就职指导的退伍军人(接受指导的时间已有几个月),头 51 人接受问卷 45,余下的 55 人接受问卷 40。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确定某些民族中心主义项目对被试回答法西斯量表是否起作用。对此,第七章将作详尽讨论。

鉴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简短形式,我们打算统计任何信度。每个组获得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在表 5-8 中呈示。

表 5-8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分数的平均分和标准差(采用问卷 45 和 40 的一些团体)

被试组	统计特性					
	人数	平均分	等级	标准差	平均分	EA 等级
a. 采用问卷 45 的被试组						
在职测验班女生	59	4.33	(4)	1.28	3.77	(12)
圣·昆丁监狱男犯	110	4.68	(2)	0.96	5.33	(1)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71	4.12 ^a	(11)	1.53	4.23	(5)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50	4.14 ^a	(10)	1.40	3.92	(7.5)
总计 ^b	290	4.32		1.29	4.31	
b. 采用问卷 40 的被试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32	4.30	(6.5)	1.13	4.04	(6)
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	63	4.83	(1)	1.31	4.31	(4)

被试组	统计特性					
	人数	平均分	等级	标准差	平均分 EA	等级
中产阶级男子	69	4.30	(6.5)	1.52	3.89	(10)
中产阶级女子	154	4.26	(8)	1.62	3.64	(14)
工人阶级男子	61	3.39	(13)	1.58	3.92	(7.5)
工人阶级女子	53	3.25	(14)	1.53	3.91	(9)
洛杉矶男子	117	3.91	(12)	1.49	3.82	(11)
洛杉矶女子	130	4.16	(9)	1.41	3.71	(13)
总计 ^b	779	4.05		1.45	3.91	
c. 采用两个问卷的被试组						
海事学校男子						
问卷 45	179	4.31				
问卷 40	164	4.32	(5)	1.08	4.95	(2)
职业介绍所男子退伍军人						
问卷 45	51	4.35				
问卷 40	55	4.37	(3)	1.28	4.43	(3)
总计 ^b	449	4.34		1.18	4.69	
d. 所有各组合计	1518	4.19		1.37	4.13	

- a. 精神病诊所病人组由于同时使用两个问卷,使得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结果有点复杂化了。上述数据取自 45 名女子和 29 名男子,他们采用问卷 45 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余下的 26 名女子采用问卷 60 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14 个项目),平均分为 4.05,而 21 名男子的平均分为 4.04。47 名男子和女子是采用该量表的混合组,信度为 0.77,标准差为 1.05。这些数值可以与采用问卷 60 的其他组的数值作比较。
- b. 在计算总平均分,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没有因人数而加权。

团体平均分似乎呈三种不同水平。两个最保守的组是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组(4.83)和圣·昆丁监狱男犯组(4.68)。在中间水平上,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平均分为 3.91~4.37(比第一种水平稍低,但比第三种水平稍高),构成了整个样本的主体。

它们是大学生组、精神病诊所病人、中产阶级组和洛杉矶组。最后,是最为自由主义的组——尽管平均分 3.25 和 3.39 远不是极端的,但是每个组的内部变化却是巨大的——它们是工人阶级男子组和女子组。

对于服务俱乐部男子来说,获得最高平均分并非一种新发现,它说明量表提供了对保守主义的有效测量。在支持保守主义思想的众多倾向中,这些被试的传统是相当明确的。你们也许还记得,在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组里,也可找到类似的结果(问卷 60)。不过,我们必须强调这个组与其他组的不同。

圣·昆丁监狱男犯的保守主义可能会使这样一些人吃惊,他们把罪犯想像成是社会秩序的蓄意破坏者,认为犯罪和激进主义之间具有心理上的亲近性。人们也许会期望,那些反对现行法律的人,也会趋向于反对当前流行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权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罪犯一方面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又违背社会规则和法律。罪犯不反对严格的个人主义原则,并把这些原则推演到荒诞的程度。圣·昆丁的材料,以及犯罪与反民主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进一步考虑。

保守主义方面的阶级差别问题是由下列事实提出的:工人阶级男子和女子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平均分要比中产阶级男子和女子以及洛杉矶组(主要也是中产阶级)更低。这些差别是否可以推广到更为宽泛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总人口中去?提出这一疑问是有理由的。一方面,工人阶级组在自由主义方面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抽样偏见:这个组几乎有一半成员来自联合电气工人工会(这是一个左翼倾向鲜明的机构)。中产阶级组更加多样化,而且在成员身份方面也更具代表性。除此之外,有些组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平均分与中产阶级组的平均分相似,这些组也包含了比例很大的工人阶级个体,它

们是圣·昆丁监狱男犯(差不多都是工人阶级的个体)、精神病诊所病人,以及海事学校学员和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鉴于团体间和团体内的变化,因此作出下列结论似乎是可行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总体差别并不明显,每个阶级内部的个体与团体的差别却十分明显,以至于它们成为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例如,同样的工人阶级背景,却产生了守法的工人、保守的罪犯、公司的职工代言人、产业工人工会的领袖或共产党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一个身为中产阶级的个体参加了服务俱乐部,而另一个身为中产阶级的个体则成为亨利·华莱士的支持者呢?为什么有些工人认同中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或经济现状,有些身为中产阶级的个体却认同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呢?这些问题可能并不属于阶级或团体成员身份的问题(所谓的“身份”是一个心理变量)。一个人在体现其社会身份时,这种身份不仅决定了他的思想,而且还决定了他打算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后面几章,我们将有机会进一步考虑更为深层的情感倾向,这些倾向有助于决定个体的团体成员身份。

在我们研究过的各个团体中,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密切程度?若想获得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一种方法是比较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团体平均分(见表5-8)。由于大多数被试组采用了缩短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A量表,因此其平均分与那些采用民族中心主义AB量表的被试组的平均分相一致(见第四章)。对于14个被试组来说,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平均分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A平均分之间的级序相关为0.50,表明统计上虽有意义,但两者关系并不十分接近,一般说来,随着团体保守主义程度的增加,民族中心主义程度也增加。在民族中心主义A量表上获得高平均分的4个团体是圣·昆丁监狱男犯(5.33)、海事学校男子

(4.95)、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4.43),以及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4.31)。这些组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排行分别为2、5、3、1。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没有一个组得到明显的低平均分;获最低分的8个组没有一个平均分在3.64~3.92区间之内;最自由主义的组也是最少民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A的总平均分为4.13,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总平均分4.19几乎一致。民族中心主义量表AB的平均分有点偏低,部分原因在于抽样差异,部分原因在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B的项目(4个项目涉及犹太人,1个项目涉及黑人)具有较低的平均分。

可是,级序相关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有许多组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到的平均分比它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到的平均分显著偏高,或者反过来,显著偏低。不论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团体平均分比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团体平均分是高还是低,应该承认,大规模的测量有赖于团体的社会经济阶层:占优势的中产阶级团体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比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分要低一些,而工人阶级团体则似乎更具民族中心主义而非保守主义。让我们考虑一下中产阶级团体:对在职测验班女生来说,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分别为4.33和3.77;对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来说,分别为4.30和4.04;对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的男子来说,分别为4.83和4.31;对中产阶级男女和洛杉矶男女来说,也有相似的情况。在这些关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差异中,只有一种差异低于5%这一统计意义。你们也许还记得,在问卷78和问卷60的样本中(主要是中产阶级被试),保守主义水平要比民族中心主义水平更高些。在工人阶级组里(或者在所谓中产阶级边缘组里),可以找到相反的倾向。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分别为:圣·昆丁监狱男犯是 4.68 和 5.33;工人阶级男子是 3.39 和 3.92;工人阶级女子是 3.25 和 3.91;海事学校男子是 4.32 和 4.95;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是 4.36 和 4.43。余下来的只有精神病诊所的男女病人了,虽然他们所属的阶级不同,但他们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只有细微的差异(0.1~0.2)。

有若干因素(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阶级差别。首先,公开的偏见性描述在工人阶级的言语理解水平上要比中产阶级更易被接受。前者较高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平均分可能部分地反映了这种言语气氛,而不是反映他们对外团体抱有敌意的一种差别(这个因素对于亲内团体的项目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存在着前面讨论过的“假民主”问题,它是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的特征,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项目也许只能部分地防止其发生。再次,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某些倾向,不仅在真正的自由主义基础上对某些工人有吸引力,而且还在一种“阶级—民族中心主义”基础上(它是一般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方面)对某些工人有吸引力。例如,有些工人强烈地亲近工会,而对“老板”愤愤不平。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反对黑人的,排外的,而且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坚持保守主义立场。

总之,团体数据引导我们深入调查民族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既注意那些使相关达到较高水平的东西,又注意那些防止它达到更高水平的东西。当我们考虑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个体在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心理联结时,这些问题将被进一步探索。但是,我们现在必须首先完成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数据的描述。

表 5-9 提供了问卷 45 和 40 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项

目分析的小结。男性和女性的数据分开归纳。女性总平均分 4.07 比男子总平均分 4.25 明显地要低。正如第四章指出的那样,女性要比男性明显地较少民族中心主义。不过,这可能是一个样本的差异而非总人口的差异,因为我们没有女性团体可以与得高分的圣·昆丁、服务俱乐部和海事学校男性组相比较。此外,正如表 5-8 所显示的那样,对所有可以比较的性别组来说(精神病诊所、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洛杉矶),男女的平均分几乎是一致的。由于所采取的抽样方式主要不是用来决定广大人口中意见或态度的平均强度,因此不对整个男性和女性人口作出推论也许是最为安全的。但是,也可以说,对于这里描述的一般类型的团体来说,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况且男子组之间的差别和女子组之间的差别要比男女之间的差别大得多。

表 5-9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项目(问卷 40 和 45)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编号 条目	男子组 ^a (人数 869) ^b			女子组 ^c (人数 573) ^d		
	平均分	分辨力	等级	平均分	分辨力	等级
3. (工会)	4.51	3.16	(4)	4.67	3.49	(4)
7. (美国方式)	4.90	3.33	(3)	4.57	3.98	(1)
11. (政府控制)	4.19	3.08	(5)	3.92	2.97	(5)
14. (福特和摩根)	3.75	3.58	(1)	3.56	3.90	(2)
17. (经济保障)	3.93	3.46	(2)	3.62	3.77	(3)
每一项目的平均分 Ae	4.25	3.32		4.07	3.62	

a. 样本中个别男子组如下:圣·昆丁监狱男犯(人数 = 110);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人数 = 106);海事学校男子(人数 = 343);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人数 = 63);中产阶级男子(人数 = 69);工人阶级男子(人数 = 61);洛杉矶男子(人数 = 117)。

- b.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男子)的总人数要比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总人数少 100 人,因为删去了两个组:(1)在 50 个精神病诊所男病人中,只有 26 人采用了正常的问卷 45;其他人采用了与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相等的问卷,该问卷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并不相等。由于人数很少,因此对这个组未作任何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分析。(2) 50 个工人阶级男女被用作对民族中心主义量表进行分析的统计组,因为我们要求得到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补充数据;但是,对他们的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却未进行统计分析。
- c. 本样本中的个别女子组如下:在职测验班女生(人数 = 59);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人数 = 132);精神病诊所女病人(人数 = 45);中产阶级妇女(人数 = 154);工人阶级妇女(人数 = 53);洛杉矶妇女(人数 = 130)。
- d. 这个人数比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的妇女总人数少 26 人,因为 71 个精神病诊所女病人中只有 45 人采用了问卷 45;余下的 26 人所采用的问卷(就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而言)相等于问卷 45,但它并不适用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
- e. 在计算总平均分,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没有因人数而加权。

在关于个别项目的平均分和分辨力方面,男女亚样本也是十分相似的。由于女性的量表平均分较低,因此项目平均分对两性而言近乎一致,级序相关为 0.90。只有在一个项目上(工会),女性比男性更加保守。类似的关系也适用于分辨力,级序相关为 0.70。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由 5 个项目组成的量表要比由 14 个项目组成的量表稍大一些,因为前者的每个项目对总分的贡献更多。所以,分辨力水平就问卷 45 和 40 而言,平均分分辨力 3.4 ~ 3.5 是可以与问卷 78 和 60 的平均分辨力 2.1 进行比较的,前者高于后者。本研究的所有项目在统计上似乎都是合适的。项目 11(政府对商业的控制)具有最低的分辨力,但是,鉴于在第

二个量表中“政府职能”的项目获得较大成功,因此改进该项目应当说不会有太大困难。虽然 5 个项目几乎构不成一种“量表”,但是它们却表现出充分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人们可以有意义地谈论“整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分数”,而且确定这个分数与其他各种测量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也可以通过一种相关分析来表明,这种相关分析是对一个由 517 个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组成的团体进行分析而获得的。^[8]在每个项目与其余项目之和之间找到了平均相关系数 0.26,相关系数的区间为 0.10 ~ 0.33。这些项目的级序(根据项目的相关与其他项目之和的大小)与前述女性混合组的项目分辨力的级序是一致的(见表 5-9)。个别项目之间的相关平均为 0.14,区间为 0.02 ~ 0.30。最高相关 0.30 出现在项目 7(美国方式)和项目 14(福特和摩根)中。只有 3 个相关系数低于 0.10(一个百分点水平),这三个相关系数均涉及项目 11(政府控制)。由于这些相关远低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相关,因此它们表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满足了本研究所提出的最低要求,并且表明由 20 ~ 30 个这类项目组成的量表可以达到接近 0.80 的信度。

(五) 讨论: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若干模式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信度和内在一致性,表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当代政治经济思想中一对有组织和可测量的模式,而且在这对可概括的模式中,每一种模式还包含相当多的亚模式以及不一致性。如果对相对的概括性或相对的不一致性视而不见,那么就会导致对问题的严重误解。至于这些思想倾向的本质,以及更为深层的心理学意义的探讨(这些思想倾向往往在访谈中反映出来),将在第十七章随着临床材料的提出而进

行。不过,根据量表和某些量表答案的个别模式,我们应当简要地考虑自由主义内部和保守主义内部的某些变化。

自由主义并非一种单一的态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包含着许多倾向或组成成分。量表的信度和内在一致性表明,这些倾向显著地相关,但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根据我们的指导性概念,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积极地寻找渐进的社会变革,对现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尽管不一定完全排斥现状),反对或者并不强调各种保守主义价值观和信念(这些价值观或信念涉及商人利益、绝对的个人主义、人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且通过强化劳工力量和政府的经济职能来削弱商人的力量。

但是,有些人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不一定表现出上述的某些倾向,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种不一致既与大众传媒的不足和歪曲有关,也与那些根深蒂固的相当强烈的拒绝变革的情感倾向有关。可是,不论组成个体思想模式的内容是什么,它们是该个体人格的折射,而不仅仅是从思想环境中捡来的意见的汇集。

有一种变化形式在被测团体中尤为普遍,它可以称作政治上不抵抗的自由主义。该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害怕社会力量的集中。这种人一方面敏锐地感到目前社会秩序的不公正,从而同情劳工和其他从属团体,另一方面却不去支持他们争取更大权力的斗争。在他看来,“强大的工会与强大的商业一样危险”。他倾向于强调这样的主张,即工会在有组织的工业社会里不再是一支弱旅,而且,他也很有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受保守主义的论点,认为工会虽然不错,但其力量必须加以限制。他想减弱商业的力量,但发现难以直接抗拒它——“毕竟我们也有可能像它们一样糟”。他主张拓展政府的经济职能,强调某种

程度的工业国有化,但对政府力量的恐惧又常常导致他反对自由主义的措施,或者支持那些成效甚微的不彻底措施。他反对武力,倾向于把武力与好战混淆起来,对双方都持批判态度,或采取妥协措施。面对政治行动,常常表现出犹豫不决或无能为力,并容易为政治事件所震惊。他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很可能获得中等分数而不是低分。这种分数不是出于真正的保守主义,而是出于受抑制的自由主义;人们也许会说,他有一种“自由主义的”空想,但却无法为实现这种空想的思想境界而从事社会变革的战斗,他批评现状,同时却害怕变革;他不喜欢屈服,但却不作反抗;他对现状不持积极态度,但也不反对它。

我们并不想对各种左翼思想进行量化研究。除了激进的和政治上不抵抗的自由主义以外,我们还对决定其他模式的一些因素及其性质感兴趣,例如“觉醒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等等。有些东西导致了后来进行的访谈研究。对此,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讨论。

关于政治权利,需要相似的分化和研究。根据目前的量表,典型的“保守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支持现状,拒绝对已存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变革,主张保守主义价值观和传统,认为劳工是从属于雇主和管理者的。当然,他也想减弱政府的经济职能,以便商人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

由于这种“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在今日十分普遍,因此实际的政治经济形式已经从 50 多年前的状态转变为目的目前这种思想所意指的状态。个体商人或企业家不再是一种原始的经济单位;大型商业和集团经营已经取代了个体老板;生产过程更为复杂,更有组织,而且已是非个人化了;专业化和机械化威胁着个体化。随着劳工和企业更有组织,成为更趋明确的社会力量,政府的作用也日益成为一个问题了。传统的保守主义者陷于困

境。他是否会反对大商业的垄断倾向,要求回到严格的个人竞争中去,并使政府的经济职能降至最低限度,也即推行一种放任自流的保守主义呢?他是否会赞成强化政府的职能,将此作为防止垄断的一种措施,即便这意味着增强劳动力量,偏向自由主义呢?或者,他是否会要求把政府视做的一种商业服务的力量,从而将此作为劳工的对立面(偏向法西斯主义)呢?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似乎仍处于这种或那种思想的调整过程中。看来,还需要进行许多研究,包括研究新的保守主义模式和心理倾向(它们使一些人更容易接受一种模式,另一些人更容易接受另一种模式)。

我们建议,对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可以按照一般的和特定的因素来加以理解。一般的因素(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能够说明有意义的信度或一致性的原因,而左翼和右翼内部的特定变化则使量表难以达到较高的统计标准。

二、民族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

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之间的相关如表 5-10 所示。数值的相关范围从圣·昆丁男犯的 0.14 到工人阶级女性的 0.86,但是大部分数值位于 0.5~0.6 之间。在所得的 29 个相关系数中,只有 4 个小于 0.40,5 个大于 0.70。这些个体得分的相关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5 和 40)团体平均分之间 0.50 的级序相关是一致的。

表 5-10 的数据表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较之民族中心主义的其他组成成分,与反犹主义量表的关系并不密切。在问卷 78 中,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显著相关(除反犹主义量表外),而与反犹主义量表的相关(0.59~0.43)并不显著。就问卷 60 而言,在 12 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

表 5-10 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全部问卷)的相关

	人 数	相 关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与 政 治 经 济 保 守 主 义	反 犹 主 义 与 政 治 经 济 保 守 主 义
A. 采用问卷 78 的组:			
演说班女生	140	0.52	0.49
演说班男生	52	0.55	0.32
在职心理学班女生	40	0.52	0.23
职业妇女	63	0.76	0.69
平均相关系数 ^a	295	0.59	0.43
B. 采用问卷 60 的组: ^b			
俄勒冈大学女生	47		0.48
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54		0.62
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57		0.48
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	68		0.52
平均相关系数 ^a	226		0.52
C. 采用问卷 45 的组: ^c			
在职测验班女生	59		0.60
圣·昆丁男犯	110		0.14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71		0.53 ^d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50		0.55 ^d
工人阶级男女	50		0.75
平均相关系数 ^a	340		0.51
D. 采用问卷 40 的组: ^e			

	人 数	相 关 民族中心主义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	反 与 济 犹 与 保 主 治 守 义 主 义 经 义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32	0.48	
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	63	0.64	
中产阶级男子	69	0.67	
中产阶级女子	154	0.76	
工人阶级男子	61	0.74	
工人阶级女子	53	0.86	
洛杉矶男子	117	0.61	
洛杉矶女子	130	0.52	
平均相关系数 ^a	779	0.66	
E. 采用问卷 40 和 45 的组:			
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			
(问卷 40)	55	0.60 ^e	
(问卷 45)	51	0.49	
海事学校男子			
(问卷 40)	164	0.41 ^e	
(问卷 45)	179	0.38	
平均相关系数 ^a	449	0.47	
采用问卷 40 和 45 的所有			
各组的平均相关系数	1568	0.57	

- a. 在计算总平均分,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没有因人数而加权。
- b. 你们也许还记得,在问卷 60 中,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包含了 4 个反犹主义项目,不存在单独的反犹主义量表。
- c. 在采用问卷 40 的各组中,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问卷 A 相

关,在采用问卷 45 的组中,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问卷 A + B 相关。

- d. 在精神病诊所的被试组中,对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而言,女性人数为 45,男性人数为 29。
- e. 这些相关数值既依据采用问卷 45 的被试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 的分数,又依据采用问卷 40 的被试的分数。

目中有 4 个涉及反犹主义,平均相关系数为 0.52,处于问卷 78 两个项目的中间。既采用问卷 45 又采用问卷 40 的两个组(海事学校男子和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也表明 A 的相关要比它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 + B 的相关更高些(前者为 0.60 ~ 0.49,后者为 0.41 ~ 0.38)。你们也许还记得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 并不包含反犹主义项目,而在 5 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B 的项目中有 4 个涉及犹太人。最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最为显著的相关在问卷 40 上获得(它只包含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问卷 40 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0.66,鉴于两个量表的简缩形式(每个量表只有 5 个项目),该数据是特别有意义的。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在于下列事实:这些项目代表了它们所要表示的思想的一般倾向,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支持现状和保守主义价值观,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则支持内团体和排斥外团体。也许,在一些主要的思想倾向中,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明显重叠,因为这些思想倾向均扎根于同样深层的情感倾向(参见第七章)。至于那些降低反犹主义量表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相关性的特定因素,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就民族中心主义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而言,似乎不存在性别和阶级的差别。在大学生组、中产阶级组和工人阶级组(每组均有可资比较的男女样本),男性的相关系数均比女性

的相关系数低 0.1;但是,在洛杉矶组中,这种倾向被颠倒了过来;至于在精神病诊所的病人组中,此类差异似乎微不足道。上述情况同样适用于阶级差异:在工人阶级男子和女子中,相关性很高,达 0.74 和 0.86。但在其他被试组(主要如圣·昆丁和海事学校组),相关值很低,只有 0.14 和 0.4。导致相关系数大小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组与组的特定性质,而不在于它的性别或社会地位。在这方面,有一点令人感兴趣,即工人阶级男女两组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相关显著,工人阶级男子达 0.74,工人阶级女子达 0.86,同样,两组分别具有最低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平均分(见表 5-8)。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当其他情况(例如标准差)相等时,如果一个组包含着相当强硬的自由主义少数派,那么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就会很高。至于强硬的保守主义者,对相关的影响较少。我们不久将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相关的一般水平表明,民族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正如本量表所测量的那样,是明显地联系着的。^[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保守主义者要比自由主义者更具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一个人越是保守,他就越有可能成为民族中心主义者——但是,这只是一种或然性,而非一种必然性。由于在这些思想形式之间彼此的关系较为亲密,正如前面已经观察到的那样,这种相关也许算不上是一项惊人的发现,它只是表明了量表的正确性。对于那些没有意识到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之间关系的人来说,这种相关的意义有可能得到强调。对于那些把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等同起来作为个体的一种心理倾向的人来说,这种相关是远远不够完美的。即使有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可靠测量,民族中心主义的相关平均分也很难超过 0.70(这个数值尚不适合

于预言的目的)。因此,有必要了解在个体的这些思想形式中间哪些东西导致了这种密切的联系,了解哪些系统因素使得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小于 1.0。

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也为它们的潜在倾向的某些相似性所揭示。支持占优势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权威,显然是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屈服于权威。与此相似的是,民族中心主义对外团体排斥,在政治经济领域也由抗拒社会变革而表现出来,或者说通过下列倾向表现出来:把渐进的政治思想归入“外国的”标题之下,认为外团体和思想是对内团体权威的威胁。这两种思想之间的相互联结,以及鉴于研究的目的而难以将它们分开的现象,在一些量表的项目中也反映出来。例如,“美国虽然并不十全十美,但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接近于人类可能到达的完美社会”。对这种思想的支持,既表达了政治经济的保守主义,又表达了内团体的理想化(这是民族中心主义的特征之一)。“在过去的 5 年间,对崇美思想的最大危险来自外来思想和煽动者”,这个项目是政治化了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另一个例子:我们再次发现,有些人会为了社会问题而责怪外团体,把外团体视做一种威胁。

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中心主义之间也存在联系,对此说法的理论依据是:两者都倾向于批判占统治地位的当局和传统。对民众(工人、“老百姓”“弱者”和“被践踏者”)的认同往往是左翼政治思想的一个中心题材,它在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和反对歧视外团体的言行中反映出来。确实,当青年中间形成一种左翼的政治观点时,它往往是从反犹主义或反黑人的不公正行为开始的;当从属团体的同情意向拓展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时,从“团体关系”向“政治经济”思想的过渡开始了。自由主义—激进观

点的进一步发展常以意象和态度为基础,它们与那些潜在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相一致:反对等级,反对支配—屈服,消除阶级和团体,强调平等的相互作用,等等。

我们还必须考虑“相关性降低”的因素。鉴于上述的理论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不是很高呢?本研究的数据提示了若干假设。每个样本的相关图示表明,许多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的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也得低分。但是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的人,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却因立场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也许,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而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的组,构成了前面讨论过的“政治上和平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被试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而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民族中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如果有的话,则这些个体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者要比得低分者更容易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发生变化。由于许多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也往往得高分,因此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和低分的人,便是非民族中心主义的保守派。换言之,强烈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反民族中心主义的适当指标,但是,政治保守主义却不一定与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

当我们试图解释保守主义者在民族中心主义方面的可变性时,我们应该注意“真”“假”之间的区分。我们在前面讨论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第四章)时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可能在政治上保守,但他不一定是民族中心主义者,正如一个人可能是爱国的(从坚定地依附于美国文化和传统意义上说),但他不

一定是民族中心主义者一样。我们想用“真正的保守主义”这个术语来意指具有这种概括性思想模式的人。他总是认真地关注美国民主传统中最具活力的东西。例如,他相信利润动机的重要性,承认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现实,但他又主张“市场之争,优胜者胜”的法则,而不管胜者的社会背景如何。他虽然拒绝社会变革,但却谴责国家的和政治的内团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为僵化和敌意(民族中心主义的特征)所控制。

民族中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是假保守主义者,因为他的民族中心主义背离了与民主价值观和传统相对应的倾向。他是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性”的代表。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那样,他的政治经济观是以同样的潜在倾向(屈从权威,依靠置换,以及借助向外团体进行投射来无意识地处理对权威的敌意,等等)为基础的。反民主变革的心理潜能竟然来自那些自以为代表民主传统的人们,这确实是自相矛盾的。由于假保守主义就是假民主主义,而他们需要的又恰恰是使用武力和压迫,以保护神话式的“崇美主义”,因此,它与美国历史上最具生动的东西毫无相似之处。

对于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的被试来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补充假设。这些人可能是假保守主义者,他们通过改变传统的(个人主义的)保守思想,来跟上实际的政治经济变革。他们既强调个体价值的竞争和实现,又支持商业垄断或经济力量的集中(后者是对个体商人的最大威胁)。他们既强调经济的流动性和“霍雷肖·阿尔杰”神话(Horatio Alger myth),^[10]又支持各种形式的歧视,主张对人口的流动性施加严格的限制。他们之所以相信政府经济职能的拓展,不是为了人道的原因,而是把它视做限制劳工和其他团体力量的一种措施。

上述的保守主义并非“现代的保守主义”。确切地说,它具有有一种全新的含义:摆脱个人主义和机会均等,赞成严格的分层社会(其中只有极少的经济流动性,“正确的”团体掌权,而外团体处于附属地位)。也许,“反动”这个术语最适合这种思想了。它的最终结果是法西斯主义。由于它不属于放任自流的保守主义,因此可以把它视做是一种对保守主义的歪曲——这种歪曲保留了某些表面的相似性,但却改变了基本结构,使之成为其原始状态的对立面。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处于中间状态”,因此,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了解心理倾向,它们有助于确定个体思想的新动向。

上述关于政治上左—右思想形式的区分,只是一种假设,目的是帮助我们解释量表的结果。^[11]如果这些假设得不到证明,便需要其他假设。这是因为政治思想不能简单地归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范畴;民族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个体对政治思想的可接受性(正如他们接受“团体关系”的思想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深层的人格倾向为基础的。

三、个案研究的证实:麦克和拉里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回答

为了判断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正确性,我们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一样,比较了麦克和拉里对量表的回答,并把它们与访谈材料联系起来考虑(像第二章一样)。这两个被试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分数,包括问卷 78 中 16 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项目的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在表 5-11 显示。

表 5-11 麦克和拉里对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回答

编号	条目	麦克	拉里	团体 ^a 平均分	团体 ^a 分辨力
1.	(美元的价值)	6	7	6.10	1.16
5.	(经济萧条)	5	1	3.33	2.76
8.	(慈善事业)	3	7	5.46	1.48
13.	(商人、艺术家)	1	1	2.29	1.70
15.	(中间道路)	7	5	4.35	2.90
22.	(政治候选人)	7	7	6.38	0.32
27.	(反叛思想)	5	6	3.86	2.84
36.	(政府责任)	2	1	3.22	3.01
44.	(社会化医疗)	2	6	2.38	1.69
52.	(税收、公司)	2	3	3.66	2.29
61.	(经济保障)	6	6	3.75	2.68
63.	(政府干预)	5	1	4.01	2.39
68.	(工会更强大)	6	2	4.58	2.30
71.	(福特、摩根)	7	6	5.30	2.00
76.	(政府作用)	2	2	3.32	2.76
78.	(能力的影响)	7	6	4.74	1.99
每个项目的平均分		4.56	4.19	4.17	2.14

a. 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均根据采用问卷 78 的 4 个被试组。

这两个人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得分与他们在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得分相比十分相似。拉里的平均分 4.19 与团体平均分差不多,而麦克的 4.56 也高不了多少。就这两个被试所属的演说班男子组而言,麦克正好在高的四分

位数中间,拉里正好处于其下。在16个项目中,两人有11个项目的得分相差不超过1分。可是,如果注意一下个别项目的话,可以看到相似性限于政治经济思想的某些领域;在其他领域则有显著差别。

麦克和拉里对一般的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支持是十分相似的。两人都同意(而且是相当强烈地同意)项目1(美元价值)、项目15(中间道路)、项目22(政治候选人)、项目27(反叛思想)、项目71(福特、摩根),以及项目78(能力的影响)。这与访谈的结果相一致:在访谈中,两人都表示了对新政的保守主义的批判。两人也似乎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进步主要取决于他以节俭、决心、工作、诚实、遵奉等价值观来生活。

可是,对其他项目得分的考察表明,麦克和拉里在涉及他们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得以发生的环境方面出现了差异。对麦克来说,这种环境似乎是以阶层内团体为基础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而对拉里来说,它似乎是一种19世纪的自由主义。此类差异在他们对项目5(经济萧条)和项目68(工会更强大)的不同反应中表现出来。麦克认为经济萧条是“自然的”,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我们的社会利益不够分配,因此必须把它们的主要部分给予“合适的人”,也就是给予内团体。这个内团体并不包括有组织的劳工(项目68),也不包括各种少数民族团体(这些团体是他在回答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时加以排斥的)。对麦克来说,这是他表达其倾向的另一种方式。它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也即对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关系的考虑作出严格的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可是,另一方面,对拉里来说,进步的价值并不排除他人,他人也有进步的可能性。他似乎按照一种拓展的经济学来进行思考,在这种拓展的经济学中,工人起着重要的作用(项目68),所以经济萧条是不该出现的(项

目5)。在拉里的访谈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不作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并对经济繁荣的可能性持乐观的态度。

两人均不反对政府参与国家的经济生活(保守主义是反对的):对于项目36(政府责任)、项目44(社会化医疗)、项目52(税收公司)、项目63(政府干预),以及项目76(政府作用)等等,两人具有同样的低平均分,即2.60。不过,他们所依据的理由似乎是不同的。当我们考虑他们对整个量表的回答时,麦克偏离了放任自流的保守主义,进一步采取政治经济上右倾的立场。他拒绝工会,认为经济萧条不可避免,这一事实表明他所赞成的强有力的中央控制并非使经济计划有利于全体人民;确切地说,他思考的是内团体的统治,许多人被排除在这一内团体之外。他确实排斥大多数人,这在他对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只有当他考虑到政府干预个人“赚钱和随心所欲地花钱”(项目63)这一自由时,他才是反政府的。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的中央控制的主张是政府和强大的商业利益的结合。看来,麦克比较接近16个项目中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范围,并且,从他的访谈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假保守主义的形式。

另一方面,拉里偏离了一般的保守主义立场,进一步向左靠拢。他不仅支持政府的社会责任(项目36和76),而且还接受了对个人和公司利润进行限制的主张(项目52和63)。他用强烈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和亲商意识来调和这些观点,他的信念是:政府的任务是使人们既不拥有太多也不一无所有,惟有这样的措施,才能使那些愿意努力工作的人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而不造成别人的苦难。

根据上述的分析,也根据第二章关于麦克和拉里的访谈,可以看到,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中0.37的平均分之差,尚不

足以反映两人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右一左之间的实际距离。不过,正如前面一节所讨论的那样,假保守主义(以麦克为代表)和真保守主义(以拉里为代表)之间的差异既是量的差异,又是质的差异,而且,从量化的意义上讲,麦克更趋极端。

四、各种政治经济团体中民族中心主义 和成员身份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已经考察过由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测得的政治思想本质,以及这些思想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数据还反映了在民族中心主义上团体之间的差异。因此,接下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各种政治经济团体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有何不同?关于这些团体的资料(政党的偏爱、父母的偏爱、成员的身份、收入的水平等),在问卷的第一页上便可获得,因此有可能为每个组计算民族中心主义的平均分。^[12]

我们首先考虑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团体偏爱之间的关系。

政治团体偏爱是由若干问题来体现的。首先,“你最喜欢什么政党或团体?”其次,“你对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以及传统的共和党人感觉如何?”对每一问题要求被试在4种选择中作出一种选择:很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根据被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由两个评价者来确定该被试的“团体偏爱”(半独立判断)。每个被试能被很容易归入这样或那样的类别中去:(1)“完全的”民主党人(支持党内的派别之争);(2)反对新政的民主党人;(3)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4)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5)传统的共和党人;(6)“完全的”共和党人(支持党内的派别之争);(7)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和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支持这两组并反对其他组,但不表

明特定的党派偏爱);(8)共产党人;(9)社会主义者;(10)公民和产业工人联合会政治行动委员会;(11)不作决定(从第一个问题起就写“未定”);(12)反对一切党派;(13)无党派;(14)自我矛盾(例如,支持传统的共和党人和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但不提供任何党派偏爱);(15)空白。

表5-12提供了个案数(N),以及每个政治团体的平均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分数,并为每个测试的样本和采用问卷的样本提供了上述的个案数和分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个样本中的新政民主党人与该样本中的另外一些政治团体进行比较,或者与接受测验的所有新政分子的总分进行比较,或者与接受测验的所有被试的总分进行比较。^[13]

首先可以进行考察的是底线上的个案数和平均分。民主党人(纵行1~3)与共和党人(纵行4~5)之比大致是10:7,这个数值近似于1944年加利福尼亚州选举的登记数字。可是,新政民主党人与“结合的自由主义团体”(纵行17)之比差距较大。因此,我们似乎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本研究的样本在自由主义方面显示了显著的倾向性——这一抽样因素倾向于降低总体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

看来,以民族中心主义平均程度为基础,可把各种团体归入两个清晰分化的类别。一个是“保守主义者”类别(纵列16:完全的民主党人、传统的共和党人、完全的共和党人),它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的区间为4.17~4.27,平均为4.39。另一个是“自由主义者”类别(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新政—威尔基式的结合、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等),它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的区间为1.25~3.60,平均为3.41。从统计学角度讲,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0.98的差异是有意义的(远远高于10%的水平)。^[14]

表 5-12 各种政治倾向团体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平均分*

被试组	量表平均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完全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3.63	4.33	2.8	3.11	3.9	3.00	1.3	4.19	3.4	3.66	0	0	2	1.15	0	8	2.88	0	2	3.70	(57)	3.79	(69)	2.99	1.40	3.32	1.43									
民主党的支持者	0	3	5.07	1.7	3.25	1.1	3.33	4	4.18	6	3.88	8	2.10	0	3	3.67	0	0	0	0	(13)	4.25	(39)	3.07	5.2	3.34	1.48									
在那些理论学生	1	3.80	6	3.70	1.1	2.57	3.39	4	3.30	2	5.35	0	0	4	2.36	0	4	2.36	0	5	4.24	(13)	3.84	(18)	2.89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0	1	6.00	3.0	2.06	1.2	4.3	3	2.63	8	3.43	0	0	2	1.40	0	3	2.10	0	2	1.65	(12)	3.44	(41)	2.40	6.3	2.57	1.37								
总分	7	3.66	14	4.19	8.6	2.70	6.9	3.17	24	3.84	5.0	3.72	8	2.10	0	7	2.30	0	15	2.63	0	9	3.54	(95)	3.82	(170)	2.85	2.97	3.18	1.45						
采用问卷的组:	2	3.32	2	3.24	14	2.73	6	3.14	4	4.44	13	4.28	3	2.77	0	1	1.16	0	0	0	0	0	0	(21)	4.13	(24)	2.77	4.7	3.42	1.38						
俄勒冈大学女生	3	4.59	4	4.15	1.9	2.95	9	3.26	1	2.49	14	3.24	2	2.37	0	1	1.83	0	0	0	0	(22)	3.56	(31)	2.97	5.4	3.24	1.29								
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2	2.78	2	3.07	1.2	2.95	9	2.08	6	3.45	10	3.67	7	2.32	0	0	2	3.03	0	0	0	0	(20)	3.45	(30)	2.55	5.7	2.93	1.25							
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7	3.71	8	3.70	4.5	2.88	24	2.79	11	3.73	37	3.72	12	2.44	0	4	2.26	0	0	0	0	(63)	3.71	(85)	2.76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的组:	17	4.41	16	4.49	7.4	4.32	12	3.88	13	5.08	12	4.54	3	3.23	1	1.30	3	3.20	0	7	4.86	1	3.30	0	13	4.47	6	4.35	(58)	4.61	(93)	4.16	1.78	4.36	1.60	
海事学校男生	6	4.12	0	20	3.97	2	3.55	7	4.27	3	3.70	1	1.30	1	1.30	2	1.65	0	0	3	2.40	2	2.70	0	2	4.05	1	4.60	(16)	4.11	(26)	3.55	50	3.67	1.59	
精神病学系女生	7	4.74	3	4.07	2.8	3.51	2	4.20	5	4.54	3	3.28	2	1.80	1	1.00	1	1.00	5	3.34	5	3.20	0	2	3.65	6	4.57	(20)	4.23	(33)	3.25	71	3.65	1.60		
圣·惠尔男犯	19	4.44	5	4.74	4.5	4.60	6	4.83	3	5.80	3	4.50	0	0	1	2.80	0	0	7	4.64	5	4.52	0	4	3.05	12	5.11	(30)	4.84	(52)	4.59	110	4.61	1.28		
总分	30	4.43	19	4.42	10.2	4.08	16	5.88	25	4.74	20	4.10	6	2.43	3	1.20	6	2.45	1	1.00	15	3.88	8	3.09	0	17	4.32	13	4.47	(94)	4.44	(152)	3.86	299	4.07	1.63
采用问卷的组:	13	4.37	17	4.86	44	3.83	5	3.48	9	5.49	14	4.14	1	1.80	0	1	2.80	3	1.13	9	3.04	0	12	3.94	0	4	4.10	(53)	4.66	(54)	3.63	132	4.04	1.58		
华盛顿大学女生	21	5.15	15	5.11	6.9	4.95	4	3.85	5	4.84	15	5.60	1	5.80	0	1	5.60	1	3.40	10	5.28	5	5.64	0	10	5.44	5	4.60	(56)	5.21	(77)	4.90	164	5.08	1.76	
海事学校男生	0	4	3.35	4.3	2.76	2.8	3.36	11	6.00	32	4.51	10	1.50	2	1.10	3	2.07	2	2.40	1	2.80	2	3.70	9	4.75	(47)	4.76	(88)	3.06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女生	4	6.30	0	16	2.51	9	4.07	10	4.34	10	4.96	3	2.73	1	1.20	1	1.20	1	5.98	2	3.50	2	4.80	7	4.57	(24)	4.92	(32)	2.94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生	4	4.52	0	25	3.70	1	4.20	0	3	4.87	2	3.70	3	1.40	4	2.45	2	3.90	1	5.00	0	5	4.56	2	5.50	3	3.47	(11)	4.62	(37)	3.40	59	3.83	1.72		
总分	46	4.90	36	4.79	197	3.86	47	4.17	35	5.63	74	4.73	18	2.56	6	1.27	10	2.14	23	4.13	9	5.02	33	3.78	17	5.13	17	4.11	(191)	4.88	(288)	3.69	578	4.19	1.90	
合计	90	4.55	77	4.48	448	3.60	156	3.49	95	4.72	181	4.17	43	2.43	9	1.25	27	2.60	11	2.04	46	3.91	17	4.11	58	3.42	34	4.73	39	4.10	(413)	4.39	(685)	3.41	1332	3.82

a. 上述量表以问卷形式进行,问卷78——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2个项目),问卷45——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个项目),问卷4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5个项目)。
b. 圣·惠尔男犯包含在总样本之中,但他们的平均分比其他的平均分低得多,由于它与当党派偏爱的关系并不明显,因此将其除去,将会影响总体形象。
c. 在这些被试组中,有若干组的个案数不同,其中有1~2个被试组在表5-1~5-11中被剔除,如表5-12~5-20中的个案数少一些,这是由于1~2个对被试组剔除所致。

根据民族中心主义的平均分,个别团体的排序与它们在右一左的政治维度上的排序相似。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传统两翼(派别)既是最民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为4.2~4.7),又是最保守的。新政民主党人和威尔基共和党人主要代表了稍微左倾的政治观点,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具有相似的立场(平均分为3.6和3.5)。有趣的是,那些既支持新政又支持威尔基的人,没有作出党派的选择,其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很低,为2.4——这也许表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复杂性伴随着民主团体关系方面的好斗性。社会主义者(被试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党派偏爱,而不考虑他们对其他团体的观点)的平均分为2.6,与上述那组相似。最为好斗的反民族中心主义团体是美国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共产党人,其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分别为2.0和1.25。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团体之间的排序,为上述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相关的结论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民族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成员身份之间的关系与个体的民族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思想十分相似。一般说来,在民族中心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政治团体偏爱之间存在一种系统的关系,相关性接近0.5。

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团体倾向和个体差异。这种关系尽管重要,但却不够完美。一方面,每个团体中存在着相当多样的个体变化性,而且样本之间在团体平均分上也有许多变化。例如,新政民主党人在测试的各个样本中所得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从2.06~4.95不等。此外,政治偏向在有些被试组要比其他被试组更加接近民族中心主义。中产阶级被试组要比工人阶级组(如海事学校男子或圣·昆丁男犯)更接近民族中心主义。确实,

圣·昆丁的数据并不典型,因此它们未被包括在总分之内;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二十一章。我们发现最大的变化在于,被试在思考团体时受到定型的影响。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并不“全都相似”;而一个个体属于一个特定政治团体的事实,尚不足以成为预言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立场的依据。

这些团体内和团体间的变化表明,团体的成员身份并非个体思想的主要决定因素。确切地说,不同的个体以不同的理由支持某一政治团体。我们必须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人选择支持一个团体而不是另一个团体。说一个人之所以具有偏见,是因为他是一个反新政的民主党人,这样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合适的。他可能是一个反新政者,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思想和成员身份这两者都必须按照基本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来予以解释。考虑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些反新政的民主党人不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而有些新政者则是民族中心主义的。

那些对政治团体不表示任何偏爱的人们(表 5-12,纵列 11~15)又怎么样呢? 此类结果虽然难以解释,但是却暗示着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有 4 种反应(即“未决的”“反对一切党派”“自相矛盾”和“空白”)的平均分为 3.9~4.7,位于总平均分 3.8 之上。那些认为自己是“无党派”的人,相对来说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分较低,平均为 3.4。也许,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甚至反对“政治”等,是与那些超越民族中心主义的东西联系着的。由于这些被试构成了本研究样本的 10%~15%,因此需要对此进行更为彻底的研究。

一种可能性是,间接地研究被试父母对被试思想的影响,或者说询问被试父母的政党偏爱。在表 5-13 中,被试按父亲的政党偏爱被分组,每个组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也随之显示。^[15]

表 5-13 父亲具有各种政党偏爱的被试组的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平均分^a

被试组	父亲的政治偏爱										总平均分	标准差	
	民主党人 个案数	共和党人 个案数	社会主义者 个案数	共产党人 个案数	其他 个案数	无人 个案数	空白 个案数	平均分	平均分	平均分			
采用问卷 78 的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	48	80	1	0	0	4	2.73	7	2.34	140	3.32	1.43	
演说班女生	20	26	0	1	2.30	0	2.50	3	1.77	52	3.34	1.48	
加利福尼亚大学	17	19	0	0	1	1.30	0	5	3.36	42	3.40	1.36	
演说班男生	16	30	1	0	0	1	1.10	15	3.20	63	2.57	1.37	
在职心理学班女生	101	155	2	1	2.30	1	1.30	7	2.43	30	2.88	2.97	
职业妇女	18	24											
合计	58	79	5	1	2.30	8	2.39	18	3.20	97	3.64	1.31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18	24											
俄勒冈和加利福	19	28											
尼亚大学女生	21	27											
俄勒冈和加利福	58	79	3.25										
尼亚大学男生	18	24	3.74										
合计	19	28	3.19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事学校男子	95	42	4.16	2	4.70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20	21	3.26	1	2.70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31	23	3.27										
合计	146	86	3.70										
总计	305	320	3.41	5	4.08	1	2.30	8	2.39	18	3.20	97	
												754	
												3.53	

a. 上述量表包括:问卷 78:反犹主义量表(10 个项目);问卷 6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2 个项目);问卷 45: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 个项目)。

一般来说,共和党人的子女比民主党人的子女较少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分别为 3.41 和 3.68。假设每个组的标准差为 1.5,则这种差异在 5% 水平上是有意义的。

这些数据表明(日常生活的观察也表明),被试不一定相信父母告诉他们的话。这种假设并不深刻,尽管我们认为它对理解思想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不过,它与另一种被人们经常引用的理论发生冲突,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是通过模仿而学习的。“模仿”理论预期,在父母思想和子女思想之间有着显著相关。其假设是,子女会“自然而然地”(也就是模仿地),甚至原封不动地接受父母的思想。然而,本研究的数据,以及许多前人研究的数据[例如由墨菲和纽科姆(Murphy and Newcomb, 85)讨论过的数据]都表明,个体思想的形成是一种选择性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种来自环境的思想刺激,都将根据个体的需要而奋斗而被接受或拒绝。为了研究以此方式进行的观念学习,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哪种类型的人格会使一个人原封不动地接受父母的观点或当局的观点?在何种心理条件下,我们会发现各种形式的变化或反叛?

上述的问题出自这样的假设:一些共和党人的父亲有着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但他们的子女却比民主党人的子女更少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这种假设提示了如下的推断:与父亲意见不一是与反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的,而无须考虑父亲的政治观点[也可参见莱文森和桑福德(71);墨菲、墨菲和纽科姆(85)]。该假设可以通过比较被试的政治倾向和父亲的政治倾向而予以验证,其结果在表 5-14 中显示。一组被试的政治偏爱与父亲相同,其平均分为 4.05,但他们却不考虑党派,比之与父亲的观点不同的那组被试(平均分为 3.04),前者具有高得多的平均分。这里,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差不多与自由主义和保守

主义在政党偏爱上的团体差异相一致(见表 5-12)。换言之,一个人在民族中心主义上的立场,可以根据他同意还是反对父亲的政党偏爱而相当接近地给出预言(无须了解被试的政治观点或父亲的政治观点),正如我们可以根据被试的实际党派偏爱来给出预言一样。^[16]这里,重要的间接证据有助于前面提出的假设(见第三、四章),也就是说,民族中心主义者趋向于屈从内团体的权威,而反民族中心主义者则持批判或反叛的态度;至于家庭,则是第一个典型的内团体。个体与其父母权威的关系,尤其是他的顺从或独立倾向,是一种基本的人格倾向,这种倾向部分地决定着一个人的政党偏爱和他关于团体关系的思想。

在采用问卷 40 的各组中,民族中心主义的平均数据在表 5-15 中显示。得低分的被试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为 1.20~2.41)是劳工学校的男子和女子,妇女投票者同盟,以及惟一神教派教会。有趣的是,工人阶级(劳工学校成员)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比中产阶级的平均分要高得多(前者为 2.4,后者为 1.2),而比中产阶级妇女投票者同盟和惟一神教派教会的平均分稍高一些。显然,中产阶级的左派不仅认同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而且也认同它的从属团体。不过,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工人阶级被试虽然支持左翼的政治团体,但不接受其潜在的社会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完全的反民族中心主义观点)而参与自由主义团体活动。这种情况也由下列事实所表明:联合电气工会(这是一个好斗的美国产联工会)所得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为 3.45,这个数值略高于家长—教师协会的被试组数值(3.12),后者主要包括中产阶级成员,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这些结果表明,工会成员身份和大学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们并不保证反民族中心主义。看来,根本的问题是:个体能否吸收由团体环境所提供的民

表 5-14 具有各种表现的被试—父亲政治偏爱组的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平均分^a

被试组	被试—父亲政治偏爱的关系										总体 平均分	标准差			
	相同 个案数	不同 个案数	父无子有 个案数	父有子有 个案数	父空子空 个案数	两者都无 个案数	父空白子有 平均分	父有子空 平均分	父空白子有 平均分	两者都无 平均分					
采用问卷 78 的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澳说班女生	99	3.49	19	3.10	2	2.50	11	3.07	6	2.25	3	2.93	140	3.32	1.43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	37	3.63	12	2.76	2	2.50	0	—	1	1.50	0	—	52	3.34	1.49
在心理学班女生	21	3.51	9	2.99	0	—	7	3.61	3	2.73	2	4.30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24	2.59	23	2.16	1	1.10	2	2.35	9	3.92	4	2.30	63	2.57	1.37
合计	181	3.40	63	2.68	5	2.20	20	3.19	19	3.08	9	2.96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29	3.70	13	2.45	0	—	0	—	3	4.62	2	3.74	47	3.42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33	3.48	18	2.81	0	—	0	—	2	2.45	1	4.57	54	3.24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29	3.07	13	2.67	2	2.16	7	3.17	6	2.85	0	—	57	2.93	1.25
合计	91	3.42	44	2.66	2	2.61	7	3.17	11	3.26	3	4.01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事学校男生	107	4.32	20	4.16	4	4.58	14	4.49	20	4.51	13	4.52	178	4.36	1.60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24	4.08	12	3.15	1	5.00	6	2.90	5	3.46	2	3.95	50	3.67	1.59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27	4.29	18	2.80	1	1.70	9	3.86	7	3.39	9	3.63	71	3.65	1.60
圣·昆丁男犯 ^b	53	4.62	8	4.86	5	4.18	13	4.01	16	4.60	15	5.10	110	4.61	1.28
合计	158	4.28	50	3.43	6	4.17	29	3.96	32	4.10	24	4.14	299	4.07	1.63
采用问卷 40 的组:															
华盛顿大学女生	78	4.28	12	3.85	6	3.33	13	3.66	10	3.68	13	3.62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生	94	5.17	26	4.64	3	5.07	22	5.41	14	4.86	5	4.80	164	5.08	1.76
中产阶级女子	71	3.88	47	2.90	1	1.60	9	3.09	16	4.94	10	3.98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34	4.75	19	2.07	0	—	4	3.82	3	3.80	4	5.5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22	4.26	17	2.71	0	—	9	5.20	9	4.09	7	4.06	59	3.83	1.72
合计	299	4.52	121	3.21	10	3.68	57	4.38	52	4.50	39	4.14	578	4.19	1.90
总计	729	4.05	278	3.04	23	3.39	113	3.99	114	4.03	75	3.79	1332	3.82	—

a. 上述量表包括: 问卷 78: 反犹主义量表(10 个项目); 问卷 60: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2 个项目); 问卷 45: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 个项目);

问卷 40: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5 个项目)。

b. 圣·昆丁组不包括在总计之中。

表 5-15 在问卷 40 样本中各种组织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

中产阶级妇女		
被试组	个案数	平均分
1. 家长—教师协会	46	3.13
2. 劳工学校(中产阶级成员身份)	11	1.20
3. 郊区教会团体	29	5.23
4. 惟一神教教会团体	15	2.32
5. 妇女投票者同盟	17	2.06
6. 中产阶级妇女俱乐部	36	5.05
总分	154	3.64
标准差		1.96

续表 5-15(一)

中产阶级男子		
被试组	个案数	平均分
1. 劳工学校(中产阶级成员身份)	9	1.27
2. 家长—教师协会	29	3.12
3. 郊区教会团体	31	5.38
总分	69	3.89
标准差		2.08

续表 5-15(二)

工人阶级男子		
被试组	个案数	平均分
1. 联合电气工会(产联)(旧成员)	12	3.45
2. 劳工学校	15	2.41
3. 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产联)(新成员)	26	4.60
4. 联合海员服务社	8	4.74
总分	61	3.83
标准差		1.72

主思想。这里,我们再次找到了在民主思想的可接受性方面广泛存在的个体差异。

工会在其教育方面至少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这已由下列事实所提示: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的新成员在民族中心主义上所得平均分为 4.60(见表 5-15)。

由于个案数较少,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新成员与联合电气工会老成员之间 1.15 的差异虽然显著,但在统计上不一定有意义;若想在深入的研究中证明它的话,则结果将会表明,至少某些工会正在努力与民族中心主义作斗争。

最高的得分组是郊区教会的男子组和女子组,^[17]以及中产阶级女子俱乐部,其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为 5.05~5.38(比任何其他中产阶级团体显著高一些)。由于这些团体都不是以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的相对一致性支持了这样的假设:民族中心主义在其他领域具有相对一致的思想形式。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与惟一神教和郊区教会之间有 3 分之差,这暗示着相似的差异也可以在宗教思想方面找到;但是,关于该问题的讨论,有待宗教材料的搜集,我们在第六章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此相似的是,女子俱乐部和女子投票者同盟的比较表明,两者所具有的特点很难归因于其实际的阶级或教育水平,而在于心理倾向,例如上流社会的身份、向上发展的经济流动性、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等等。此外,团体的成员身份也不一定导致深层的人格倾向。由于在女子俱乐部这一被试组中未获得任何集中的个案研究,因此,上述关系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相似倾向只能放在其他组中进行研究,并在后面几章予以报道。

各种海运工会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正如海运学校所反映的那样)在表 5-15 中呈现。我们认为,这些结果应当被认为

是提示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因为每个被试组的个案数很少,也因为下列事实:这个样本在智力和教育水平上超过了海运工会的平均分,而且在阶级水平和经济志向上也超过海运工会。经过充分的描述,可以发现,获得最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4.12)的被试组是全国海运工会(产联),该组织也是最为好斗的左翼组织。最为民族中心主义的被试组是太平洋海员工会和海员国际工会,其平均分分别为 4.97 和 4.81;这两个工会在政治上都倾向于保守,并强烈地反对产联和共产党人。海运消防员、加油工和洗船工的平均分为 4.24,稍高于全国海运工会;这一发现由下列事实所证明:几年前,由于码头劳工和管理人员发生纠纷,致使上述海运消防员、加油工和洗船工加入了产联。

当各种工会组织被组合成主要类别时,我们得到了以下的排序(从最多民族中心主义到最少民族中心主义):空白或“无”(4.94),组合的国际海员工会(4.79),组合的产联(4.41),以及组合的独立工会(4.30)。由于工会成员身份(尤其是产联或独立工会)在减弱民族中心主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全国海运工会得到的平均分是最低的,但是 4.12 得数值只位于中点——距离它的教育计划和民主原则有很长距离。了解一下为什么反偏见的计划(例如全国海运工会的计划)并不十分成功,同时研究一下如何改进这一计划,是既具理论意义又具社会意义的。

在表 5-16 中,问卷 40 的数据与问卷 45 的数据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总体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较高(5.08~4.34),而各种工会之间的差异则很小。这些差异部分地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问卷 45 的数据是以 10 个项目组成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B 为基础的,而问卷 40 则是包括了 5 个项目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 卷。问卷 45 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 卷的平均分为 4.82

(见第四章,表 17C),这一数值稍低于问卷 40 民族中心主义 A 卷的平均分(5.08)。不过,对问卷 45 的民族中心主义 B 亚量表来说(其中有 4 个项目涉及反犹主义),其平均分仅为 3.85,而民族中心主义 A - B 卷的相关[用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 Brown)公式纠正]只有 0.73。因此,在关于民族中心主义 A 卷的意见和态度方面(黑人、外国人、佐特风格者、爱国主义),两个样本颇为相似。此外,在工会之间的差异方面,问卷 45 比问卷 40 更大,这也许与问卷 45 中民族中心主义 B 卷项目有关;也就是说,在关于反犹主义问题上,工会要比其他形式的偏见分歧更大。例如,全国海运工会问卷 45 的平均分为 3.67,比样本平均分 4.34 明显低些;但是,全国海运工会问卷 40 的平均分为 4.87,只稍低于样本平均分 5.08。由于抽样的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尚未得到控制的因素,可能影响了这些结果,因此我们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即全国海运工会的教育计划与某些偏见形式(民族中心主义 A 卷)的斗争,比之与其他形式的斗争(民族中心主义 B 卷),所获成功机会较少。^[18]

表 5-16 各种海运工会分支机构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a(海运学校样本)

工 会	问卷 45 ^b		问卷 40 ^b		总体	
	个案数	平均 EAB	个案数	平均 EA	个案数	平均
1. 太平洋海员工会 (附分支机构)	26	4.79	26	5.15	52	4.97
2. 海员国际工会 (附分支机构)	20	4.52	12	5.30	32	4.81
3. 分支机构	7	4.10	9	4.26	16	4.19
4. 海运消防员、加油工、 洗船工(独立工会)	16	4.11	23	4.34	39	4.24

工 会	问卷 45 ^b		问卷 40 ^b		总体	
	个案数	平均 EAB	个案数	平均 EA	个案数	平均
5. 大副和领航员 (独立工会)	0	-	1	6.80	1	6.80
6. 海运工程师协会 (产联)	2	3.85	4	5.95	6	5.25
7. 全国海运工会 (产联)	29	3.76	14	4.87	43	4.12
8. “产联”	8	4.88	7	5.00	15	4.93
9. “工会”	17	4.07	12	5.45	29	4.64
10. 组合的分支机构 (1,2,3)	(53)	4.60	(47)	5.0	(100)	4.79
11. 组合的产联 (6,7,8)	(39)	3.99	(25)	5.08	(64)	4.41
12. 组合的独立工会 (4,5)	(16)	4.11	(24)	4.44	(40)	4.30
13. 所有工会的组合 (1~9)	(125)	4.27	(108)	4.95	(233)	4.58
14. “无和空白的结合”	(25)	4.55	(56)	5.31	(109)	4.94
15. “无”	17	4.89	21	5.25	38	5.08
16. 空白	36	4.38	35	5.35	71	4.85
总计	178	4.34	164	5.08	342	4.70
标准差		1.60		1.76		

- a. 这些数据是以下述问题的回答为基础的:“你属于哪些团体或组织(工会、政党、大学生联谊会等)?”在进行问卷调查时,要求被试记录下他们所属工会的分支机构。
- b. 正如第四章讨论过的那样,海运学校总人口被分成相等的两半,一半接受问卷 45,另一半接受问卷 40。

我们曾试图确定被试的收入水平和背景,但是,也由于若干原因而未获成功。看来,若想通过提问以确定社会经济的阶级

水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再者,被试对问卷中的有些问题常常留下空白,这主要出于防御或缺乏了解之原因(例如被试往往在关于父亲或丈夫的收入上不予填写)。许多被试的收入较低,或者由于暂时失业,或者还是一个学生或军人。在某种情况下,战时的收入有所增加,而在本研究开展期间,其实际的等级水平则没有相应上升。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下面的数据必须小心地加以解释。

表 5-17 是根据目前的收入为一些被试组计算出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样本中约 25% 的被试报告说“没有任何收入”,而 13% 的被试则对收入问题不作填写。

大多数人报告的年收入低于 300 美元,只有 3 人报告说年收入超过 1 万美元。

在年收入不到 5000 美元的被试中,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3.30~3.57)无显著差别,也没出现一致的增加或减少的倾向。可是,在年收入 5000~10000 美元的被试中,则出现民族中心主义的明显低平均分(3.02),而年收入“10000 美元以上”的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分最高,平均分为 4.70。一些异质的被试组(主要是妇女,没有收入)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也相对地得高分(4.10)。在工人阶级男子中(问卷 40),随着年收入增加到 5000 美元,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随之减少,之后,平均分又重新攀升。可是,另一方面,在中产阶级男子(问卷 40)与俄勒冈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中(问卷 60),年收入处于 5000~10000 美元之间的被试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最低。由此可见,在收入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关系,至于收入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如果把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十分不同。有趣的是,在两个非学生的女子组中(精神病诊所女子组和中产阶级女子组),那些无收入的女子要比有

表 5-17 各种年收入^b的被试组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平均分^a

被试组	目前的收入(美元)										合计								
	2千以下	2千~2.9千	3千~3.9千	4千~4.9千	5千~1万	1万以上	空白	无	无	无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标准差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13	3.21	15	3.87	0	—	0	—	0	—	11	3.14	8	3.29	47	3.42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11	3.15	23	3.27	15	3.28	0	—	1	1.74	0	—	4	3.55	0	—	45	3.63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14	2.91	10	3.06	16	2.83	5	3.42	4	2.26	0	—	4	3.59	4	2.53	57	2.93	1.25
合计	38	3.08	48	3.41	31	2.99	5	3.42	5	2.16	0	—	19	3.32	12	3.04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 45 的组: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6	2.90	14	3.58	9	4.07	1	4.60	2	4.00	1	3.70	8	3.28	9	4.08	50	3.67	1.59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12	3.51	4	3.03	3	4.37	0	—	0	—	0	—	27	3.20	25	4.21	71	3.65	1.60
合计	18	3.31	18	3.46	12	4.14	1	4.60	2	4.00	1	3.70	35	3.22	34	4.17	121	3.66	1.62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中产阶级女子	22	2.80	19	3.00	8	2.92	1	1.00	3	3.27	1	6.40	17	3.42	83	4.13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11	4.49	3	4.87	9	4.04	12	4.27	25	2.89	1	4.00	0	—	8	5.1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7	4.20	26	4.11	8	2.80	7	2.71	3	4.67	0	—	1	4.80	7	4.20	59	3.83	1.72
合计	40	3.51	48	3.72	25	3.29	20	3.56	31	3.10	2	5.20	18	3.50	98	4.21	282	3.74	2.10
总计	96	3.30	114	3.55	68	3.30	26	3.57	38	3.02	3	4.70	72	3.32	144	4.10	561	3.57	—

a. 上述量表包括:问卷 6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2个项目);问卷 45: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个项目);问卷 4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5个项目)。

b. 要求这些被试组回答下列问题:“你目前的年收入是多少?”

收入的女子更加民族中心主义。职业妇女在民族中心主义上之所以平均分较低,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经济地位;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导致非民族中心主义的人格倾向也有助于产生有收入工作者的意愿或欲望。

看来,预期收入要比目前收入更能产生有关经济渴望的测量。以期望收入(今后10年)为基础而划分的被试组,其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在表5-18中呈示。该表中两个最大的组是:一个期望年收入为5000~10000美元,另一个为3000~3900美元。所有样本结合起来的总分表明,随着期望收入的增强,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也逐渐增高。然而,个别样本的数据却反映了更加复杂的情况。有3个最高收入的组(4000美元以上),其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比低收入组的平均分更高,这是因为民族中心主义的海运学校样本(问卷45和40)构成了该团体的主体(50~70%)。你们将会注意到,在每个海运学校样本中,期望收入和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明确的关系。与此相似的是,在其他样本中也不存在任何一致的倾向。由此可见,对问卷78来说,4000~10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比起低的收入水平稍为民族中心主义一点。但是,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最高的被试是那些年收入万元以上的被试。另一方面,对问卷60来说,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的变化较小(2.97~3.34),而且与收入无关。可见,样本中间的差别,要比实际收入或期望收入之间的差别大得多。^[19]这些结果并未支持这样的理论,即认为经济力量在创造民族中心主义背景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而且,这些结果为我们反对这样的假设提供了证据,该假设认为,经济动机是一种主要的心理力量,推动个体朝着民族中心主义或反民族中心主义方向前进。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假设是:偏见由父母的经济水平所决定。

简言之,“成长在富裕家庭中的人要比成长在中等或者低收入家庭中的人更可能具有偏见”。为了对这一假设进行部分测试,我们在问卷中把父亲的收入也包括进去了,并且为反映若干收入水平的被试组统计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数据在表5-19中呈示。在各种收入水平中,个案数表明了总体样本的中产阶级特性。5000~10000美元的组最大,有205个个案。2000~2900美元的组和3000~3900美元的组,在1944~1946年间,也许是总人口中最大的组,分别有154个个案和86个个案。10000美元和10000美元以上的组与其他组不成比例——只有55个个案。由于下列事实,使得我们解释这些数据变得复杂起来,这一事实是:父亲现在的收入与被试幼年时期父亲的收入可能不是一回事。还应当注意的是,被试中几乎有半数的人在这道题上留下了空白;这一结果究竟造成多大影响,暂时还说不清楚。

在表5-19中,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并非始终视父亲的收入而变化。它们表明,一些非系统性的变化(3.77~3.92)在年收入10000美元以下的各种水平之间波动。不过,父亲年收入为10000美元和10000美元以上的组,比之较低收入水平的结合组(平均分分别为3.35和3.84),明显缺乏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较低平均分是适用于一切个体,还是适用于那些被研究的个体,这一点尚不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表明,较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构成了这样一些个体的特征,他们出生于较富裕家庭,而且朝着中产阶级的职业和思想倾斜。鉴于诸如此类的许多结果,我们不禁怀疑这样的说法:向上运动的阶层,以及对现状的认同,与民族中心主义呈正相关;而向下运动的阶层,以及对现状的认同,则与反民族中心主义呈正相关。

最后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社会经济背景”是父亲的职业。表5-20提供了父亲职业不同所导致的各个组的平均民族中心

5-18 各种期望收入的被试组的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a

被试组	期望收入(美元)										合计								
	2千以下 个案数	2千~2.9千 平均分	3千~3.9千 平均分	4千~4.9千 平均分	5千~1万 平均分	1万以上 平均分	空白 平均分	无 平均分	合计 平均分	标准 差									
采用问卷78的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 演说班女生	6	3.08	2.99	3.18	6	4.32	11	3.62	0	—	56	3.45	14	3.11	140	3.32	1.43		
加利福尼亚大学 演说班男生	0	—	5	3.74	9	3.00	10	3.52	22	3.55	1	1.20	5	2.76	0	—	52	3.34	1.48
在心理学班女生	0	—	4	3.80	4	2.10	1	3.80	4	2.35	0	—	29	3.66	0	—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14	2.91	11	2.65	14	2.84	3	2.07	4	2.10	3	3.07	14	2.04	0	—	63	2.57	1.37
合计	20	2.97	46	3.06	48	2.95	20	3.56	41	3.31	4	2.60	104	3.28	14	3.11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60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2	2.99	9	3.27	6	3.54	1	2.66	1	2.82	0	—	19	3.50	9	3.55	47	3.42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 尼亚大学女生	6	3.90	9	3.30	16	2.91	4	4.03	3	1.91	0	—	8	3.71	8	2.95	54	3.24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 尼亚大学男生	2	1.99	2	3.07	12	2.75	7	2.70	24	3.12	4	3.03	6	3.03	0	—	57	2.93	1.25
合计	10	3.34	20	3.27	34	2.97	12	3.14	28	2.98	4	3.03	33	3.47	17	3.27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45的组:																			
海事学校男子	3	5.17	9	4.16	27	4.57	14	4.52	70	4.46	12	4.38	2	3.95	41	3.98	178	4.36	1.60
精神病诊所所病人	0	—	3	3.30	8	3.59	3	4.73	10	3.45	1	3.40	0	—	25	3.70	50	3.67	1.59
合计	3	5.17	12	3.94	35	4.34	17	4.55	80	4.34	13	4.30	2	3.95	66	3.87	228	4.20	1.62
采用问卷40的组:																			
海事学校男生	1	5.20	16	5.22	28	5.23	20	5.05	44	5.06	10	5.60	0	—	45	4.84	164	5.08	1.76
总计	34	3.34	94	3.37	145	3.73	69	4.16	193	4.09	31	4.34	139	3.33	142	4.03	847	3.82	—

a. 上述量表包括: 问卷78:反犹主义量表(12个项目); 问卷6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个项目); 问卷45: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个项目); 问卷4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5个项目)。

5-19 父亲收入不同的团体的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a

被试组	父亲收入										合计								
	2千以下 个案数	2千~2.9千 平均分	3千~3.9千 平均分	4千~4.9千 平均分	5千~1万 平均分	1万以上 平均分	空白 平均分	合计 平均分	标准 差										
采用问卷78的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	8	2.94	17	3.35	28	2.99	9	3.97	22	3.32	11	3.83	45	3.34	140	3.32	1.43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	2	5.45	6	3.33	10	3.18	5	3.42	13	3.39	5	3.34	11	3.03	52	3.34	1.48		
在心理学班女生	1	4.20	2	4.25	7	3.17	0	—	4	2.63	1	4.70	27	3.43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2	5.65	6	2.30	3	2.40	0	—	10	2.23	5	2.34	37	2.59	63	2.57	1.37		
合计	13	3.84	31	3.20	48	3.02	14	3.77	49	3.06	22	3.42	120	3.10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60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5	3.45	7	3.08	8	3.17	0	—	10	3.03	1	5.31	16	3.80	47	3.42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 尼亚大学女生	0	—	9	3.17	9	3.14	4	3.13	11	3.34	0	—	21	3.28	54	3.24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 尼亚大学男生	6	2.60	11	3.28	8	3.17	5	2.56	8	2.66	2	2.49	17	3.01	57	2.93	1.25		
合计	11	2.99	27	3.19	25	3.16	9	2.81	29	3.05	3	3.43	54	3.35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45的组:																			
海运学校男子	12	3.88	26	4.09	31	4.48	12	4.68	28	4.68	8	3.54	64	4.40	178	4.36	1.60		
精神病诊所所病人	6	3.62	4	2.88	6	3.03	2	3.25	7	2.97	0	—	25	4.18	50	3.67	1.59		
精神病诊所所病人	5	4.36	4	3.70	5	1.66	2	3.95	6	2.75	1	1.60	48	3.92	71	3.65	1.60		
合计	23	3.92	34	3.90	42	3.94	16	4.41	41	4.11	9	3.32	134	4.19	299	4.07	1.63		
采用问卷40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2	4.80	7	3.20	13	4.11	10	3.64	35	4.14	7	3.97	58	4.12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生	6	5.57	34	5.48	30	5.01	14	4.73	29	5.13	5	4.60	46	4.89	164	5.08	1.76		
中产阶级女子	7	3.46	9	3.29	10	3.30	5	1.84	9	2.64	5	1.72	109	3.96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3	2.87	8	3.35	6	4.63	5	4.56	10	4.12	4	2.40	33	4.0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5	4.00	4	5.40	12	4.00	0	—	3	5.67	0	—	35	3.41	59	3.83	1.72		
合计	23	4.16	62	4.62	71	4.40	34	3.96	86	4.37	21	3.29	281	4.08	578	4.19	1.90		
总计	70	3.84	154	3.94	186	3.77	73	3.88	205	3.82	55	3.35	589	3.84	1332	3.82	—		

a. 上述量表包括: 问卷78:反犹主义量表(10个项目); 问卷6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2个项目); 问卷45: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个项目); 问卷4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5个项目)。

主义量表分。最普通的职业(人数 = 136 ~ 169)是劳工(熟练的和熟练的)、白领、大企业经理。小企业和职业团体的规模次之(人数 = 95 和 90)。随着规模的减少,我们依次选择农场主、工程师、政府官员和宗教牧师等。关于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只有 3 个组与总体平均分 3.86 偏离了 0.3 以上。工程师的子女显然在平均水平以上,其平均分为 4.36。另一方面,在宗教领域或政府部门任职的父亲,其子女的得分位于平均水平以下(3.20 和 3.25)。对于其他各类职业来说,差别较小,甚至比一种职业里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别还要小。在每个样本里,没有一种职业团体呈现一贯地高或一贯地低。甚至在父亲属于大企业任职或经理职位的情况下,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也变动很大:一忽儿高一忽儿低。由此,我们可以在在职心理学班和职业妇女中发现这种职业团体特别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而在华盛顿大学女生中则发现相对高的平均分(与每个样本中其他职业团体相比较)。这些变化像上面的数据一样,表明个体的民族中心主义并不与许多社会经济团体显著相关(这些社会经济团体被普遍假设为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决定因子)。它是团体对个体的意义,而不是成员身份使我们预言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

根据本节提供的团体成员身份(见表 5-12 ~ 5-20),我们可以作出某些暂时性的假设。也许,从中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关于团体定型的想法。在本研究中,没有一个团体(被试组)表明被试在思想上接近同质。我们不想把这一发现作为惊人的发现提出来,而是将它视做对有些人的提醒(他们认为,在某些团体中,成员身份与偏见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由于发现了一般水平的差异,标准差是明显的,团体之间的重叠也相当大。这并不意味着团体成员身份和社会力量在民族中心主义的形成

表 5-20 不同职业父亲的被试组的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a

被试组	劳工(熟练和不熟练)		白领(包插工头)		个体小商人		农场主		宗教的		职业的		工程师		大企业经理和官员		非上述类别(闲、死、退休、杂项)		空白		合计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个数	平均分	标准差																																																																																																																																																																																																																																																																																																																																																																																																																																																				
采用问卷 78 的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	23	2.93	25	3.16	12	3.76	9	3.08	3	2.20	16	3.28	10	4.31	36	3.38	0	—	6	3.67	0	—	140	3.32	1.43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	16	3.65	5	2.96	10	2.35	0	—	1	2.60	6	3.70	2	4.80	8	3.96	0	—	4	2.78	0	—	52	3.34	1.48	在职心理学班女生	1	4.00	8	3.23	2	4.55	3	4.10	0	—	4	3.13	2	3.20	6	2.72	0	—	16	3.53	0	—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6	2.80	12	2.23	6	2.75	4	3.05	0	—	9	.63	1	2.00	10	2.34	0	—	15	3.32	0	—	63	2.57	1.37	合计	46	3.19	50	2.92	30	3.15	16	3.26	4	2.30	35	2.91	15	4.07	60	3.22	0	—	41	3.40	0	—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5	2.94	8	3.37	3	3.54	6	4.08	0	—	4	3.30	0	—	13	3.20	0	—	8	3.58	0	—	47	3.42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1	2.32	14	4.45	4	3.44	8	3.05	3	3.10	2	2.82	2	1.95	13	3.66	0	—	7	2.80	0	—	54	3.24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8	3.24	7	3.69	6	2.35	11	2.54	2	1.99	5	2.97	0	—	7	2.58	0	—	11	3.34	0	—	57	2.93	1.25	合计	14	3.07	29	3.49	13	2.96	25	3.07	5	2.66	11	3.06	2	1.95	33	3.25	0	—	26	3.27	0	—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运学校男子	48	4.16	29	4.29	17	4.32	9	4.82	1	6.30	9	4.08	5	5.22	18	4.58	0	—	30	4.45	12	4.08	178	4.36	1.60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4	3.83	20	4.28	10	4.34	1	2.20	1	6.40	25	4.03	9	3.78	18	4.79	12	3.25	18	3.71	4	3.95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生	47	5.22	16	4.76	25	5.01	10	5.72	0	—	10	5.30	12	5.18	7	5.00	0	—	26	5.09	11	4.20	164	5.08	1.76	合计	61	4.90	36	4.49	35	4.82	11	5.40	1	6.40	35	4.39	21	4.58	25	4.85	12	3.25	44	4.53	15	4.13	296	4.16	1.78	总计	169	4.07	144	3.70	95	3.95	61	3.81	11	3.20	90	3.62	43	4.36	136	3.71	12	3.25	141	3.95	27	4.11	929	3.86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	23	2.93	25	3.16	12	3.76	9	3.08	3	2.20	16	3.28	10	4.31	36	3.38	0	—	6	3.67	0	—	140	3.32	1.43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	16	3.65	5	2.96	10	2.35	0	—	1	2.60	6	3.70	2	4.80	8	3.96	0	—	4	2.78	0	—	52	3.34	1.48																																																																																																																																																																																																																																																																																																																																																																																																																																																		
在职心理学班女生	1	4.00	8	3.23	2	4.55	3	4.10	0	—	4	3.13	2	3.20	6	2.72	0	—	16	3.53	0	—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6	2.80	12	2.23	6	2.75	4	3.05	0	—	9	.63	1	2.00	10	2.34	0	—	15	3.32	0	—	63	2.57	1.37																																																																																																																																																																																																																																																																																																																																																																																																																																																		
合计	46	3.19	50	2.92	30	3.15	16	3.26	4	2.30	35	2.91	15	4.07	60	3.22	0	—	41	3.40	0	—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5	2.94	8	3.37	3	3.54	6	4.08	0	—	4	3.30	0	—	13	3.20	0	—	8	3.58	0	—	47	3.42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1	2.32	14	4.45	4	3.44	8	3.05	3	3.10	2	2.82	2	1.95	13	3.66	0	—	7	2.80	0	—	54	3.24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8	3.24	7	3.69	6	2.35	11	2.54	2	1.99	5	2.97	0	—	7	2.58	0	—	11	3.34	0	—	57	2.93	1.25	合计	14	3.07	29	3.49	13	2.96	25	3.07	5	2.66	11	3.06	2	1.95	33	3.25	0	—	26	3.27	0	—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运学校男子	48	4.16	29	4.29	17	4.32	9	4.82	1	6.30	9	4.08	5	5.22	18	4.58	0	—	30	4.45	12	4.08	178	4.36	1.60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4	3.83	20	4.28	10	4.34	1	2.20	1	6.40	25	4.03	9	3.78	18	4.79	12	3.25	18	3.71	4	3.95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生	47	5.22	16	4.76	25	5.01	10	5.72	0	—	10	5.30	12	5.18	7	5.00	0	—	26	5.09	11	4.20	164	5.08	1.76	合计	61	4.90	36	4.49	35	4.82	11	5.40	1	6.40	35	4.39	21	4.58	25	4.85	12	3.25	44	4.53	15	4.13	296	4.16	1.78	总计	169	4.07	144	3.70	95	3.95	61	3.81	11	3.20	90	3.62	43	4.36	136	3.71	12	3.25	141	3.95	27	4.11	929	3.86																																																																																																																																																											
俄勒冈大学女生	5	2.94	8	3.37	3	3.54	6	4.08	0	—	4	3.30	0	—	13	3.20	0	—	8	3.58	0	—	47	3.42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1	2.32	14	4.45	4	3.44	8	3.05	3	3.10	2	2.82	2	1.95	13	3.66	0	—	7	2.80	0	—	54	3.24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8	3.24	7	3.69	6	2.35	11	2.54	2	1.99	5	2.97	0	—	7	2.58	0	—	11	3.34	0	—	57	2.93	1.25																																																																																																																																																																																																																																																																																																																																																																																																																																																		
合计	14	3.07	29	3.49	13	2.96	25	3.07	5	2.66	11	3.06	2	1.95	33	3.25	0	—	26	3.27	0	—	158	3.18	1.31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运学校男子	48	4.16	29	4.29	17	4.32	9	4.82	1	6.30	9	4.08	5	5.22	18	4.58	0	—	30	4.45	12	4.08	178	4.36	1.60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4	3.83	20	4.28	10	4.34	1	2.20	1	6.40	25	4.03	9	3.78	18	4.79	12	3.25	18	3.71	4	3.95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生	47	5.22	16	4.76	25	5.01	10	5.72	0	—	10	5.30	12	5.18	7	5.00	0	—	26	5.09	11	4.20	164	5.08	1.76	合计	61	4.90	36	4.49	35	4.82	11	5.40	1	6.40	35	4.39	21	4.58	25	4.85	12	3.25	44	4.53	15	4.13	296	4.16	1.78	总计	169	4.07	144	3.70	95	3.95	61	3.81	11	3.20	90	3.62	43	4.36	136	3.71	12	3.25	141	3.95	27	4.11	929	3.86																																																																																																																																																																																																																																																																																											
海运学校男子	48	4.16	29	4.29	17	4.32	9	4.82	1	6.30	9	4.08	5	5.22	18	4.58	0	—	30	4.45	12	4.08	178	4.36	1.60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4	3.83	20	4.28	10	4.34	1	2.20	1	6.40	25	4.03	9	3.78	18	4.79	12	3.25	18	3.71	4	3.95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生	47	5.22	16	4.76	25	5.01	10	5.72	0	—	10	5.30	12	5.18	7	5.00	0	—	26	5.09	11	4.20	164	5.08	1.76	合计	61	4.90	36	4.49	35	4.82	11	5.40	1	6.40	35	4.39	21	4.58	25	4.85	12	3.25	44	4.53	15	4.13	296	4.16	1.78	总计	169	4.07	144	3.70	95	3.95	61	3.81	11	3.20	90	3.62	43	4.36	136	3.71	12	3.25	141	3.95	27	4.11	929	3.86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4	3.83	20	4.28	10	4.34	1	2.20	1	6.40	25	4.03	9	3.78	18	4.79	12	3.25	18	3.71	4	3.95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生	47	5.22	16	4.76	25	5.01	10	5.72	0	—	10	5.30	12	5.18	7	5.00	0	—	26	5.09	11	4.20	164	5.08	1.76																																																																																																																																																																																																																																																																																																																																																																																																																																																		
合计	61	4.90	36	4.49	35	4.82	11	5.40	1	6.40	35	4.39	21	4.58	25	4.85	12	3.25	44	4.53	15	4.13	296	4.16	1.78																																																																																																																																																																																																																																																																																																																																																																																																																																																		
总计	169	4.07	144	3.70	95	3.95	61	3.81	11	3.20	90	3.62	43	4.36	136	3.71	12	3.25	141	3.95	27	4.11	929	3.86																																																																																																																																																																																																																																																																																																																																																																																																																																																			

a. 上述量表包括:问卷 78:反犹主义量表(10 个项目);问卷 6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10 个项目);问卷 45:民族中心主义量表(5 个项目);问卷 40:民族中心主义量表(5 个项目)。

和表现中不再重要；确实，有大量的社会学文献表明它们是重要的。

确切地说，社会因素起着一种基本的复杂的间接的心理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心理学必须超越它对思想和团体成员身份之间简单关系的研究，深入探讨一些复杂的过程，因为个体往往通过这些过程接受社会思想环境的各种刺激。

由于找不到思想上同质的组别(归类)，因此，在民族中心主义与某些团体成员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明显分化的被试组，也就是倾向于得高分或得低分的被试组，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它们的成员身份是通过选择形成的，而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在关于其他一些心理特征方面，表现出相对来说明显的同质性。由此推论，父亲的政治偏爱或收入——职业归类，在子女身上并不表现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显著相关。但是，被试的个人政治倾向(通过选择形成的成员身份，诸如他的社会经济志向，以及他接受或拒绝父亲政治观点的倾向)，则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分数密切相关。与此相似的是，女子俱乐部或劳工学校的成员，比之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或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其民族中心主义更加明显，因为后者在相应的思想领域中较少同质性。

对于民族中心主义来说，具有最大意义的团体成员身份也就是那些对个体来说具有最大心理意义的成员身份。

看来，个体之所以选择和参加一些团体，是因为这些团体容许他们充分地发展和表示先前存在的倾向。这一发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样的概念：团体成员身份决定思想，例如，一个人由于是一名共和党人或一名俱乐部成员，而在民族中心主义方面持有偏见。要知道，思想不仅很有可能发生于参加团体之前，而且，更重要的是，思想和团体成员身份似乎反映了个体身上更为

深刻的倾向。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是，与家长权威有关的“独立”—“服从”。由此推导，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者比得低分者将表现出更大的顺从和遵奉，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思想内容上(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而且表现在他们对政党的选择上(见表5-14)。个人对团体的选择，如同他对思想的选择一样，不只是一种偶然的或简单的模仿问题，而是重要的感情倾向的一种折射。在更为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在下一章考虑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的宗教思想和分组问题。

五、结 论

对政治经济思想和团体成员身份的研究，促使我们去拓展反民主个体的概念。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它们是我们测量反民主倾向的主要手段)表明，从右倾到左倾的政治经济思想，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在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中心主义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就量化角度而言并不完善(相关系数近似于0.5)，而且从质的方面来说是复杂的。因此，有人建议，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将右倾—左倾的范围分解成若干思想形式。其中的一种形式——就潜在的反民主倾向而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便是假保守主义。

在前面几章，我们看到反犹主义或反黑人倾向并非一种孤立的态度，而是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一些组成部分。本章表明，民族中心主义不过是广泛的社会思想和团体作用的一种形式。与那些潜在的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的思想倾向，在个体的政治经济思想中也可找到。总之，应把社会思想看做是完整的个体思想的一个侧面，它们在个体思想中得以折射，并受制于深层的心

理倾向。

注 释

- [1]本章为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所撰。
- [2]由于“思想”(ideology)这个术语包含许多负面的意思(尤其在政治思想领域),因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思想”是从一种纯粹描述的意义上来加以运用的:“思想”是指一种“意见、价值观和态度的有组织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社会理念的主体,不论它正确或错误,有益或有害,民主或非民主,都可以被称为一种思想。
- [3]赫斯特(Hearst 1863~1951年),美国报业巨头,创建赫斯特报系,曾拥有25种日报,11种周刊和多种杂志。这些报刊的基调是鼓吹保守主义。——译者注
- [4]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像“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类术语有着多种定义。它们作为归类的概念被运用,而不是作为描述或分析的工具,这是颇具代表性的。因此,我们设法使我们的解释尽可能明确。
- [5]读者若想详尽地了解问卷78中包括的各个被试组和抽样问题,以及后来的各种问卷,请参阅第四章(民族中心主义)。
- [6]若想了解本研究的抽样问题,可参见第四章。
- [7]与政党和其他团体成员有关的这个样本的代表性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考虑(见第五节)。各大学生组通常是保守主义的,这已为下述事实所揭示: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平均分与其他中产阶级团体相比,相对来说较低(参见第四章)。被试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平均分,可以与那些采用问卷40和45的被试组的平均分相比。
- [8]关于团体和过程的问题,在第四章和第七章予以充分讨论。
- [9]一般来说,该结果与本章开头提到的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
- [10]指美国儿童文学家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靠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的人物。——译者注
- [11]进一步的假设,以及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将在第十七章提出。届时我们探讨访谈材料。

- [13]你们将会注意到,由于时间的关系,对若干受测的被试组来说,团体或成员身份的数据并未进行统计(占整个个案数大约三分之一)。不过,表5-12中的团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总体样本的选择。
- [14]我们尚未为这里讨论的各种团体差异计算临界比。下述约略的衡量可以用来估计差异的意义:假设任何一个团体的标准差等于其样本的标准差。这样的估计是一种最大限度的估计,致使任何一种误差将倾向于降低所获得的临界比的值。对于个案数约50的团体来说,0.6的差异很可能在5%水平上有意义;当个案数为100时,0.4的差异是适当的。这些近似的标准适用于本节中讨论的所有图表。就这些差异的意义而言,一个补充的论点是组与组之间的相对一致性。
- [15]母亲的政治偏爱对被试的影响也获得了类似的数据。这里不再提供这些数据,因为它们与父亲的影响相一致。我们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父亲身上,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似乎仍主要是一种“父亲的事业”,正像宗教信仰主要是母亲的职能一样。
- [16]如果我们了解父亲的党派偏爱,那么此类差异也许会更大一些。由此推论,一切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被试,倘若把父亲的偏爱列入“民主党人”,则他们自己便可归入与父亲同样的偏爱之中。不过,也有这样的可能,即父亲是一名反新政的民主党人,则父子之间的差异便被抵消了——对于这种父子差异,我们原本期望伴随着较低民族中心主义分数。这类测量的不正确性使得所获的差异格外地令人注目。
- [17]这个教派位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它具有郊区的特色:拥有若干小型工业;居民来往于伯克利和旧金山之间,从而在文化或经济上并不闭塞。
- [18]如果时间容许的话,有必要在问卷45的样本中分别获取每个工会组的民族中心主义A卷和B卷的平均分,并且与问卷40数据进行比较。
- [19]在关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早期研究中(未发表),期望收入的数据也表明了类似的否定结果。

我们通过提问“你信仰什么宗教?”而获得有关宗教信仰的数据。该问题出现在问卷的第一页上。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被试提出某个教派的名称,或者写“无”(无宗教信仰),或者干脆留白。答案“无”(无宗教信仰)被认为被试是拒绝宗教的,而答案提到某个宗教团体名称则被认为被试是接受宗教的。当问题的答案为留白时,我们便无法作出任何推断。有关该问题的数据在表6-1中呈示。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回答“无”(无任何宗教信仰)的被试(见表6-1中的最后纵列)获得了“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2.71的总平均分(表6-1中最后横排),比其他宗教团体的平均分显著要低。^[3]惟一的例外出现在惟一神教信徒(Unitarians)的案例中,他们的总平均分是1.99,以及出现在联合的小新教派(Combined Minor Protestant Sects)中,他们的总平均分是2.49。对于其他教派来说,平均分在3.41(公理会)和4.38(路德派)之间。这些倾向既出现在各种问卷的数据中,也出现在整个量表中。如果为了统计的目的而把那些承认自己属于某种宗教信仰的被试放在一个组内,那么他们的平均分便会比那些声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被试的平均分高出许多。

看来,下述结论是没有疑问的:一般说来,拒绝宗教的被试要比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受宗教的被试更少偏见。

然而,具有宗教信仰的被试也不一定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尽管没有宗教信仰的被试显然是非民族中心主义的。总的说来,填写宗教名称的被试平均分非常接近中点。

在我们的被试中,大多数人确实承认自己具有某种宗教信仰。非宗教的(非民族中心主义的)团体相对来说数目较小,而且,从社会角度上讲,也非人们关注的热点。具有宗教信仰的被试存在易变性,我们的总体样本有多大,这种易变性就有多大。

这意味着,在具有宗教信仰的被试中,既有极端高分者,也有极端低分者。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在非宗教的被试中,也会出现高低得分者。与非宗教被试有关的另一问题是性别差异的可能性。非宗教的女性要比非宗教的男性获得更低的分数。(请注意表6-1的“无宗教信仰”纵列中女子组和男子组的平均分)。非宗教的女性差不多总是得低分,而非宗教的男性则更具易变性。

2. 不同宗教的民族中心主义

如果我们询问为什么有些宗教人士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高分而有些宗教人士则得低分,我们便会很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向这样的问题:特定的教派起着哪些特定的作用?对表6-1的考察表明,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差别,即使我们把那些填写“新教徒”的被试置于一个类别之中,或者与最大的新教派名称结合起来,情形也是如此。在新教徒的名称中,有些被归入“大新教派”(Major Protestant Sects),只有一个组与众不同,它就是惟一神教,^[4]其平均分要比其他教派的平均分更低。看来,这与该团体意欲保持自由主义观点有关。把小新教派结合在一起,其平均分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宗教团体(惟一神教除外)的平均分更低一些。遗憾的是,这些小组均缺乏足够数量的被试来保证分别的统计处理。毫无疑问,虽然我们拥有一些综合的被试组,但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

小新教派的数据也提示了某种不一致的现象(或者至少缺乏对现状的某种认同),提示了反民族中心主义的某种东西。一项有趣的计划将是获得这些团体的代表性样本,并研究与本表的回答型式有关的信念等特定内容。

表 6-2 以不同频率出入教堂宗教仪式的团体的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

	1. 正常		2. 经常		3. 很少		结合 1,2,3		从不参加		空白		总计	
	人数	平均分	人数	平均分	人数	平均分	人数	平均分	人数	平均分	人数	平均分	人数	平均分
采用问卷 78 的组:														
演说班女生	45	3.09	39	3.71	47	3.28	131	3.34	6	3.20	3	4.70	140	3.32
演说班男生	11	3.43	10	3.28	23	3.55	44	3.45	7	2.87	1	1.90	52	3.34
在心理学班女生	6	4.47	7	3.09	24	3.21	37	3.39	4	3.70	1	2.50	42	3.40
职业妇女	14	2.70	11	3.04	24	2.76	49	2.81	13	1.76	1	1.70	63	2.57
小计:	76	3.20	67	3.47	118	3.21	281	3.27	30	2.37	6	3.37	297	3.18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11	3.36	11	3.59	25	3.39	47	3.45	0	—	0	—	47	3.43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17	9.39	10	3.59	24	3.87	51	3.18	3	4.42	0	—	54	3.25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15	2.99	14	3.30	20	2.97	49	3.07	8	2.19	0	—	37	2.95
小计:	43	3.24	35	3.47	69	3.09	147	3.23	11	2.80	0	—	158	3.20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军事校男子	14	4.74	29	4.36	100	4.46	143	4.46	32	3.82	3	4.77	178	4.36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7	2.60	9	3.89	22	4.24	38	3.86	10	2.98	2	3.50	50	3.67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12	4.35	13	3.65	29	4.20	54	4.10	16	2.28	1	1.30	71	3.65
小计:	33	4.15	51	4.09	151	4.38	235	4.28	58	3.25	6	3.77	299	4.07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47	4.34	42	4.43	36	3.44	125	4.11	5	2.32	2	4.20	132	4.04
海军事校男子	17	4.67	45	5.42	82	5.09	144	5.14	16	4.66	4	4.40	164	5.08
中产阶级女子	35	4.14	38	3.61	57	3.92	130	3.89	17	1.56	7	4.06	154	3.64
中产阶级男子	9	3.56	12	5.37	27	4.26	48	4.40	19	2.60	2	3.90	69	3.88
工人阶级男子	8	4.50	13	4.72	27	3.72	48	4.14	9	2.40	2	3.60	59	3.83
小计:	116	4.27	150	4.62	229	4.28	495	4.38	66	2.78	17	4.08	578	4.19
总计	268	3.79	303	4.14	567	3.94	1138	3.96	165	2.87	29	3.87	1332	3.82

3. 出入教堂

在具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中间,另一种差异类型对于偏见来说可能有意义,它就是出席教堂的频率。人们可以这样设想,那些经常出入教堂的人理应更加充分地参与形式化的宗教活动,他们似乎赞成民族中心主义,比之不经常出席教堂仪式的人来,前者获得较高的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分数。这些数据是通过下列提问而获得的:“你是否经常做礼拜?”该问题以问卷方式出现,其结果见表 6-2。我们对正常出席礼拜活动的人所作的推测尚未得到证实。在这个类别中,被试的平均分与那些经常参加或很少出席的人的平均分没有显著差别。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三种类别(即“正常”“经常”“很少”)结合起来,并把这一结合类别中被试的平均分与那些诉说“从不参加”的被试的平均分相比,则后者的得分明显地更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拒绝宗教的人比那些接受宗教的人具有较少的民族中心主义。至于后者为什么会得高分和低分的现象,个中原因尚待探究。

4. 父母的宗教信仰

人们可能会问,具有宗教信仰的被试(以一种对偏见来说有意义的方式)在施加宗教压力和接受宗教方式等方面有否差异呢?我们在早些时候就指出,被试为自己选择的团体成员身份,与他通过在该团体中成长起来而具有的团体成员身份,所包含的意义是不同的。人们也可能指出,被试在其成长岁月中,他所从属的宗教模式的同质性,以及施加宗教压力的一致性,都具有引发偏见的影响。对此,可以通过提问被试,分析他们在问卷上如何陈述,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考察,从而使有关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显示。提问的内容是,他们父母过去的宗教信仰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考虑父母宗教信仰之间的各

种关系,并假定它们与民族中心主义分数可能相关。

这一程序的结果在表 6-3 中予以说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调查的每一问卷而言,凡父母宗教信仰相同的被试,其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分数要比父母宗教信仰不同的被试稍高一些。^[5]总分中出现的差异也许接近统计意义。在采用问卷 78 和问卷 60 的团体中,对那些父母不信教的被试而言,他们要比前述两种类别中的任何一种(即父母具有相同或不同的宗教信仰)被试所得的平均分稍低一些;在采用问卷 40 和 45 的三个组中,他们的回答也被分析(在“父母都不信教”的类别中,被试的数目太少,以致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结果表明,对父母施以连续而又统一信仰的宗教的被试来说,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可能要比父母宗教影响不连续、不完全,甚或不存在的被试较高些。原因可能是,在民族中心主义被试中,他们的父母都是信教的。请注意,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对内团体权威的服从,若其结果越显著,权威也就越连续和一致。

暂且不去考虑在父亲的宗教信仰和母亲的宗教信仰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有一点很明显,即被试既有可能接受来自家庭的宗教压力,也有可能拒绝这种压力。考虑到美国的宗教主要是一个“母系”的问题,因此我们便在表 6-4 中将团体的反犹太主义平均分和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放在一起,以说明被试的宗教与母亲的宗教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这里,一般的情况是,承认与母亲信仰相同的被试比承认与母亲信仰不同的被试,在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获得较高的分数。在母亲信教而被试不信教的案例中,或者在被试信教而母亲不信教的案例中,偏见的分数更低些。而且,我们可以期望,当被试与母亲均不信教时,会出现最低的平均分。从整体上考虑这些结果,人们可以说,鉴于在量表上宗教信仰总是与较高的得分相关,因此假如宗

表 6-3 在父亲信仰与母亲信仰之间具有不同关系的团体的反犹太主义平均分和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

	父亲的宗教和母亲的宗教之间的关系												总计	平均	标准差
	相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宗教信仰		母亲信教		父亲信教		父母都信教		空白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采用问卷 78 的组:															
演说班女生	75	3.42	38	3.53	14	2.89	2	1.4	5	2.66	6	3.00	140	3.32	1.43
演说班男生	36	3.40	7	3.19	5	3.66	0	—	2	1.20	2	4.30	52	3.34	1.48
在职心理学班女生	25	3.43	10	3.20	2	4.55	0	—	2	2.80	3	3.47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35	2.73	15	2.37	9	2.37	0	—	2	1.05	2	3.75	63	2.57	1.37
小计:	171	3.28	70	3.20	30	2.97	2	1.40	11	2.13	13	3.42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22	3.47	9	3.69	8	3.72	22.00	2	3.54	4	2.71	47	3.43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37	3.54	7	2.66	3	3.47	1	3.00	2	2.88	4	1.71	54	3.25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41	3.17	6	2.94	5	2.10	0	—	2	2.21	3	1.78	57	2.95	1.26
小计:	100	3.38	22	3.16	16	3.17	3	2.33	6	2.88	11	2.09	158	3.20	1.32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事学校男子	120	4.36	30	4.24	9	4.94	0	—	1	4.60	18	4.21	178	4.36	1.60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78	4.29	45	3.84	3	2.67	0	—	1	3.40	5	2.96	132	4.04	1.58
海事学校男子	115	5.20	19	4.80	12	4.47	0	—	2	5.20	16	4.99	164	5.08	1.76
小计:	193	4.83	64	4.12	15	4.11	0	—	3	4.60	21	4.51	296	4.61	
总计	584	4.03	186	3.68	70	3.51	5	1.96	21	2.81	63	3.78	929	3.87	—

教是“自己选择的”(也就是说,假如被试独立地接受宗教,而不受家庭中主要宗教影响的支配,甚或违反这种支配),那么情况就不大可能是这样了。在这样的场合里,宗教被个体相当充分地内化了。不仅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服从或依赖父母的权威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果被试(尤其是女性被试)承认他们(她们)与母亲的信仰不同,则有可能使他们(她们)摆脱与此相应的态度,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摆脱偏见。

上述结果在女性身上要比在男性身上更加显著。这里可以提出的解释是,对男性来说,母亲通常不是与权威有关的冲突的焦点,在宗教问题上站在母亲一边的男性,可能因此获得某种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而这种人道主义恰恰是反偏见的。

与宗教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的家庭关系的这些结果表明,为了了解为什么有些教徒具有偏见,而其他一些教徒则不然,有必要探索该问题的深层的心理动因,而不应仅仅局限于社会因素方面。

(二) 宗教和教会的“重要性”

研究宗教心理学的一种方法是直接询问被试:“你认为宗教和教会是否重要?”这个问题出现在使用问卷 78 之前的调查之中。问题的答案取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普通心理学班的 123 个女生。^[6]被试的回答按下列条目归类:

- (1) 无条件地反对宗教和教会。
- (2) “不重要”,但未提供充分理由。
- (3) 不可知论;强调价值观、伦理学,以及由宗教和教会来强化的生活方式。
- (4) 强调宗教,把宗教视为内在力量和满足的源泉。
- (5) 接受宗教,但拒绝教会;强调诸如忠诚和上帝等概念。

表 6-4 在被试的信仰和母亲的信仰之间具有各种关系的被试组的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

	被试的宗教和母亲的宗教之间的关系										标准差																																																																																																																																																																																																																																																																																																																																																																																	
	相同的		不同的		母亲信教 被试不信		被试信教 母亲不信		被试和母亲 都不信教			空白	总计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人数	平均																																																																																																																																																																																																																																																																																																																																																																																
采用问卷 78 的组:													演说班女生	82	3.50	41	3.32	9	2.47	6	2.23	0	—	2	3.45	140	3.32	1.43	演说班男生	38	3.37	5	3.48	7	3.71	1	1.20	1	1.20	0	—	52	3.34	1.84	在心理学班女生	19	3.90	10	3.23	10	2.62	1	4.00	1	1.60	1	4.70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31	2.74	21	2.95	9	1.48	0	—	2	1.05	0	—	63	2.57	1.37	小计	170	3.37	77	3.22	35	2.51	8	2.33	4	1.23	3	3.87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21	4.22	16	3.00	1	1.17	4	2.85	2	1.17	3	3.33	47	3.43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大学女生	28	3.45	18	3.18	4	2.29	2	3.21	1	2.33	1	2.50	54	3.25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大学男生	25	3.15	22	3.11	5	1.60	1	1.67	1	2.75	3	2.78	57	2.95	1.26	小计	74	3.57	56	3.10	10	1.83	7	2.79	4	1.85	7	2.98	158	3.19	1.32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军事校男子	29	4.56	16	4.13	22	3.16	0	—	1	4.50	10	3.72	178	4.36	1.60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24	4.16	14	2.94	6	3.17	0	—	0	—	6	3.88	50	3.67	1.59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40	4.25	11	3.75	9	2.22	0	—	4	1.18	7	3.30	71	3.65	1.60	小计	193	4.44	41	3.62	37	3.20	0	—	5	1.84	23	3.64	299	4.07	1.63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85	4.27	33	3.88	8	3.08	0	—	1	3.40	5	2.92	132	4.04	1.58	海军事校男子	128	5.10	15	5.43	12	4.33	0	—	2	5.20	7	5.17	164	5.08	1.76	中产阶级女子	84	4.22	47	3.38	10	1.22	1	1.40	1	1.20	11	2.95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40	4.49	13	3.75	13	2.60	0	—	1	1.00	2	2.7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33	4.16	7	3.83	11	2.62	5	5.00	1	1.00	2	3.40	59	3.83	1.72	小计	370	4.56	115	3.86	54	2.80	6	4.40	6	2.83	27	3.53	578	4.19	1.90	总计	807	4.19	288	3.51	136	2.70	21	3.07	19	2.03	60	3.53	1332	3.82	—
演说班女生	82	3.50	41	3.32	9	2.47	6	2.23	0	—	2	3.45	140	3.32	1.43																																																																																																																																																																																																																																																																																																																																																																													
演说班男生	38	3.37	5	3.48	7	3.71	1	1.20	1	1.20	0	—	52	3.34	1.84																																																																																																																																																																																																																																																																																																																																																																													
在心理学班女生	19	3.90	10	3.23	10	2.62	1	4.00	1	1.60	1	4.70	42	3.40	1.36																																																																																																																																																																																																																																																																																																																																																																													
职业妇女	31	2.74	21	2.95	9	1.48	0	—	2	1.05	0	—	63	2.57	1.37																																																																																																																																																																																																																																																																																																																																																																													
小计	170	3.37	77	3.22	35	2.51	8	2.33	4	1.23	3	3.87	297	3.18	1.46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21	4.22	16	3.00	1	1.17	4	2.85	2	1.17	3	3.33	47	3.43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大学女生	28	3.45	18	3.18	4	2.29	2	3.21	1	2.33	1	2.50	54	3.25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大学男生	25	3.15	22	3.11	5	1.60	1	1.67	1	2.75	3	2.78	57	2.95	1.26	小计	74	3.57	56	3.10	10	1.83	7	2.79	4	1.85	7	2.98	158	3.19	1.32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军事校男子	29	4.56	16	4.13	22	3.16	0	—	1	4.50	10	3.72	178	4.36	1.60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24	4.16	14	2.94	6	3.17	0	—	0	—	6	3.88	50	3.67	1.59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40	4.25	11	3.75	9	2.22	0	—	4	1.18	7	3.30	71	3.65	1.60	小计	193	4.44	41	3.62	37	3.20	0	—	5	1.84	23	3.64	299	4.07	1.63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85	4.27	33	3.88	8	3.08	0	—	1	3.40	5	2.92	132	4.04	1.58	海军事校男子	128	5.10	15	5.43	12	4.33	0	—	2	5.20	7	5.17	164	5.08	1.76	中产阶级女子	84	4.22	47	3.38	10	1.22	1	1.40	1	1.20	11	2.95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40	4.49	13	3.75	13	2.60	0	—	1	1.00	2	2.7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33	4.16	7	3.83	11	2.62	5	5.00	1	1.00	2	3.40	59	3.83	1.72	小计	370	4.56	115	3.86	54	2.80	6	4.40	6	2.83	27	3.53	578	4.19	1.90	总计	807	4.19	288	3.51	136	2.70	21	3.07	19	2.03	60	3.53	1332	3.82	—																																																																																													
俄勒冈大学女生	21	4.22	16	3.00	1	1.17	4	2.85	2	1.17	3	3.33	47	3.43	1.38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大学女生	28	3.45	18	3.18	4	2.29	2	3.21	1	2.33	1	2.50	54	3.25	1.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大学男生	25	3.15	22	3.11	5	1.60	1	1.67	1	2.75	3	2.78	57	2.95	1.26																																																																																																																																																																																																																																																																																																																																																																													
小计	74	3.57	56	3.10	10	1.83	7	2.79	4	1.85	7	2.98	158	3.19	1.32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海军事校男子	29	4.56	16	4.13	22	3.16	0	—	1	4.50	10	3.72	178	4.36	1.60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24	4.16	14	2.94	6	3.17	0	—	0	—	6	3.88	50	3.67	1.59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40	4.25	11	3.75	9	2.22	0	—	4	1.18	7	3.30	71	3.65	1.60	小计	193	4.44	41	3.62	37	3.20	0	—	5	1.84	23	3.64	299	4.07	1.63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85	4.27	33	3.88	8	3.08	0	—	1	3.40	5	2.92	132	4.04	1.58	海军事校男子	128	5.10	15	5.43	12	4.33	0	—	2	5.20	7	5.17	164	5.08	1.76	中产阶级女子	84	4.22	47	3.38	10	1.22	1	1.40	1	1.20	11	2.95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40	4.49	13	3.75	13	2.60	0	—	1	1.00	2	2.7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33	4.16	7	3.83	11	2.62	5	5.00	1	1.00	2	3.40	59	3.83	1.72	小计	370	4.56	115	3.86	54	2.80	6	4.40	6	2.83	27	3.53	578	4.19	1.90	总计	807	4.19	288	3.51	136	2.70	21	3.07	19	2.03	60	3.53	1332	3.82	—																																																																																																																																																																													
海军事校男子	29	4.56	16	4.13	22	3.16	0	—	1	4.50	10	3.72	178	4.36	1.60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24	4.16	14	2.94	6	3.17	0	—	0	—	6	3.88	50	3.67	1.59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40	4.25	11	3.75	9	2.22	0	—	4	1.18	7	3.30	71	3.65	1.60																																																																																																																																																																																																																																																																																																																																																																													
小计	193	4.44	41	3.62	37	3.20	0	—	5	1.84	23	3.64	299	4.07	1.63																																																																																																																																																																																																																																																																																																																																																																													
采用问卷 40 的组: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85	4.27	33	3.88	8	3.08	0	—	1	3.40	5	2.92	132	4.04	1.58	海军事校男子	128	5.10	15	5.43	12	4.33	0	—	2	5.20	7	5.17	164	5.08	1.76	中产阶级女子	84	4.22	47	3.38	10	1.22	1	1.40	1	1.20	11	2.95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40	4.49	13	3.75	13	2.60	0	—	1	1.00	2	2.7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33	4.16	7	3.83	11	2.62	5	5.00	1	1.00	2	3.40	59	3.83	1.72	小计	370	4.56	115	3.86	54	2.80	6	4.40	6	2.83	27	3.53	578	4.19	1.90	总计	807	4.19	288	3.51	136	2.70	21	3.07	19	2.03	60	3.53	1332	3.82	—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85	4.27	33	3.88	8	3.08	0	—	1	3.40	5	2.92	132	4.04	1.58																																																																																																																																																																																																																																																																																																																																																																													
海军事校男子	128	5.10	15	5.43	12	4.33	0	—	2	5.20	7	5.17	164	5.08	1.76																																																																																																																																																																																																																																																																																																																																																																													
中产阶级女子	84	4.22	47	3.38	10	1.22	1	1.40	1	1.20	11	2.95	154	3.64	1.96																																																																																																																																																																																																																																																																																																																																																																													
中产阶级男子	40	4.49	13	3.75	13	2.60	0	—	1	1.00	2	2.70	69	3.89	2.08																																																																																																																																																																																																																																																																																																																																																																													
工人阶级男子	33	4.16	7	3.83	11	2.62	5	5.00	1	1.00	2	3.40	59	3.83	1.72																																																																																																																																																																																																																																																																																																																																																																													
小计	370	4.56	115	3.86	54	2.80	6	4.40	6	2.83	27	3.53	578	4.19	1.90																																																																																																																																																																																																																																																																																																																																																																													
总计	807	4.19	288	3.51	136	2.70	21	3.07	19	2.03	60	3.53	1332	3.82	—																																																																																																																																																																																																																																																																																																																																																																													

(6) “轻度重要”,但未提供充分理由。

(7) 宗教和教会都重要;对祈祷、礼拜仪式等抱接受的态度。

提供这些回答类别的被试,其反犹主义平均分被分别统计:(6)(7)两类的平均分相对较高,其他类别的平均分相对较低。不过,从统计学上看,这些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有些类别只是极少数被试的反映。看来,有充分的理由将类别(6)和(7)结合起来,其根据是:两者都描绘了对宗教和教会的赞成态度,但两者之间未作任何区分;与此相似的是,可把余下的类别结合起来,其根据是,它们反映了某种态度,而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定型化了的宗教。这两种类别的平均分如表6-5所示。那些认为宗教和教会都重要的被试,其反犹主义平均分为180.7,而其他被试(反对宗教和教会的被试,接受宗教而不接受教会的被试,强调宗教的个人意义、道德意义和理性意义的被试)的平均分为115.4。两种平均分的差异是65.3,相关系数为7.3。

表6-5 对“宗教和教会是否重要”这一问题作出不同回答的被试组的反犹主义平均分

回答的类别	人数	反犹主义平均分	标准差
(6)(7)结合的“高分”类别	65	180.7	54.5
(1)(2)(3)(4)和(5)结合的“低分”类别	58	115.4	41.8

这些数据意味着,对于在反犹主义问题上获得高分的被试来说,宗教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习俗问题。在反犹主义问题上获得低分的被试,要么反对宗教,要么具有一种相对来说个人的和内化的宗教含义。接受或拒绝宗教的态度,不如接受或拒绝宗教的方式那样重要。

(三) 量表项目

量表中包含了三个属于宗教思想的项目,试图测量人格方面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该量表将在下一章予以描述,这里主要考虑这些涉及宗教课题的项目。第一个项目是:“现代教会具有许多清规戒律,而且伪善,因此虔诚的教徒并不欢迎它;它只对那些缺乏批判能力的被试有吸引力。”这里的假设是,不同意该项目便标志着无批判地接受教会,从而也无批判地接受民族中心主义;而同意该项目,则表明一种反宗教态度,或者对宗教抱理智的观点,教会因此会受到批判(我们期望它在测量偏见的量表上理应得到低分)。然而,结果令人沮丧。采用问卷78的295个被试,在这个项目上的平均分为4.67,而反犹主义分辨力为-1.18。仔细分析一下,也许该论述过于复杂和过于棘手,容易为被试所误解。更有甚者,高平均分表明,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准备以这种方式批判教会;当然,这会降低项目分辨的强度。毫无疑问,在第一次试测后,该项目便从问卷中删去了。

量表中的另一个项目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应当对他无力把握的某种超自然力量怀有深刻的忠诚,对之效忠,并且对其表现出不抱怀疑的态度。”该项目的假设是,如果同意这一论述,表明被试坚定地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并持顺从的态度,结果,就会有偏见的举动。采用问卷78的295个被试,其平均分为3.97,而反犹主义分辨力为1.26。当该项目经过稍稍修改后用于问卷60时(人数=226),平均分为3.60,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为1.38。分辨力增大的现实表明,该项目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符合统计意义。项目与量表的余下部分显著相关,整个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高度相关。

第三个项目是:“化学、物理和医学等科学虽然促进了人类

的进步,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无法为人类的头脑所理解的。”据认为,同意这一项目的被试,把事物的神秘的精神领域构想成一种戒律,并且对此抱敬畏的态度。这种观点被期望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在问卷 78 的例子中,平均分是 4.35,而反犹太主义分辨力是 0.97。在问卷 60 的例子中,对该项目略作修改,平均分为 4.98,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为 1.32。这一结果再次表明了特定的宗教思想与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项目与量表的余下部分显著相关(像上面讨论过的“超自然力量”的项目一样),有助于测量含蓄的反民主倾向,而且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予以使用。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有可能以量表的项目形式标示各种宗教信仰、思想和感情,那么,便可取得宗教思想与民族中心主义关系的量化结果。这是一个可以成为未来研究课题的假设。

二、讨论

加入今日美国的一个宗教团体,或者把自己认同于美国的一个宗教团体,不等于说一个人从此接受了传统的基督教关于容忍、情同手足和平等的价值观。相反,调查结果表明,这些价值观恰恰由那些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的人们所掌握。也有这样的可能,即参与教派或教堂仪式并不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态度;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人士把自己认同于某种宗教,但却不去过多思考这一问题。此类情况与下列事实相一致,大新教派的平均分和易变性与整体样本中找到的那些平均分和易变性是十分相似的。不过,可以争辩的是,关于宗教的这种常规研究方法,表明了对现状(服从外部权威)的充分认同,从道德上强调“参与者”和“不参与者”之间的区别,根据民族中心主义的得分情况,把非

宗教人员与大新教派成员分化开来,与小新教派成员分化开来(后者实际上代表了相反的倾向)。与此同时,大新教派成员在其倾向方面各有不同。有迹象表明,如果接受宗教主要由习俗的或外部的考虑所决定,则民族中心主义分数便趋向于上升。由此可见,父母在宗教信仰上的一致,会减少被试对所涉问题觉醒的机会,被试宗教信仰与母亲宗教信仰的相同性,可能表明对权威的服从,这些都倾向于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但是,在主要的教派成员中,许多被试的宗教似乎不受外部压力的支配,而是采取了内化价值的形式。看来,这些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倾向于得低分。具有这种观点的被试,在得低分的新教中占支配地位,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常常声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教派。

我们对宗教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共识:需要注意的是,接受或拒绝宗教对个体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这些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与前面几章中位居前列的那些因素(遵奉、因袭、顺从权威、听从外部压力、以内团体—外团体为标准进行思考,以及与此相对的非遵奉、独立、价值观的内化)是相同的。由量表项目提供的宗教思想的数据也为宗教思想本身提供了解释方式。对“超自然力量”的完全顺从,强烈地暗示着个体身上一种婴儿般的无助状态,也就是对一种纯形式的权力主义的顺从。这里所讨论的此类心理变量,将在下一章直接研究。

三、归纳和小结

承认自己信教的被试要比那些不承认自己信教的被试反映出更多的偏见。但是,对所有的大新教派来说,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在理论上接近于中点。被试中确有许多人把自

己与某个宗教团体等同起来,他们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的易变性,几乎与整体样本一样大。业已证明,教派因素并不十分重要。在较大教派中,没有出现显著差别;但是,惟一神教派的教徒,似乎由于自由主义而显得与众不同。还有一些小新教派,鉴于某种非遵奉精神,或者缺乏对现状的识别,比之其他被试得分更低。参与教堂活动的频率也未给我们什么特别的启示;不过,那些从不参加教堂活动的人,比之那些经常参加教堂活动的人,获得较低的民族中心主义分数。这一发现补充证明了上述的结论,即拒绝宗教的人要比那些接受宗教的人较少偏见。

当我们把被试的宗教信仰与其父母的宗教信仰联系起来考虑时,可以发现,被试的父母宗教信仰相同,比之被试的父母宗教信仰不一,或者影响不连续、不完整、甚至不存在的,前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更为显著。此外,有关情况也表明,被试与其母亲在宗教问题上的一致,则其倾向于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倘若不一致,则与反民族中心主义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如果接受宗教主要是为了表明对父母权威型式的顺从,那么这种接受便是促成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条件。

我们也对宗教思想进行了量化研究:在问卷中包含了一个尚不确定的问题,它涉及被试心目中关于宗教和教会是否重要的认识。当我们将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归类,并算出反犹主义平均分以后,结果表明,认为宗教和教会都重要的被试,与那些认为宗教和教会均不重要的被试,或者强调宗教的伦理方面的被试,或者在教会和宗教之间作出区分(拒绝前者,强调后者)的被试,也即更加内化和更加理性的被试相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加反犹主义的。

属于宗教思想的两个量表项目似乎与偏见稍稍相关。对其中的两种说法(人们应当“信任某种超自然力量”,以及“有些东

西是人类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越是同意,则反犹主义分数越高。

一般说来,那些客观因素(教派和参与教堂活动的频率)对偏见很少具有意义;被试接受或拒绝宗教,与心理倾向有关,这些心理倾向反映在他的宗教思想内容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教派和参与教堂活动的频率,对偏见的影响弱于心理倾向的影响。上面所说的某些心理倾向(因袭主义、顺从权威,等等)与前面几章中位居前列的那些倾向相同。现在,就让我们研究这些心理倾向。

注 释

- [1]本章为尼维特·桑福德(R. Nevitt Sanford)所撰。
- [2]关于某些宗教态度的访谈材料也同时展现于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一章。
- [3]本章关于平均分之间差异的估计,遵循着第五章曾提及过的规则(请比较第五章的注释14)。如果讨论中团体人数(N)达到50,那么0.6的差异很可能是有意义的,至少在5%的水平上是有意义的。本章讨论的大多数差异要比0.6大得多,看来明显超过统计意义上的最低要求。
- [4]按照美国的宗教成员数字,这个团体也许可以归入“大新教派”。
- [5]我们只在采用问卷45的一个组和采用问卷40的两个组里计算这种关系。我们所关心的那些关系,在问卷60得到修改之前,以一致的方式出现在所有被考察的组中,致使我们可以把余下的组作为样本。结果证明,这样做多少有点缺陷,因为在问卷78和60中发现的一些关系,当用于那些采用问卷40和45的被试组时,没有得到确认。
- [6]这个被试组的总体数据在第三章已展示。

第七章 对反民主倾向的深层因素的测量^[1]

当我们的研究进入一定阶段,也即用反犹太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作了许多调查以后,我们逐渐感悟出这样一个计划:构建一种对偏见进行测量的量表,它既不直接表现这一目的,也不提及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名称。看来,这样一种工具,如果它与反犹太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高度相关的话,便可证明是一种很有效用的测量手段。它可以用来调查某些团体的意见,因为在这些团体中,“种族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无法向这些团体的被试直接展示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例如,在一个团体中,存在某种少数民族的许多成员)。它也可以用来测量少数民族团体成员本身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防止某些防御反应(这种防御反应是人们被要求表达自己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时经常会发生的),它还能对偏见提供更为有效的测量。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是我们衡量一个人有否偏见的指标,但是它与反犹太主义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相关,尚未达到十分显著的程度。此外,该量表的项目太具思想性了,也就是说,它们很容易以某种逻辑的方式与偏见相联系。所以,我们需要收集项目,每个项目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相关,但却并不来自一个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关的领域。我们所转

向的领域是诊所的个案访谈:当被试讨论诸如自我、家庭、性、人际关系、道德价值和个人价值等问题时,会表现出众多的倾向,它们可能与偏见有关。

以此为目的,我们开始考虑第二种(也是最主要的)新量表。这样一种量表能否在人格水平上作出对反民主倾向的有效估计呢?在设计新量表之际,我们认为,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不只是一种表面观点,它还是一种倾向,其根源可以追溯至个体的内部结构,至少部分是这样。我们能否构建一种量表,用以直接研究这些深层的,而且常常是无意识的力量呢?如果能够的话,如果该量表可以通过后来的临床研究予以证明的话,那么,比之那些直接暴露思想的量表,我们难道不能获得对反民主潜力的精确估计吗?看来,前景是令人鼓舞的,而且,临床技术的经验和其他量表的经验都为此计划的成功提供了相当多的保证。为了说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原因,为了解释是什么东西使这些量表的不同项目得出同一结果,我们的注意力开始被吸引到个体的心理倾向上来,这些心理倾向有定型(stereotype)、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关注权力等等。关于个体思想的研究,例如对麦克(Mack)和拉里(Larry)的研究,已经获得了相同结果:个体身上的有些倾向,既会在他们对自以为是思想问题的讨论中反映出来,也会在他们自以为不是思想问题的讨论中反映出来。我们对临床一遗传材料进行考察时发现,这些倾向常常指向深层的人格需求。于是,我们的任务便是系统阐述量表项目,尽管这些项目涉及观点和态度的陈述,而且与普通的观点、态度问卷中的项目有着同样的形式,但它们可以揭示人格中潜在的反民主倾向。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临床研究中的一些感悟和假设用于团体研究,同时检验我们是否在个体性质的特征上开展研究。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在人格水平上量化反民主倾向)并没有取代第一个目标(既测量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又不提及少数民族团体或政治经济问题)。确切地说,这两个目标可以一起实现。我们认为,由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答案受到潜在倾向的强烈影响,而这些潜在倾向又是新量表希望探索的,因此,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应与新量表相关。诚然,如果这样一种相关确能获得的话,那么,它可以被视做是一种证据,即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并非孤立的态度,或完全表面化的态度,而是反映了个体身上一种持久的倾向。然而,当我们这样设计量表时,我们应从新量表中排除下列的项目:一些经常与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的项目,也即很容易被视做一种政治“路线”的项目。关于观点和态度的研究发现,除了通常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该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是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的),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会提供被试对世界是否持有偏见看法的综合资料。我们的新工具取名为F量表,以表示它关注前法西斯主义(Prefascist)的深层倾向。

从理论上讲,人们期望法西斯主义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不会达到显著相关。人们也期望,法西斯主义量表会反映某些反民主的潜在影响。当被试对一些直接处理少数民族团体的敌意问题的项目作出反应时,这种反民主的潜在影响可能会表现出来。目前的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目大部分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阐述的,以便允许被试在表示偏见的同时,仍保持他自以为民主的感觉。不过,应该承认,一个被试可能在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而在访谈中(在信任关系业已建立的基础上),被试仍可能反映出他是有偏见的。不仅如此,还应承认,一个被试可能一方面拒绝对少数民族团体表示敌意,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些特征,例如,以传统的方法评价这类

团体,或者从道德上拒绝它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反民主宣传的影响。如果说法西斯主义量表是对反民主潜力的一种测量(这种测量可能以公开反对新团体的敌意表示出来),那么它不可能完全与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相关。确切地说,构建这一量表的基本要求是:它能挑选出一些个体,他们在临床研究中反映出很容易接受反民主宣传。尽管在研究范围内不能单凭法西斯主义量表挑选被访谈者,但我们可以把法西斯主义量表与其他一些反民主人格倾向的指数(它们是由其他技术来揭示的)联系起来考虑。

看来,这些人格倾向可以在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低分状态下存在。

然而,不应截然划分潜力和表现之间的区别。假定个体身上已经存在由情绪决定的反民主倾向,那么我们也应当期望这些倾向会由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诱发出来,并由法西斯主义量表和其他一些间接方法诱发出来。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的被试会成为例外,因为他们对少数民族团体的偏见受到了抑制,对此需给予特别的解释。

一、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建构

(一) 基本理论

表7-1中展示了法西斯主义原始量表的38个项目,按照它们在问卷78中出现的顺序标上数码。如果读者们认真思虑一下本问卷中的许多内容,可以发现,它们在法西斯主义量表建构之前已为人们所了解,所以,很显然,在设计该量表时,我们并

没有以严格的经验主义方式进行。我们并没有考虑用数百个项目来测试被试,而是多少随机地进行挑选,然后通过试误(trial and error)的方法确定哪些项目可以与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对每个项目来说,我们的假设是:陈述的内容应能揭示偏见的本质。

表 7-1 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78

2. 尽管占星术会招来许多人的嘲笑,但它仍能解释许多事情。
3. 美国尚未实现真正的美国生活方式,对此问题,只有诉诸武力方能解决。
6. 应以某种方式对妇女加以限制,以便男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是十分自然和正确的。
7. 今日许多人以好逸恶劳的方式生活;我们应当坚持基本的生活原则,恢复充满活力的积极的生活方式。
10. 日本在 1944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时发生过一次地震,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
12. 现代教会具有许多清规戒律,而且虚伪;它们对虔诚的教徒没有吸引力,而对孩子般的、不安全的和无批判的人有吸引力。
14. 在我们打败德国人和日本人以后,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的其他敌人身上,例如老鼠、蛇和细菌。
17. 相似孕育蔑视。
19. 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应当避免做一些在他人看来错误的事情,即使他知道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正确的。
20. 进步教育的一个主要价值是,它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示那些为传统的中产阶级社会所拒斥的冲动和愿望。
23. 那些不爱父母、不感激父母、不尊重父母的人是最可鄙的。
24. 今天,凡事都变得不稳定了;我们应当对变化、冲突和动乱有所准备。
28. 比起那些专述打斗、罗曼史和冒险的小说和故事来,描述人们想些什么和感觉什么的小说或故事有趣得多。
30. 鉴于宣传的目的,关于欧洲发生暴行的报道被大大夸张了。
31. 同性恋是少年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当严加惩处。
37. 教师或老板总是详尽地描述什么事情该做,以及如何去做,这对学生的学习或成人的工作来说是基本的。

38. 大学学习过于强调知识的和理论的价值,而对实际问题和生活美德则轻描淡写。
39. 每个人都应当对非他能力所能控制的某种超自然力量怀有深刻的忠诚,彻底效忠,不怀疑它的一切表现。
42. 不管男人表面上如何表现,他们对女人发生兴趣只有一个原因。
43. 化学、物理和医学等科学已使人们步入现代生活,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的大脑所无法理解的。
46.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性放荡与今日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相比,只不过是见大巫见小巫,甚至在人们最不希望它发生的圈子里也是如此。
47. 凡对我们荣誉的侮辱都应当受到惩罚。
50. 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53. 有些事情过于私密,甚至不能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说。
55. 休闲是一件乐事,但是要知道,惟有辛勤劳动才能使生活有趣和充满价值。
56. 战后,犯罪的浪潮会到来;控制帮派、打击流氓将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58. 只要一个人把事情做好,至于他从事什么工作并不那么重要。
59. 人类的本性就是那么回事:引发战争和冲突。
60. 在下列陈述中,哪一种陈述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在三项自以为最重要的陈述上标上*号:

艺术和激发美感	敏感性和理解
平易近人的个性	效率、实用性、节俭
内驱力、决心、意志力量	理智和严肃
宽宏大量的人道主义社会观	情感的表示、温暖、亲切
良好的姿态	仁爱和慈善
65. 人类的一系列战争和冲突,会由一场世界性的地震、洪水或其他灾难而告结束,这是完全可能的。
66. 书籍和电影不该如此频繁地描绘生活的阴暗面;它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娱乐或振奋精神上面。
67. 当你琢磨人性时,你会发现,它总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
70.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阴谋所控制,这些阴谋是由政客们秘密炮制的。
73. 当今,各种人群到处迁移,自由混合。对此,人们必须特别小心,以防止自己被感染上疾病。
74. 这个国家所真正需要的是少一点法律和机构,多一点有勇气的、不知疲倦的、专注于事业的领导人,以便人民可以信任他们。
75. 对于性犯罪,例如强奸和恋童,不仅要拘禁,而且还必须当众鞭答。
77.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想到去伤害自己的密友或亲属。

上述假设的主要来源是本研究中已经实施的调查。为此目的,可以获得的材料有:从反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中得出的结果(正如前面几章所提供的那些结果一样);从问卷调查中获得的关于民族中心主义的众多相关材料,它们来自对实际问题的反应,属于这类题目的有宗教、战争、理想社会等等;关于投射问题的早期结果;还有从访谈和主题统觉测验中获得的重要材料。项目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与本研究相关的一些领域的研究(作者也曾在这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一些主要结果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关于与战争士气和思想相关的人格方面的若干研究(19、20、102、107、108、109),以及社会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例如反犹主义煽动者演说的内容分析,关于反犹主义活动家的一项研究(2、3、56、57、57A、57B)。最后,还有论述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一些文献,它们既包括经验主义研究,又包括理论研究。

对本研究的材料进行解释,是由一种理论来引导的,这一点是能得到人们认可的。目前,虽然它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它在准备法西斯主义量表的过程中却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旦一个假设得到系统阐述,则涉及人格的深层倾向便可能以某种观点或态度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这种观点或态度动态地(尽管不是逻辑地)与反新团体的偏见有关。在此基础上,议定一个项目也就为期不远了。例如,日报上的一个标题、访谈者的一句话、人际交往时的会话片断等,通常可以作为项目设计的参考。不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一个项目的实际阐述是一种技术,对此程序必须谨慎小心。

至于哪类核心的人格倾向可以期望成为最重要的导向,我们说过,这在以前已经进行过研究;它们是一些倾向,随着假设的构成,它们能够最佳地解释量表反应的一致性。而且,它们也

出现在临床材料的分析中,作为从个案中寻求一致性的可能依据。在这些倾向中,大多数倾向前面已经提到过,它们能为获得的结果提供意义。例如,当我们发现反犹主义的个体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持有反习俗的道德价值观。于是,一种解释是,该个体特别顽固地坚持习俗的价值观,他的人格中的这种一般倾向为某种反犹主义提供了动机基础。与此同时,他会以某种方式来表现自己,例如以蔑视和惩罚犹太人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理由是犹太人违反了习俗的价值观。这种解释得到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支持,这些量表表明,反映因袭主义的项目与明显的偏见形式相联系。因此,相应地说,坚持习俗的价值观被认为是个体的一个变量(它可以通过法西斯主义的量表项目来揭示),它在功能上与各种偏见的表现形式相联系。同样,对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结果的考虑也表明,潜在的若干偏见是美化内团体的权威人物,屈从于这些人物,对他们不加批判,并且采取一切措施,以某种道德权威的名义惩罚新团体人物。由此可见,权力主义所假设的这个变量是值得调查的。

其他一些变量也以同样方式得以形成,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基本内容。其中,每一变量被认为是个体身上的核心倾向,它们与某种动力过程相一致,既以外显形式在民族中心主义上反映出来,又在与心理活动相联系的观点和态度上反映出来。这些变量列举如下(我们还为每一种变量提供了简明的定义):

- (1) 因袭主义:顽固地坚持习俗,遵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 (2) 权力主义的屈从:把内团体理想化,顺从当局,对当局不持批判态度。
- (3) 权力主义的攻击:对违背习俗价值观的人予以提防、谴

责、拒绝和惩罚。

(4) 反内感受作用(antiintraception):反对主观、想像和良心。

(5) 迷信和定型:信奉个人命运的神秘主义,以僵化、刻板的思想方式考虑问题。

(6) 力量和“顽强”:主张支配—顺从、强硬—懦弱,以及领导—随从等维度;认同权威人物;过分强调自我的习俗化属性;夸大“力量”和“顽强”的作用。

(7) 破坏性和犬儒主义(cynicism):敌意的泛化,贬低人类。

(8) 投射:认为狂暴和危险正在世界上盛行;将无意识的情感冲动向外投射。

(9) 性:过于关注性问题。

上述这些变量是相伴而行的,由此形成单一的症状,也就是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或多或少持久的人格结构,导致个体接受反民主宣传。因此,可以这样说,法西斯主义量表试图测量潜在的反民主人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量表涉及到这种人格模式的所有特征,相反,它只是相关特征的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借助这些例子来展示人格模式的特征。确实,随着研究的开展,这一模式的许多补充特征,以及模式内部的变化也都得以展现。遗憾的是,我们尚未构建第二个法西斯主义量表,以便将这一探索推向深入。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是在这样的程度上谈论人格的,也即量表项目的一致性是以内在结构为基础来解释的,而不是以外部联系为基础来解释的。

量表的变量可以详尽地予以讨论,我们所强调的是它们的结构,以及它们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随着变量的引进,变量得以表现的量表项目被提出来了。不过,你们将会注意到,随着变量被提出,同一项目有时会出现在几个标题之下。这种情况产生于我们建构量表的方法。为了有效地涉及尽可能宽泛的领

域,有必要系统阐述那些适合于基本理论的项目(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项目有时被用来代表两种思想,有时甚至代表更多的思想)。你们还需注意的是,不同的变量是由不同的项目来描述的。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量表的设计首先应该考虑整个模式(变量必须迎合的模式),其次应该考虑有些变量比另外一些变量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A. 因袭主义

12. 现代教会具有许多清规戒律,而且伪善。它们对虔诚的教徒没有吸引力,而对孩子般的、不安全的和无批判的人有吸引力。

19. 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应当避免做一些在他人看来错误的事情,即使他知道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正确的。

38. 大学学习过于强调知识和理论的价值,而对实际问题和生活美德则轻描淡写。

55. 休闲是一种乐事,但是,要知道,惟有辛勤劳动才能使生活有趣和充满价值。

58. 只要一个人把事情做好,至于他从事什么工作并不那么重要。

60. 在下列陈述中,哪一种陈述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在三项自以为最重要的陈述上标上√号。

艺术和激发美感	敏感性和理解
平易近人的个性	效率、实用性、节俭
内驱力、决心、意志力量	理智和严肃
宽宏大量的人道主义社会观	情感的表示、温暖、亲切
良好的姿态	仁爱和慈善

对法西斯主义的易感性被认为是中产阶级颇具特征的一种现象,与该文化最相符的人也是最具偏见的人,这是一个十分著名的假设。本量表包含了那些与传统价值观有关的项目,以便收集与此假设有关的数据。不过,本研究的许多早期发现证明,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传统价值观与偏见之间的相关是正的,但并不显著;由于不受传统制约的人也不受偏见的影响,因此,很显然,有些坚持传统的人有偏见,而有些坚持传统的人则没有。看来,在传统的团体中,可以根据传统性或因袭性来衡量成员之间的不同,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可以根据人格的结构类型来衡量成员之间的不同。如果坚持传统价值观是个体良心(conscience)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期望这些价值观与反民主潜力之间存在任何必要的联系。所谓“个体的良心”,在这里意指下述的现象:个体把提供给他的一些标准看做是尚未同化的少数民族团体成员或“低层次”的人在道德上放松自己的行为——这样的标准,如果它们被充分地内化的话,会使他拒斥暴力和少年犯罪(这些暴力和少年犯罪是法西斯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另一方面,如果坚持传统的价值观是由外部的社会压力所致,如果它以个体坚持团体力量的标准为基础,则他至少会暂时地认同这些团体力量。由此,我们便可以期望它与反民主的可接受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后一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因袭主义”),试图把它与仅仅接受传统的价值观相区别。因袭主义者受外部力量的支配,不论这些力量可能会把他引向何方。此外,他还会为了一种十分不同的标准而改变初衷。例如,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化成信仰天主教。

在“因袭主义”标题下列举的量表项目,为被试提供了一个表现机会:他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是否属于刚才描述过的刻板的专制主义。例如,下列项目可以由+3分数来标示,它们声称

“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们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不过,对这个问题的最后抉择将有赖于个体在其他项目上的回答。例如,极端的因袭主义有着对那些违反传统价值的人进行惩罚的强烈倾向。换言之,在这一变量上得高分(正如在其他变量上得高分一样),应以更为宽泛的背景为依据来解释。

B. 权力主义的屈从

20. 进步教育的一个主要价值是,它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示那些为传统的中产阶级社会所拒斥的冲动和愿望。

23. 那些不爱父母,不感激父母,不尊敬父母的人是最可鄙的。

32. 教师或老板总是详尽地描述什么事情该做,以及如何去做的,这对学生的学习或成人的工作来说是基本的。

39. 每个人都应当对非他能力所能控制的某种超自然力量怀有深刻的忠诚,彻底效忠,不怀疑它的一切表现。

43. 化学、物理和医学等科学已使人们步入现代生活,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的大脑所无法理解的。

50. 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们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74. 这个国家所真正需要的是少一点法律和机构,多一点有勇气的、不知疲倦的、专注于事业的领导人,以便人民可以信任他们。

77.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想到去伤害自己的密友或亲属。

在我们看来,屈从权威(希望出现强有力的领袖,个人属于

国家,等等)是纳粹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使我们在研究偏见时自然地把这些态度考虑进去。^[2]这些态度在与反犹主义相联系时常被提及,从而使得我们系统阐述一些项目变得格外困难,因为这些项目既要表示潜在的倾向,又要充分摆脱与偏见发生逻辑的或直接的联系——我们并不认为这些项目已完全成功。对我们来说,需要避免的是直接提及独裁和政治人物,而主要强调服从、尊重、背叛,以及与权威的关系。权力主义的屈从被看做是一种十分一般的态度,它在与各种权威(这些权威包括父母、长者、领导、超自然力量等等)相联系时就会产生。

我们曾以下述方式来系统阐述项目:同意这些项目不仅表示对权威的现实主义的尊重,而且也表示一种夸张的、全面的、屈从权威的情感需要。看来,它由同意下列观点来表明: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们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一个人应当毫无疑问地服从超自然的力量,等等。这里,如在因袭主义的例子中一样,一种假设是,屈服于外部力量是因为未能成功地发展一种内部的权威,也就是良心。另一种假设是,权力主义的屈从是面对权威人物时处理自相矛盾情感的一种方式:潜在的敌意和反叛的冲动,以及由恐惧产生的抑制,使被试在尊重、服从、感激等方面过度反应。

看来,很清楚,权力主义的屈从主要是由于反民主潜力,它使一个人特别容易接受由最强大的外部力量所实施的操纵。这种态度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直接联系已在前面几章阐释过:由于反对内团体权威的敌意态度(从反对父母开始)受到扼制,这些权威人物的“坏的”方面——不公正和支配别人等——被看做存在于外团体之中,从而指责外团体搞独裁,用财富进行统治,以及有着支配别人的欲望,等等。这种负面意象的置换,也是被压抑的敌意态度得到处理的惟一方法;看来,我们需要寻找权力主

义的攻击性表现。

C. 权力主义的攻击

6. 应以某些方式对妇女加以限制,以便男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是十分自然和正确的。

23. 那些不爱父母、不感激父母、不尊敬父母的人是最可鄙的。

31. 同性恋是少年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当严加惩处。

47. 凡对我们荣誉的侮辱都应当受到惩罚。

75. 对于性犯罪,例如强奸和恋童,不仅要拘禁,而且还必须当众鞭笞。

如果一个人被迫放弃基本的生活乐趣,为刻板的制度所统治,并且因此而感到受骗上当,那么他很有可能不仅寻求一种目标,而且还会对某些个体的行为颇感恼火。因此,可以这样说,本研究的变量反映了权力主义的施虐狂成分,正如前述的一个变量反映了权力主义的受虐狂成分一样。可以预期,那些不能批判权威的因袭主义者,会对违背这些价值观的他人实施谴责、拒斥和惩罚。由于他认为情感生活应该适度,也即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冲动(尤其是性欲冲动和攻击冲动——它们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处于一种与自我相异的状态)很可能是强烈的和狂暴的。由于生活中的各种刺激可能诱发这些冲动,因此他感到焦虑,他关于冲动特征的列举(行为模式、个体,以及他所谴责的团体的列举)也会变得冗长。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提示过,此项机制可能位于民族中心主义拒绝方式(也就是拒绝诸如佐特风格者、外国人、其他民族等团体)的背后;这里的假设是,上述的民族中心主义特征不过是对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人施以惩罚的一

般化倾向的组成部分。所谓传统价值观的违背者,有同性恋者、性攻击者、不讲礼貌的人,等等。一旦个体确信有人应当受到惩罚,他便获得一种渠道,通过该渠道,他那深刻的攻击性冲动可能得以表示,甚至当他认为自己最讲道德之时,也是如此。如果他的外部权威同意这种形式的攻击,那么这种攻击性就有可能采取最为暴力的形式,甚至在传统的价值观不再受到威胁时,这种攻击形式仍有可能坚持下去。

人们可能会说,在权力主义的攻击中,原先由内团体激起的,并指向内团体的敌意,现被转移到了外团体上面。这种机制表面上看来与曾经提到过的“替罪羊”过程很相似,但是,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按照“替罪羊”的概念,个体的攻击是由挫折引起的,并且通常与经济需求有关;由于理智的混乱,一个人无法讲明他所遭遇的困难的真正原因,于是他便怪罪别人,或者对于手头的东西大光其火。尽管这种过程在反对少数民族团体的敌意中有其作用,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根据置换理论,权力主义者主要是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将他的攻击转向外团体。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从心理学上讲,他无法攻击内团体,这与挫折源和理智混乱无关。如果这一理论正确,那么权力主义的攻击和权力主义的屈从应当是高度相关的。此外,该理论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攻击如此经常地以道德面貌出现,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具有暴力,并且丧失了与原先诱发它的刺激的一切联系。

从道德立场上谴责他人,可能还有另外原因:权力主义者不仅谴责他在他人身上看到的道德松弛,而且还被驱使着寻觅他人身上的非道德属性,不管这样做有否根据。这是处理他自己受抑倾向的进一步手段;他似乎在对自己说:“我不坏,不该受罚,该受罚的是他。”换言之,个体的不可接受的冲动被投射到他人或团体身上,从而使他们备遭拒斥。投射作为一种变量,我们

将在下面作充分地讨论。

因袭主义、权力主义的屈从和权力主义的攻击都与生活的道德问题有关——与行为标准有关,与强化这些标准的当局有关,与反对这些标准的叛逆者(他们被看做应该受惩罚)有关。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期望,在这些变量上得高分的被试,在其他变量上也会得高分,因为这三者可被理解成被试表现了其人格内部的一种特定结构。这种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在道德力量(被试是通过这些道德力量而生活的)与其人格的其余部分之间缺乏一种联系。人们可以说,良心或超我(superego)与自我尚未完全结合(这里,自我被想像成包括个体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表示在内的各种功能)。自我支配着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与深层人格之间的关系;自我以某种方式调节着冲动,它容许满足,但前提是不招致由超我来实施的惩罚,而且,它还力求按照现实的要求来指导个体的各种活动。一旦自我与良心进行协调,便可创造出更大的整合,致使良心、情感冲动和自我能相对和谐地运作。当这种整合尚未达到时,超我与自我在人格中是冲突的,于是人格便表现出上述那些刻板的和不稳定的评价。

有某种理由相信,超我的内化力量之所以不起作用,是由于自我的虚弱,它未能实施必要的整合,也就是把自己与超我结合起来。不管情况是否如此,自我的虚弱似乎是因袭主义和权力主义的一种表现。自我的虚弱表明,个体未能在人格中建立起一组一致的和持久的道德价值观;正是这一原因,促使个体在他自身以外寻找某种组织的和协调的力量。鉴于这些外部力量是由道德决定的力量,所以人们可以说良心被升华了。

既然因袭主义和权力主义被认为是自我虚弱的根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更为直接的手段来评价人格中的这种倾向,并且把这种倾向与其他倾向关联起来。自我的虚弱往往以内省的

对立面表现出来,在迷信和定型中表现出来,在过度强调自我及其假设的力量中表现出来。下列三种变量是专门为处理该现象而设计的。

D. 反内感受作用

28. 比起那些专述打斗、罗曼史和冒险的小说或故事来,描述人们想些什么和感觉什么的小说和故事,要有趣得多。

38. 大学学习过于强调知识和理论的价值,而对实际问题和生活美德则轻描淡写。

53. 有些事情过于私密,甚至不能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说。

55. 休闲是一件乐事,但是要想知道,惟有辛勤劳动才能使生活有趣和充满价值。

58. 只要一个人把事情做好,至于他从事什么工作并不那么重要。

66. 书籍和电影不该如此频繁地描绘生活的阴暗面;它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娱乐或振奋精神上面。

“内感受作用”(intrareception)是由默里(Murray, 89)引介的一个术语,用来意指“感情、幻想、推测、志向的支配作用,一种意象的、主观的人类观点”。内感受作用的对立面是“外感受作用”(extrareception),“它意指一种由具体的、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倾向”(这里的物质条件是指明确的客观事实)。内感受作用/外感受作用与自我虚弱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偏见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不过,这里并不对此作详尽地考察。很清楚,反内感受作用(anti-intrareception)是一种对主观的、脱离实际的想法的拒斥态度,它完全是虚弱的自我的一个标志。极端反内感受作用的个体害怕考虑人类现象,因为他以错误的思想为出发

点;他害怕真正的感觉,因为他的情绪可能失控;他回避自己的内在生活,不希望他人密切注视自己,害怕他人看见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他反对“打听”,不想关心人们之所想和所感,也反对不必要的“谈话”;相反,他会忙忙碌碌,致力于实际的追求,用以替代一种内部冲突,将思想转向某种令人愉快的东西。纳粹计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个体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问题加以诽谤;不仅“犹太人的精神分析方法”被迅速取消,而且除了能力测试以外,其他一切心理学都受到攻击。这种态度容易导致人类的贬值,以及对物质客体的过高评价;当它走向极端时,人类只是一种被随意操纵的物质客体——甚至当物质客体被赋予情感引力时,仍像掌股之物那般被摆弄。

E. 迷信和定型

2. 尽管占星术会招来许多人的嘲笑,但它仍能解释许多事情。

10. 日本在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时发生过一次地震,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

39. 每个人都应当对非他能力所能控制的某种超自然力量怀有深刻的忠诚,彻底效忠,不怀疑它的一切表现。

43. 化学、物理、医学等科学已使人们步入现代生活,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的大脑所无法理解的。

65. 人类的一系列战争和冲突,会由一场世界性的地震、洪水或其他灾难而告结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迷信思想(信仰神秘的人类命运,信仰决定命运的外部因子)和定型^[3](以刻板的思想方式考虑问题)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过,而且它与民族中心主义具有明显的关联,因此这里就无须再讨论了。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倾向与理智的关系,以及理

智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迷信和定型常与低级的理智水平相伴而行,而低级的理智水平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参见第八章)。看来,迷信和定型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理智缺乏,它们还包括与偏见相关的某些思维倾向,即便它们在外感受作用方面没有理智受阻现象。这些倾向可被视做是(至少可被部分地视做是)自我虚弱的表现。定型是一种比较含糊的形式(尤其在心理学和社会问题上是如此),可以这样假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求助于原始的、过分简单化的解释来处理人类事件,原因在于他们将需要正确描述的思想和观察拒之门外;因为它们充满感情,并潜在地产生焦虑,致使虚弱的自我无法将它们纳入它的计划之中。不仅如此,人格中间的这些更深层的力量,自我不能使之与自我本身相结合,这些力量很可能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上去;这是异乎寻常的思想的源泉,涉及其他人的行为和自然界中事件的因果关系。

迷信表明了这样一种倾向:把个体内部的责任转移到他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上去;它表明自我可能已经“放弃”,也就是说,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即自我可以通过克服外部的力量而决定个体的命运。当然,必须承认,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体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实际上已经减弱,因此,指向外部原因的项目可能是现实的,从而对人格不具任何意义。因此,有必要选择一些项目,它们能以一种非现实的方式表示自我的虚弱,也即个体的命运或多或少依赖于异想天开的因素。

F. 力量和“顽强”

9. 今日许多人以好逸恶劳的方式生活;我们应当坚持基本的生活原则,恢复充满活力的、积极的生活方式。

47. 凡对我们荣誉的侮辱都应当受到惩罚。

70.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阴谋所控制,这些阴谋是由政客们神秘炮制的。

74. 这个国家所真正需要的是少一点法律和机构,多一点有勇气的、不知疲倦的、专注于事业的领导人,以便人民可以信任他们。

这一变量首先涉及对自我的因袭主义属性的过度强调。其基本假设是:过分展示顽强,不仅反映了自我的虚弱,而且反映了它所履行的任务之大小,也就是说在被试的文化中被排斥的某种需求的力量。因此,自我和冲动的关系至少像自我和良心的关系一样紧密。不过,为了分析的目的,它们可能分开处理,其中,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其他变量指向个体感情生活的深层领域。

与夸张的顽强性现象密切关联的是一种“力量情结”(power complex)。它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是在人类关系中过分强调力量动机;其倾向表现为,按照诸如强一弱、支配一屈服、领导一随从等思想模式来看待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至于上述作用中被试主要认同哪一种作用,这一点很难说。看来,他想得到权力,拥有权力,而不是失去权力,与此同时,他又害怕掌握权力和运用权力。看来,他羡慕他人身上的力量,倾向于顺从这种力量,但是,他又害怕这样的行为意味着的懦弱。我们期望,在这个问题上得高分的人很容易把自己鉴定为“小人物”,或者“平凡的人”,而且,他在这样做时似乎极少感到羞耻,相反,他实际上认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或者认为他可以变得强大有力。总之,力量情结包含一些基本上矛盾的成分,我们可以期望,有时一种特征在外显水平上占统治地位,有时另一种特征在外显水平上占统治地位。我们还可期待,领导与随从都会在这一变量上得高

分,原因是比之领导—随从的关系,一个人并不十分关注个体的实际作用。这种个体经常获得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与权力人物密切合作,借此既可满足他的权力的需要,又可满足他的屈从的需要。在他看来,通过屈服于权力,他可以参与权力。例如,有一个被试报告说,他最感敬畏的经验是“与总统握手”,这样他不仅借屈从得到了满足,而且,在下述的想法中得到了满足:由于“握过大人物的手”,或者“认识了大人物”,或者“曾经到过他住的地方”,大人物的某种力量已经移置于他,他似乎也成了重要的人。同样模型的满足也可以通过扮演“中层角色”来获得,或在某种结构清晰的中间位置上运作,因为中间位置的上方有人,下方也有人。

权力情结与民族中心主义在某些方面有联系。以强—弱维度来思考人类关系的个体,很可能把这一维度应用于他对内团体和外团体的思考之中,例如,应用于对“优秀民族”和“劣等民族”的想像之中。从心理学上讲,获得优越感的手段之一,是声称自己拥有某种特定“种族”的成员身份。

G. 破坏性和犬儒主义

3. 美国尚未实现真正的美国生活方式,对此问题,只有诉诸武力方能解决。

9. 今日许多人以好逸恶劳的方式生活;我们应当坚持基本的生活原则,恢复充满活力的、积极的生活方式。

14. 在我们打败德国人和日本人以后,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的其他敌人身上,例如老鼠、蛇和细菌。

17. 相似孕育蔑视。

24. 今天,凡事都变得不稳定了;我们应当对变化、冲突和动乱有所准备。

30. 鉴于宣传的目的,关于欧洲发生暴行的报道被大大夸张了。

35. 有些活动是公开地非美的,因此,如果官方不再采取正确的措施,则广泛觉醒的公民便会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

42. 不管男人表面上如何表现,他们对女人发生兴趣只有一个原因。

56. 战后,犯罪的浪潮会到来;控制帮派,打击流氓将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59. 人类的本性就是那么回事:引发战争和冲突。

67. 当你琢磨人性时,你会发现,它总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

按照我们的理论,对反民主的个体来说,由于他的需求不得不要受到外部强施的限制,因此在他身上就会出现强烈的潜在的攻击性冲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攻击的一种发泄形式是转向外团体,引发道德上的愤慨和权力主义的攻击。毫无疑问,这对个体而言是一种十分管用的手段;但是,与此同时,强烈的潜在的攻击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以一种非道德的方式表现出来。据假设,成人很少以完全直接的方式表示原始的攻击性冲动,相反,这种攻击性冲动多少被修饰过,以便能为自我所接受。

因此,本研究的变量是指理性的、能为自我所接受的、非道德化的攻击。它的命题是,一个被试可以借同意下列陈述的方式来表示这种倾向,这些陈述尽管是攻击性的,但却以某种措辞表示,以便避开他的道德审查。于是,有些项目提供了攻击的理由,并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系统阐述,即他只需部分的理由便可表示强烈的同意,以便准备实施全面的攻击。其他一些项目则涉及到对人类的蔑视,其理论是,这里所表示的敌意已经如此概括

化,致使个体感到无须说明其原因。不过,存在着另一种指导性概念,即认为一个人可以十分自由地表示攻击,只要他认为人人正在这样做时便可。因此,如果他想成为攻击者,他就会倾向于认为别人也正在这样做。例如,“人类的本性”是去剥削自己的邻居,并向邻居开战。毋庸讳言,这类尚未分化的攻击性可以通过宣传手段而轻易地使矛头转向少数民族团体,或者反对其他团体,只要这种制裁从政治上讲是有利的。

H. 投射

46.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性放荡与今日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相比,只不过是小事见大巫,甚至在人们最不希望它发生的圈子里也是如此。

56. 战后,犯罪的浪潮会到来;控制帮派、打击流氓将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65. 人类的一系列战争和冲突,会由一场世界性的地震、洪水或其他灾难而告结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70.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阴谋所控制,这些阴谋是由政客们秘密炮制的。

73. 当今,各种人群到处迁移,自由混合。对此,人们必须特别小心,以防自己被感染上疾病。

投射机制与权力主义的攻击有关:具有权力主义特性的压抑性冲动被投射到正在遭受谴责的他人身上。投射因此成为保持与自我不相容的本我驱力(Id drives)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认为它是自我在实施其功能时不予配合的一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量表的许多项目是投射性的。它们涉及这样的假设:事实的判断和解释被心理冲动所歪曲。被试利用投

射倾向,以便借助项目来表达其人格中的深层倾向。如果反民主的个体从外部世界看到他自己身上受压抑的一些冲动,而我们也想知道这些冲动是什么,那么,注意他把哪些属性不现实地归之于他的周围世界,我们便可以获得某种东西了。假定一个人坚持认为别人将会对他实施敌意,而我们却找不到证据来说明这是事实,在此情况下,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试具有攻击的意图,而且正在通过投射的手段来证明该意图是正确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科林神父(Father Coughlin)把反犹太主义作为“防御机制”,也就是说,保护非犹太人免遭假想的犹太人的攻击。与此相似的是,一个被试越是专注于世界上的“邪恶力量”,则他的无意识冲动(性欲和破坏性)就越强,这是由他思考和信奉下列现象显示出来的:狂暴的性欲过度,阴谋诡计,以及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危险。

I. 性

31. 同性恋是少年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当严加惩处。

42. 不管男人表面上如何表现,他们对女人发生兴趣只有一个原因。

46.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性放荡与今日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相比,只不过是小事见大巫,甚至在人们最不希望它发生的圈子里也是如此。

75. 对于性犯罪,例如强奸和恋童,不仅要拘禁,而且还必须当众鞭答。

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中明显的性问题是 由 4 个项目来表达的,其中 2 个项目与权力主义的攻击相联系,另一个项目则反映了投射。这是一个有关变量相互作用的例子;这些项目结合在

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由此遵循了单个问题可能涉及整体若干方面的原则。为了分析的目的,既可从整体中提取性问题,也可从其他变量中提取性问题。至于这些变量中哪个变量最根本,必须由临床研究来决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性愿望的“反移情”(counter-cathexis, 压抑、反应形成、投射)看来是值得专门研究的。

本研究的变量涉及与自我相异的性欲。对性习俗的违反者进行惩罚的强烈倾向(例如对同性恋、性攻击者进行惩罚)反映了一般的惩罚态度,但它也提示了被试自己的性欲在受到压抑时失去控制的危险性。关于“性放荡”的陈述表明了一种倾向,即借助投射来曲解现实。但是,性内容几乎无法投射,除非被试具有同样的冲动(它们是无意识的,而且极其活跃)。有3个项目涉及对同性恋的惩罚,对性犯罪的惩罚,以及对性放荡的惩罚,它们可能揭示被试的无意识的性驱动。

(二) 量表项目的系统阐述

前面几章所描述的关于量表项目系统阐述的一些考虑,也同样适用于法西斯主义量表。有些原则是我们建构量表方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对本研究的量表也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项目应当间接,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不该具有偏见,而且应当尽可能远离我们的实际兴趣。根据这一观点,项目2(占星术)和65(洪水)优于项目74(不知疲倦的领袖)和3(诉诸武力)。后面两个项目尽管很好地表达了一种明显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但是,正如上面说明的那样,涉及领导人的想法,以及武力概念的陈述,要求被试具有一定的理论根基。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问题,即建构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的量表之目的,是由间接的项目来体现,还是由直接的项目来体现? 如果将两类项目都包括进去,是否更

明智一些?

项目阐述的第二个原则是,每个项目应当在非理性和客观真实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种论述带有明显的偏见,而且令人闻之“震颤”,则极少有人会同意它;如果一种论述不用辨析,便明真伪,结果每个被试都会同意它,这样一来显然无法在持有偏见和不持有偏见的被试之间作出区分,该项目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每个项目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理性感染力,但它还应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系统阐述,即使理性部分不再成为被试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主要因素。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例如,社会历史学家可能会同意项目46(性放荡),不过,认为它是投射性欲的一种标志,论据是许多被试尚缺一定的理论根基来判断它的正确性,而是凭借他们的感觉来作出反应。由于每个项目都包含了客观真实的要素和理性的证明,因此被试对特定项目的回答可被设想为是由事实来决定的。单凭一个项目是无法证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对量表来说,项目有否价值,主要看其有否分辨力,而个体对项目的回答也应根据他的整个回答模式来加以推断。如果一个人在项目46(性放荡)上得+3分,但在项目31(同性恋)和75(性犯罪)上却得-3分或-2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项目46上得+3分,同时又赞成项目31和75的观点,那么这便充分表明他关注性欲问题了。

最后,每个项目还应对量表结构的统一性作出贡献。它必须在涵盖各种人格倾向方面发挥作用(这些人格倾向涉足量表要测量的模式)。由于不同的人鉴于不同的原因而对一个特定的项目提供相同的答案——这已脱离了客观真实性的标准——因此有必要使项目具有充分的意义,以便被试对它的任何一种反应都可以按照我们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二、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相继形式

(一) 原始量表(问卷 78)的统计特性

原始的法西斯主义量表由上面列举的 38 个项目所组成,它于 1945 年春作为问卷 78 的组成部分用于 4 组被试。这 4 个组在第三章已作过描述,而且曾作为例子列在表 3-11 中。

该量表的得分依据我们在反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中采用过的方法。除了否定项目之外,+3 等于 7 分,+2 等于 6 分,等等。项目 12、20 和 28 是否定项目(它们表述了无偏见的立场),这里,+3 等于 1 分,等等。表 7-2 提供了信度系数,每个项目的平均分,以及 4 个被试组的标准差。平均信度 0.74 处于对团体比较来说合适的范围之内,但却低于该测量工具所规定的要求。可以这样说,由于各种因素均进入了法西斯主义量表,因此本研究的数字的一致性程度基本上预期了这种原始量表的信度。问题是,在修改量表后,有否可能使它达到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所具有的那种信度,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在这里探讨反应的不一致问题(如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中那样)。

可以看到,职业妇女要比其他被试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她们的信度系数为 0.88,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所获得的信度不相上下。由于这些妇女年龄偏大(相对其他被试来说),因此可以推测,较高的信度是由于她们人格的更大一致性。

看来,对演说班男生所获的低信度尚无现成的解释。此外,该组的标准差和区间也很小。可以想像,适当的解释取决于更大的男子样本,以及进一步修订法西斯主义量表。

表 7-2 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78)^a 的信度

特 性	被试组				总体 ^b
	A	B	C	D	
信度	0.78	0.56	0.72	0.88	0.74
平均(总计)	3.94	3.72	3.75	3.43	3.71
平均(奇数一半)	3.80	3.59	3.60	3.22	3.55
平均(偶数一半)	4.08	3.87	3.91	3.64	3.88
标准差(总计)	0.71	0.57	0.70	0.86	0.71
标准差(奇数一半)	0.87	0.71	0.85	0.94	0.84
标准差(偶数一半)	0.69	0.65	0.76	0.84	0.74
人数	140	52	40	63	295
区间	2.12 ~ 5.26	2.55 ~ 4.87	2.39 ~ 5.05	1.68 ~ 5.63	1.68 ~ 5.63

a. 这些数据取自下述 4 个组: A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 B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 C 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心理学班女生; D 组:职业妇女。

b. 在获得总体平均分方面,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不因人数(N)而加权。

对于表 7-2 的考察表明,在所有的被试组里,既没有出现极端高分,也没有出现极端低分。同时,它还表明,所获的平均分接近中点。

分数的分布相对狭隘——这种狭隘现象是相对于其他量表分数而言的——部分原因在于量表内部缺乏一致性:除非项目反映了同样的倾向,否则我们无法期望被试会对大量的项目作出一致的同意或不同意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有这种可能,即本研究的样本并不包括这样一些被试,他们对法西斯主义量表的测量模式持相当极端的态度。上述情况[即降低了的“人才区间”(range of talent)]倾向于降低信度系数。

在问卷 78 中,法西斯主义量表与反犹太主义的相关为 0.53,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相关为 0.65。

(二) 项目分析和原始量表的修订

我们根据 4 个被试组的数据,试图对法西斯主义量表进行修订(也即简缩量表),提高它的信度,但又不使其在广度上或含义上有所损失。如同其他量表一样,一个项目的分辨力是判断其有否价值的主要的统计基础。由于我们不仅要使法西斯主义量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也使它明显的偏见高度相关,因此,我们既要注意项目与整个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关系,又要注意它对反犹太主义量表上高低得分者的分辨能力。以反犹太主义的某个项目为例,所谓分辨力(D.P.A-S)实际上是指该项目的反犹太主义高四分位数的平均分和低四分位数的平均分之间的差异。表 7-3 为每个项目提供了平均分,它所依据的是法西斯主义量表(D.P.F)高一低得分者的分辨力及其排序,反犹太主义量表的分辨力及其排序,以及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分辨力和反犹太主义量表的分辨力之和所表现的项目排行(档次)。这最后的分档排序,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是项目统计中“优点”的标志。

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平均分辨力为 1.80,比起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辨力,它要低得多。不过,它也表明,项目在高一低四分位数之间产生了统计上有意义的差异。有 16 种分辨力在 2 以上,18 种分辨力在 1~2 之间,只有 4 种分辨力在 1 以下。总的说来,平均分 3.71 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接近中点 4.0,只有 9 个平均分明显地呈极端状,也就是说,不是超过 5.0,便是小于 3.0。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具有极端平均分的项目中,只有产生了像 2.0 那般大的分辨力。

表 7-3 法西斯主义量表项目(问卷 78)^a 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项 目	平均分	法 西 斯 主 义 分 辨 力 ^b	法 西 斯 主 义 分 辨 力 排 行	反 犹 太 主 义 分 辨 力 ^c	反 犹 太 主 义 分 辨 力 排 行	最 终 排 行 (法 西 斯 主 义 分 辨 力 排 行 + 反 犹 太 主 义 分 辨 力 排 行)
2. (占星术)	2.60	1.74	(22)	1.24	(11)	(18)
3. (诉诸武力)	3.04	1.98	(18)	1.05	(17)	(15)
6. (限制妇女)	2.93	1.75	(21)	0.41	(32)	(26)
9. (积极的生活)	3.99	2.40	(15)	-0.08	(35)	(29)
10. (珍珠港事件)	2.22	2.20	(9)	1.37	(6)	(8)
12. (现代教会)	4.67	0.19	(38)	-1.18	(38)	(38)
14. (老鼠、细菌)	4.44	1.60	(26.5)	0.85	(24)	(23.5)
17. (相似性)	3.33	1.86	(19)	1.56	(4)	(10)
19. (回避)	3.63	0.76	(36)	0.70	(27)	(35)
20. (进步教育)	3.28	1.07	(33)	-0.25	(37)	(37)
23. (爱父母)	3.62	2.61	(4)	1.17	(13)	(5)
24. (凡事不稳定)	5.01	0.79	(35)	0.88	(22)	(33)
28. (小说或故事)	3.02	1.29	(30)	0.76	(26)	(27)
30. (动乱报道)	4.20	0.43	(37)	0.66	(28)	(36)
31. (同性恋)	3.22	2.16	(10)	1.18	(12)	(13)
32. (对学习是基本的)	3.31	1.67	(24)	1.10	(16)	(20)
35. (掌握法律)	2.50	1.42	(29)	0.62	(29.5)	(28)
38. (大学的价值)	3.91	1.20	(31)	1.14	(15)	(25)
39. (超自然力量)	3.97	2.54	(6)	1.26	(9.5)	(4)
42. (只有一个原因)	2.06	1.05	(34)	0.59	(31)	(34)
43. (化学等科学)	4.35	2.79	(3)	0.97	(18)	(6)
46. (性放荡)	3.64	2.11	(12.5)	0.93	(20)	(14)
47. (荣誉)	3.00	2.09	(14)	1.65	(3)	(7)
50. (服从和尊重)	3.72	3.09	(1)	1.55	(5)	(2)
53. (隐私)	4.82	1.99	(17)	-0.23	(36)	(32)

项目	平均分	法西斯主义分辨力 ^b	法西斯主义分辨力排行	反犹太主义分辨力。	反犹太主义分辨力排行	最终排行(法西斯主义分辨力+反犹太主义分辨力)
55. (休闲)	5.20	2.11	(12.5)	1.26	(9.5)	(11)
56. (犯罪浪潮)	4.60	1.16	(32)	0.62	(29.5)	(31)
58. (做好事情)	3.48	1.70	(23)	0.87	(23)	(22)
59. (引发战争)	4.26	2.59	(5)	1.91	(2)	(3)
60. (哪个最重要)	4.17	1.60	(26.5)	0.31	(34)	(30)
65. (世界性灾难)	2.58	1.55	(28)	0.90	(21)	(23.5)
66. (书籍和电影)	4.10	2.48	(7)	0.38	(33)	(19)
67. (自身利益)	3.71	2.21	(8)	0.78	(25)	(17)
70. (政客的阴谋)	3.27	1.85	(20)	1.15	(14)	(16)
73. (感染疾病)	4.79	2.02	(16)	1.34	(8)	(12)
74. (不知疲倦的领导)	5.00	1.66	(25)	0.94	(19)	(21)
75. (性犯罪)	3.26	2.81	(2)	2.07	(1)	(1)
77. (健全的人)	4.12	2.12	(11)	1.36	(7)	(9)
平均/人/项目	3.71	1.80		0.89		

- a. 上述数据取自下述 4 个组: A 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女生(人数 = 140); B 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班男生(人数 = 52); C 组: 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职心理学班女生(人数 = 40); D 组: 职业妇女(人数 = 63)。在获得总体平均分方面, 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不因人数而加权。
- b. 法西斯主义分辨力依据的是法西斯主义量表分布上高四分位数和低四分位数之间的差异。
- c. 反犹太主义分辨力依据的是反犹太主义量表分布上高四分位数和低四分位数之间的差异。例如, 项目 2 的反犹太主义分辨力为 1.24, 它表明反犹太主义低四分位数的平均分比反犹太主义高四分位数的平均分低 1.24 分。
- d. 指法西斯主义分辨力与反犹太主义分辨力之和。一个项目的最终档次是整个量表的总和分布中这个和的档次。

参照反犹太主义量表的分辨力, 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分辨力当然要低得多; 不过, 有 17 个项目看来与反犹太主义显著相关, 它们的分辨力大于 1.0。由于我们期望整个法西斯主义模式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相关, 因此没有必要再让法西斯主义量表中的每个项目去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一般说来, 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具有显著分辨力的那些项目, 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也具有显著的分辨力, 尽管也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在决定保留哪个项目以供修订后的量表使用时, 我们的标准主要是法西斯主义分辨力和指导我们建构量表的一般原则;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那么项目的反犹太主义分辨力越大, 它被纳入修订后的量表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们现在可以询问: 是什么东西把统计上所谓的好项目与统计上所谓的差项目区分开来? 能否分别陈述这两种项目, 以便其成为系统阐述新项目时的指导? 第一个问题涉及 9 组项目, 它们被挑选用来代表法西斯主义概念形成中的变量。许多具有高分辨力的项目是否属于这些变量呢? 有没有一些变量根本不属于我们正在考虑的模式呢? 下列 3 组项目(性、权力主义的攻击、权力主义的屈从)具有 2.0 以上的平均分, 余下各组的平均分在 1.26 ~ 1.80 的区间之间。投射(1.70)、破坏性和犬儒主义(1.56), 以及因袭主义(1.26)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可是, 需要注意的是, 每组项目中至少有一个项目的分辨力超过 2.0。因此, 在测试的这个阶段, 最好不要去排除任何变量, 而应注意改进或取代在每个组内所找到的较差的项目。

现在, 让我们考虑另外一些项目。从统计意义上说, 它们是最好的。我们注意到项目 75(性犯罪)统领了其余的所有项目, 也就是说, 它具有法西斯主义分辨力 + 反犹太主义分辨力的最高总分。这个项目很好地代表了一种理念, 这是我们为了系统

阐述法西斯主义量表项目而意欲达到的。不仅答案呈广泛分布,平均分相当接近中点,而且该项目还以十分有效的方式兼并了若干思想(根据我们的理论,这些思想在偏见中具有关键作用):对于性的更为原始的潜在兴趣,肉体攻击的准备状态,以及借助道德价值观来证明这种攻击的正当性。不仅如此,该项目并不受由明显的偏见所产生的逻辑推导的支配。下一个最佳项目为项目 50(服从和尊重)。毫不奇怪,它之所以能与差的项目区分开来,是因为这种权力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著名理念。将权力主义放入儿童训练的背景,目的是想把它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区分;但是,不论这样做是否正确,我们必须使项目反映法西斯哲学,或者说,使其成为法西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统计意义上说,第三个好项目是项目 59(“人类的本性就是那么回事:引发战争和冲突”)。这个项目来自破坏性和犬儒主义范畴,它表明在法西斯主义症状中有若干想法特别重要。它除了具有明显的反和平主义观点外,还涉及对人类的蔑视,并以“适者生存”的思想作为攻击合理化的借口。第四个好项目是 39(超自然力量),它似乎很好地表示了这样一种倾向——把责任转嫁到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上去。这便是所谓的“自我虚弱”的表现形式;该项目之所以被置于“权力主义的屈从”之中,其根据是:信奉超自然力量是与忠于内团体的权威相联系的。我们并不期望宗教信仰本身会对偏见具有意义;设计该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陈述,它如此极端,以致不会有太多的被试同意它,而且它还强调“毫不怀疑”地“完全服从”,这样一来,不加批判地服从的被试便会为自己定位了。平均分 3.97 和法西斯主义分辨力 2.54 表明这一目标已经达到。项目 23(爱父母)在好项目上排行第五,它表明了极端的道德因袭性,以及与家庭相联系的内团体感觉。它在权力主义屈从和权力主义攻击

中都占一席之地,因为它既包括对内团体的忠诚,又包括对那些违反该价值观的人所持的惩罚态度(“这样的人是最可鄙的”)。这一陈述在“抗议”的态度上十分夸张,并富有表现力,因此我们怀疑对它的强烈同意是否实际上掩盖了对父母和父母式人物那种潜在的、受到压制的反叛性敌意态度。

上述 5 个好项目(可以这样说,它们在内容上是十分多样的)属于基本理论的范畴(超我、自我和本我都得到了表示)。其中,可能的例外是项目 50(服从和尊重),从本研究的意义上说,该陈述是高度间接的。确实,当人们按照项目的分辨力对项目的排序进行考察时——也即考察化学等科学、荣誉、珍珠港事件、心智健全的人、相似性、休闲、感染疾病等项目——他们也许会注意到,从统计意义上讲,所谓最佳的项目,是指项目达到了最佳水平的系统阐述,而且符合我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从统计意义上讲,差的项目是容易评判的。在有些例子中,存在着无法进行系统阐述的情况:陈述含糊或模棱两可,致使许多被试从中得出不同的含义。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项目 12(现代教会)和 20(进步教育)上。在其他例子中,例如项目 24(凡事不稳定)、74(不知疲倦的领导人)和 58(犯罪浪潮),对于高一低得分者来说,它们的陈述包含了明显的真理要素或理性证明,而且对高一低得分者十分具有吸引力,这已由高平均分显示出来。再者,有些项目带有公然的挑衅性,致使许多得高分者和得低分者都明确表示不同意。例如,项目 42(只有一个原因)和 35(掌握法律),既出现低平均分,又出现低分辨力。

(三) 第二个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60

在准备新形式的问卷时,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被大大地压缩了,以便冗长的法西斯主义量表(34

个项目)仍能得到利用,并且量表项目的总数不超过60个。由于我们既面临着构建可信的法西斯主义量表的任务,又面临着不牺牲它的广度或含义的任务,看来,对本阶段的项目不作过多压缩实乃明智之举。

来自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78的19个项目(即按其“良好”程度排行最高的那些项目)在新量表中被保留,只不过以同样的方式稍加修改。从统计学上说,项目分辨力是我们选择这些项目的主要依据。如上所述,那些从统计角度上看最佳的项目,从理论观点上看也是最佳的,因此可以在新量表中完全保留它们。在这些项目中,有5条未作任何修订;其他各条的修订涉及措辞的变化,但基本意思不变,目的是为了避免一律同意或一律不同意,以便得出的平均分尽量接近中点。

上述19个项目的信度已经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系统阐述15条补充项目,它们符合好项目的要求,而且合在一起,涵盖了本研究意欲涉及的领域。这里,制订量表的原则(而不是统计标准)起着重要作用。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间接性,我们不仅取消了公然表达挑衅的项目(它们的分辨力都很低),而且还以修订的形式保留了项目65(世界性灾难),尽管该项目相对来说也具有较低的分辨力(排序为23.5),但它表达了一种重要的思想,而且差不多完全与“种族”偏见和法西斯主义相脱离。项目67(自身利益)的分辨力不低(排序为21),但仍被取消了,原因在于它与高分辨力的项目59(总会引发战争)过于相似。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包括各种思想,我们把两个项目或两个以上的项目合并成一个项目,例如,“生气勃勃的美国将进行战斗以保卫它的财产”或“……讲得太多而做得太少”。在明确了这些原则和意义对量表结构统一性的贡献,以及理性证明的恰当程度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78)的4个项目,其

分辨力排序要比19个项目低一些,由此予以修订,而11个新项目得到系统阐述,以便组成新的量表。这34个项目依其所代表的变量而被归类,并在表7-4中展示。

表7-4 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60

1. 因袭主义:刻板地坚持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 (1) 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们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 (6) 一个不讲礼貌、具有不良习惯和血统的人,是不大可能为正派人士所喜欢或接纳的。
 - (53) 今天,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麻烦是,人们讲得太多而做得太少。
2. 权力主义的屈从:对内团体的理想化的顺从,毫无批判地接受内团体。
 - (1) 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们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 (7) 科学已经把人类带入现代生活,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的大脑所无法理解的。
 - (11) 人们应当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抱有完全的忠诚,毫不怀疑它的一切表现。
 - (23) 年轻人有时会产生反叛思想,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应当克服冲动,并且安定下来。
 - (29) 凡心智健全的、正常的和正派的人,是不会想到去伤害朋友或亲属的。
 - (32) 除了法律和政治纲领,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些勇往直前的、不知疲倦的、专注于事业的领导人,以便人们可以信任他们。
 - (44) 为了使我们做好工作,老板们有必要详细地描述要做的事情,并且告诉我们如何去做。
3. 权力主义的攻击:密切地关注、谴责、拒绝和惩罚那些反传统价值观的人。
 - (6) 一个不讲礼貌、具有不良习惯和血统的人,是不可能为正派人士所喜欢或接纳的。
 - (17) 凡对我们荣誉的侮辱,都应当受到惩罚。
 - (19) 青年最需要的是严格的纪律、坚定的决心,以及为家为国工作和战斗的意志。
 - (22) 如果让每个人都对政府工作评头论足,那么由此带来的麻烦是:要是这些人天生愚蠢,或者充满疯狂的念头,又该怎么办呢?
 - (34) 性犯罪,例如强奸和恋童,不仅应该拘禁,还必须当众鞭笞,或者施以更严厉的刑罚。
 - (39) 一个人如果不爱父母,不感激父母,不尊重父母,那么没有什么东

- 西比这更加恶劣的了。
- (49) 如果我们能够铲除那些不道德的、不正派的和意志薄弱的人,那么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 (53) 今天,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麻烦是:人们讲得太多而做得太少。
- (58) 同性恋除了堕落已没有什么东西可言了,对此应当严加惩罚。
4. 反内感受作用:反对主观的、想像的和脱离实际的思想。
- (16) 当一个人有问题或忧虑时,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忙着去干更加愉快的事情。
- (30) 有些意志薄弱的表现是因过度学习造成的。
- (45)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理应保密的个人隐私产生了兴趣。
- (53) 今天,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麻烦是:人们讲得太多而做得太少。
5. 迷信和定型:相信个人命运的神秘决定因素,以定型化的方式进行思考。
- (7) 科学已经把人类带入现代生活,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的大脑所无法理解的。
- (11) 人们应当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抱有完全的忠诚,毫不怀疑它的一切表现。
- (18) 日本在 1944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时发生过地震,这决非巧合。
- (24) 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争取进入上流社会地位的冲动。
- (30) 有些意志薄弱的表现是因过度学习造成的。
- (35) 可以把人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弱者和强者。
- (40) 将来,总有一天会证明,占星术能够解释许多东西。
- (46) 战争和社会问题会由一场摧毁世界的地震或洪水而一劳永逸地结束,这是可能的。
- (50) 信任一个不能坦诚待你的人是不对的。
6. 力量和“顽强”:抱有统治—屈服、强—弱、领导—随从的成见;认同权力人物;过分强调自我的因袭主义属性;武断地夸大力量和顽强。
- (2) 如果我们拥有坚强的意志,那么任何困难都无法使我们退缩。
- (5) 生气勃勃的美国将进行战斗,以保卫它的财产。
- (17) 凡对我们荣誉的侮辱,都应当受到惩罚。
- (19) 青年最需要的是严格的纪律、坚定的决心,以及为家为国工作和战斗的意志。
- (32) 除了法律和政治纲领,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些勇往直前的、不知疲倦的、专注于事业的领导人,以便人民可以信任他们。
- (35) 可以把人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弱者和强者。
- (57)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明显地受到由政客们秘密炮制的阴谋所控制。
7. 破坏性和犬儒主义:一般的敌意态度,诽谤人类。
- (10) 不管人性是什么,它总会引发战争和冲突。

- (25) 相似引发蔑视。
- (41) 真正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威胁,惟有武力才能阻止它。
8. 投射:认为世界被野蛮和危险所笼罩;无意识的情感冲动向外投射。
- (36) 今天,各种不同的人群到处迁移,自由混合,因此一个人要特别小心,以防感染疾病。
- (45)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理应保密的个人隐私发生了兴趣。
- (46) 战争和社会问题会由一场摧毁世界的地震或洪水而一劳永逸地结束,这是有可能的。
- (52)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性放荡与这个国家里发生的某些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在人们不希望它发生的地方也是如此。
- (57)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明显地受到由政客们秘密炮制的阴谋所控制。
9. 性:夸张地关注性欲问题。
- (34) 对于性犯罪,例如强奸和恋童,不仅应当予以拘禁,还必须当众鞭笞,或者施以更重的刑罚。
- (52)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性放荡与这个国家里发生的某些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在人们不希望它发生的地方也是如此。
- (58) 同性恋除了堕落外已没有什么东西可言,对此必须加以严惩。

表 7-5 列出了量表的信度,每个项目的平均分,以及 5 个类别中每个类别的分数范围。它们均在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60)中被提出。量表的信度相对于问卷 78 有了相当大的改进(前者为 0.87,后者为 0.74),与压缩了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一样高(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信度为 0.86),而且比压缩了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信度(0.70)要好得多。可是,平均分没有像问卷 78 那样十分接近中点(前者为 3.5,后者为 3.7),不过,区间要略为大一些。^[4]

对于项目分辨力的考察表明(参见表 7-6),问卷 60 比问卷 78 有了很大进步。问卷 60 的法西斯主义平均分分辨力是 2.15,而问卷 78 是 1.80。有 3 个项目的分辨力在 3.0 以上,18 个项目在 2.0~3.0 之间,12 个项目在 1.0~2.0 之间,只有一个项目在

1.0 以下。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辨力为 1.53,比问卷 78 的反犹太主义平均分辨力 0.89 要大得多。有 28 个项目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辨力大于 1.0;这些法西斯主义量表项目在 5%的置信水平上与民族中心主义显著相关。进入法西斯主义量表的每一个变量(因袭主义、迷信等)是由分化程度令人满意的项目来代表的。

表 7-5 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60)^a 的信度

特 性	被试组					总分 ^b
	I	II	III	IV	V	
信度	0.86	0.91	0.89	0.87	0.81	0.87
平均分(总)	3.32	3.39	3.82	3.74	3.25	3.50
平均分(奇数一半)	3.41	3.42	4.09	3.78	3.19	3.58
平均分(偶数一半)	3.24	3.36	3.56	3.73	3.28	3.43
标准差(总)	3.86	0.96	0.93	0.81	0.71	0.85
标准差(奇数一半)	0.97	1.03	0.99	0.77	0.83	0.92
标准差(偶数一半)	0.75	0.96	0.97	0.93	0.76	0.87
人数	47	54	57	68	60	286
区间	1.00 ~ 5.50	1.24 ~ 5.50	1.28 ~ 4.38	2.24 ~ 5.62	1.97 ~ 5.35	1.82 ~ 5.62

a. 上述数据取自下述 5 个组:第一组:俄勒冈大学女生;第二组: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第三组: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第四组:俄勒冈俱乐部男子;第五组:俄勒冈俱乐部男子(部分)。

b. 在获得总体平均分方面,个别被试组的平均分不因人数而加权。

表 7-6 法西斯主义量表项目(问卷 60)^a 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项 目	平均分	法 西 斯 主 义 分 辨 力 ^b	法 西 斯 主 义 排 行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分 辨 力 ^c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排 行	最 终 排 行 ^d (法 西 斯 主 义 分 辨 力 + 反 法 西 斯 主 义 分 辨 力)
1. (服从和尊重)	4.86	2.39	(14)	1.52	(17)	(13)
2. (意志力量)	4.44	2.50	(11)	1.46	(19)	(12)
5. (生气勃勃的美国)	5.49	1.46	(29.5)	1.18	(25.5)	(27)
6. (不讲礼貌)	5.30	1.80	(23)	1.56	(13.5)	(22)
7. (科学)	4.98	1.71	(24)	1.32	(23)	(25)
10. (战争和冲突)	4.46	1.67	(26)	1.70	(10)	(21)
11. (超自然力量)	3.60	2.91	(4)	1.38	(2)	(10)
12. (德国人和日本人)	3.71	3.16	(3)	2.83	(1)	(1)
16. (做愉快的事情)	3.15	2.08	(20.5)	1.18	(25.5)	(23)
17. (荣誉)	3.14	2.46	(12)	2.34	(4)	(7)
18. (珍珠港事件)	2.19	2.51	(10)	1.83	(9)	(9)
19. (纪律与决心)	3.68	3.17	(2)	2.28	(6.5)	(3)
22. (不能人人做主)	2.74	1.46	(29.5)	1.17	(27)	(28)
23. (反叛思想)	4.30	2.70	(7)	2.29	(5)	(5)
24. (天生的冲动)	2.87	2.60	(8)	2.28	(6.5)	(6)
25. (相似)	3.30	2.08	(20.5)	1.33	(22)	(20)
29. (健全的人)	3.55	2.82	(6)	1.95	(8)	(8)
30. (意志薄弱者)	1.84	1.43	(32.5)	0.91	(30)	(30)
32. (领导人)	4.49	2.42	(13)	1.43	(20)	(15)
34. (性犯罪)	3.43	2.83	(5)	2.52	(3)	(4)
35. (两种阶层)	1.44	0.73	(34)	0.83	(34)	(34)
36. (感染与疾病)	4.80	1.68	(25)	1.03	(28)	(26)
39. (爱父母)	3.16	3.28	(1)	2.56	(2)	(2)
40. (占星术)	2.56	2.15	(17)	1.66	(11)	(16)
41. (武力维持)	2.48	2.31	(15)	1.56	(13.5)	(14)

项 目	平均分	法西斯主义分辨力 ^b	法西斯主义分辨力排行	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 ^c	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排行	最终排行 ^d (法西斯主义分辨力+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	犹太主义分辨力
44. (老板)	2.46	1.60	(27)	0.50	(33)	(33)	
45. (隐私)	3.48	2.52	(9)	1.56	(13.5)	(11)	
46. (洪水)	2.15	1.43	(32.5)	0.94	(29)	(29)	
49. (铲除不道德的人)	2.74	2.12	(19)	1.56	(13.5)	(18)	
50. (错误信任)	2.12	1.45	(31)	0.84	(31)	(31)	
52. (性生活)	3.18	2.13	(18)	1.50	(18)	(19)	
53. (讲得太多)	3.87	1.83	(22)	1.24	(24)	(24)	
57. (阴谋)	4.24	1.55	(28)	0.63	(32)	(32)	
58. (同性恋)	2.29	2.20	(16)	1.54	(16)	(17)	
平均/人/项目	3.42	2.15		1.53			

- a. 上述数据取自下述 4 个组: 第一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人数 = 47); 第二组: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人数 = 54); 第三组: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人数 = 57); 第四组: 俄勒冈俱乐部男子(人数 = 68); 在取得总评平均分方面, 个别被试组不因人数而加权。
- b. 法西斯主义分辨力所依据的是法西斯量表分布的高四分位数和低四分位数之间的差别。
- c. 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所依据的是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分布的高四分位数和低四分位数之间的差别, 例如, 项目 1 的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为 1.52, 这表明民族中心主义低四分位数的平均分比民族中心主义高四分位数的平均分低 1.52 分。
- d. 指法西斯主义分辨力与民族中心主义分辨力的和。一个项目的最终排行是整个量表总和分布中这个和的排行档次。

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60)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平均相关是 0.69。比之我们从问卷 78 获得的结果, 问卷 60 有了很大

改进(问卷 78 的法西斯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相关为 0.53, 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相关为 0.65, 尚未高到问卷 60 所达到的那种程度)。

(四) 第三个法西斯主义量表: 问卷 45 和 40

尽管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60)是一种相当合适的工具, 但是它仍有一些明显的缺点, 我们希望这些缺点能在被试使用该量表之前被克服。首先, 它仍包含一些从统计学上说很差的项目, 它们对量表的目的几乎未作贡献。其次, 有 2 个项目(项目 12 和 18)在排行上位居第 1 和第 9, 但仍在 1945 年秋天的测试时被删除了, 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战时的特性。不仅如此, 经验表明, 当我们把量表用于非大学生的被试组时, 需要一种比问卷 60 更简短的问卷。与其他量表相比, 法西斯主义量表也有删节。不过, 这种删节是十分明智的, 既不丧失其综合的特征, 而且其信度及其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相关也将得到提升。新问卷的项目数达 30 个。

修订的内容主要是放弃 7 个项目, 并补充了 3 个新项目。在放弃的项目中有 2 个是较好的项目, 鉴于上述的原因, 它们不再符合时代性。从量表中剔除了 5 个项目, 因为它们的分辨力相对来说较低, 而且其他项目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如项目 44 (老板安排计划, 排序为 33), 项目 50 (错误信任, 排序为 31), 项目 30 (意志薄弱者, 排序为 30), 项目 22 (不能人人做主, 排序为 28), 以及项目 5 (生气勃勃的美国人, 排序为 27)。若干分辨力很低的项目作了修改, 并在新量表中得以保留, 它们是项目 35 (两个阶层, 排序为 34), 项目 57 (阴谋, 排序为 32), 以及项目 46 (洪水, 排序为 29)。

就 3 个新项目而言, 第一个新项目是: “商人要比艺术家和

教授对社会更加重要。”这是一个项目被稍作修订的例子,该项目最早出现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中。数据表明,它既对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具有分辨力,又对民族中心主义具有分辨力。由于这个项目较好地表现了因袭主义和反内感受作用,因此它是对法西斯主义量表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补充。

第二个新项目是:“最好起用战前的德国统治当局,以便维持秩序和防止动乱。”在拟定这个项目之时(1945年夏季),恰逢美国陆军上将巴顿(Batton)由于起用德国纳粹分子和极端保守的大人物来帮助执行占领军的某些任务而遭到人们谴责。批评者争辩说,这是一种意欲获得德国民主分子合作的糟糕方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巴顿将军辩护,他们认为这有助于提高效率和防止动乱。该问题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与它有关的一个项目可以为得高分者提供一种向军事当局表示仰慕之情的机会。但是,这个项目运作得并不好,原因在于措辞不当:由于我们不能确定哪些战前的统治者会得到利用,因此“战前”也有可能被认为是“纳粹之前”。

第三个新项目是:“惟有经历苦难,人们才会学到真正重要的东西。”这里,在法西斯主义量表的修订期间,经常存在诱惑,也即检验一种新的假设,或者说获得有关某种现象的量化数据(在临床研究中,它们伴随着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而出现)。该项目取自一份杂志的社论,看来,它充分适应于施虐—受虐的主题。而且,可以相信它在得高分者的人格中是突出的:这些个体认为,他们已经蒙受过苦难,因此了解真正重要的东西。至于那些尚未成功提高其地位的人,也就是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如果他们希望改善命运的话,就应该经受更多的苦难。对这个项目的反应并不理想,就男性而言,其排序是29(分辨力为1.70,仍在5%的水平上有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部分原因在

于,许多被试认为它是不合理的(平均分为2.54),部分原因在于被试的特征,有些被试具有施虐—受虐的人格结构,有些被试乍一看有着受虐狂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内感受作用的。

最后的法西斯主义项目,按照它们所属的变量而分类,并在表7-7中列出。

表7-7 法西斯主义量表归类:问卷45和40

1. 因袭主义:刻板地坚持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 (1) 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应当习得的最重要的美德。
 - (12) 不讲礼貌、恶习染身的人是很难与正派人相处的。
 - (37) 如果人们少说多做,那么每个人的处境都会好一点。
 - (41) 比起艺术家和教授来,商人和业主对社会更加重要。
2. 权力主义的屈从:把内团体理想化,屈从于当局,对内团体不抱批判态度。
 - (1) 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儿童应当习得的最重要的美德。
 - (4) 虽然科学有其地位,但是,有许多东西是人类的大脑所不能理解的。
 - (8) 人们应当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抱有完全的忠诚,毫不怀疑它的一切表现。
 - (21) 青年有时会产生反叛思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必须克服这些思想,并安定下来。
 - (23) 对这个国家来说,除了法律和政治纲领以外,最需要的是—些勇往直前的、不知疲倦的、专心于事业的领导人,以便人们可以信任他们。
 - (42) 凡是心智健全的正常人都不会想到伤害自己的朋友或亲属。
 - (44) 只有经历苦难,人们才会学到真正重要的东西。
3. 权力主义的攻击:提防、谴责、拒绝和惩罚那些违反传统价值观念的人们。
 - (12) 不讲礼貌、恶习染身的人是很难与正派人相处的。
 - (13) 青年人最需要的是严格的纪律、坚定的决心,以及为家为国工作和战斗的意志。
 - (19) 凡对我们荣誉的侮辱,都应当受到惩罚。
 - (25) 对于性犯罪,例如强奸和恋童,不仅要拘禁,而且必须当众鞭答,或者处以更重的刑罚。
 - (39) 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不感激和尊重自己的父母,那么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人了。

- (34) 如果我们铲除那些不道德的、欺诈的和意志薄弱的人,则我们的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 (37) 只要人们少说多做,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
- (58) 同性恋不会比罪犯好到哪里去,对此应当予以严惩。
4. 反内感受作用:反对主观的、想像的和脱离实际的思想。
- (9) 当一个人有问题或忧虑时,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忙着去干更加愉快的事情。
- (3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理应保密的个人隐私产生了兴趣。
- (37) 只要人们少说多做,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
- (41) 比起艺术家和教授来,商人和业主对社会更加重要。
5. 迷信和定型:相信个人命运的神秘决定因素,以定型化的方式进行思考。
- (4) 虽然科学有其地位,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人类大脑所无法理解的。
- (8) 人们应当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抱有完全的忠诚,毫不怀疑它的一切表现。
- (16) 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争取上流社会地位的冲动。
- (26) 可以把人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弱者和强者。
- (29) 将来,总有一天会证明,占星术能够解释许多东西。
- (33) 战争和社会问题会由一场摧毁世界的地震或洪水而一劳永逸地结束。
- (40) 有些意志薄弱的表现是因过度学习造成的。
6. 力量和“顽强”:抱有统治一屈服、强一弱、领导一随从的偏见;认同权力人物;过分强调自我的因袭主义属性;武断地夸大力量和顽强。
- (2) 如果我们拥有坚强的意志,那么任何困难都无法使我们退缩。
- (13) 青年最需要的是严格的纪律,坚定的决心,以及为家为国工作和战斗的意志。
- (19) 凡对我们荣誉的侮辱,都应当受到惩罚。
- (22) 最好起用战前的德国统治当局,以便维持秩序和防止动乱。
- (23) 除了法律和政治纲领,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些勇往直前的、不知疲倦的、专注于事业的领导人,以便人民可以信任他们。
- (26) 可以把人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弱者和强者。
- (38)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明显地受到由政客们秘密炮制的阴谋所控制。
7. 破坏性和犬儒主义:一般的敌意态度,诽谤人类。
- (6) 不管人性是什么,它总会引发战争和冲突。
- (43) 相似引发蔑视。
8. 投射:认为世界被野蛮和危险所笼罩;无意识的情感冲动向外投射。
- (18) 今天,各种不同的人群到处迁移,自由混合,因此一个人要特别小

- 心,以防感染疾病。
- (3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理应保密的个人隐私发生了兴趣。
- (33) 战争和社会问题会由一场摧毁世界的地震或洪水而一劳永逸地结束。
- (35) 古希腊和罗马人的性放荡与这个国家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在人们最不希望它发生的地方也是如此。
- (38)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明显地受到由政客们秘密炮制的阴谋所控制。
9. 性:夸张地关注性欲问题。
- (25) 对于性犯罪,例如强奸和恋童,不仅应当予以拘禁,还必须当众鞭笞,或者施以更重的刑罚。
- (35) 古希腊和罗马人的性放荡与这个国家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在人们最不希望它发生的地方也是如此。
- (39) 同性恋比罪犯好不了多少,对此必须加以严惩。

量表的信度,每个项目的平均分、标准差,以及对 14 个组(总人数 = 1518)而言,每个组的区间(采用问卷 40 或 45),都在表 7-8 中列出。信度系数的平均值为 0.90,其区间从 0.81 ~ 0.97。该量表不仅对问卷 60 的信度有了改进(平均 $r = 0.87$),以及对原始问卷 78 的信度有了改进(平均 $r = 0.740$),而且它还满足了严格的统计要求。0.90 的信度可以这样解释:量表将个体沿一定区间安置,误差较小。换言之,个体获得的分数在测量误差上已经减至最低限度。因此,重复使用该量表(当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与以前相同时),被试的新分数会与他的第一次分数相同,或者略高于它,或者略低于它。本研究获得的信度处于可接受的智力测验范围之内。

尽管平均分在组与组之间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讨论),但是,总的说来,仍然相当接近中点。正如我们使用该量表对各种被试进行调查时所预期的那样,区间和标准差比以前的

量表大得多。虽然尚未作出分布曲线,但是散乱的图解表明,它们在形态上是相当正常的(对称的,但稍呈扁平凸出状)。

表 7-8 法西斯主义量表项目(问卷 40 和 45)的信度

被试组	人数	信度	平均	标准差	区间
问卷 40: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32	0.84	3.51	0.90	1.2~5.4
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	63	0.94	4.08	1.03	1.8~7.0
中产阶级男子	69	0.92	3.69	1.22	1.3~6.7
中产阶级女子	154	0.93	3.62	1.26	1.1~6.7
工人阶级男子	61	0.88	4.19	1.18	1.8~6.9
工人阶级女子	53	0.97	3.68	1.67	1.3~6.6
洛杉矶男子	117	0.92	3.68	1.17	1.1~6.0
洛杉矶女子	130	0.91	3.49	1.13	1.2~5.8
平均 ^a	779	0.91	3.76	1.20	1.3~6.4
问卷 45:					
测试班女生	59	0.89	3.62	0.99	1.3~5.9
圣·昆丁监狱男犯	110	0.87	4.73	0.86	2.0~6.8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b	71	0.94	3.69	1.30	1.0~6.3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b	50	0.89	3.82	1.01	1.7~5.9
平均	290	0.90	3.96	1.04	1.5~6.2
问卷 40 和问卷 45:					
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	106	0.89	3.74	1.04	1.2~5.8
海事学校男子	343	0.81	4.06	0.77	1.6~6.1
平均 ^a	449	0.85	3.90	0.90	1.4~5.9
总平均	1518	0.90	3.84	1.10	1.4~6.3

a. 在获取综合的团体平均分方面,个别团体的平均分不因人数而加权。

b. 由于问卷的替代,供精神病诊所被试使用的法西斯主义量表只包含 28 个项目。

1. 内在一致性

量表项目的分辨力(2.85)如表 7-9 所示,平均分比问卷 60 的分辨力(2.15)高得多。所有这些项目在高四分位数和低四分位数之间显著分化。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项目毫无改变地从问卷 60 移植而来,在这里要比在问卷 60 中更具效果。部分原因在于获得问卷 45~40 的被试组包括许多极端得分者,部分原因在于量表在整体上有了改进:倘若一个好的项目能明显地在上下四分位数之间作出分化,则整个量表便能成功地对个体作出区分(按照正在测量的倾向,那些个体实际上是颇为极端的)。

一般说来,女子的分辨力比男子高,这一事实值得作些评论。看来,该现象与下述事实有关:共有 3 组男子(海事学校、圣·昆丁男犯和工人阶级男子),他们的量表信度相对较低(0.81~0.88)。由于这 3 组男子比我们的大多数被试所受教育程度要低,因此很有可能他们难以理解某些量表项目,此类情况既对高分辨力不利,也对信度不利。此外,在所有被研究的被试组中,正是这 3 个组获得了最高平均分。由此可以推论的是,对于某些项目,被试之间出现太多的同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降低了分辨力。据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被试组里,我们是否遭遇不到比期望的更加极端和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表现形式,或者说遭遇不到法西斯主义量表未能适当包括的前法西斯主义人格模式。就量表的建构和修改而言,大多数工作是在一些组的被试中实施的,其中,得高分者主要是高度传统化的被试。保留这些分化得最好的项目,对于建构一件工具来说也许不是最佳的。理想的工具应以最高效率在一些组里(这些组的心理变态和少年犯罪等倾向十分明显)发挥作用。这是一个今后要加以详细讨论的问题。

尽管男女之间在分辨力上存在差异,但是,在一个性别上运

作得很好的项目,一般说来在另一个性别上也会运作得很好。男子分辨力排序和女子分辨力排序之间的相关为 0.84。这充分证明,若将两组的分辨力予以平均,便可获得每个项目的总的“理想排序”。由于本研究中异性之间的差异与同性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因此任何两个同性组之间的分辨力排序的相关将在 0.84 附近。看来,在男子组运作得很好的项目和在女子组运作得很好的项目之间不存在系统的差别。

一般说来,男子组的平均分比女子组的平均分要高一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看来主要是由于上面讨论过的原因,即 3 个男子组的分数特别高。如果将社会经济阶层相同的男子和女子进行比较,平均分就不会出现显著差异。此外,对男子具有明显吸引力的项目,对女子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男子平均分和女子平均分之间的排序相关为 0.95。

2. 相关分析

作为独立调查的组成部分,我们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40 和 45)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普通心理学班的 900 个学生进行了调查。之所以没把这些新大学生被试组的数据包括在目前研究的一般结果之中,原因在于被试过于年轻,而且相对来说比其他被试所受教育更高。可是,来自这个心理学班的 517 个女性却可以构成一个组,其中的量表服从于项目间的相关分析。^[5]该分析的结果将在这里概述。

法西斯主义量表的项目之间是相关的(见表 7-9)。435 个系数的平均分为 0.13,区间从 -0.05 ~ 0.44。^[6]此外,每个项目又与量表的余下部分相关,平均 r 是 0.33,区间从 0.15 ~ 0.52。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中,项目间的平均 r 为 0.42,而项目总分的平均 r 为 0.59,由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有着与可接受的智力测

表 7-9 法西斯主义量表条目(问卷 40 和 45)^a 的平均分和分辨力

项 目	男子组		女子组		男女结合组							
	平均	排行	分辨力	排行	平均	排行						
1. 服从和尊重	5.41	(1)	2.70	(15)	4.67	(4)	3.91	(4)	5.04	(2)	3.31	(6.5)
2. 意志力	5.16	(4)	2.48	(20.5)	4.94	(1)	2.67	(23)	5.05	(1)	2.58	(2)
4. 科学	4.20	(15)	2.55	(16)	4.32	(6)	2.89	(19)	4.26	(11)	2.72	(17)
6. 战争和冲突	4.69	(17)	2.32	(22.5)	4.26	(8)	2.98	(16)	4.48	(6)	2.65	(19)
8. 超自然力量	3.47	(22)	3.19	(5)	3.43	(18)	3.92	(3)	3.45	(20)	3.56	(4)
9. 愉快的事物	3.80	(18)	2.52	(19)	3.71	(15)	3.14	(12)	3.76	(17)	2.83	(16)
12. 不讲礼貌	5.22	(2)	1.77	(27)	4.80	(3)	2.60	(24)	5.01	(3.5)	2.19	(26.5)
13. 纪律与决心	4.59	(8)	3.60	(3)	4.03	(11)	4.03	(2)	4.31	(10)	3.82	(2)
16. 天生的冲动	3.75	(19)	2.54	(17.5)	3.25	(19)	2.47	(26)	3.50	(19)	2.51	(24)
18. 感染与疾病	4.53	(10)	2.82	(12)	4.13	(10)	3.52	(7)	4.33	(9)	3.17	(8.5)
19. 荣誉	3.50	(21)	2.74	(14)	3.11	(25)	3.12	(13)	3.31	(22)	2.93	(14)
21. 反叛思想	4.71	(6)	3.04	(7)	4.14	(9)	3.72	(5)	4.43	(7)	3.38	(5)
25. 德国	4.26	(14)	1.98	(24)	3.74	(14)	2.40	(27)	4.00	(14.5)	2.19	(26.5)
23. 领导人	5.18	(3)	2.32	(22.5)	4.84	(2)	2.87	(20)	5.01	(3.5)	2.60	(21)
25/24. 性犯罪	4.54	(9)	3.68	(2)	4.29	(7)	4.32	(1)	4.41	(8)	4.00	(1)
26/25. 弱和强	3.05	(26)	2.94	(9)	2.48	(29)	3.39	(8)	2.77	(26)	3.17	(8.5)
27/26. 爱	4.09	(16)	3.76	(1)	3.21	(20)	3.66	(6)	3.65	(18)	3.71	(3)
29/27. 占星术	3.31	(24)	2.79	(13)	3.16	(22.5)	3.33	(10)	3.24	(24)	3.06	(11)
30/28. 武力维持	2.92	(27)	2.54	(17.5)	2.47	(27.5)	2.73	(22)	2.70	(27)	2.64	(20)
31/29. 打听隐私	4.34	(12)	2.98	(8)	3.66	(16)	3.02	(15)	4.00	(14.5)	3.00	(12)
33/30. 地震、洪水	2.58	(28)	1.76	(28)	2.59	(26)	2.19	(29)	2.59	(28)	1.98	(29)
34/31. 不道德的人	3.38	(23)	2.90	(10)	3.16	(22.5)	2.85	(21)	3.27	(23)	2.88	(15)
35/32. 性放荡	4.04	(17)	2.48	(20.5)	3.60	(17)	2.93	(17)	3.82	(16)	2.71	(18)
37/33. 少讲多做	4.88	(5)	2.84	(11)	4.59	(5)	3.10	(14)	4.74	(5)	2.97	(13)
38/34. 阴谋	4.32	(13)	1.97	(26)	3.99	(12)	2.54	(25)	4.16	(12)	2.26	(25)
39/35. 同性恋	3.10	(25)	3.25	(4)	2.67	(24)	3.36	(9)	2.98	(25)	3.31	(6.5)
41/36. 艺术家、商人	2.36	(30)	1.58	(30)	1.88	(30)	1.88	(30)	2.21	(30)	1.73	(30)
42/37. 健全的人	4.42	(11)	3.13	(6)	3.85	(13)	3.18	(11)	4.14	(13)	3.16	(10)
43/38. 相似性	3.56	(20)	2.20	(25)	3.20	(21)	2.90	(18)	3.38	(21)	2.55	(23)
44/39. 受苦	2.54	(29)	1.70	(29)	2.47	(27.5)	2.29	(28)	2.51	(29)	2.00	(28)
平均/人/条目	4.00		2.64		3.63		3.03		3.81		2.85	

a. 这些数据均取自采用问卷 40 和 45 的 14 个组(参见表 7-8)。

验同等程度的单一维度(1937年,斯坦福一比纳修正版的项目间平均 r 约为 0.38,项目总分的平均 r 为 0.61),因此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分级相当低。虽然量表相对来说缺乏表面的同质性,可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据此谈论一种法西斯主义模式或症状,因为每个项目与作为整体的量表显著相关。对此问题,我们需要记住构建法西斯主义量表的两个目的:(1)在广泛的领域中寻找各种答案,它们都属于单一的征候;(2)建构一种工具,以便对民族中心主义分数进行可靠预计。很清楚,第一个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尽管可以继续寻找有助于揭示法西斯主义特征的补充项目。事实上,法西斯主义量表中的个别项目与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相关为 0.25,这充分保证了第二个目的的实现——我们将马上转入这个问题。

在建构法西斯量表时考虑量表或项目,从统计意义上讲并非分类,这一证明可从 517 个女性的数据中得出。尽管在问卷 45 的法西斯项目之间呈现相关(0.11 ~ 0.24),但是一个类别中项目之间的相关并不比它们与其他类别众多项目的相关更好些。因此,我们有正当理由运用这些类别,借此作为一种由原因推知结果的辅助手段。

三、法西斯主义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相关

法西斯主义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相关性是以 3 份问卷为基础的,并用于研究中的各组。它们的相关如表 7-10 所示。表中显示的主要结果是: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关由于量表的不断修订而有所上升,在问卷 40 和 45 中,平均约 0.75。根据这一相关,民族中心

主义的分数可以相当准确地依据法西斯主义的分数来预测。

表 7-10 在若干问卷中,法西斯主义量表和反犹主义量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相关

	人数	法 西 斯 主 义	对 反 犹 主 义	法 西 斯 主 义 对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法 西 斯 主 义	对 政 治 经 济 保 守 主 义
采用问卷 78 的组:						
演说班女生	140	0.55		0.58		0.52
演说班男生	52	0.52		0.56		0.45
在职班女生	40	0.49		0.74		0.54
职业妇女	63	0.57		0.73		0.65
合计 ^a :问卷 78	295	0.53		0.65		0.54
采用问卷 60 的组:						
俄勒冈大学女生	47			0.72		0.2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54			0.78		0.49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57			0.58		0.43
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	68			0.69		0.29
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 ^b	60					0.22
合计:问卷 60	286			0.69		0.34
采用问卷 45 的组:						
测试班女生	59			0.79		0.54
圣·昆丁监狱男犯	110			0.59		0.23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71			0.86		0.62 ^c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50			0.76		0.57 ^c
工人阶级男女	50			0.85		0.70
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	51			0.67		0.62 ^d
海事学校男子	179			0.56		0.39 ^d

	人数	法西斯主义 对反犹太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 对法西斯主义	保守主义 对政治经济 法西斯主义
合计:问卷 45	570		0.73	0.52
采用问卷 40 的组 ^a :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32		0.69	0.53
加利福尼亚服务 俱乐部男子	63		0.80	0.59
中产阶级男子	69		0.81	0.71
工人阶级男子	61		0.76	0.60
中产阶级女子	154		0.83	0.70
工人阶级女子	53		0.87	0.72
洛杉矶男子	117		0.82	0.58
洛杉矶女子	130		0.75	0.61
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	55		0.72	0.62
海事学校男子	165		0.62	0.39
合计:问卷 40	999		0.77	0.61
总计:所有问卷	2150	0.53	0.73	0.52

- 在获得各个小组平均分时,个别组的平均分不因人数而加权。
- 这组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接受了一份简短的问卷,它只包含法西斯主义量表和一半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
- 对于精神病诊所组的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女子数为 45,男子数为 29。
- 这些法西斯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相关是以问卷 40 和 45 为基础的。据认为,不论是否安置 5 个民族中心主义条目,均不会影响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因此可把两个问卷合在一起,以便获得较大的人数。对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来说,总人数为 106,而海事学校男子的总人数为 343。
- 在问卷 40 中,只使用了 10 个条目,也即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A”部分。

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相关在组与组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变化,它主要取决于量表本身的信度。^[7]在圣·昆丁组中,法西斯主义的信度为 0.87,而民族中心主义的信度只有 0.65,两个量表之间的相关是最低的,为 0.59。然而,在工人阶级女子组中,法西斯主义的信度上升到了 0.97,^[8]相关达到其最大值,为 0.87。很显然,如果两个量表的信度增加的话(可以用增加每个量表的项目数来做到这一点),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关也会很高。^[9]不过,这并不是说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测量了同样的东西。相关值为 0.775,意味着大约有 2/3 的被试既在一种量表的高四分位数上得分,也在另一种量表的高四分位数上得分。而且,实际上并不存在颠倒的情况,也即一个被试在一种量表上得高分,却在另一种量表上得低分。如果人们想单单运用法西斯主义量表来挑选高度民族中心主义的被试,也就是处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高四分位数中的被试,那么他就必须把被试限于那些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得极端高分的人上面,也许是那些处于极端的 10% 的人群。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为什么可以期望两个量表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这是有原因的。毫无疑问,有些个体对法西斯宣传特别易感,而法西斯主义量表恰恰涉及这种宣传。但是,这些个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倾向于抑制对少数民族团体的敌对态度,致使这些被试在法西斯问题上得高分,却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低分。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些个体倾向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迎合他们的生活风格,所以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高分,却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得低分。对于这些“例外”,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详细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问卷 40 的被试,其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相关,要比那些采用问卷 45 的被试稍高一些。

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A 部分的相关,要比法西斯主义与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相关稍好一些,而这种相关在量表的 B 部分要更低一些。在一些采用问卷 45 的被试组中,民族中心主义 A 部分与法西斯主义的相关,以及民族中心主义 B 部分与法西斯主义的相关也得到了统计,借以补充整个民族中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相关。结果如表 7-11 所示。在每个被试组里,民族中心主义 A 部分与法西斯主义的相关,要比民族中心主义 B 部分与法西斯主义的相关更高。但是,比之民族中心主义 A 部分 + B 部分与法西斯主义的相关,两者基本接近。读者也许还记得,量表的 A 部分涉及高度概括的民族中心主义,但并不包括反犹主义项目,而 B 部分却由 4 个反犹主义项目和一个黑人项目所构成。正是这个黑人项目,从统计意义上讲,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差的项目(其排序男性为 5,女性为 10)。但是,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民族中心主义 A 部分与法西斯主义更具相关性这个事实。更加确切地说,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与一般的民族中心主义更为密切,而不是与反犹主义更为密切。这种情况与早先时候报道的发现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问卷 78 中,法西斯主义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联系更密切,而不是与反犹主义量表联系更密切。尽管反犹主义仍被看做是一般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方面,但是它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这是不容怀疑的。至于它具有哪些特点,我们将在第十六章予以描述。

法西斯主义倾向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只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问卷 45 和 40 的平均相关为 0.57。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方面获得高分,既可能是由于真正的保守主义,也可能是由于假保守主义。而且,正是后者(假保守主义)表现了法西斯主义量表所测得的人格倾向。这种情况符合下列事

表 7-11 法西斯主义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 A 部分
和 B 部分的相关,以及它与整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相关

被 试 组	人 数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A 部 分 与 法 西 斯 主 义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B 部 分 与 法 西 斯 主 义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A + B 部 分 与 法 西 斯 主 义
圣·昆丁监狱男犯	110	0.56	0.45	0.59
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	51	0.66	0.61	0.67
海事学校男子	179	0.61	0.40	0.56
测试班女生	59	0.77	0.66	0.79
平均		0.65	0.53	0.65

实:民族中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高度相关,但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只具中等程度的相关。民族中心主义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比之法西斯主义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基本上是接近的。看来,目前使用的一些量表所测得的一般民族中心主义,主要是法西斯主义量表所测得的人格结构的一种表现;鉴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可能具有同样的原因,因此它要比民族中心主义更有赖于个体的一些因素。

四、各个被试组法西斯主义量表平均分的差异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不同被试组的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平均分。这些平均分列于表 7-12。这里,值得回顾的是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所陈述的内容。由于我们并未采取任何步骤来保证所研究的每个被试组能够真正代表大部分人口,因此,我们不想依据目前的平均分来作出概括,不管这些结果是多么地具有提示

性。当然,大规模的社区研究是必要的,这样方能对总人口的不同部分的法西斯倾向作出正确估计。我们相信只要对法西斯主义量表进行修订,以便适合于受教育较少的那些被试组,则它可以用于这样的研究。可是,由于填写问卷的被试组并不代表对当前研究而言颇有意义的那类团体,因此,可以预料,个中的差异是很大的,每个被试组内部的变化性也是显著的。我们认为,只有当一个被试组的成员资格具有某种心理学意义时,我们在法西斯主义平均分中寻找团体差异才是有意义的。看来,目前的大多数被试组均不符合这一条件。我们在问卷的第一页上也设计与团体成员身份有关的一些项目,诸如收入、宗教等等。这样做多少是有好处的。鉴于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高度相关,我们可以期望与此相似的结果会在继后的量表中找到。但是,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目前的被试组里,存在着重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差异(确实,其中的一些被试组被描述为“重点”组)。如果法西斯主义量表有效,我们便可期望,按照我们的理论,平均分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

表 7-12 采用若干形式问卷的各个被试组的法西斯主义量表平均分

被试组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问卷 78:			
演说班女生	140	3.94	0.71
演说班男生	52	3.72	0.57
在职班女生	40	3.75	0.70
职业妇女	63	3.43	0.86
问卷 78 的总平均分	295	3.71	0.71
问卷 60:			
俄勒冈大学女生	47	3.32	0.86

被试组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	54	3.39	0.96
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男生	57	3.82	0.93
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	68	3.74	0.81
俄勒冈服务俱乐部男子(仅一份问卷)	60	3.25	0.71
问卷 60 的总平均分	286	3.50	0.85
问卷 45:			
测试班女生	59	3.62	0.99
圣·昆丁监狱男犯	110	4.73	0.86
精神病诊所女病人	71	3.69	1.30
精神病诊所男病人	50	3.82	1.01
问卷 45 的总平均分	290	3.96	1.04
问卷 40: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	132	3.51	0.90
加利福尼亚服务俱乐部男子	63	4.08	1.03
中产阶级女子	154	3.62	1.26
中产阶级男子	69	3.69	1.22
工人阶级女子	53	3.86	1.67
工人阶级男子	61	4.19	1.18
洛杉矶女子	130	3.49	1.13
洛杉矶男子	117	3.68	1.17
问卷 40 的总平均分	779	3.76	1.20
问卷 40 和 45:			
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	106	3.74	1.04
海事学校男子	343	4.06	0.77
问卷 40 和 45 的总平均分	449	3.90	0.90
4 个问卷(78、60、45、40)的总平均分	2099	3.78	

在采用问卷 40~45 的所有 14 个被试组里,圣·昆丁男犯得

分最高,平均分为 4.73。这个平均分与次一最高得分组(即工人阶级男子组)的 4.19 平均分显著不同(相关 = 3.2)。圣·昆丁组与得分最低组(洛杉矶男子,平均分为 3.68)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相关 = 7.8)。鉴于上面说过的犯罪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果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关于圣·昆丁组的结果,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进行分析,这里不再赘言。

服务俱乐部男子和工人阶级男子在法西斯主义平均分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会使下列那些人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以社会经济的团体成员身份为基础来解释社会态度方面的一切重要差异,而且他们还把工人视做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载体。当然,如果从经济和社会事实的角度看待该问题,这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反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垄断斗争最为激烈。他们依据自身的利益而行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这一群体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易感性。就我们的发现而言,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假设工人阶级的权力主义结构弱于人口中的其他群体。如果认为我们抽取的工人阶级样本是一些极端的或异常的样本,那么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尽管该样本的一半来自好斗的“自由主义”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和加利福尼亚劳工学校的成人学员,但是没有理由假设来自联合海员服务中心和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的新成员(他们构成了样本的另一半)会比工人更加保守。由于得分最高的圣·昆丁男犯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他们的观点既取决于他们的背景,又取决于他们被囚禁的环境。

看来,男性被试组之间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与自由主义组织和自由主义思想接触的因素,而非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团体成员身份。这是我们解释中产阶级男子平均分相对较低(3.69),以及洛杉矶男子平均分相对较低(3.68)的基础,而两者与服务俱

乐部男子的平均分(4.08)显著不同,差异大于 0.05。中产阶级男子与服务俱乐部男子在经济、职业和地位等方面是颇为相似的;他们在法西斯主义量表平均分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安排前者在 RTA 的一次会议上填写问卷,或者在基督教长老会的俗人联盟会议上填写问卷,或者在加利福尼亚劳工学校的夜课上填写问卷,而安排后者在服务俱乐部的午餐会上填写问卷。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一个心理问题;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心理因素有关。你们可能还记得,洛杉矶男子主要来自大学和影视界,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肯定不低于旧金山地区的服务俱乐部男子,但他们生存的背景却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海事学校被试组主要由工人阶级男子和低于中产阶级的人员构成,其平均分(4.06)与服务俱乐部男子和工人阶级男子相当,而精神病诊所男子(平均分为 3.82)和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平均分为 3.74),在社会地位或自由主义归属方面是更加异质的,其平均分的排序处于中间地位。

我们已经提及过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整个样本中,男子比女子具有更高的平均分。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男子样本中存在得分很高的被试组。然而,目前的数据表明,在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男子的平均分与女子的平均分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以工人阶级男子与工人阶级女子为例,相关仅为 1.22,而在精神病诊所组、洛杉矶组和中产阶级组之间,男子和女子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例子中,男子得分略高些。但是,差异有否意义,应以大样本为依据。

在女子被试组中间,达到显著差异的是工人阶级女子(平均分为 3.86)、乔治·华盛顿大学女生(平均分为 3.51)和洛杉矶女子(平均分为 3.49)。如果这类差异确实存在,那么对此的解释

可能与某些男子被试组的解释相同,也即这些被试组的女子更多地接触到自由主义倾向。考察一下与这些被试组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相联系的法西斯主义平均分的团体差异是有趣的。一般说来,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得高分的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也得高分。最为引人注目的差异发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女生中间,她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平均分为 4.04)比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平均分为 3.51)得分较高,而工人阶级男子的得分,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平均分为 4.19)比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平均分为 3.92)得分较高。看来,就这一女子被试组而言,我们必须考虑地区差异:许多观察家注意到,东部地区的妇女比西部地区的妇女偏见更深。因此,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这些大学女生相对来说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她们却受到流行舆论的引导,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分较高。它与下列事实相符,即这个被试组里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相关,是所获相关值中间最低的。

工人阶级男子组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低于法西斯主义平均分。这也许是由于大多数被试所属的工会成功地灌输了“反歧视”的缘故,此类情况往往发生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工会中。可是,很显然,这种灌输并未改变围绕权力主义的那些态度,因为这个被试组的权力主义态度比其他被试组更为显著。人们可以说,如果取消这种灌输,或者用相反的宣传取而代之,那么该组的结果就会与其他组一致了。

读者也许会认为,工人阶级在表示偏见方面相对地未受抑制,而中产阶级在表示偏见方面则受到抑制,从而表明后者的偏见更深。但是,目前尚未找到支持这种猜测的数据,这可能是由于下述的事实,即我们的民族中心主义问卷大多是相当含蓄的,也就是说,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述,使得一个假民主的被试可能

同意这些表述,但却以为自己没有偏见。

五、个案研究的证实:麦克和拉里对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反应

现在,我们可以将麦克和拉里对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反应与他们在访谈中的言论作比较了。表 7-13 显示了麦克和拉里的分数、团体平均分,以及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78)的 38 个项目中每一个项目的分辨力(项目按照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类别归类)。

表 7-13 麦克和拉里对法西斯主义量表(问卷 78)的反应

项目	麦克	拉里	被试组平均 ^a (人数 = 295)	被试组分辨力 ^a
因袭主义				
12. (现代教会)	5	7	4.67	0.19
19. (回避)	2	1	3.63	0.76
38. (大学的价值)	5	2	3.91	1.20
55. (休闲)	7	6	5.20	2.11
58. (做好事情)	6	1	3.48	1.70
60. (哪个最重要)	5	5	4.17	1.60
项目平均	5.00	3.66	4.18	1.26
权力主义的屈从				
20. (进步教育)	3	1	3.28	1.07
23. (爱父母)	6	7	3.62	2.61
32. (对学习是基本的)	7	6	3.61	1.67
39. (超自然力量)	1	1	3.97	2.54

项目	麦克	拉里	被试组平均 ^a (人数=295)	被试组分辨力 ^a
43. (化学等科学)	1	2	4.35	2.79
50. (服从和尊重)	6	2	3.72	3.09
74. (不知疲倦的领导)	2	1	5.00	1.66
77. (健全的人)	6	5	4.12	2.12
项目平均	4.00	3.13	3.96	2.19
权力主义的攻击				
6. (限制妇女)	2	1	2.93	1.75
23. (爱父母)	6	7	3.62	2.61
31. (同性恋)	6	6	3.22	2.16
47. (荣誉)	5	2	3.00	2.09
75. (性犯罪)	6	1	3.26	2.81
项目平均	5.00	3.40	3.21	2.28
反内感受作用				
28. (小说或故事)	5	1	3.02	1.29
38. (大学的价值)	5	2	3.91	1.20
53. (隐私)	3	5	4.28	1.99
55. (休闲)	7	6	5.20	2.11
58. (做好事情)	6	1	3.48	1.70
66. (书籍和电影)	6	2	4.10	2.48
项目平均	5.33	2.83	4.09	1.80
迷信				
2. (占星术)	5	6	2.60	1.74
10. (珍珠港事件)	1	1	2.22	2.22
39. (超自然力量)	1	1	3.97	2.54
43. (化学等科学)	1	2	4.35	2.79
65. (世界性灾难)	1	1	2.58	1.55

项目	麦克	拉里	被试组平均 ^a (人数=295)	被试组分辨力 ^a
项目平均	1.80	2.20	3.78	1.70
力量和“顽强”				
9. (积极的生活)	1	2	3.99	2.04
35. (掌握法律)	1	1	2.50	1.42
47. (荣誉)	5	2	3.00	2.09
70. (政客的阴谋)	7	2	3.27	1.65
74. (不知疲倦的领导)	2	1	5.00	1.66
项目平均	3.20	1.60	3.55	1.77
破坏性和犬儒主义				
3. (诉诸武力)	3	5	3.04	1.98
9. (积极的生活)	1	2	3.99	2.04
14. (老鼠、细菌)	6	5	4.44	1.60
17. (相似性)	3	1	3.33	1.86
24. (凡事不稳定)	5	5	5.01	0.79
30. (动乱报道)	6	5	4.20	0.43
35. (掌握法律)	1	1	2.50	1.42
42. (只有一个原因)	1	1	2.06	1.05
56. (犯罪浪潮)	5	5	4.60	1.16
59. (引发战争)	7	1	4.26	2.59
67. (自身利益)	7	3	3.71	2.21
项目平均	4.09	3.09	3.74	1.56
投射				
46. (性放荡)	5	2	3.64	2.11
56. (犯罪浪潮)	5	5	4.60	1.16
65. (世界性灾难)	1	1	2.58	1.55
70. (政客的阴谋)	7	2	3.27	1.65

项目	麦克	拉里	被试组平均 ^a (人数=295)	被试组分辨力 ^a
73. (感染疾病)	5	1	4.79	2.02
项目平均	4.60	2.20	3.78	1.70
性				
31. (同性恋)	6	6	3.22	2.16
42. (只有一个原因)	1	1	2.06	1.05
46. (性放荡)	5	2	3.64	2.11
75. (性犯罪)	6	1	3.26	2.81
项目平均	4.50	2.50	3.05	2.03
总平均 ^b	4.31	2.95	3.71	1.80

a. 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是以所有采用问卷 78 的 4 个被试组为依据的(见表 7-3)注 a。

b. 总平均分依据的是 38 个项目之和,项目之间没有重叠。

两人的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平均分与前述的观察相一致,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代表本研究中所发现的极端例子。麦克的平均分为 4.31,对于他所属的演讲班男生组来说,处于高四分位数之内。该分数稍高于工人阶级男子的平均分(4.19),但比圣·昆丁组的平均分(4.73)低得多。拉里的平均分为 2.95,尚未达到演讲班男生的低四分位数的范围,但它低于本研究中所获得的各种团体平均分。

现在,让我们转向量表内的 9 个变量。可以注意到麦克对 9 个变量中的 7 个变量,其平均分在团体平均分之上,而在权力主义攻击上,他明显地偏离了团体。这与他访谈中的一个特点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倾向于在道德立场上责备和谴责各种个体、团体和机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民防机构,以及

各种少数民族。至于同性恋、性犯罪、那些侮辱“我们荣誉”的人,以及对自己父母没有爱心的人,都应当以同样方式予以考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应当以某种方式限制妇女。”这种不一致可以从他在访谈中表述的一段话得到解释:^[10]

“我希望娶我现在正在谈的那个女孩为妻。她是一个极为理想的伴侣。许多女孩只对所谓的好时光感兴趣,而且以有钱的小伙子为伴。但是,我没有钱给她们。现在,我所钟爱的女孩住在离我有 9 里路的地方。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中学里,当时我刚从军队复员,在木材厂工作。这个女孩从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她的叔叔是银行的副总裁。我与她谈到购买一辆她感兴趣的轿车。我为她挑选,因为我对车子多少有点了解,并且告诉她我所选的车子是辆好车子。我与她继续保持关系。我发现她对钱不感兴趣,而是对我感兴趣,因为她全然不顾我是退伍军人、我的健康不佳,以及我的前途等问题。她很好,人品极好。她是法国人,却具有爱尔兰血统。她身材苗条。我们何时结婚要视情况而定。这是一个责任问题。她在一所学校教书,而且想现在就结婚,但我却受退伍军人法案的限制。如果我读上四年大学,那么今年春天我便可以结婚。我们很相配;我知道她对我感兴趣,尽管我给她的很少。我们两人的年龄也很合适。我想做些兼职工作。我不想让她从事教学工作;我希望以我的能力来养活妻子。我始终抱有这个想法。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会有此可能。她是一个好厨师,那是一笔财富,至少对我的胃而言是如此。当我告诉她你赞同我们结婚时,她会高兴的。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由自己作出决定的男人。”

其实,麦克并不赞成“一个女人的位置在家中”这种说法,只是他当时的处境阻止他在问卷中这样说罢了。

在性、反内感受作用、因袭主义和投射等其他变量上,麦克的得分超过团体平均分。性的问题在第二章描述的访谈报告中没有提到。但是,根据麦克访谈的临床部分的摘录,可以看出他对量表中性项目的反应:

(你是在哪儿接受性教育的?)“我从未从父母那儿受到过任何性教育,尽管我从姑妈那儿得到过某些建议。其实,我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性教育。我所了解的内容,大多是从书籍中获得的。我也曾听男人们谈论过,但接受得很少。我是按照阅读的内容来处理性问题的。”

(你的第一次性经验是什么?)“那是 1940~1941 年的事情,当时我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新年晚会。晚会上有白酒,但我却是一个落伍的男孩。”

按照我们的理论,这里描述的那种性抑制和“落伍”,以及在结婚计划中表示出来的因袭主义,是以对他人的性欲的道德和惩戒态度为基础的,它们是量表中性项目的主题。有一个陈述是这样的:“男人对女人感兴趣只有一种原因。”麦克对此不同意。对此态度的不一致,可以根据他对项目 6(限制妇女)的反应的同样方式来解释:如果同意的话,则与他目前的处境明显抵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项目“男人对女人感兴趣只有一种原因”,具有很低的团体平均分和很低的分辨力。

麦克的访谈也充分说明了他的反内感受作用。他强调实践、效率和勤奋,并且将它们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忽视人类特性和人类事件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这一倾向使他不能考虑到他的观点的内部根源,以及他所表示的价值观和他真实动机之间的差异。上述这些都是他的访谈的特色。法西斯主义量表中的若干反内感受项目,似乎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借此表示这些倾向。一种有趣的差异出现在项目 53 中(隐私),他在该项

目上得分为 3,低于团体平均分。这个反应与他在访谈中提出的价值模式并不十分一致,而与他在访谈中的表现倒是相当一致:正如上述摘录的对即将到来的婚姻所作的说明那样,他能够在短短的一小时访谈中,面对一位陌生人,相当放松地谈论隐私问题。确实,访谈期间,他始终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和举止,这也许是他的权力主义屈从的一个折射。不仅如此,它还表明,不管麦克多么武断地声称他的独立,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当孤独和麻烦的青年;他十分希望与某个了解他的人交谈。

人们也许会期望麦克在因袭主义问题上得到高分。他之所以拒绝许多团体或机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违反了传统的价值观。与此相对应的是,他对内团体的积极评价是以同样的条件为依据的:诚实、慈善、节俭、勤奋等等。他关于工作、恋爱和婚姻的想法似乎是十分传统的。除了反内感受作用外,他的因袭主义的平均分与其他变量一样高。他的平均分之所以没有显著地超出团体平均分,是因为团体平均分本身很高:比任何其他变量都高。此外,与团体平均分相比,他对因袭主义项目的分辨力不高,平均分辨力为 1.26,是若干变量中最低的平均分辨力。在项目 19(回避)上,麦克的得分低于团体平均分。他不同意该项目的观点,是与他所表示的独立价值观相一致的。有趣的是,尽管他在访谈中拒绝宗教,但他在回答项目 12 时却非如此:他拒绝批评现代教会。他的因袭主义不容许他对如此完善的宗教机构实施攻击。

我们从麦克的访谈中(见第二章)可以推断,他谴责各种团体或机构的目的是想建立他那自私的内团体,但他无法证明这种反社会愿望的正确性。于是,他把这些愿望看做不是他自己的愿望,而是他周围的愿望。这是一种以相当极端的形式出现的投射。如果麦克在这一变量上没有超出团体平均分的话,那

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一定是量表出了问题。他在项目 70(阴谋)上的得分为 7,看来这完全符合他在访谈中关于政治的看法。他对项目 46(性放荡)和项目 73(感染和疾病)的反应,与上面提及的性抑制情境是完全一致的。他在项目 65(世界性灾难)上的得分明显低于团体平均分,这可以归因于他的固执的价值观。他不仅在访谈中,而且在对“迷信”一类的项目反应中,均表示了这种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科学的“现实主义”并未保证他在解释社会事件时站稳立场。

麦克在“破坏性和犬儒主义”类目上稍高于团体平均分。它提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访谈给人留下一个相对来说“温和”的印象,因为他既没有作出偏激的论述,也没有表示暴力的意向。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破坏性和犬儒主义”类目的个别项目,便会发现,对于那些属于公开攻击的项目,他的得分趋于团体平均分或低于团体平均分,但在一些涉及犬儒主义的项目上,得分高于团体平均分。由此推论,麦克不会直接表示攻击,除非它以某种道德名义来实施,换言之,某个在道德立场上遭到拒绝的团体可以实施攻击。

我们发现,麦克处理攻击的另一种方式是他的犬儒主义评价。他的访谈充满犬儒主义:一些机构握有大权;官员们只想到他们自己;罗斯福很自私,想第四次连任总统等。他在项目 30(动乱的报道)、59(始终存在战争)、67(眼睛盯着利益)上获得高分,充分说明了这种倾向。当然,认为麦克具有无意识的攻击倾向,并被投射到人性和世界上,这种说法还只是一种假设。麦克还表现出某种类似犬儒主义的东西:他既同意项目 30(动乱的报道),又同意项目 48(应当消灭德国人和日本人),这两个项目均出现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内。在同意前者的时候,他说德国人并不像被描述的那样坏;在同意后者的时候,他则说我们必须

尽己所能消灭他们。

根据麦克的访谈,我们可以期望他在权力主义屈从问题上可能获得最高平均分。他美化内团体的权威(例如马歇尔将军、陆军部、大资本家),将他们视做“上帝”,这是访谈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他在这个变量上的分数(4.0)正好位于团体平均分之中。考虑一下属于这一变量的项目,既可以发现量表和访谈的某种一致性,也可以反映出问卷 78 的某些不足。麦克的得分高于团体平均分的一些项目,例如项目 23(爱父母)、32(学习是基本的)、50(服从和尊重)、77(健全的人)等,就是以其最纯的形式表示权力主义屈从的项目:它们中有 3 个项目与家庭忠诚有关,项目 50 与权力主义教育有关。一些与宗教有关的项目,例如项目 39(超自然力量)和项目 43(化学等科学),其思想和感情原先是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被体验到的,现在却以科学的价值观表现出来。对此,他的得分很低。人们也许会说,麦克的屈从倾向得到了并不充分的升华,从而使它们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凡是重要的力量,都是可以确立的;它们存在于个体身上,或者存在于物质客体内部。奇怪的是,他并不同意项目 74(不知疲倦的领导人)。该项目的团体平均分很高,分辨力却相对较低。看来,对于那些真正屈从的被试,诸如麦克,这个项目太直接了。由于它击中要害,因此被试的反应多少带有他们自己的情绪。但是,项目并非要求情绪的卷入,而是按照陈述中的理性要素作出反应,所以这个项目在继后的修订中应该最大程度地缩小理性因素,更加强调领导方面的内容。另一个较差的项目是项目 20(进步教育)。自由主义者和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都可能被“进步”这个话题所吸引。麦克不是进步教育的真正支持者,这一点可从他对项目 32(学习是基本的)的热情赞词中得到佐证,它也许是可以找到的一个关于教育的极端保守主

义的陈述。

在那个并不令人满意的力量和“顽强”的类目中,麦克的得分位于团体平均分之下。访谈和量表之间的一致性表现在下述事实之中:不论在何种项目上,他都拒绝成为一个顽强的、具有攻击的人。正是由于他对权力的羡慕,以及屈从于权力的意愿,而不是想成为一个具有攻击性的领袖,因此他存在着法西斯主义的潜力。

关于麦克的外感受作用已经谈了很多,这可以从他的访谈和他对量表的反应中看出。鉴于此,他在“迷信”问题上得分很低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同意项目2(占星术),对此项目大多数被试是不同意的。他的同意表明,他在访谈中所说的反对迷信,并不是真正把科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认同,而是以他需要表现的顽强、现实主义和不想“受骗”为基础的。

一般说来,在麦克的访谈和他对量表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当量表未能表现相对来说专门的和独特的事物时,差异便出现了。也就是说,当特定的量表项目存在缺陷,未能在高得分者和低得分者之间作出分辨时,差异便出现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困难在量表的修订中已被克服。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拉里的例子。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个变量之外,拉里在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各个变量中得分均低于团体平均分(这个惟一例外的变量是权力主义攻击)。他与团体平均分偏离很远,就所得低分而言,最低的是权力和“顽强”、投射和反内感受作用;次低的是迷信和权力主义屈从;至于破坏性、犬儒主义、性和因袭主义等问题,其得分接近团体平均分。

与麦克的倾向相比,关于拉里的倾向似乎没有多少话好说。

在权力和“顽强”这一类目中,他不同意任何项目,这与他在访谈中的表现颇为一致。访谈中,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温和的、值得交往的青年。他只同意一个投射性项目,即项目56(犯罪浪潮)。即使如此,其得分也仅仅勉强地处于团体平均分之上。访谈中,他承认他想找出他目前的动机和倾向的根源。在内感受作用上,他对自己的感情给予相当的重视,说他喜欢将事物“哲学化”,并且讨论偏见的心理因子。在项目55(休闲)和53(隐私)上,出现了不一致,其得分稍高于团体平均分。前者可被视为他的因袭性表现,后者则似乎与他的特定问题(也即他患肺结核)相联系。

就拉里的访谈而言,没有任何线索表明他有迷信色彩,因此,可以期望他在迷信变量上得分较低。不过,他为什么同意占星术项目则是一个问题。也许,可在这种被动的性格中发现一种神秘主义的要素。在拉里的访谈中,权力主义屈从相当突出。他清楚地表示他十分尊重自己的家庭,不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极少有讨厌家庭的表现。至于他为什么仍得低分,我们认为,若想在这个变量上得高分,对特定的权威就不只是一般的尊重:必须夸大屈从,或者做得过头,包括家庭成员外的其他人员。3个项目中有2个项目拉里的得分在团体平均分之上,它们是项目23(爱父母)和77(健全的人),因为它们特别指向与家庭有关的内团体感情;第三个项目,即项目32(学习是基本的),给了他表示因袭性的机会。

拉里在破坏性和犬儒主义类目中的得分低于团体平均分。但是,他对世界所持的纯朴的乐观主义态度(在访谈中表现出来)足以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的得分不更低些?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他所接触的项目的团体平均分均较高,分辨力均较低。由于这些项目分辨力低,彼此之间比较接近,因此

许多人会同意它们,而拉里则是一个充分的遵奉主义者。

拉里在性问题上的得分是 0.55,低于团体平均分。下述言语摘自他的临床访谈,颇有启发。

(性?)“没有什么大问题。像其他男孩一样,我也想女孩。有时我会盯着她们。大约 15 岁时,我便和她们外出。我喜欢她们,与她们在校内外交往。你知道,人都有性欲,但我不会使她们讨厌我。”

(性道德?)“我认为,对女孩来说,在 21 岁或 22 岁前,无论如何要保持贞操。如果她希望在此年龄后就结婚,那她就应当在此年龄前保持贞操,直到结婚。如果她是一个职业女性,或者不想结婚,那么与一个未婚男子谈恋爱也无妨。但是,她要冷静,有计划,以免影响他人的道德标准。她应当慎重挑选一个男人,与之建立性关系,而不是同时与几个人建立性关系。”

(你的性?)“那要到我出院以后,或者说等我 23 岁或 24 岁时。在此之前,我有过几次恋爱,持续几个星期或一个月。在我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之前,我不会结婚。我希望的对象是一个处女,但也不一定。我对不是处女的女人会不再尊重。我知道那很自私,但是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尽管这里的阐释十分传统(正如拉里所说:“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它并没有揭示存在于性项目高分背后的那种压抑。实际上,如果拉里在项目 31(同性恋)上的得分不是 6 的话,那么他在这个变量上的分数将会十分低。也许,他在这个领域没有摆脱忧虑。这个问题最好放在我们讨论临床材料时再分析。

关于拉里的因袭主义已经谈了很多。他在这个变量上的分数接近团体平均分,是较为合理的。不过,他在权力主义攻击问题上却高于团体平均分。这一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虽

然他的分数仍然低于麦克,但是他的访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年轻人不想惩罚他人的印象,而这恰恰是对量表的批评,因为它未能证实这种印象。拉里在 2 个项目上得分上升,它们是项目 31(同性恋)和项目 23(爱父母)。前者在上面已讨论过,后者尽管有惩罚的成分,也表现了权力主义的屈从,但他的反应却可以根据他对家庭的忠诚来解释。权力主义攻击项目的团体平均分和分辨力相对来说是令人满意的,可是,就目前的变量而言,法西斯主义量表并未在拉里的个案中提供真实的情况。

拉里和麦克之间的差异,在他们对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反应中得到充分反映。除了一个类目(迷信)外,麦克在所有变量上的得分均高于拉里。在反内感受作用、投射和性问题上,麦克高出 2 分;在权力和“顽强”、权力主义攻击和因袭主义上,麦克高出 1 分;在破坏性和犬儒主义、权力主义屈从上,麦克分别高出 1.00 和 0.87 分。特别有趣的是,那些十分分化的变量(反内感受作用、投射性和性),它们并不直率地表示法西斯的思想内容,其根源似乎深置于人格的内部,而且相对来说不受外部变化的影响。后面几章将会表明,随着我们的分析深入到个体,高一低得分者之间的分化会变得格外清楚。

六、小 结

我们试图设计这样一个量表,它既能测量偏见,又不具有此类项目,而且也不提到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名称,这种尝试看来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之间的相关为 0.75,意味着前者的分数可以从后者的分数中正确地得到预示。我们已经达到了建构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第二个目的,也就是创制一种工具,以便从人格水平上对法西斯主义的接

受情况进行估计。不过,实现这第二个目的的事实还有待证实。

一些未被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等研究所关注的领域,已以变量形式被设计出来,它们形成一组表现特征,而且,研究发现,它们与反犹太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所涉及的反民主倾向显著相关。这至少意味着,一种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可能获得相当的延伸,而导致这一模式延伸的关键因素是个体的性格倾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量表所涉及的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性格变量。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随着我们专门调查性格而设计问卷,它们就会直接暴露出来。而且,在这种性格调查中,允许个体自发地表白自己。后面将要报道的临床调查,不仅使本章的研究结果具体化,而且还提供了对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的深入了解,以及它在个体内部发展的情况。

注 释

- [1] 本章为尼维特·桑福德(R. Neritt Sanford)、阿道诺(T. W. Adorno)、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Else Frenkel Brunswik)和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等人所撰。
- [2] E. 弗洛姆(E. Fromm, 42), E. 埃里克森(E. Erikson, 25), A. 马斯洛(A. Maslow, 79), M. B. 奇斯霍尔姆(M. B. Chisholm, 18)和 W. 里赫(W. Reich, 96)等人的权力主义思想对我们的权力主义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
- [3] 尽管在法西斯主义量表的问卷 78 中没有出现属于“定型”的项目,但是这类项目在后来的问卷中却有了一席之地。看来,在这里介绍这一概念以供讨论是不错的。
- [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俄勒冈大学女生的例子中,问卷 60 分两部分执行:A 部分包含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一半,B 部分在一天以后实施,包含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

义量表的另一半。这样安排的目的是想测试一下,对于一个量表中有关项目的反应,是否会受到同一问卷中其他量表项目的影 响。显然,这种变化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差异。当我们把俄勒冈大学女生(第一组)的问卷结果与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第二组)的问卷结果作一比较时——第二组与第一组十分相似——我们发现,信度平均分和标准差等方面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以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为例,情况也一样,表 4-14)和表 5-5 都说明了这一点。俄勒冈俱乐部男子组(第五组)只接受了问卷 60 的 A 部分,他们的平均分要比俄勒冈俱乐部另一组男子低一些。不过,这种差异不能归因于问卷的差异,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第五组比起其他组来,被试是在听了“如何解决德国问题”的演讲后才填写问卷的。在演讲的内容和法西斯主义量表的内容之间至少有着一种含蓄的联系;正如有位被试在意识到这种联系后对我们所说的那样:“你们本该在演讲之前就发下问卷的。”

- [5] 这一分析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赞助。
- [6] 费希尔(Fisher)的 $2r$ 被用来计算这里的平均 r 。
- [7] 看来,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关并不取决于这两个量表是否在不同时间进行调查,或者在同一时间调查时一种量表的项目与另一种量表的项目相混合。在俄勒冈大学女生组中,她们运用问卷 60,获得的相关值不仅与俄勒冈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女生组使用的问卷 60 相似,而且实际上与所有各组被试的平均民族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相关值相同。
- [8]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A”部分的信度(作为问卷 40 的一个组成部分提供给该组),并未计算在内。
- [9] 理论上讲,如果两个量表完全可靠的话,则相关系数约为 0.9。这表明两个量表所测量的东西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尽管不是完全一致)。
- [10] 访谈者的报告用仿体印出。本材料中的引号表示被试陈述的字面记录。

第八章 与智力和教育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1]

我们之所以推测智力和教育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是有若干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涉及方法论:由于所有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目(它们出现在民族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系列中)都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如果被试表示同意的话,则这种反应便代表了一种赞成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一些理解力不太强的个体得了高分,这不是因为他真正确信,而是因为他易受暗示,并缺乏分辨力。在回答此类项目时,我们主要对所需测量的两个内容感兴趣:一是测量被试的可接受性;二是测量被试对反民主思想的被动的、消极的易受暗示性。但是,我们应当注意,易受暗示性不过是影响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远非最重要的因素。

有关章节提出的假设和解释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了智力与民族中心主义是呈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高分的人要比得低分的人智力稍差一些。对思维材料和临床材料的分析表明,民族中心主义既与思维中的定势、僵化和具体化有关[对此,可以参见罗基赫(Rokeach, 98)的文章],也与自我的狭隘性有关,还与个体难以对社会现象进行心理社会学解释有关。由于这些变量只是智力的部分组成内容,还由于它们虽然显著但不完善地与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因此,我们可能期

望,在智力与民族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对来说较低的但恒常的负相关。

然而,上述的相关可能由于另一种因素的介入而接近于零。人们经常观察到,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个领域(例如,在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机械师或商人的职业中),能以高度复杂的、抽象的和灵活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却并不理智。看来,基本的智力只有按照某些情绪—动机的原则才能表现它自己;它能自主地沿着某些路线运作,可在其他路线上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受阻和歪曲。不论什么原因,事实上许多个体在他们的智力行为方面是不一致的,尤其在他们的社会思想方面表现出某些“非智力的”(定势的和僵化的)品质,尽管就智力测验而言,他们的智商并不低。与此相反,智力中等的一些个体,在他们的社会思想方面却能现实地或灵活地进行运作。智力测验只是测量某些基础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相关可能要比人们所期望的更低一些(至于它们是否确实测量了那些专门的心理功能,这还不完全清楚)。如果相关性很高,超过了0.4~0.5,那么我们便有理由怀疑这些量表是不可靠的。但是,从理论上说,智力本身在社会思想领域究竟具有多大的作用,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民族中心主义与教育的相关也可能虽然显著但却偏低。对我们的教育体制来说,主要陈述的一个目标是民主价值观念的教学,这些民族价值观念在我们的宪法和其他文献中均有所表现。只要我们在这些目标上取得成功,民族中心主义与教育应当是呈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民族中心主义则越少。

上述这些假设是与以往关于偏见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研究相一致的。^[2]

业已表明,“自由主义者”(就团体关系、政治、宗教等思想而

言)在智力上略胜一筹。大学里,他们得分较高,阅读更多,并具有显著的好奇心。由于分歧明显,因此在分歧之间肯定有许多重叠。

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若对参与调查的各个被试组实施智力测验是不适宜的。况且,有四个被试组已经实施过智力测验。这四个被试组是海事学校男子、职业介绍所男子、精神病诊所男女病人和圣·昆丁监狱男犯。在我们的问卷中,没有收集教育年限方面的信息;之所以省略这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答案可能不可靠,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担心那些受教育较少的被试在问卷上采取守势。在某些被试组中,例如在大学生和专业人员组,受教育的量相对来说是恒常的。对于下列两个组,即精神病诊所病人和海事学校男子,受教育年限以某种可靠的方式(尽管不是完全可靠)来确定。

关于智力的数据在表 8-1 至表 8-3 中显示,关于教育的数据在表 8-4 至表 8-5 中显示。我们首先考虑智力问题。

表 8-1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与各种能力测验的相关(海事学校男子)

能力测验	测验特性			与下列四项的相关 ^b			
	平均 ^a	标准差	区间	陆军通用测验	民族主义 A	民族主义 A+B	法西斯主义
陆军通用分类测验	126.7	8.98	102~153	-	-0.02	-0.20	-0.20
机械理解	126.5	14.61	66~166	0.25	-0.17	0.00	-0.13
阅读理解	92.5	13.04	57~121	0.55	-0.08	-0.06	-0.20
算术理解	81.2	8.88	61~105	0.59	-0.06	-0.16	-0.16

a. 这里的平均值可以与下列人口平均值作比较;就总人口而言,陆军通用分类测验和机械理解测验的平均值为 100。就“中学毕业生”人口而言,

阅读理解测验和算术理解测验的平均值为 79。可见,这里的样本是明显高于平均值的。

b. 涉及相关的案例数(N)如下:总体样本为 343 个被试,342 个接受了所有的能力测验,其中有 4 人例外,他们省略了阅读理解测验。因此,陆军通用分类测验和法西斯主义量表的相关是以 342 个个案为基础的。包括在问卷 40 内的民族中心主义 A 型量表,有 168 个个案,而民族中心主义 A+B 量表则有 178 个个案。

表 8-2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与奥蒂斯高级 A 型智力测验的相关(职业介绍所男性退伍军人)

	奥蒂斯测验特性		奥蒂斯与各类量表的相关 ^c	
	平均 ^a	区间		
奥蒂斯原始分	56.5	34~75	民族中心主义 ^A	-0.32
奥蒂斯智商	114.5	92~133	民族中心主义 A+B	-0.22
斯坦福—比纳智商 ^b	129.5	108~140	法西斯主义	-0.48
			政治经济保守主义	-0.16

- a. 奥蒂斯平均智商为 114.5,人口平均智商为 100.00(人口标准差为 10.0),前者显著地高于后者。
- b. 把奥蒂斯分数转化成斯坦福—比纳智商,是通过吉塞利博士(Dr. E. E. Ghiselli)设计的一张表来完成的。对于总人口而言,斯坦福—比纳的平均分为 100,标准差为 16。
- c. 在样本中,奥蒂斯测验数据是由 105 名个案中的 104 名个案提供的。因此,就它与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而言,个案数为 104。对于民族中心主义 A 型来说,个案数也是 104,因为民族中心主义 A 型分数既用于问卷 45 的被试,也用于问卷 40 的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 A+B 的情况下(问卷 45),个案数为 50。

表 8-3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每个四分位数的
韦克斯勒—贝尔维平均智商分数
(精神病诊所男女病人)

问卷 45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四分位数	民族中心主义的区间	个案数	平均智商
低四分位数	10 ~ 24	8	125.3
低中四分位数	25 ~ 36	5	117.8
高中四分位数	37 ~ 50	13	113.9
高四分位数	51 ~ 70	11	107.3
		37	114.9

a. 被试所反映的只是每个四分位数的一个部分。在 121 个男女被试中, 50 个男子, 71 个女子。男子中有 15 个, 女子中有 22 个都已接受过韦克斯勒—贝尔维智商测验。关于每个四分位数的比例, 男子和女子均相似, 这与平均智商是一致的。但是, 为什么只有部分被试接受测验, 这点尚不清楚。平均值 114 近似于病人的平均值。

对于表 8-1 至表 8-3 中的所有三个组来说, 平均智商明显高于一般人口的平均值(大约高出一个 Σ)。甚至最低得分者(除了第三组以外), 其得分也高于人口平均分。对此事实, 也即“天才区间”(range of talent)的限制, 必须在评价结果时予以考虑。海事学校男子的相关是用陆军通用分类测验(AGCT, Army General Classification Test)获得的, 职业介绍所男子的相关是用奥蒂斯高级 A 型智力测验(Otis Higher Form A Intelligence)获得的, 两者的相关十分相似。根据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问卷(45 和 40), 这些测验的相关区间在 -0.02 和 -0.32 之间, 平均在 -0.2 之上。民族中心主义与机械、阅读和算术理解测验^[3]的相关性(表 8-1)稍低一些, 平均大约 -0.1 。这些相关合在一起,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也就是说, 在 5% 的水平上大于零。值得注意的是, 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表 8-3 为 4 个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四分位数提供平均智商[韦克斯勒—贝尔维智力测验(Wechsler - Bellevue Intelligence Test)], 而且我们找到了一个低的负相关的证据。

表 8-1 至 8-3 表明, 对于那些智商接近 100 或 100 以上的个体, 其智力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较低的负相关: 一般说来, 最具民族中心主义的被试比之较少民族中心主义的被试智力低些, 而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的中等得分者, 其智商是居间的。至于圣·昆丁男犯的数据(上面几张表已有展示), 表明在智力区间分布较广的一些组里, 其民族中心主义和智商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关系。例如, 在圣·昆丁的样本中, 110 个被试中有 77 个已获得韦克斯勒—贝尔维测验分数。这个亚样本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为 4.68, 标准差为 1.28, 与整个样本平均分 4.61 和标准差 1.28 相差无几。韦克斯勒—贝尔维平均智商(就整个量表而言)是 109.0, 标准差为 13.8, 区间为 78 ~ 132。由此可见, 这个亚样本在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和标准差方面几乎与整个(问卷)样本相一致。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智商之间获得的相关是 -0.28 。正如上面已经报告过的样本那样, 该相关的相关是 -0.28 。正如上面已经报告过的样本那样, 该相关的智商区间是更受限制的。当然, 这还不是结论, 因为受测的样本在其选择方面可能抱有偏见。此外, 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教育和阶层水平)也对这种相关起了相当的作用。看来, 它们至少与民族中心主义和智商有关联。关于智商和民族中心主义关系的结论性研究, 必须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或者使它们保持恒定。下述这些负相关(它们取自各种被试组的各种智力测验)为民族中心主义和智商之间的有意义关系提供了实质性证据。相关大于零, 但呈负性, 这种情况既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又与目前关于

民族中心主义中定势和僵化问题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相关适度地接近。处于-0.2到-0.4的区间的事实表明,智力只是决定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分数的众多变量中的一种。

能力测验和法西斯量表之间的相关可从海事学校男子表8-1和职业介绍所退伍军人表8-2这两个被试组看出。在前一个被试组,相关的变动区间处于-0.13和-0.20之间,而在后一个被试组,却获得了相当高的值,即-0.48。看来,智商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比智商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退伍军人组例外,其相关相对较低。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是,确定-0.48这个相关值是否是假的。智商与法西斯主义的相关高于它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相关,这一点可以根据某些法西斯主义的类目来解释,例如迷信和定型;智商与个别法西斯主义项目之间的相关,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获得。至于智商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之间的相关,即-0.16,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

智力与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这一点也由团体的总数据给以提示了。因此,虽然表8-1至8-3展示的三个组在平均智商方面十分相似,但它们在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方面却差异甚大。精神病诊所病人得到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为3.7,比海事学校男子和男性退伍军人的平均分低了整整1分。此外,尽管男性退伍军人的平均智商很高,但他们在接受测验的所有各组中其民族中心主义是最强烈的。因此,高智商的人也有可能是在思想和人格方面具有权力主义型式。

表8-4和表8-5呈现了民族中心主义与受教育量的关系。令人惊奇的一个结果是,这两个变量在精神病诊所组比在海事学校组更具相关性。就精神病诊所组而言,随着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分数的增长(表8-4),教育年限的平均数则逐步下

降。但是,海事学校的数据表明,其变化并不那么一致。把问卷45和40的数据相加,可以发现,受教育年限不到12年的被试(也即不是中学毕业生)得到了最高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4.9),而那些受过12~14年教育的被试(没有一个是大学生),其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为4.6。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两个问卷的结果是否可以相加?如果分别观察每个问卷的话,其结果是十分醒目的。在问卷45的那个组里,不存在一致的倾向,受过13年教育的被试得到了最高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而处于其他教育水平的被试则在0.1分的区间内变动。另一方面,在问卷40组里,受过13年教育的被试,民族中心主义最少,而处于14年教育水平的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立场上与12年以下的被试相似。两个问卷的惟一差别出现在12年教育水平和不到12年教育水平之间,这种差别接近5%的统计意义。

表8-4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每个四分位数受教育年限的平均数(精神病诊所男女病人)

问卷45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四分位数	民族中心主义的区间	个案数 ^a	平均教育年限 ^b
低四分位数	10~24	29	13.8
低中四分位数	25~36	28	12.7
高中四分位数	37~50	27	11.8
高四分位数	51~70	28	11.2
		112	12.4

a. 这些数据取自50名男子中的45名和71名女子中的66名。男子和女子的平均数十分相似,两者相加为个案数。

b. 有5名个案受过专门的训练,例如,文秘专业或会计专业,因此在受教育年限上加上一年。

表 8-5 各种教育年限被试组的民族中心主义
平均分(海事学校男子)

教育年限	问卷 45 (民族中心主义 A+B)		问卷 40 (民族中心主义 A)		全部被试	
	个案数	平均	个案数	平均	个案数	平均
不到 12 年	36	4.38	60	5.21	96	4.90
12 年	104	4.28	91	5.04	195	4.63
13 年	13	4.75	7	4.40	20	4.63
14 年	18	4.34	6	5.17	24	4.55
空白	7	4.63	0	-	7	4.63
合计	178	4.36	164	5.08	342	4.68

为什么精神病诊所组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更趋一致呢?一种可能性是,海事学校的被试在上了一二年大学后便停学了,严格地说,他们是不典型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这组大学生可能具有较少的民族中心主义。如果上述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教育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明确的关系。不过,在精神病诊所的例子中,其关系可能是虚假的,因为这个样本中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并非是一般教育意义上的随机样本。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受过大学教育的病人比那些未上过大学的病人,可能为了谋取心理治疗而接受选择。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比起这里展示的关系来,民族中心主义和教育之间的真正关系就不那么清晰了。

人们也许会大胆地提出这样的假设:正如民族中心主义与受到的教育量有关那样,它也与希望接受的教育量密切相关。由此推测,两个在职班(问卷 78 和 45)的大多数成员只受过 12 年教育或不到 12 年教育,作为成人,他们意欲“了解更多的东西”,甚至想获得大学学位。结果,像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一样,

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也较低。当然,临床证据也支持了这种假设。无论怎么说,关于各种团体平均分的考察表明,就两个被试组而言,教育水平可能相似,但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却有很大差异;同理,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可能相似,但教育水平却十分不同。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教育水平相似,但在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方面却显著不同(反犹主义量表的问卷 78 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问卷 40)。此外,工人阶级尽管与圣·昆丁男犯组在社会经济背景和教育背景方面相似,但前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较少(问卷 45)。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中心主义与受到的教育量呈低度负相关。据此推导,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较少民族中心主义,中学毕业生比未完成中学学业的学生较少民族中心主义。尽管这还不是十分明确的事实。至于下列两点哪一点更重要(即相关大于零或者相关不偏离零),这尚不清楚。对于那些竭力主张教育是一种灵丹妙药的人来说,微小的相关都是应当加以强调的。但是,我们这样说并非是想否认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包括公立大学和公立中小学)是为民主价值观念服务的一种社会力量,但目前它仍远不能实现其潜在力量。其中的原因已经超越本研究的范围。可以指出的是,即使在最佳的教育条件下,涉及民主价值观念的显性课程仍然不充分,致使民主教育难以有效地得到发展。

让我来概括地说一下,民族中心主义既与智力又与教育有着虽低但统计上有意义的关系;受教育最多的被试,以及最具理智的被试,其民族中心主义最少。然而,这些变量在本研究中只进行了部分探讨,它们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关系还需广泛地采集样本,尤其需要采集教育水平较低和智力水平较低的样本。此外,还需要适当地控制其他变量的运作,包括阶级水平、教育机

会和教育动机。可是,本研究的结果确实与人们普遍持有的偏见和某种法西斯理论相抵触。这种偏见常因单纯的愚昧或混乱而得到支持;这种理论却鼓吹独裁的社会结构最适合于权力主义人格。未来研究的一个诱人前景是对所谓“智力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intelligence)的研究。例如,民族中心主义个体的理智(即便是那些具有高智商的个体)似乎是相当刻板的。他们在与事物打交道时比与人打交道时运作得更好,而且主要是外感受作用的(extrareceptive)。但是,他们在处理具有心理学性质的问题时会产生混乱,尤其在处理那些涉及个体需要和情感的问题[反内感受作用(anti-intrareceptive)]时会产生混乱。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尤其是第四章),本研究抽取的整个样本的平均智商和教育水平略高于总人口的平均智商和教育水平,或者,更确切地说,高于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主要参照人口)的水平。这种样本收集的偏见,与年龄偏见一起(我们的样本比代表性样本年龄稍轻),导致我们获取各种量表的平均分偏低。然而,这种误差要比一开始怀疑的较少一些。此外,上述的样本采集因素也不可能把思想、人格和被试的团体成员身份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歪曲到可以察觉的程度。由于我们主要关注反民主倾向的原因和相关事物,也就是说,关注相关和差异,而不是任何单一倾向的平均量,因此,可以说,构成总样本的各个被试组为本研究提供了适宜的基础。

注 释

- [1] 本章为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所撰。
- [2] 关于报道和摘要的材料,请参阅墨菲、墨菲和纽科姆(Murphy, Murphy & Newcomb, 85),以及克尔(Kerr, 63)的著述。
- [3] 贝内特机械能力测验(Bennett Mechanical Aptitude Test)、衣阿华默读测

验(Iowa Silent Reading Test),以及斯坦福成人算术推理测验(Stanford Adult Arichmetical Reasoning Test)。

